

在

历史的漩涡中——

姚杉尔

著

- 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院
- 三顾茅庐与平反委员会
-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 能干的女将
- 阳光下的猫头鹰
- 大把头和恶婆婆
- 魔鬼戴上了天使的面具
- 六六六秘密会议
- 阳谋·阴谋·牛鬼蛇神出笼
- 有一天该我当总理了吧

中国百名

大右派

朝华出版社

在历史的旋涡中——

中国百名大右派

朝 华 出 版 社

GDA-8/17

(京)新登字138号

总策划:姚杉尔

特约责编:严君

在历史的漩涡中

中国百名大右派

姚杉尔 著

朝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212工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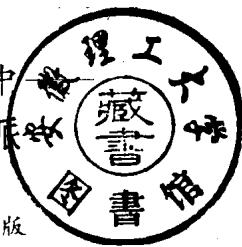
850×1108毫米 32开本 印张17 370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7—5054—0280—3/I·0072

定价:12.20元



524-817

前 言

这是一个产生梦魇的时代。

这是一个产生悲剧的时代。

一切的社会关系都处在动荡、无序、脱节和错位的状态。

一切社会生活都失却了原有的价值和准则。

悲剧的时代产生了悲剧的人物。

悲剧的主人公就是中国人自己，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

当1950年郭沫若代表党外知识分子在天安门上虔诚地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的时候，

当1951年口诛笔伐《武训传》的时候，

当1952年大批特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

.....

这部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

.....

1957年，在那个不寻常的“早春”到来之时，一场新的悲剧又开始酝酿了。

前
言

一夜之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人生的梦幻、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豪迈、人生的尊严，一切的一切，都统统变成了一个令人感伤的童话：

一个住在十八层地狱的小鬼每到夜晚睡觉时，总是听到地板下有长嘘短叹声。有一天晚上，他忍不住了，便大声问：

“谁在下面？”

好久之后，地板下传来了凄惨的回答：

“右派分子。”

.....

这是一个产生悲剧童话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谎言就是真理，

虚伪成了忠诚，

灵魂撕裂成零乱的碎片，

自信垮成了俯首与听命。

一组美妙绝伦的逻辑也随之形成：

凡右派，政治上一定反动透顶！

凡右派，生活上一定腐朽肮脏！

凡右派，历史上必有劣迹！

凡右派，日日在做变天梦！

.....

前 言

反右斗争的扩大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但是,透过“不幸”的表面,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们可以承认自己“罪大恶极”!

他们也能揭发他人“罪大恶极”!

他们在深揭猛批之后,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已经有人反省了,忏悔了。

但卢梭式的、巴金式的忏悔实在太少,太少了。

反右扩大化的根源在于极“左”,

反右的扩大化就是极“左”。

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经形成了一股习惯势力。中国需要防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我们不能再迷惘了!

我们不能再徘徊了!

我们不能再踟躇了!

我们不能再徬徨了!

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痛苦,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

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旅程的坎坷,

中国知识分子一曲悲歌的哀伤，

.....

我们不愿，永远也不愿，再见到了。

中国不需要“左”，永远不需要。

中华民族的悲剧，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忆往者之不谏兮，知来者犹可追。

前 言

●前 言

1

●章伯钧·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院”

1

○望江南·救国岁月稠 ○不是引
“蛇”出洞 ○“和风细雨中”·“手
托茶壶笑颜开” ○“有一天该我当
总理了吧” ○葫芦中的灵药
○“我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
神经中枢·智囊团·五大将 ○楚
歌声声·余罪袅袅

●罗隆基·“三顾茅庐”与“平反委员会”

34

○“士为知己者死”和“成立一个自
成系统的委员会” ○“把我烧成
灰，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
○“你杀我的头，我也没有小集团”

- “无形组织”和“章罗合作”
- “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野心家”
- “最后总攻”·“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储安平·“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82

- “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 “不晓得知无不言有个界限”
- “对农民大发雷霆，斗地主躲躲闪闪”
- “向人民投降”
-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浦熙修·“能干的女将”

119

- “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来写新闻”
- “知人知面不知心”
- “犹抱琵琶半遮面”
- “得意杰作”·“吐露内情”

●徐铸成·“未甘盛世作遗民”

141

○“鸣放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墙’是能够拆掉的” ○阴谋·
阳谋·牛鬼蛇神出笼 ○“盛世遗
民”·“以盟代党”

●费孝通·“章罗联盟的军师”

163

○乍暖乍寒早春天,草色遥看近却
无 ○“我犯下弥天大罪” ○“白
脸挨打” ○学术批判? 政治围攻?
到底为哪桩? ○并非尾声的尾声

●曾昭抡·“大把头”和“恶婆婆”

195

○“意见书”和“秀才造反” ○“头
上一顶大帽子,脚下一双大鞋,拖一
个小尾巴,肚子却很空虚” ○“科
学界的大骗子,凶恶的把头教授”

●钱伟长·“科学界的掮客”

218

目
录

○“六六六”秘密会议 ○理工合校
大签名 ○反动的科学纲领○“有
职无权”论 ○“超级自大的万能科
学家”

●吴景超·“章罗联盟的干将”

239

○“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
堡垒” ○“劳动人民少生育，资产
阶级多生育”

●黄药眠·“章罗联盟的参谋长”

258

○愿变成巨大的竖琴，为千万人的
悲苦抒情 ○山雨欲来风满楼
○“愿意从泥坑中跳出来” ○“卖
假药的葫芦”被打碎

●叶笃义·“党派取消论” 282

○“政治地位超过一切” ○“资产阶级思想冒出头来” ○同志乎?朋友乎? ○反揭批与戴帽子

●潘光旦·“帝国主义撒下的恶毒种子” 300

○揭密·“土家,一个兄弟民族”
○四支“毒箭”·“恶毒的种子”
○“独腿教授”·民主斗士

●钱端升·“法学界右派主脑” 319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 ○美帝培养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功过是非,留待来者细评说”

●沈志远·“魔手的俘虏” 339

○“民主党派应当独立自主了”
○“剥掉沈志远的画皮” ○“事前
监督论”

●陈仁炳·长太息以算帐兮,点鬼火
以消愁 355

○“治安策”与“旧帐” ○算谁的
帐? 赖帐么? ○面貌与灵魂
○“影院点鬼火”

●彭文应·“阳光下的猫头鹰”

366

○所谓“报喜不报忧” ○“美人垂
死英雄败,一片相思负老彭” ○活
报:一场精采的大辩论 ○“迷途的
羔羊”乎? “披着羊皮的狼外婆”乎?
○花絮·谎言·洋相 ○“三
种人”·尾声

●孙大雨·炼狱之行

387

○“只有上帝才能全面” ○莫伊拉
说,众怒难犯 ○还有一块遮羞布
·先砍下我的头 ○春去春又归

●陆诒·“文章满纸书生累” 402

○“全聚德秘密聚会” ○“鸣放三
策” ○难过社会主义的“关”

●宋云彬·“镜前妖形现” 415

○祸从口出 ○“显微镜”下的宋云
彬 ○“照妖镜”前 ○“依葫芦画
瓢”

●王毅斋·“恩将仇报的中山狼”

441

○“民主党派是花瓶、招牌、牌位”
○“有职无权”·“六亲不认”
○“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
嘎然而止的挽歌

●马哲民·“华中主帅”

451

○第一书记请教“拆墙”办法 ○继
续放炮、全面反击 ○天堂有路
○似乎是最后的定论

●韩兆鹞·“贼船上的舵手” 466

○受到周恩来褒扬的人 ○“两条
大腿造反”·澡堂里的污蔑 ○“彻
底脱裤子”

●潘大逵·“谁言蜀中无大将” 486

○“百家争鸣就是百家争人” ○友
情·“真理”·内情 ○“无形组织”
与“有形集团” ○四面楚歌欲何
求？

●林希翎·“魔鬼戴上了天使的面
具” 500

○基本论点派、精神支持派和沙里
淘金派的垮台 ○人啊人，鉴别毒
草与鲜花 ○玉门之行·野心未死
○害群之马·雌狐狸

○行凶者·罗曼蒂克史·谋士的命运
○右史演义·三仙姑的来历

●谭天荣·“哲学的狂徒” 518

○北大不是乐园,这是上帝的旨意
○平妖传又一章 ○除毒草者·
萧捷父 ○东征天津·北大风雷更
响 ○春天不再来·忏悔录 ○阶
级分析法·垃圾一堆 ○密信·公
开信

章伯钧·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195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交通部部长。

○望江南·救国岁月稠

词曰：

怀叵测，

叱咤风云间，

政客生活数十年，

“空守灵牌”不得志，

终身难入愿。

赶紧放火焰，

不如实行“两党制”，

来个“政治设计院”，

走我新路线。

这首以“望江南”为词牌的词是“咏叹”1957年的右派“要人”章伯钧的。

案：词作者为了让人明了其词的旨意，特作以下注释：

守灵牌——章伯钧对人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走我新路线——章氏想用所谓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来实现他第三条政治路线的野心。^①

大名鼎鼎的章伯钧，本世纪20年代以来，便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直到1957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反右运动。

1957年是章氏的政治生命的转折点。由“大名鼎鼎”变为“臭名昭著”之后不久，章伯钧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逝了。

从此以后，似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章伯钧”这个人，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

章伯钧，安徽枞阳人。1895年11月7日生。少年时的章伯钧，曾求学于桐城中学，不久转入武昌高师英语系，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彭湃、恽代英任教，遭到当局的反对，一年后即被解职。1922年，章取得公费留学德国的资格，旋入柏林大学攻黑格尔哲学，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在德国结识了邓演达，政治思想上受到邓的影响。

1926年春，章伯钧从德国回到祖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章离开武汉。八一南昌起义，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伯钧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失败后，章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章伯钧从香港到上海，在宋庆龄、邓演达等的

① 《文艺学习》1957年第8期。

“莫斯科宣言”的号召下，同谭平山等酝酿组织中华革命党，主张推翻南京统治，恢复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精神。1930年邓演达由欧洲回国，8月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章伯钧参与创党，在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1931年11月邓演达遇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章伯钧与黄琪翔等继续团结同志，坚持组织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绞杀，章伯钧等在上海发表宣言，痛斥南京统治“误国殃民”。1933年秋，章伯钧与黄琪翔等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同陈铭枢、李济深等商定以“抗日、倒蒋、联共”为号召，发动“福建事变”。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章伯钧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该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主任。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章伯钧流亡日本，在东京继续团结党内同志，联系爱国人士，筹划重振组织，实行倒蒋抗日。

1935年，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共发出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章伯钧等深受鼓舞，由日本回到香港，于11月在九龙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主张“抗日、倒蒋、联共”。会上，章伯钧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实际上主持全党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章伯钧由香港到达南京、武汉，常与中共代表接触，力主联共、联苏，呼吁民主、抗战。

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章伯钧继续任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被推定为总联络人。7月间，他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以后，章伯钧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

积极参加宪政运动，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下，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章伯钧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在民盟内部，以他为首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始终同“救国会”等进步力量一起，坚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盟内外的右倾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1945年2月，为了坚持和平与民主，反对内战与独裁，章伯钧创办“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半月刊，常撰文揭露、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反共行径。4月，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初，他同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为国内团结到达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的接见与鼓励，回重庆后坚决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并为此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

1946年1月，章伯钧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上保持了同中共基本上一致的态度。国共和谈期间，他呼吁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国民党召开的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在会上做了党务报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主席。10月份，国民党一方面疯狂进行内战，一方面加紧控制民主势力，农工党的活动遂被迫转入秘密之中，章伯钧也在11月份转赴香港。1948年1月，在香港出席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1948年中共发出“五一”号召，章伯钧、彭泽民分别代表民盟和农公党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通电响应，并准备北返解放区工作。9月，章伯钧等人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9月，章伯钧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又曾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副主席。1957年，章氏被打成右派之前，他还身任数职：农工民主党主席，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当然，这只能算是章伯钧1957年前的历史。当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之时，章伯钧的历史，倾刻之间，连同他1957年的一系列“阴谋活动”，都重新进行了改写。

事情还得由“大鸣大放”开始说起。

○不是引“蛇”出洞” 但“蛇”却自动出洞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搞好整风，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多次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或缺点，大胆开展批评。章伯钧已多次发言。

5月21日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再次发言。

他说：“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

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①

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各种报纸上。光明日报更是大载特载章的文章和言论。

一时间，“大鸣大放”达到热火朝天的程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言辞越来越激烈。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这是为什么”为题，发表社论，强调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开响了反击的第一炮。

接着，便有人对章伯钧的言论进行批判。

6月9日，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召开座谈会。

以写《朱元璋》而闻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在座谈会上首先开始了对章伯钧言论的批判。

他说：“……我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①

6月12日，章伯钧在《光明日报》上以“代论”为名发表《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

在此文中，他指出：

“近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绝大多数的批评意见是诚恳提出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党的整风运动的。在广大非党人士提出的批评的意见中，也有些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意见，只要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可以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得到解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的右派分子和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企图混水摸鱼，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把我们的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卑鄙目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

“我们民主党派成员和广大知识分子在帮助党整风和当前的思想斗争中，一定要站在人民立场，判明是非，划清界限，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坚决地予以回击。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例如，他不喜欢对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社论，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们问得好：光明日报的社论为什么不能歌颂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该歌颂？……”^②

也许章伯钧以为，他的这篇代论，可以免除人们对他的批判，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2日。

因为他毕竟响应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也批评了储安平。

但，不久以后，章伯钧便被作为“自动出洞的蛇”，受到了一步步逐渐加重的批判。

○“和风细雨中” “手托茶壶笑颜开”

章伯钧虽然在光明日报亲自动笔发表“代论”，但他依然受到批判。

6月12日下午，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继续举行座谈会。章伯钧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中，先后有六人对章伯钧提出批判。

杨清源首先对章伯钧的言论提出了批评。

他说，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提法，是否有排斥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是否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章伯钧这种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今年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在言谈中就流露出认为共产党不民主的意见。他在三月间党的会议上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这也充分表现他对党的不满。

严信民是第二个发表批评意见的。

他指出：章伯钧在今天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要大家站稳立场是对的，遗憾的是他对自己过去错误言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章伯钧个人，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常常表现了动摇。

李伯球发言指出：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章伯钧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但王忱心却说：章伯钧的发言没有一条是原则性的错误。

张申府也进行了发言。他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章伯钧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

章伯钧最后也发了言，他说：

“今天所有的同志对我都有批评，我非常感谢。我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

“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加以说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①

次日，民盟中央也举行座谈会，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对章伯钧等人提出批评。

但这些批评皆是和风细雨式的。

所以，后来有人便填词批判他：“乐融融也，悠哉游哉，手托茶壶笑颜开”。^②

说他受到批判时，还很不在乎的样子，用茶壶喝茶。

章伯钧也许没预料到“狂风暴雨”的到来。

○“有一天该我当总理了吧？”

形势的发展已很明显，6月13日，章伯钧写了一份近400字的检讨，题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于次日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同时刊载。

其内容如下：

5月22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各方面人士已经提出严正的批评，其中最错误的，就是所谓“政治设计院”和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② 《文艺学习》1957年第8期。

国务院开会的“成品”问题以及文字改革问题。这些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的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检查结果，认为这是由于我几年来学习不够，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跟不上国家新形势的发展，以致犯此错误。我辜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于我的教导和信任，我深觉惭愧。

现在经过全国各界人士对我的批评，使我大吃一惊，我应该及早觉悟，纠正错误，并对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我应该接受这次重大的教训，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并继续深入地检查我错误的思想根源。

章伯钧的检讨没有让人们停止对他的批判，相反，对他的批判反而在升级。

就在他发表检讨书的当天，光明日报登载了司法部长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第四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对章伯钧进行了揭露。

次日，民盟副主席高崇民又撰文对章伯钧进行批判，指出他们是“螳螂挡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①

又次日（即6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大版的篇幅，对章伯钧进行猛烈地攻击。

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胡一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章伯钧的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他在文章中说：

……就在前不久伯钧同志曾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文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文不值”，这句话，在近年章伯钧同志曾说过不止一次。去年，当他在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十大方针”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有民主。资本主义的国家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同志曾几次说到“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这一类的话。

史良同志认为章伯钧同志有两面作法，我认为这是打中了章伯钧同志的要害。记得他在中委座谈会上曾说：世界上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章伯钧同志是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自命的。但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还是以章伯钧同志自己的话来说明。去年7月，在农工党中央的一个座谈会上，他曾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大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么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这一点，连做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做毛泽东了。蒋介石为什么不行？就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

这就是章伯钧同志对于“政治”的理解。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他就常常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农工民主党中央有些同志是深有体会的。

在6月12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上对章伯钧只字不提的黄琪翔到了6月15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上首先发言，对章伯钧的思想主流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的发言刊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他发言的题目是：和章伯钧同志划清思想界限。

他说：章伯钧是个不容易说服的人，据我所知，他的思想一直到最近恐怕还是不十分通。这些天我经常考虑着这个问题，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伯钧参加多年的革命活动，口口声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在政府中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究竟他的思想是怎样的呢？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我看，他一向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在一些事情上常常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他在我党内喜爱自己出主意，作决定，以致党内长期是非不分，在某些场合支持了落后的、错误的一面。

我们党内谁都怕他，他的作风、言论谁也不敢批评，似乎“章伯老”什么都对。

从章伯钧的发言中综合地看起来，就不难看到他思想中的主流。他一直有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思想。他常说：民主党派党员要大发展，今年几万，明年几十万，后年几百万，是不是在想：“发展大了，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

至少他的思想是朝这方向走的，不会冤枉他。

在这次座谈会上，其他的一些人也先后发言批判章伯钧。

夏康农要章伯钧不要文过饰非，

方荣欣说章伯钧现在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中，是不老实的。

何世琨揭露：解放前，章伯钧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口闭口谈马克思主义；但在解放后，社会主义来了，他倒几乎绝口不谈了。见面时，只是谈古书字画，偶尔涉及政治问题，言语之间，总是流露出牢骚抑郁，心怀不满的情绪。

与此同时，民盟地方组织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民盟中央和章伯钧表态。

15日，上海民盟市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谴责章罗决议。

同日，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季陶达提出，章罗等人的意见是否代表党中央？如果代表党中央，盟中央

就应该检查自己的政治路线。若代表自己，又不承认错误或耍两面手段，是否适宜于继续做盟的领导工作？

同时，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举行扩大会议，提出要求盟中央答复的质问：

有人指出有右派野心家利用整风混水摸鱼，盟内野心家是谁？

16日，民盟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联名给民盟中央拍电报，要求章伯钧等人迅速表明态度，对他们的错误言论作出交待。

16日，民盟广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建议民盟中央明确指出章伯钧等人错误。

.....

6月15、16两天，由各民主党派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过去一段时间的政治方向。

这次会议对章伯钧的批判了逐渐减少了“和风细雨”的成份。李纯青质问章伯钧：“你说你被右派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伯钧被迫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最后，章伯钧对光明日报作出声明：

- (1) 社长负主要责任，社长要检讨。
- (2) 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
- (3) 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

6月17日，农工民主党中委继续举行座谈会。

会上有人开始揭“底”、挖“根”。

杨清源说，章伯钧有严重的“向上爬”思想，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王一帆说，章伯钧出身地主家庭，受过欧洲资产阶级教育，满脑子西方民主。

黄慎之说，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许仲年对章的评价是：在困难前是逃兵，在名位前是勇士。章伯钧不止一次夸耀过自己做过

“共产党逃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钟岱说，章伯钧自以为是民主党派的开山老祖，说共产党不公平，自认为：“不如我的人，官和我一样大，如张奚若、傅作义；有的人地位比我还高，如陈叔通、黄炎培等。”

王人旋说，解放前，章伯钧的主张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求发展，希望国民党倒而不倒，他来渔翁得利。

6月18日，民革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对“章伯钧、储安平这种利用职权，有意篡夺光明日报的行为，不能容忍，极为愤慨，严加谴责”，并声明如下：

(1)章伯钧两个多月来不与各民主党派商量，也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即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这个路线方针，完全违反我们民革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其所发生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由社长章伯钧负责。

(2)储安平在章伯钧支持下，在编辑方针上强调只报道共产党和政府的偏差和缺点，拒绝发表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社论；不加批驳地刊登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尽量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闻，企图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且不经各民主党派同意，用光明日报名义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企图在各地集中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应该完全由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负责。

.....

(4)我们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的问题，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对于章伯钧在这一时期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我们决定要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①

○葫芦中的灵药

章伯钧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一块遮羞布一把铁锹
遮羞布写着“我被右派分子所利用”
铁锹在狠命地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章伯钧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一包心灵的炸药，一条资本主义的小道
用炮药要把今天的政权炸毁
然后转过头来往资本主义道上跑
——反右诗

形势的发展对章伯钧越来越不利。

6月18日，民盟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

民盟主席沈钧儒、抱病已久的副主席马叙伦等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作出决定：立即在盟内开始整风，揭露右派的言行。

18日晚、19日晚整风会继行进行。会上已开始把章伯钧“葫芦中的灵药”抖出来。

发言的内容，一个比一个新奇，生动，让人听起来聚精会神。
请看下面的发言。

丘克辉——“章伯钧在解放后，一直存在着反对党的领导的情绪。今年4月他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曾说：我解放前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平居的，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我是不甘心的，是很消极的。他在交通部还经常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说，共产党并不是靠本领吃饭，而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的。”

黄药眠——“章伯钧不能算左派。他一向主张中间路线。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共产党而走中间路线的。……

去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他假借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党分庭抗礼。

章伯钧虽不学无术，但对政治却有无限野心。他对人一抬一打喜怒无常。朝三暮四，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利于他的就是他的朋友，有害于他的就是他的敌人。章伯钧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子。”

曾庶几——“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就一贯反共。他的已故胞弟章伯涛二十六年前就对我说过：我们老大没出息，总想反对共产党。”①

这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著名诗人、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的遗孀也发出一封公开信“斥责章、罗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

信中说：

你们说什么“工业方面有设计院，政治上没有设计院”，什么“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什么“积极分子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

我不得不怀疑你们在施展两面派手法，怀疑你们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搞资本主义复辟，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

你们实在太没良心了！

你们的野心太大了！

你们这种阴谋，我和我的孩子们绝不能答应，就是在九泉之下的一多也绝不能答应你们违背他的意志的这种行为。

作为一个盟员，作为一个烈属、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我要求你们不要文过饰非、应付过关，要老老实实在地彻底交待并解释你们的想法。②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0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6月25日，又有读者在人民日报上正告章伯钧：

是时候了！章伯钧必须老老实实检讨。否则他自己也难免成为人民永远唾弃的象胡风、储安平那样的“历史人物”。

正告章伯钧：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在桌面上举手赞成，背地里进行诽谤；这套手法在今天觉悟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是行不开的，也是掩藏不了的。

是时候了！

必须把你背后那一套见不得人的东西老老实实检讨出来！

同日，陈其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

章伯钧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自己回答了章伯钧是如何如何的一个人。

——我和章伯钧相识十年（从1947年——1957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专玩弄两面手法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搞党”人物。对于中国共产党处处流露出恶毒的仇视态度，他的历史是“靠反共起家”。

1948年，我在香港彭泽民家见到了章伯钧，谈起延安光复，东北、山东许多重要城市解放的新闻，彭老和我很高兴，认为蒋政权垮台在即，全中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章伯钧答：

“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毛泽东聪明一点，还是和好！”

章伯钧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靠所谓“和局”去混水摸鱼的心情不觉暴露了出来。

有一次，章伯钧好似诚心诚意地问我：“你对农工民主党的看法如何？”我说：“我不是你党的人，不便批评，既承下问，不得不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你党叫农工民主党，好象你党是农民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党，其界限如何？究竟代表多少农民？章伯钧大不以为然，反问我：“中国有几亿农民，共产党要得了吗？”

可见章伯钧早已立下了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争取农民领导权”的纲领。

章伯钧在香港为了扩大政治资本，滥收党员，甚至有些托派，共产党叛徒，特务分子（仅在达德学院就发现有张觉初、周伯刚等）和可疑

分子都混进了农工民主党。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滥？

章伯钧答：“在这样大潮流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章伯钧到处拉党员，原来是为他抬轿，他爬上去之后，就叫人“自生自灭”。他对于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成员，公然采取了多么卑鄙下流和忍心害理的手段。

而对着越来越激烈的批判，章伯钧在想什么呢？他或许希望再去进一步承认“错误”，然后便完事了。

但他似乎已预感了并不象那么回事。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文汇报的记者，“在显微镜下”，已“洞察”到章伯钧到底在想什么。

——章伯钧躺在自己小洋房的席梦思软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酒水在他的胃里冲激着，三十年来的往事也象海浪似的在他的脑海里冲激着。

.....

原子弹和氢弹总不是只写在纸上的，资本主义肯定还会活下去。

中国的前途会怎样？

难道不会变天么？

想起来，该轮到章伯钧“哇啦哇啦”的日子总不会太远，总不会再让这些“小斯大林”长久地管下去。

“农奴劳动”也可以结束一下了。^①

人们已猜测到他的“全部心理”。

他的“葫芦中的灵丹妙药”全被倒出来，公布在大庭广众之中。

他的“美梦”碎了。

但，对章伯钧的批判仅仅刚拉开序幕。“好戏”总在后面。

① 《文汇报》1957年6月24日。

○“我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我们说向左，向左，
你们偏要向右，向右。
这真叫“螳螂挡车”，
你们正象在抽刀斩水流。

你们正象在抽刀斩水流，
利令智昏，
你们要显显身手，
是你们点燃了人们人们的怒火，
这怒火，烧出了你们的
狐尾蛇头。

——反右街头诗

在全国上下一片声讨右派的怒吼声中，6月25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委继续举办座谈会，对章伯钧进行剥皮掏心。

黄琪翔又是首先发言。他说，

“章伯钧是一个恶毒无情的野心家。卢郁文批评了章伯钧的发言以后，章怀疑卢是共产党员，怀疑共产党是要通过卢郁文来打击他。有人告诉他卢郁文不是共产党员，他强作苦笑，表示不同意。这就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6月9日（星期日）下午，章伯钧约李伯球、杨逸棠等到我家里闲谈。他一到就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章还说，昨天（8日）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

王寄一紧接着发言。他也揭露了一件事：

“他（指章伯钧）有一次在交通部干部大会报告中说：周总理要我当交通部长，我表示我是搞政治的，交通部长不过是修桥补

路、买卖船票的事情，我是搞不来的。他说他在交通部有职无权，实际上是经常不上班，去逛晓市、买古董。”

王一帆也说：

“章伯钧想把全国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收罗到农工民主党来。甚至想把开除出共产党的黄逸峰也拉进来。”

杨逸棠讲得更生动：

“中共八大以后，章伯钧把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比作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意思就是党对资本家的改造是假慈悲。”

李世鉴带病参加了会议，他在最后发言，他说，

“李健生是章伯钧的最亲密的朋友和爱人，也是农工民主党的一个负责人。她对章伯钧的问题如何看法？到现在没有听到她的一句回音，我们忠诚劝告她表明态度和立场。”^①

同日，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郭翹然在人民日报揭露说：

“（章伯钧）甚至在会场上公开谩骂胡宪之同志说：不要以为你有小聪明，但我不信任你。”^②

6月29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支部和北京市委支部再次举行座谈会。

会上有人指责专案检查小组对章伯钧检查无力，黄琪翔、李伯球仍没有把章伯钧的私房话讲出来。

自此，黄、李二人受到怀疑，不久也就变成右派中的一员，这是后话。

7月3日，光明日报又披露了章伯钧在北京铁道学院活动情况：

章伯钧在北京铁道学院开始整风运动后的第四天（即5月18日），即以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来到学院向全体盟员以及一部分盟外教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

师、职员和学生作关于盟的历史任务的报告。报告后又同盟员开座谈会。首先，他煽动群众向共产党进攻，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别人都有顾虑，我是第一个开炮的！提意见我不怕，我没有顾虑。

“交通部有人问鸣放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说我支持！你们铁道学院也有人问鸣放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也支持！

“整风运动以来，群众提了这么多意见，毛主席没有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也没有思想准备。有人说整风是和风细雨，恐怕不是和风细雨吧，是个台风！

“解放以来，共产党在学校里只抓了两条，一是抓人——抓党团员，二是抓苏联经验。

“人生有三件大事；就是物质生活，精神上的民主和自由。……给你穿西装、吃西餐，但是把你摆在西郊公园（北京动物园），你高兴么？”

同日，光明日报又揭露了章伯钧的一段“丑恶的历史”。

“章伯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装进步，和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很接近，但暗中和青年党的关系很密切。1946年11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议，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

7月3日，中国农工民主党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对章伯钧进行无情的揭露：

正是起草宪法，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代表全国人民用尽心机向蒋介石争民主权利的时候，在一个月色朦胧之夜，漫步回半山村的途中，章伯钧向郭则沉和我谈心时说：“今天我们是同志，朋友，大家都一样。将来一旦揭开一帘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我听了之后不禁毛骨悚然。

他常乐道刘邦、朱元璋执政后的大杀功臣，认为是历史规律。

1948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住在九龙的章伯钧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中。他指使地方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分别抽调几省干部面授机宜。当由上海来的曾伟、虞健、赵寿先几位同志劝他不要幻想第三条道路的时候，章伯钧公然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

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

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章伯钧九龙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地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谈话就这样地不欢而散了。

人民的怒火烧出了章伯钧的“狐尾蛇头”。下一步该有什么举动呢？

章伯钧实在预测不出来。但，他明白，等待他的决非和风细雨。

○神经中枢· 智囊团·五大将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文汇报的方向预以批判。并点明了章罗之间存在着联系。

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也已召开。

人大代表纷纷揭发章伯钧。

3日，甘肃省人大代表，民盟甘肃省委会主任委员杨子恒，在会上揭发了章的一些言行。

他说，今年有一次到北京开会，章伯钧曾请他和另外十几个人到家里吃饭。章伯钧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民盟副主席史良讲，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没有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到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天，章伯钧在安徽代表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

他说他的错误根源乃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背着共产党另搞一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

他承认了报纸上披露的章罗联盟的关系，但同时又补充说，“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罗隆基联盟的，但没有正式地开过会，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所以和罗隆基联盟，主要是利益没有冲突，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政治野心。然而我过去和罗隆基的关系是不好的。现在之所以要和罗隆基联盟，是想通过罗隆基，把在罗隆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

但是，这时候的罗隆基，刚从国外出访回来不久，面对国内报纸对他的批判，并且到了7月份竟把他与章伯钧联在了一起，说有一个“章罗联盟”，他很吃惊。据说，他曾亲自找到章伯钧，声称过去、将来、现在都决不会同章联盟。

同日，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也承认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

“我自己有一套想法、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

“这个联盟是从去年开始的。先是在思想上同盟，以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的联盟。我们没有纲领。”

这时有人插说：“你刚才不是说有纲领吗？”

章伯钧接着说：“写成条的纲领没有。……”

又有人问，去年8月在北戴河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说了些什么话？

章伯钧予以否认。

群众便高呼：“交待！交待！”

章伯钧说了，“在北戴河时，曾百般辱骂共产党，我是个两面派，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我是无耻。”^①

^① 1957年7月4日《光明日报》。

最后，章伯钧不肯承认到处点火。他说：

“至于是谁点火的问题，那很难说。由于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讲话，煽动了群众的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老实说，我直接下命令，直接授意点火，是没有的。结果将来查出来，我就是罪加一等了。”

接着，许多人又发言要章伯钧交待为什么硬要黄琪翔担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是否有个章黄联盟。

章伯钧说：“关于联盟，我没有法子答复这个问题。我的作风恶劣，独断专横，家长制。我现在已成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了！”

丁方托说，黄琪翔家里所有的人，从厨师到通讯员，全是他的亲信，国家机关人事部门给他介绍的工作人员他拒绝不要，不知道黄琪翔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他的家里是否有密室？在密室里究竟干些什么？为什么章伯钧总要约些人到黄琪翔家里去谈私房话，不到别人家里去，很值得怀疑。^①

怀疑终归是怀疑，黄琪翔家里到底有无密室，有人前去检查没有，不得而知。

7月4日，国家计委全体工作人员召开大会，抗议章伯钧的造谣诽谤。

据悉，6月6日，章伯钧召集了几名学者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上章伯钧曾讲：“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这事被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披露在7月4日人民日报上。

计委人员看到此文后，当日下午便举行了批判大会。

机械局代表金家源痛批了章伯钧之后，激动地问：“我们有没有看到过要求撤换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

会场上呼声雷鸣：“没有！”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4日。

金家源高呼：“一定要打退一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7月6日，章伯钧致函人民日报，信的内容如下：

7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阎刚候同志所揭发的关于6月6日我在一次六教授座谈会上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话，是由于我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道听途说，以无当有不符合事实的极端错误的污蔑党的言行，因此引起计委全体同志的极端愤怒并向我提出强烈的严正的抗议和指责。我感到万分痛悔，我现在发表这个更正声明并向他们请罪。

章伯钧 7月6日

章伯钧痛悔也好，请罪也好，没有人同情他，更没人原谅他。

对他的请罪、痛悔的答复，是更加系统地搞出他的活动来。

不久，他的活动情况便被系统地弄出来了：

第一，右派的神经中枢是章伯钧、罗隆基，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

第二，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纲领的。其纲领是：要从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

第三，有组织。

首先是有智囊团，如费孝通、陶大镛、黄药眠、曾昭抡、钱伟长等；其次是有大将，如农工民主党内有名的五大将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等；再次，许多大将各有据点。如：

北京——陶大镛、黄药眠，

西南——潘大逵、赵一明、舒军，

山西——王文光，

浙江——姜震中，

上海——陈仁炳、彭文应，

湖南——杜迈之，

湖北——马哲民、戴今生，

沈阳——陈彦之，

广东——钟平，

广西——杜焕平，

安徽——童车五，

青岛——陈仰之，

甘肃——杨子恒，

陕西——韩兆鄂，

河南——王毅斋。

第四，有活动。^①

凡此等等。

因章伯钧任交通部长，7月8日，交通部在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特举行反右派分子大会，揭露章的罪行。

会上要求发言的有两百多人，章伯钧参加了大会。

交通部部长助理孙大光在发言中举了一个例子：

党的十大方针提出后，我到章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后，又谈到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么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当时，我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

章伯钧的亲戚，农工民主党党员李应文也在会上发言，表示要与章伯钧划清界限，并揭发说：章伯钧曾讲，我随时可能发展

① 石人：《章罗联盟罪行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为反革命。^①

7月8日，人大代表邓初民在人代会上发言，进行了一番忆苦思甜：

“我也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也当过大学教授，可是常常受到迫害的，那当然由于他们骂我是“共产党走狗。”但我看到许多不是共产党走狗而是国民党走狗的教授们，也并没有受到尊重；晋见校长时只能坐半边屁股；除了按一定的薪水发给你外，你住洋房或住茅房，你坐车或步行，你吃得饱或吃不饱，总之你的死活，他一切不管。欠薪还是经常的事，发聘书只发半年，少上一点钟的课就扣一点钟的薪，真是朝不保夕，不知明年又在何处。

但是，那时我就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知识分子的传统，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反抗，住在火坑里，心安理得，一到乐园反而听不得蜜蜂叫，有些知识分子，就硬是这样要抬举而又不受抬举。今天党和政府把像这样的人包下来了。许多不能教书的人，仍然给他们的生活费，但他们还要发牢骚，说有职无务。而能教书的人，不仅请他教书，而且请他当校长、院长，却又说有职无权。

那怎么好呢？请大家把心肝捧出来说一句话，应该是仁至义尽了。然而，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却说党和政府对他们不好，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这个故事是小人书上都有的，叫“中山狼”。……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应该打死它。^②

○楚歌声声·余罪袅袅

“历史人物”已成，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久视茶壶长吁叹，

大势休已矣，

好梦一场空。

——反右词抄。

到7月15日，全国人代会上前后发言的达408人。其中大多是对右派的声讨。

众怒难犯。

章伯钧等人于7月15日在人代会上作了检讨。

章的检讨比前几次要深刻得多。他在检讨中说：

“我今天是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采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

“……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①

章、罗认罪了，他们的“部下”便各作鸟兽散，寻找出路。当然，最好的出路莫过于揭发章、罗的“罪行”，讲明自己的糊涂，受了章、罗的利用。

在人大四次会议上，李伯球慷慨陈辞，痛恨自己给章伯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

甘肃代表杨子恒的揭发检讨向人们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1955年人民代表大会后，我到章伯钧家，在场的有三人，其中有江苏的邓昊民，浙江的李士豪。章对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在中央说话还可以公开，你们在地方搞工作的，就是要多听少说，如果说错了，小辫子被人抓住，好久也解不开。在英国，不管谁都可以在马路上、公园里演讲，叫骂首相也无人干涉，也没什么后患，充其量没人听就是了。

“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作报告，他公开表示对铁托很有兴趣，而对苏联则大表不满。”^①

这时候，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及章的妹妹也先后在报纸上撰文批判章。

但斗争还不是尾声。

1957年8月到了。

北京的8月并不太热，但章伯钧却感到难以忍受了。

往年的8月，章伯钧似乎没有这种感受。

这可能因为对他的炮击并没有减弱。

8月4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严信民揭发：

一次在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章对地方来的几位干部大发雷霆说：“你们太不中用，现在天下是人家的。”

今年四月，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首次学习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了这个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六亿人口的天下，忧的是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要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

对于民盟主席，多少年来坚决站在进步方面，得到共产党信任的沈衡老，章伯钧从来是不服气，看不在眼里的。沈老尽管因健康关系很少过问盟务，章并不因之甘心。1953年当沈老进了医院的时候，章就断言病已无望。沈老一度病危，章伯钧兴致勃勃。对盟务极备关心。后来病势好转，性命无忧，章无精打采，像失去了灵魂一样。

章伯钧是个出色的、反动的政治宣传家。今年春天他视察天津新港回来车过武清灾区。在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座谈会上就描绘地说：“那里离北京仅四十里，老百姓就得从先一天起，带着铺盖卷露夜排队，等候第二天的只供三天充饥的混合粮、萝卜干或一块豆饼。有时还得吃树叶。而这边呢，高楼大厦，黄油面包。”去年冬，章伯钧借交通部长之名视察水道，专轮漫游长江苏杭一带。归来又在中央座谈会上说：“我到处刺目惊心的是，共产党党部都是最好的洋房，负责人出入是小汽车。我看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会造反的。”

又一次，在农工党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会造反的。”

严信民最后得出结论说：

章伯钧是决心要造反。

既然章伯钧要决心造反，那么必须要有造反的准备工作。

直接一点，就是说章伯钧首先必须“招兵买马”。

为了招兵买马，据说“参加农工民主党比买张电影票还

容易。”^①

人民日报披露：到今年大鸣大放时期，这些右派分子对于发展组织已经到了狂热程度，章伯钧派了六路大军去各地，王一帆去东北，杨逸棠去山东，张云川去河南，韩兆鄂去陕西，钟岱去太原、石家庄、保定，郭仲衡去昆明。

王一帆在山东花了一千九百多元大肆请客，他并对发展对象说：“你是统战部同意参加的，我们预备要你做省筹委会委员，我们省委的部长，等于政府的厅长级干部。”

章伯钧所绝口称赞的天津农工民主党组织的发展手段是极其卑劣的。他们对于那些对党不满的人说：“加入农工后，你可以不受共产党的欺负”，对那些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说：“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平反”；对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说：“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得出结论，”对于一些要求进步想参加共产党的人则以甜言蜜语加以拉拢说：“农工和共产党一样，今后长期共存。”天津新华医院农工民主党支部负责人公开向发展对象说：“你愿意参加也得参加，不愿参加也得参加。”

农工天津市组织中，六个支部九十五个成员的材料统计，50%以上的人是有历史问题的，其中有反动党团分子18人，有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汉奸、反动会道分子9人，有当过国民党少将参谋、上校军医等身份的反动军警人员7人，出身是恶霸地主、富农、五毒俱全资本家的21人，还有国民党“锄奸小组组员”、贪污犯等，共57人。^②

总之，章伯钧在到处收罗旧社会的垃圾残渣，“地主恶霸来者不拒，特务汉奸收为骨干。”^③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6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次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

先一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也举行了第六届第四次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

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决定,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

.....

他的一切社会职务几乎都没有了。

但“余罪依然袅袅”。

他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不怎么好。

“他住的房子很大,生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很会挥霍,每天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所坐的一辆汽车是新式保险的,价值3万多元,是交通部付的帐。他喜欢买古董,积欠了古董店万余元,不肯偿还,后来还是由国务院替他还了帐。”^①

1958年1月19日,史良在民盟批判章罗联盟大会上对章罗联盟进行了系统地批判,洋洋洒洒数万言。

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批判渐入低潮。

1959年以后,章伯钧的名字在中国的报刊上消逝了。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因胃癌在北京病逝。

时年74岁。

而四年前的12月7日,“章罗联盟”中的罗早已魂归天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9日。

国。

若干年之后，当春风吹遍了中国的大地之时，人们似乎从淡忘中记起了章伯钧这个人，只是，却很少提及那沉重的1957年中他的活动。

罗隆基·“三顾茅庐”和“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1957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

○“士为知己者死” 和“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委员会”

1957年3月的北京，虽然还是乍寒乍暖，可是，在人们的感觉中，“早春的气息”已经露出来了。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不断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传达；

.....

这一切，都给早春的北京又添了几分浓浓的春意。

整个国家发展的形势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3月5日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与以往历届历次相比，气氛都特别显得活跃、热烈。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罗隆基，参加了这次令人振奋的会议。

19日，他在会上作了《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这是一个众人关注的，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从1956年冬去四川视察，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不少，最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罗隆基感到，作为一名政协常委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似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反映出来。

他说：“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绩。”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现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极，现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

“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并且必须肯定。”

“但是”，他很婉转地说，

“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变化。旧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

他指出，“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有人说：‘代表委员们年年视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问题还是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实不符合的。……这种悲观论调是错误的。”

“第二，国家正在一个发展很快的过渡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问题，

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也是不可能有的。”他说：“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国家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问题”，也应该注意，“逐步地来解决。”

在对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作了一般性地总结之后，罗隆基又着重讲了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问题。

他强调，“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说，“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他的话引起了委员们的阵阵掌声。

罗隆基接着说，

“周恩来总理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

他表示，“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见。”

他举例说，“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评级制，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

“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

“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

“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

毛病。事实果真不是如此，事实就会给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说服教育。”

他接着说，“旧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我曾说过：‘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结，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就所见，畅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

但是，“事实怎样呢？”

他指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

他认为，发生这种现象，其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

“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

“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栗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

他强调：“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因为“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

他说，“隔膜是从双方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须双方共同努力，倘此方认彼方为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见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见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他指出，“我们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处世特点。“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他说：“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

他解释说，

“我不是说在今天的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对不是的。”

“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他提出，“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

他说：“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等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

他的发言再一次引起雷鸣般的掌声。

最后，罗隆基表示：

“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指示来处理问题。”

罗隆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对他这种“实事求是

是”、“据理直谏”的光明磊落的态度犹为钦佩。

——毕竟说出了大家心里所想，而欲讲却又未讲的话。

许多人对罗隆基是熟悉的、理解的。

罗隆基，字努生。1898年8月生于江西省安福县。1913年夏，以江西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9年“五·四”运动时，勇敢地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是当时著名学生领袖之一。

1921年夏，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国留学。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后又转道英国，师从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熏陶。

1928年，罗隆基留洋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课程。不久，他又担任《新月》杂志主编。

面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统治，罗隆基不畏危险，在《新月》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扼杀人权的罪行，和胡适等人发起一场“人权运动”。一度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1年与张君勱等人秘密组织“再生”社，1923年改组为“国家社会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

1932年1月赴天津，就任《益世报》主笔，后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北京《晨报》社社长。1936年6月，提出“攘外即可安内”的主张，反对内战。

国民党当局对他既恨又怕，想尽办法想封他的口。但他不为刺刀和匕首的威胁所惧，不为高官厚禄的利诱所动，始终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洁的人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他的声名和影响，被聘为国民

参政会参政员。

1941年3月，与张澜、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宣传部长，积极奔走，呼吁国民党推行民主政治和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1946年1月，以民盟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了国民党政府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罗隆基和民盟主席张澜一直留在上海直至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任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此后，又相继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长。

1953年，民盟七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

党和人民的信任，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一向积极“入世”的他，以新的姿态投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他积极地为政府提建议，沟通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沟通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联系。

3月19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正是他满腔热情的具体体现。

.....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很快，中共中央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5月初，中央统战部又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主要是对统战工作提意见。邵力子、史良、楚图南、曾昭抡、陈铭枢等先后发言。

10日，罗隆基也应邀发言。

罗隆基说：

“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他说，“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

“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

他指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

他说，“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他接着说，“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

他说，“我们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罗隆

基又举例说，“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

他指出，“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事情很多，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他最后谈到：“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维汉）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

“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①

罗隆基真是快人快语，他把这一阶段自己听到的或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的许多事情和想法，一古脑儿地都倒了出来。很简单，“这是帮助党在整风，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他这么想！也就无所顾忌了。

而且，当时看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是欢迎的！

这对罗隆基来说，不啻是一种鼓励。

22日，他又一次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了言。

针对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防止对提意见的人的打击报复等问题，他又提出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的问题。

他说，最近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

他说，“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都提了不少意见，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我现在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罗隆基继续发言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将受到打击报复。”

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個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罗隆基认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

“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的，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

罗隆基最后建议：

“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①

罗隆基的发言，很快引起一片哗然。

赞同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不知可否者也有之。

但他感到：君子坦荡荡，自己是直抒胸意，是如实反映情况。

27日，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等人开始批评罗隆基的意见，不赞成他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特别关于‘平反’问题。

李仲公批评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无论怎样有能力，除非上帝出现，怎么能够做到一点没有偏差。”

他指出，“单纯强调平反，大家都来翻案，地主富农也来喊冤，这怎么行呢？”^②

罗隆基感到，虽然他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批评，但是，既然有批评，就可以有反批评，应该允许别人开展正常的反批评。否则怎么才能叫“百家争鸣”呢？

他没有公开去反驳李仲公的批评意见。

6月初，他就忙着准备出国了。

3日，罗隆基离开北京赴锡兰首都科伦坡，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国内整风运动的发展，他就不得而知了。

其后的情形，是出乎人们预料的，当然更是出乎罗隆基的预料的。

形势忽然发生了逆转。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

○“把我烧成灰， 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右派作了部署，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很明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场伟大的反右斗争迫在眉睫。

实际上这并不突然，早在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员干部阅读。伟大领袖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伟大领袖还尖锐指出，“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好家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只是象罗隆基这样“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不知道罢了。

按照后来的情况推测，罗隆基的那顶“右派”帽子最迟在5月15日就已给他预备好了。

.....

最早站到批判罗隆基前线的，是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委吴晗。

6月9日晚，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吴晗深刻指出：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

他说，“我们要在人民的立场来帮助党整风，不利于人民的言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接受党的领导”，“凡是不要党领导、拒绝党领导，都是错误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真可谓“一针见血”。^①

随后，批判罗隆基错误的斗争就在民盟内部首先展开了。

.....

14日，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发表谈话，“希望罗隆基表明立场。”

15日，民盟中央另一副主席高崇民著文《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

高崇民指出：“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鸣放’中显然是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

他说：“这少数右派分子，一直是野心勃勃的，不情愿自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并且妒嫉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领导作用，所以他们平日是面从心违，遇机则兴风作浪。”

他尖锐指出：“‘螳螂挡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两句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中国的俗语，恰恰写照了现在少数右派分子的心理。”^①

同日晚，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揭发章罗储等人的“反动面目”，吴晗、陶大镛、冯亦代等发言。吴晗号召盟员们“大力击败两面派。”

会议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开会，和罗隆基、章伯钧“划清界限，明确立场。”

16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文汇报》著文，分析右派分子的言论，重点是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的言论，并进行了“合理”推断，认为他们的言论好象是“集体创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集体创作”几个字特别耐人寻味、令人遐想。

斗争紧锣密鼓地发展着。

17日，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感到自己无法沉默下去了，遂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对罗隆基、章伯钧的错误“非常痛心”，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

最后，他还特别提到：“罗隆基现在还在国外，他回来后我也要他作彻底检查。”

沈钧儒先生的谈话是很有分寸的。

18日，民盟中央又一领导人邓初民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精神实质，就是要从各方面推翻党的领导。”

他说：罗隆基“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呢？这是不是根本不信任共产党呢？而且在逻辑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就会搞不好，推论下去，就是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都会搞不好。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最后，就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得
好。”

他质问：罗隆基“企图从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
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试问居心何在”？^①

邓初民先生的批判主要是从“逻辑上”“推论”而来，这种特
定的思维方式，给时人的批判方式恐怕也不无启发。

同日的会议上，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卧病已久的副主席马
叙伦、秘书长胡愈之、副秘书长千家驹、中央常委吴晗、刘清扬
等，都对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

沈钧儒指出：“现在民盟负责人中，居然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
党的领导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言论，我们有一些盟的负责人，当
面搞一套，背后又搞一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马叙伦指出：“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言行不是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
到这一点。”

“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夺权利的冲突而伤尽
脑筋。”

他说“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
联合。”

“联合”二字又是非同凡响。

胡愈之指出：“民盟两个领导人以及一些盟员所犯错误性质是
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止是思想问题。他们表面赞成社会主义，背
后反对社会主义；表面拥护共产党，背后骂共产党。这种牵涉到
政治立场性质的错误应该彻底揭发。”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9日。

千家驹指出：“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①

这次会议，是“民盟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也是对罗隆基批判中一个重要转折点。

问题逐步升级，性质越来越严重。

19日，民盟早期领导人闻一多的夫人高真，在天津的家中，给罗隆基、章伯钧写了一封公开信。

她指责罗隆基，“什么‘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来的’，什么‘另成立一套平反机构’等等，‘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她斥责罗隆基等人，是“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搞资本主义复辟，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实在太没良心了！”“野心太大了。”

她说，“你们这种阴谋，我和我的孩子们绝不能答应，就是在九泉之下的一多也绝不能答应”。^②

22日，《北京日报》又刊登了民盟中央一干部写给北京日报的信，“揭露章罗反党阴谋”。

很显然，对罗隆基的批判已不是限于他一人了，而是把他和章伯钧圈在一起来批了。

21日，罗隆基参加完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回到昆明。

半个多月来，国内发生的一切他都一无所知。等待他的，是完全出乎他预料的，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揭发。

他匆匆赶回北京，想把事情搞个究竟。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25日晚，罗隆基参加了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根据会议预先安排，主要是“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

他几乎是毫无准备的，对他来说，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他只有耐心地听别人的揭露和批判。

陈鼎文指责说：“罗隆基说盟的组织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是‘腰斩民盟’。”

“罗隆基看到盟员中有人入党，犹如芒刺在背，他竟指出要盟内的共产党员都退盟。”

“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他一贯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脑子里是资本主义，有时口头上也来点资本主义，于是‘右派’这个称呼在人群中有一口皆碑。”

费孝通检讨说，他的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有些则不同。

他指出：“罗隆基这几年来一直讨厌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名词。”

“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他还揭发说：“罗隆基把盟北京市委的‘争鸣’刊物夺过来据为己有，企图把这个刊物变成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一直被视作罗隆基的亲信的中央常委潘大逵在检讨中承认他是“罗隆基小宗派中的一分子”，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

他揭发说：“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或者小宗派，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潘光旦、吴景超、叶笃义、费孝通、范朴斋和张志和等。”

他认为“民盟内部实际上有宗派”。

他说，罗隆基还对他说过，“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有缺点，但是也还有它的优点，无产阶级专政固然也有优点，但总觉得缺乏一

点什么东西。””

他认为：罗隆基有当领袖的野心。”

.....

罗隆基听着，心如绞痛。

民盟中央秘书处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也揭发了“罗隆基的一系列反动言论。”时间从三十年代直至1956年。他列举了很多“事实”。

他说，罗隆基解放前后和司徒雷登、国民党之间有“暧昧关系”。

胡愈之在发言中说：

“最近四川有人来，谈到这样一件事：民盟成都市委吴汉家揭发：1954年夏，范朴斋带罗隆基的信给他，信上说：要范朴斋去重庆助潘大逵一臂之力，信上还说：‘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

他说：“这句话值得研究，不知他究竟要和谁斗争到底，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联合发言：

“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今年5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央常委会讨论，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

“当时我们的政治警惕性不够，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后来“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他们认定是被罗隆基之流的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罗隆基坐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几次想站起来说几句，但最后还是按捺住自己。

他知道，他的脾气会害了自己。

民盟北京市委常委、《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针对一个时期来有不少人揭发罗隆基利用她控制文汇报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她一再表示“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

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她说：

“我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与会的人知道她和罗隆基的密切关系，指责她在为罗隆基“辩护”，在政治上还没有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立场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主持人让罗隆基检讨自己的问题。

罗隆基表示自己要做深刻反省。

针对“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他说：

“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领导党也要参加。”

“这句话是错误的，我不否认。这主要是因为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

针对有人揭发他和储安平“串通”，抛出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的说法，罗隆基说：

“我的确没有看到过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不但事先没看，事后也没看，直到这次回国才看到。”

他说，“最近有些人常常把章罗并提，我不愿意这样，我对自己的言论行动负责。”

最后，他坚决表示，“我从来没有在民盟内说过我思想进步”但是，“我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即使“把我烧

成灰，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

他说：“如果查出，愿意受国法和盟章制裁。”^①

他的辩解，显然是无济于事。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揭发批判。

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罗隆基以一届人大常委的身份参加。

与以往的会议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人大、政协会议，罗隆基是很活跃的人物，强烈、有效的参政方式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自己也常常感到聊以自慰；这次人大会议，人民代表主要是“集中力量批判右派分子”，而他和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则是批判的对象，进攻的靶子。

反差太大了，他的内心隐含着深深的痛苦和折磨。

在小组会上，他常常被当场质问、当面斥责。

28日，在江西代表小组上（因罗隆基是江西人，分组时就分在江西小组了。）几位劳模当场质问罗隆基：

“你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

“作为江西人民的代表，你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

……

萍乡煤矿工人、劳动模范郭清泗警告说：

“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工人是不答应的。”

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也正告：

“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跟他拚命。”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危秀英质问罗隆基：

“你的家乡就在革命老根据地，你怎么不了解江西人民的力量？”^②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

面对江西的乡亲那纯朴的感情，罗隆基确实无言以对。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立场问题》，对罗隆基的“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建议再次进行批判。

社论指出：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根本不是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问题。如果硬要说礼贤下士，那么知识分子首先要向工人农民礼贤下士，如果硬要说三顾茅庐，那么，在根本方面，工人农民更加是诸葛亮。”

“因此，这一类说法只是放在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只是阻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团结的墙和沟。”^①

想填“沟”拆“墙”的人，转眼之间变成了挖“沟”砌“墙”的人。这对罗隆基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他无法相信自己了。

30日，民盟中央举行第二次整风座谈会，责成“罗隆基检讨交代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

沈钧儒依然很诚恳。

他劝告罗隆基：“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交代自己的，你说你的错误大家可以讲，但总不如自己交代好，朋友要帮助，但是事情还要靠自己。”

他希望罗隆基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要走那一条路，两条路不要走错了。

沈钧儒提醒大家都要考虑一下应该怎样帮助朋友，“不要让朋友走上敌人的道路。”

罗隆基在“检讨”时，“不得不承认他的许多丑恶历史。”

“早年在外国留学时，参加了国家主义派的一个组织叫‘大江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会’”；

“1929年跟胡适等一起搞‘新月’杂志时，写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

“和张君勱、张东荪一起搞反动的国家社会党”；

……

很快，会上就有人指责他是在“辩解”，“是对大家所已经揭露他的反动言行作一些重复”。

郭则沉尖锐指出：“罗隆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最危险、最狡猾的人。”

“是敌人？是人民？罗隆基已经到了分晓的边缘。”

罗隆基表示：“我确实感到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和企图。”“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如果查出，应受国家法律处分。虽然我不能说我没有这种思想。”

会场上的人再次为他的“不老实的态度”所激怒。

史良、千家驹等“要他老实交代事实，不要辩解。”

张国藩责问罗隆基，“歪曲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郭则沉、高崇民指责罗隆基：“在盟内搞联盟”。

郭则沉揭发说：

“罗隆基常讲：‘谈马列主义我不如章伯钧，谈英美章伯钧不如我’。又说‘章伯钧走到哪里，我跟到那里’。”

“罗隆基与章伯钧为什么合作得这样好？很显然，他们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过去说他们两人有分歧，那只是在争权夺利上不一致，反对共产党，这在过去也是一致的。”

罗隆基听得目瞪口呆。

高崇民也指出：“章、罗二人去年由过去的水火不相容一变而为章、罗联盟。这是为了要整个地篡夺民盟的领导权作为进一步

的资本。”“以便创造条件，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攻击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罗隆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章罗联盟”、“反党”……一连串刺耳的名词已经出来了。

罗隆基脑子里一片茫然，他想反驳，但不知从何处说起；一开口就是群起攻之。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罗隆基面对愤怒的人们，几无招架之力。

但是，他深知：不说话就意味着默认。

他不能，因为事实不是如此。

最后，他对自己在民盟中的宗派活动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

“我在民盟中闹宗派搞小集团，是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不过，这“只是盟内的事而不是盟外的。”

他很坦率地“交代”了；但他不希望别人把“盟内”的事，引到“盟外”，引到“反党”上去，他深知“反党”一词的份量。

关于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

“我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和他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同时，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

“4月民盟工作会议上我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

关于民盟组织的四个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的那些天，他事先也不知道，是章伯钧确定的。

罗隆基的发言不断地被大家的质问打断。

他只得表示：“我不辩了，以后调查就知道了。”

接着，曾昭抡、徐铸成、浦熙修也揭发他的“罪行”。

曾昭抡揭发“罗隆基的小集团活动”；

徐铸成承认“文汇报和罗隆基有些关系”；

一直被视为罗隆基亲密朋友的浦熙修，也在强大政治攻势面前，低下了头，揭发了罗隆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她承认以前为罗隆基辩护的“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说法是错了。

她揭出了不少足以证明罗隆基“反共”的“反动言论”；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裁政治”；

“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要好些”。^①

浦熙修的揭发，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批判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同时，这也深深地伤害了罗隆基，伤害了他的感情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

他们毕竟相恋了十年，欲结婚而最终未结成。罗隆基心寒了。

他想不通，难道恋人和朋友之间私下讲的话，也可以被断章取义拿来给他定罪吗？

他感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压力。

他无法抵御强大的政治风暴的冲击。

他最终被巨浪吞了进去，无以自为。

……

○“你杀我的头，我也没有小集团”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指出：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日。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宏论一出，整个大地风起云涌，“章罗反党同盟”已成定局。这次罗隆基是真的惊呆了！

“愤怒的人们”循着毛主席的思路和所指的方向，四处出击，“挖掘”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新闻日报编辑部披露右派分子王造时透露给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的情况：罗隆基在听完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以后，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人民日报在转载时用了这样的标题：

“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

读来的确令人义愤填膺。

罗隆基家乡的农民“指责罗隆基包庇地主仇恨农民。”

.....

3日晚，民盟中央召开第三次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胡愈之首先发言，代表民盟整风领导小组要求罗隆基真实地交待四个问题：

“（一）怎样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使它走向资产阶级方向的？

（二）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储已经在人大小组会上承认事先和罗商量过，而罗还在狡辩说没有看过储的讲稿，现在要罗交代，是否同意储的‘党天下’意见？事先怎样密谋的？当

时如何指示储安平的呢？

(三) 罗隆基的小集团都是哪些人？都作过什么活动？主要目的何在？

(四) 章罗联盟组织目的何在？都做了些什么？”

胡愈之宣布：“今晚先要交代两件事”：

“今年3、4月间民盟工作会议期间，章、罗对民盟地方组织代表曾非公开地布置了工作，具体内容是什么？”

“章、罗在盟内擅自组织‘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无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工作组，用意何在？有何企图？都做了什么布置？”

很明显，罗隆基的基本“罪行”已经勾划出来，下面的问题就是根据大家的要求，“真实”地交代问题。

他感到，自己纵然有九个头十张嘴，对这种“指鹿为马”、“三人成虎”的做法，实在也是有口难辩了。

面对“车轮战”和强大的群众运动，他感到自己已无力回天。可是，必须为自己辩护。

他心如刀绞：“章罗联盟”这是“千古奇冤”。

他承认：

“文汇报改教师报，曾对浦熙修说过‘可惜’”。

“曾对徐铸成说过‘不要迷信党员，有事到北京来看我’。”

“常常把国家大事告诉浦熙修。”

“把浦熙修影响落后了。”

“‘党天下’的问题，储安平也没有死，可以问他。”

“和储安平谈过肃反偏差问题。”

.....

能想到的，他尽量都说了。

但是，他的“冗长”的检讨招来的又是一阵阵斥责声：

萨空了当即指出：“你的全部发言都是辩解”。

史良指出：“今天的问题，不是你看没看过储安平发言稿，而是你们事先已经情投意合了，这要比在形式上看过发言稿更严重。”

闵刚侯指出，“叫你交代你就忘了，我给你提醒一下吧！你的小集团有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

……

罗隆基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按大家的要求“交代”。

但是，有一点始终是清楚的，自己没有搞什么“章罗联盟”，什么“小集团”。

所以他坚定表示：“你杀我的头，我也没有小集团。”

“与会者对他的狡猾态度不能容忍”了，“停止了他的‘交代’，要他认真反省，继续展开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①

最后千家驹宣读了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的机要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信。

邵慈云的信中，用许多具体的“事实”揭发了罗隆基平日的“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知识分子入党”、“迫害、威胁”“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志等等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罪行”和“恶劣行径”。

激起大家对罗隆基的“无限愤怒”。

这是继浦熙修揭发之后的又一个重磅炸弹，又一次对罗隆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

等待他的是更尖锐的批判。

罗隆基面前到处弹片横飞，许多旧日的朋友，抛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毅然站到政治斗争的前线，深深地揭、深深地挖日常生活中、私人谈话中、个人信件中、朋友聚会中，罗隆基的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4日。

“罪行”，以表现他们划清了界线、站稳了立场。有的甚至为了迎合斗争的“需要”，刻意地去虚构、去捏造。

对罗隆基来说，犹如“树倒猢猻散”。

他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

7月5日夜，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风座谈会，斗争不断升级。

有人指出罗隆基“企图取消党委制同党分庭抗礼。”

有人指出他“妄图取消共产主义另创一种‘学说’。”

有人指出他“一贯排斥异己，同章伯钧狼狈为奸。”

.....

罗隆基承认，他同章伯钧共同搞过这样几件事：

“一、章伯钧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今年民盟的中心工作，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高崇民副主席曾表示不同意，而后还是强硬通过；”

“二、章伯钧对民盟中央的人事安排我是同意的。”

“三、章伯钧强调大发展，我也强调大发展；至于后来因大发展在各地造成的混乱，我们二人要负责。”

“我只是赞同他的这些办法，此外别无任何阴谋活动”；“只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章伯钧声气相求而已。”

史良立即指出：“罗隆基已经承认了章罗联盟的反党阴谋，并承认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活动的事。希望他进一步交代。”^①

罗隆基惊得哑口无言。

费孝通揭露：“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从此一向勾心斗角的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章罗合作的共同目的很明显，是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②

又是一声闷雷。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6日。

② 《文汇报》1957年7月6日。

罗隆基陷入了无穷的困惑。

他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随着而来的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把批判罗隆基的斗争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罗隆基被推上了浪尖。

○ “无形组织”和“章罗合作”

7月12日，叶笃义在人大会上检讨，但他重点是“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以表明自己站稳了立场，划清了界限。

他指出，“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他列举了大量的历史“史实”，系统地剖析了罗隆基：

“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无所不为的人。”

“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搞阴谋活动的人。”

“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和阴谋的野心家。”

“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向党疯狂进攻。”

.....

史良也进一步揭露罗隆基“要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摆脱党的领导”是一个“毒辣的阴谋。”

从叶笃义在全国人大检讨开始，民盟的韩兆鄂、民建的毕鸣岐、民盟的费孝通、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九三学社的储安平、民革的龙云、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也相继检讨，纷纷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

罗隆基无路可走。

15日，他在人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我的初步交代》。表示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

他重点检讨了自己八个方面的错误罪行，同时对一些重要事实再一次作了申辩：

“第一，我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成为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

“第二，我五月十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个人对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以及党的上级领袖们的领导是心悅诚服的。我以为这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不懂得党的领导是整个党的领导，是整个党在全国各阶层、各机关的领导。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三，我站在民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正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由于章罗合作，提倡所谓的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具。”

“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

“第四、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影响了民主同盟不能团结，并且妨碍了领导党贯彻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在盟中争夺权位，是为了个人争夺权利。这种目的是卑劣的、可耻的。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不活动了，表面上不存有了。但这一批人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呼应，没有根本断绝的。”

“第五，我对国际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私人谈话中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影响了人民对和平力量的坚强信心。”

“第六，我对某些社会事业不能无私的加以爱护和帮助，却使自己的落后思想影响到某种社会而受到损害。同文汇报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七、就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以来，对人民事业的热诚不够，对机关工作同志不真诚爱护，这亦是我的严重错误。”

“我自己性情急躁、脾气粗暴，对同事常常过分轻视，严厉斥责。对我的两位秘书，特别机要秘书邵慈云就没有尽到帮助的责任，由于她不肯遵循我的意旨，加入民盟，我就用冷酷打击的办法对付，甚至妨碍她争取进步和要求入党的愿望。”

“第八，我骄傲自满，甘于思想落后，从不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是‘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人，并且每每轻视某些进步同志为教条主义者。”

.....

“我的错误和罪行当然不止上面八点，我今天只检举一年多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先作初步交代。”

“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

最后，他又申辩说：

“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该牵涉到我。”

“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为，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和愿望，我亦从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我要

“请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的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①

这是一次灵魂的大净化，这是一次思想的大清洗。

这里有真诚的反省，这里也有血和泪的倾诉。

罗隆基渴望自己能从深渊中，巨浪里被解救出来，渴望所谓“章罗联盟”的真象能够“水落石出”，他渴望得到党的信任。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他的微弱的申辩声早就被揭发、批判的喧嚣声所淹没。

令人震惊的是，他的“从小同学，熟识多年”，而且又视若密友的潘大逵对他的交代并没有满意。

潘大逵在同日的人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又主动地揭发了罗隆基的“罪行”。

他列举了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八年清华，三赶校长’初步培养了他的政治野心，想当领袖的俗望”；“组织国家主义信仰者，成立大江会”；“参加国社党”；“在昆明开始搞民盟工作时，就搞小圈子”；“民盟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夺取左舜生的秘书长地位”；“解放初期，未能得到如章伯钧和史良一样的地位，从1950年起，尽可能的多拉些人，无论是教授或在其他方面失意的盟员”；“七中全会得到了副主席的地位，满足了部分的一时的欲望，仍以未得到部长职位为憾”；“去年得森林工业部部长位置，又以不符合他的专长而口出怨言”；“企图利用王造时在上海为他作宣传，以迎合知识分子落后心理为自己拉群众，抬高声望”；“在反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上，把过去视若敌人的章伯钧勾结成为亲密战友。章罗联盟因此形成。”

“罗隆基是一个专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永不知足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

的野心家。”

很遗憾，潘大逵自己后来并没有逃出罗隆基的“小圈子”，他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

潘大逵最后又指出：

“章罗联盟的阴谋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部分，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采用的方法就是有意歪曲传达，或利用他们的地位，发出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利用合法的组织名义，有时又用私人邀请茶饭谈心方式，或者大谈一套，或者三言两语，总之不外散布毒素，陶醉自己，迷惑别人。”^①

作为“章罗同盟”的骨干，潘大逵的揭发是很有作用的。

那样的岁月里，人世间的温情早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所剥离。

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罗隆却无以自卫。

.....

○ “翻手云，覆手雨” 的政治野心家”

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对罗隆基的批判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7月18日、19日，浦熙修、徐铸成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吐露罗隆基的阴谋活动”。

20日，《文汇报》发表《罗隆基正传》，称他为“美国人的‘可用之材’”、“替美国人做辩护士”。而且从政治问题延及私生活。

披露他和浦熙修以及周佛海妻子来往“极密”，称罗隆基“爱情不专”等等。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17日。

同日，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孙平毅等 13 人，又联名揭露“罗隆基和他的大将”赵文璧，“狼狈为奸”，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26 日，鲁迅夫人许广平在《人民日报》著文批判罗隆基“要党和人民对他‘三顾茅庐’实际上是他要把人民当作阿斗看待。”

她尖锐指出：罗隆基是“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野心家。”

27 日，国家体委办公厅王克己、郭淑明给《人民日报》写信，揭露“罗隆基作风方面的事情”以及“强要请贴”等“行径”。

.....

8 月 3 日，康丁揭露罗隆基“入四川视察搭足老爷架子，俨如钦差大臣”，“从成都到重庆竟要独自包乘一节客车房间”，《文汇报》在见报时，在黑体字标题上将“房间”二字去掉，结果就成了“包乘一节客车”，效果就不一样了。

狼烟四起，罗隆基已成“笼中之虎”，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8 月 5 日《大公报》披露：

“罗隆基又一个阴谋被揭发”

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处心积虑地想把这个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他当上了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以后，控制了一切。”“极力排斥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干部到文化俱乐部去。”“而经常在文化俱乐部活动的‘老主顾’是罗隆基、章伯钧、黄琪翔、叶笃义、费孝通、曾昭抡、钱端升、李伯球、李健生、陈铭枢、储安平等一堆右派分子”。

9 日，《人民日报》报道：

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中发现了新材料，“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

又载“罗隆基又一丑行：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

同日，潘大逵在四川省民盟省市扩大会议上，再次“系统”“交代章罗联盟组成始末及其罪恶活动”，“幻想美蒋卷土重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产阶级统治复辟。”^①

10日，大公报记者余志恒采访罗隆基家庭护士王爱兰的情况见报：《罗隆基的为人》。

王爱兰揭发说，罗隆基“脾气很大经常骂人”；“把家庭护士当女管家”；“诬蔑女护士偷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东西”。

“罗隆基是一个你把心肝挖出来给他，他还嫌苦的人”，“在他家从早到晚的工作，从来没有休息，没有一天不挨他的臭骂，他拚命压榨你，把你当奴隶一样使用，最后还想把你逼死，真是狼子野心。”^②

“后院起火”，使罗隆基受到了内外攻击，犹有“四面楚歌”的感觉。

罗隆基内心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8月10日，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和常委楚图南同时著文《人民日报》，深入揭露“罗隆基的丑恶面目。”

高崇民指出：罗隆基等右派“有其根深蒂固的反动历史，又有其久经月岁狐狸精式的修炼。很难幡然悔悟。”“明明是蓄谋已久，有计划有布置地进行对党的颠复活动，而竟矢口诡辩，厚颜狡赖，或避重就轻，认罪诈降，仅仅把他们的反动言行说成是思想上的错误；明明本人就是右派且是右派首领，而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成被右派所利用……”

“尤其罗隆基，从他的历史上一贯就组成了一个反共小集团，到去年夏间由北戴河密商起，又和章伯钧由争夺个人权利的矛盾，一变而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协调，事实俱在的章罗联盟。”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11日。

② 《大公报》1957年8月10日。

“要实事求是，有充分的根据，以正义相谴责，用真理来驳斥，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罪恶言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抵赖之余地。”^①

楚图南采用了五十年代人们惯用的办法，“查阶级”、“查出身”。

他说：

“从罗隆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所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来说，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是有深刻的根子的。”

“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哥哥是恶霸地主”，“他留学时，成立大江会。归国后参加国社党，办‘新月’，编益世报……”；“日常生活中，到处玩弄女性，贪婪自私，仇恨劳动人民，辱骂干部，讲求生活享受，坚持所谓美国的生活方式”。

“罗隆基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一贯亲美反苏”。

楚图南的长文中，又继续重复了一些别人揭露的“反动事实”，号召人们，“对于作为民盟右派头子、章罗联盟的组织者的罗隆基”，“必须无情剥露，坚决反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②

果真，对罗隆基的批判不仅没有“收兵”，而且战果一步步地扩大。

10日，罗隆基的“亲信”，“他的小集团的重要人物”，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民盟支部主委赵文璧，在民盟中央扩大整风座谈会上，突然间锋芒逆转，开始揭露罗隆基的“反动言行”。

赵文璧揭露：“罗隆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十分仇视的；罗隆基处心积虑地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的反共集团并不是‘无形’，而是有形的；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没有结成联盟，我证明不仅有，而且章罗两人‘拉得很紧’。

赵文璧的话字字铿锵有力，外界谁都知道，赵是罗隆基一手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调进森林工业部，一手提拔起来的，是罗的绝对“亲信”，他的话难道还能假？

会上，赵文璧揭发说：

“我初来北京时，罗隆基同我谈话，罗公开表示反对和歪曲社会主义改造。他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锣鼓打早了，目前又走回头路；在商业上现在又搞自由市场，在工业建设上又要搞大、中、小配合。’他又说：‘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造成吃大锅饭的供给制现象’。”

“他还恶毒地诋毁共产党，他曾说：‘党员的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他又说：‘党这几年发展得太快，特别是知识分子，新入党的大多数是投机分子’。”

“在森林工业部，罗隆基狂妄地反对党的领导，今年3月1日，我到森工部的第一天罗便向我说：‘在行政单位里，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以后一切事先和我谈’。”

“罗隆基野心勃勃，我到森工部以后，他不顾部里的分工，要我‘注意干部司的工作’，企图控制干部工作。”

“整风期间，罗隆基为了在森工部点火，曾说：‘是否盟里有交叉党员使盟员们鸣不起来’。他的意思是暗示在整风期间交叉党员不必出席会议，结果我就照罗隆基的暗示这样地执行了。罗还怕我不敢放手，又用话来激我说：‘老实不客气地对你说，调你来不发生作用，要你来干什么？’”

“6月2日罗隆基出国前，我去看他，他首先就问：‘部里的鸣放怎样了。’又说‘你不要搞得太厉害了，共产党的政策是随时在变的，将来不知变到什么样子。’”

“同一天，罗又说：‘整风出了错误了，储安平的错误言论也出来了’。当时报纸未出，根据后来的调查表明，罗隆基6月1日并未出席统战部整风会议，罗何以事先知道储安平的发言内容呢？他说他事先未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这显然是矛盾的。”

谈到“章罗联盟的事”，赵文璧进一步揭发说：“我来北京后，曾问罗是否要我兼搞民盟的工作，罗说：‘不，现在形势变了，我和伯钧很要好。’罗说：‘你目前要搞民盟也不行，要到中央，史良会放松你吗？你

要到北京市也不行，吴晗搞的独立王国，也不会放你进去的。”

“罗又说：‘去年，好容易才把潘光旦、浦熙修选入北京市委，目前更困难。’‘如果你愿意，将来再说。’”

“今年民盟工作会议期间，叶笃义曾约赵文璧和罗涵先在和平安宾馆吃饭，席间谈到民盟的事，罗涵先说：‘还是章伯钧厉害，目前章罗完全合作，你要搞盟的工作，可到中央来，北京市是不行的，吴晗搞的那一套独立王国是不会让你去的。’”

“4月22日上午，我去看范朴斋，范说：‘目前章罗拉得很紧，实际是章在利用罗，而罗也乐于被利用。’6月16日，我第二次去看范朴斋，我问范：‘此次章伯钧是否会出卖罗隆基？’范说：‘这次不会’，语气极肯定，并重说一遍，‘这次不会’，什么原因，范又欲言复止。”^①

.....

赵文璧的揭发，在批罗运动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就象在被打翻在地的罗隆基身上，又踩上了一只脚，给罗隆基带来的是“剜心之痛”。对他的危害是最大的。

这是“章罗反党联盟”最有力的佐证之一。

听到赵文璧“无情”的揭发，罗隆基彻底地垮掉了。

同日，已故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吕光，也站出来，在民盟中央整风扩大会议上“控诉罗隆基把自己的反共言行嫁祸于张澜的卑鄙行为。”

吕光说，他在解放后担任张澜的秘书，张澜常向他谈到解放前的往事。他要用张澜生前告诉过的事实，来揭穿罗隆基的撒谎和诬蔑。

他指出：

“罗隆基所谓同张澜在上海‘共患难’，事实是被特务迎接去休养。”

“罗隆基阻挠张澜汇款接济民盟中央”；

“罗隆基知道张澜要出走后，特务对张澜监视更严密了”；

① 《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

“罗隆基在当时是不是勾结了国民党特务，有意阻止张主席去解放区？”

“罗隆基把特务当作救命恩人，始终不承认党救了他”。

“替卖国贼张东荪奔走”。

周新民发言，表示他负责保证吕光所揭发的都是事实。

吴晗发言说：

“罗隆基一贯反共，他的靠山就是美帝国主义”

“他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他说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要轮流做庄，轮流执政，而且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梁思成用1929年罗隆基发表的“反共言论”“和今天罗隆基的反动言行”对比，证明“罗隆基的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至今原封未动”，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天下”谬论始于罗隆基。“罗隆基和蒋介石一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①

吴昱恒则揭发：“罗隆基为胡风、陈望、王士倬（陈、王均为肃反对象）等喊冤，罗隆基为胡风深抱不平，扬言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把胡风关起来得罪了三万知识分子。”

浦熙修也揭发了罗隆基一些“仇恨共产党依附帝美国主义的阴谋活动。”

她说“罗隆基到北京后，对于美帝国主义仍念念不忘。他和张东荪、曾昭抡等勾勾搭搭的目的就是为此。他曾说过张东荪勾搭美国三等特务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

系。”^①

“一件件铁的事实在证明：罗隆基反动三十年。”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

12日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彻底干净地剥下了罗隆基的‘反蒋有功’的迷惑人的外衣。”

马叙伦、胡愈之、高天、陈新桂、冯素陶等民盟领导人先后发言。

曾经做罗隆基家庭护士的王爱兰和警卫员张登智，也都在会上“愤怒地控诉：罗隆基对为他服务的劳动人民的恶霸行为，和他的腐烂透顶的私生活。”并且列数“罗隆基信口撒谎的许多事实，要大家警惕罗隆基这个撒谎大王。”

人格的侮辱和攻击，使罗隆基怒火中烧，但他的几次解释都被打断。

没有人会去怀疑，也没有人敢怀疑“劳动人民”的揭发的可信度。

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和接受已揭发出的“事实”，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最后，与会者一致要求罗隆基根据大家的揭发，作书面检讨。

罗隆基按照大家的要求和暗示，在以前几次交代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和“发挥”。

他承认自己：

“彻头彻尾的反共反苏”；

“崇美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根本没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概念”；

“利用旧知识分子作资本同党分庭抗礼”；

罗隆基最后又就“无形组织”问题作了解释。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

他说“外地的朋友到北京来了，总要见面谈谈的，但都是分别谈话，从没有约集在一块谈过，为的是避免宗派嫌疑。”

他着重声明：

“第一，最近两年来我没有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 任何政治活动。”

“第二，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与无形组织中任何人写过信件指示或商讨有关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

“第三，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托任何人带口信给无形组织中任何人指示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我犯的罪过不应当牵涉到任何人，别人所犯的罪过亦绝对不应当牵涉到我。”^①

.....

然而，一切无补于事。

19日，《光明日报》报道：

“从民主同盟6月18日决定盟内整风，展开反右派斗争以来，至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组织，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有500多人。章罗联盟在各地阴谋的概貌已逐渐显露。”

“章罗联盟及一切右派分子的最终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谋求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②

民盟全体盟员本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原则，继续深入揭发罗隆基的问题。

19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整风会议上，叶笃义，浦熙修、钱端升等又揭露出“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些“怵目惊心”的“内幕”。^③

30，31日下午，连续二天的第九次整风会，胡愈之指出：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8月19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

“罗隆基反共集团野心勃勃”，“订有五项战略步骤。”^④

其实内容还都是以前揭露的那些。

关键的内容是罗隆基的机要秘书邵慈云和赵文壁、潘大逵自动交出的一部分“密信”。

邵慈云、赵文壁、潘大逵都是罗隆基“身边的人”、“亲信”。他们的举动又一次给罗隆基沉重的“打击”。

作为罗的机要秘书，邵慈云揭发的材料的最大特点就是“详”、“实”，而且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推理”。

她证实了几个重大的问题：

“罗隆基的行动证明，储安平‘党天下’谬论的内容，他是事先知道的。是不容置疑的。”

“罗隆基亲手批示给反革命分子复信，叫他们‘由各界造成舆论’。”

“罗隆基叫嚣成立‘平反委员会’是为了什么？”

邵慈云严正指出：“现在我要正告罗隆基。你不是要我‘交代’吗？我正是尊重你的意见到民盟来了。可是我不是交代，是向大会对你作新的揭发。奉劝罗隆基把对我使用的‘交代’这两个字收回去，需要交代的正是你自己。”^⑤

她的讲话引起了阵阵掌声。

萨空了用了赵文壁、潘大逵自动交出的一批密信。

他总共宣读了三部分密信，都是从交出的信中摘取的“精华”部分。

萨空了认为，“这完全可以证明从1953年到1957年罗隆基的反共阴谋集团一直在继续活动”。

第一部分信，“证明罗隆基的小集团并不是搞派系斗争的。而是反

^④ 《文汇报》1957年9月3日。

^⑤ 《人民日报》1957年9月3日。

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统战部和盟内的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的进步人士。”

第二部分信，“证实了罗隆基集团也确曾在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作了许多打击、排斥左派、民盟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领导实权的勾当。”

第三部分信，“恰恰证实了罗隆基集团从1953年到1957年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只是干得更加隐蔽而已。”

总而言之：罗隆基“1952年以后不搞宗派了”，“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①

.....

罗隆基无言以对。

9月13日，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召开。

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党务委员会沈钧儒主席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题为《全盟动员起来，把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展开全面整风，过社会主义关！》的长篇报告。

宣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已经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并且正在开始瓦解。”“反右斗争初步胜利。”^②

○“最后总攻”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结束，直至12月中旬，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揭发罗隆基“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争似乎暂时沉寂下来了。

但是，罗隆基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

① 《人民日报》1957年9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几个月的斗争，在他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太多的创伤。

往日宾客如云的罗府，已无昔日的繁荣，“门前冷落鞍马稀”。那些朋友、“亲信”们也都纷纷离他而去，谁都不愿“沾”他的“光”了。

罗隆基整日闭门思过，检讨自己。

想到“章罗联盟”，他总感到“骨鲠于喉”，至今都搞不清“联盟”的来源。

10月，他曾致函昔日好友郭沫若，诉说内心苦闷：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处境如斯，诚所谓‘今虽欲自雕琢，曼词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辱耳’。我亦唯有听之而已矣。……”

……

凭着一种长期培养出来的政治敏感，罗隆基知道，现在的“沉静”是短暂的，这是一种大战前的宁静，更大的风暴很快就要到来了。

果真不出其所料。

12月21日至23日，中国民主同盟连续三次召开盟员大会，“驳罗隆基和批判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

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和其他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罗隆基也参加了。

3天的大会上，共有100人发了言。

人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罗隆基和章罗联盟的重要反动论点，一个一个地进行了深刻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

《人民日报》以通栏黑体字标题报道了会议的情况：

“民盟中央再斗罗隆基”

“‘秀才造反’的阴谋越揭越臭”

“知识分子得到教训越来越多”

《光明日报》设专栏《彻底批判章罗联盟》，连续选登了“高水平”的批判文章。

.....

斗争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李国钧、王德滋、邓初民、池际尚、孙殿卿、邵循正、陈士骅、姜成文、高天、章名涛等联合发言，指出：

“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重点之一，就是妄想从国家组织形式入手来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改变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性质。”^①

千家驹、华罗庚、孙承谔、金岳霖、张国藩、闻家驷指出：

“罗隆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谬论，是他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

冯友兰指出：

“罗隆基和他的小集团认为现在是‘党天下’”，“鼓动落后的知识分子，迷惑中间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跟着章罗联盟走，与党对抗。”^②

梁思成、叶和才、刘崇乐、李西山、陆士嘉、陈宗器、陈鼎文、张维、童第周联合发言，指出：

“罗隆基放出来的毒素中最恶毒的一支箭就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这句话是罗隆基的政治路线的结晶。这种狂妄叫嚣的实质，就是要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③

龚祥瑞、王子泉、周新民、周叔迦、林仲易、陈重、芮沐、曹杰、黄艮庸则尖锐指出：

① 《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2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2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

“人民和罗隆基等一切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的分歧，就在于人民主张必须把一切反革命分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肃清，以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却还是让他们‘起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让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卷土重来。”^①

吴昱恒、冯素陶、杨一波、沈一帆、褚圣麟、施洪熙、余胜椿、王麦初、薛博民主要批判了“罗隆基和章罗联盟的组织路线”。认为：

“以罗隆基为首领之一的章罗联盟，他们的全部罪恶活动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相应地也有一条明确的组织路线。他们的组织路线是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路线。”^②

.....

罗隆基被迫“承认”了许多“罪行”。

但是，“章罗联盟”问题上，他仍然“矢口抵赖”。

大会执行主席宣布：批判揭发还将继续下去。

1958年1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向罗隆基和章伯钧进行了“最后总攻击。”

“至此，经过七个月的战斗，民盟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宣告“取得了根本胜利。”

“经过民盟中央和民盟各级地方组织无数次大会小会的揭发、驳斥、批判之后，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全部罪恶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7日。

“他们的全部阴谋活动已被彻底粉碎。”

26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扩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处理。

罗隆基被撤销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31日，又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同日，毛泽东签署主席令，撤销了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随后，罗隆基所兼的其他各职也相继被撤销，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

一种神奇的力量，一下子把罗隆基从中国政坛下抹掉了。

.....

他仍然孤独地守在“道兹府”胡同十二号的罗府中，直到1965年12月7日悄然离开人世。

他带走了无穷的困惑，带走了他那永远都解不开的“章罗联盟”来源之谜；带走了对五十年代中国人际关系的种种疑惑；

.....

二十年以后。

1986年10月24日，在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民盟中央为他举行纪念活动。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参加了纪念会。

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致辞。

叶笃义、千家驹、陈新桂、李文宜、闻家驊、高天、陶大镛等民盟成员参加。

阎明复指出：“罗隆基先生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有过曲折，但是，他能努力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是爱国的，

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聊以此慰藉罗隆基的在天之灵吧！

^①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储安平·“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储安平，1957 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

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有人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此人就是 1957 年鼎鼎大名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1909 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 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的文笔犀利，敢说敢言。

1936 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

1938 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湖

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中英文化协会秘书，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观察》是一个周刊，1946年9月1日创刊，凡出四卷又八期，于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所查封。

《观察》的时代，是新中国曙光在望的时代。它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风格而知名于世。

《观察》从创刊时的一万份到第四期已突破五万份。为此，储安平“洋洋得意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949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1年，他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

1957年4月底5月初，中国共产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发起了全国范围内以清除“三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宣称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储安平积极加入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鸣放行列。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

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放了重重的一记“响炮”，引起了人民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

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

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①

储安平短短上千言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重大歪曲。”

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卢郁文说，“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共产党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达到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团结。”“我正庆幸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历史上的宗派主义铲除干净，真不知道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句话是从何说起？”

卢郁文又说。“正是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宗派主义的党，是不容许党内宗派主义，才要在自己党内发动整风，把个别党员和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思想整掉，这不正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我们不能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和个别党员、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混为一谈。”

卢郁文还批评了储安平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的说法。”

他说：“今天的清一色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但并不是共产党的清一色。全国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干部究竟是党员多呢？还是非党员多呢？党员做头儿的不少，非党员做部长、省长、局长、司长、厅长、科长的能说少吗？这怎么叫做清一色呢？”^①

6月8日下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李伯球在会上批评了储安平等人的错误观点。

李伯球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会产生宗派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是要肃清宗派主义的。”

“有些共产党员是有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在实现党的领导的时候，在某种作法上，某些具体措施中，也有以党代政的现象。这都应该提出批评，要求共产党改正。”

“但是，不能因此说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说是‘党天下’；也不能因此就人民民主专政退回到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合的联合政府去，更不能来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①6月9日晚，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召开，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谈到他不同意储安平等人的意见。

吴晗说，“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

“他指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污蔑。”

“现在全国人大、政协、各级人大、政协，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包括民盟盟员参加吗？在中央各部任部长、省市任副省长、副市长的，不是有很多盟员么？这怎能说是‘党天下’呢？”

吴晗说，“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极其反动的话。”

“他把一切现象归罪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消灭的，他这话的含义岂不是要消灭宗派主义，就得消灭共产党，从而实际上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9日。

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么？”

他说，“谁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我们都选举过，储安平也选举过。你现在这样说，不怕人民质问：‘你是怎样当代表的呀？’”

“有人钦佩储安平的‘勇气’。我不禁要问：勇气是用来对付敌人，还是对付人民的呢？是要维护社会主义，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呢？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区别清楚。”^①

吴晗还说，储安平的个人言论“不能代表组织”，“这种言论，应该批判，应该与他争辩。”

会上，人民大学教师许孟雄着重地谈了对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说法。

他说，“我是希望马列主义在很快的将来就治理天下。储安平把中国比为天下，那么党领导中国就是领导天下。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就没有什么不对。这个说法是合乎我国宪法的精神。”

他说，“对储安平的意见，错误部分应该给批判掉。”

“应该提醒储安平：他应该虚心听听别人的反批评。话说错了，就应该干干净净认错。”

许孟雄最后申明说：“我不同意对储安平的全部发言加以全面的否定。我们应平心静气地加以公平合理的讨论。”^②

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继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0日。

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

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既然现实不是这样，而要说是‘党天下’，这就是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认为“应该对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才能达到新的团结。”

王昆仲认为“万枚子说储安平等人的思想错误严重，但主观上是忠心耿耿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他说，“可能他们某些地方是忠心耿耿的，但‘党天下’这类的说法不能说是忠心耿耿的。用万枚子的说法只是掩盖错误，这样，并不能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①

6月10日晚七时半，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继续举行。

章伯钧欢迎对他的批评，并对储安平的发言提出意见。

他说：“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发言，大家认为有很严重错误，我非常同意各方面对他的批评，如联合政府，党天下等。我和他有工作关系，愿意帮助他在思想上明确，使他以正确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继续“附和‘党天下’谬论”，“坚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根源”。

陈新桂说，“储安平‘党天下’的论点，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只是他没有再进一步追究根源。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归结到底，是扩大民主的问题。”

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则据理驳斥储安平的论点。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他说,“党天下之说,好像天下就是一党所有,别人就没有分。这种说法,无论从理论上和事实上都说不通。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参加国家政权工作的。事实证明,决不是一党包办。如果把党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说是党天下,这是不对的,是曲解。”

他又说,“如果党天下,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鸣大放,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如果是党天下,就不会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这个方针恰恰也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能有这样子的党天下吗?”^①

.....



○ “不晓得知无不言有个界限”

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提出“党天下”论,就有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震撼了《光明日报》全体社员的心,震撼了民主党派,震撼了北京,震撼了全中国。

震撼之下必然是反响,进一步就是反击。

随着局势的突变,整风运动由“鸣放”转入了“收”的阶段。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反击右派的序幕。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自6月8日始,就有人批判他。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功绩”都变成了批判的材料。

6月9日,天津市锅炉工人石寿凯“驳斥了储安平的关于‘党天下’的谬论”。

他说,“党的一切政策的制定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而是征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1日。

求了人民的意见的，如我国宪法制定，就曾在人民群众中反复地进行了讨论。这说明共产党是一贯倾听人民大众的意见，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说出所谓‘党天下’这种谬论，请问他屁股坐在那里。”^①

6月10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发言的人都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张阴槐、丘林说，“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许多部门有非党人士担任首长，储安平为什么要抹杀事实？”

他们说，“党从来没有排斥过非党人士，储安平给党加上‘党天下’思想的荒谬帽子，是对党的歪曲和污蔑”。

徐亦安说：“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

“不久以前，他在本报邀请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曾经说过，光明日报过去发表的社论，不是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就是教条主义的。”

张又君问道：“光明日报的社论为什么不能歌颂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该歌颂？”熊剑英说：“储安平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的发言，给报社带来极大的损害。”

“在储安平错误思想领导下，是很可能把光明日报引导到反社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0日。

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而这是光明日报全体职工，也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许的。”

巴波说，“我们光明日报全体同志一定要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光明日报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反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反对把光明日报办成资产阶级反对党的报纸。”

潘文彬、陈季子说：“储安平的发言，虽然用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但他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光明日报工作人员的意见。

“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总的原则——社会主义，我们工作的依旧是社会主义利益。储安平的发言，和我们的思想有根本的分歧。”

吴晗详细分析了储安平发言的错误后，提出“储安平的发言违背了中国民主同盟盟章和中国人民政协章程；他的发言起了破坏作用”。

他希望大家“表明态度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民盟北京市委秘书长关世雄在发言中指出“储安平的发言是全国人民包括民盟盟员在内所不能容忍的。容忍这样的荒谬言论，我们就丧失了立场。”

关世雄号召“全体盟员团结起来，为拥护宪法和盟的纲领，向脱离社会主义道路，污蔑共产党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①

6月11日晚，民革光明日报支部举行座谈会。与会的光明日报一部分编辑、记者、行政人员，“愤慨地痛斥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关于‘党天下’的谬论”。

许多行政人员表示：“储安平的发言根本不能代表光明日报的全体职工。”

民革、民盟、民建和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在光明日报的成员也在发言中指出：“储安平的发言也是不能代表我们各民主党派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的。”

他们说，储安平的发言是“彻头彻尾反对党的领导”。

“他的‘党天下’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他的言论“给光明日报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民革北京市委会秘书长许宝 在发言中“驳斥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

他说：“‘党天下’之说，是与事实不符的。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都非‘清一色’。即使如他所说每一单位有一党员作‘头儿’，也不能称这种情况为‘党天下’，这是污蔑党。”

“他用极其恶劣的、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恶毒言论来比拟，这不是无知，是污蔑。”

“他的发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形毕露。”

“他是用‘党天下’的谬论同党的领导混淆起来，用以诋毁党的领导，他对党的领导有抗拒情绪。”

许宝瑛最后说，“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报纸，我是民主党派成员，也感觉受到污蔑，因而对他的谬论也要严厉驳斥。”^①

6月12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储安平，请你回忆一下！”的文章。

文章认为“储先生的意见很笼统，给党加上这顶帽子，似乎尺寸嫌大了一些”。

文章认为“储先生的发言的发表，可以让群众加强鉴别能力，从而认识什么言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什么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这样可以使群众擦亮眼睛，灵敏嗅觉。”^②

6月13日的《光明日报》登载了关于“反党谬论激起无边愤慨”的几封读者来信。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2日。

② 《文汇报》1957年6月12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周新城“驳斥了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谬论’。

他严厉地提出责问：“储先生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他认为所谓‘党天下’，实质上就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这是全国人民坚决不能答应的。”

西单大磨盘院五号读者王东林来信说：“储安平等右派分子想用三寸不烂之舌，反对掉党的领导，那是妄想。”^①

6月13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

她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

史良还责问章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章伯钧是认识模糊呢？还是背后别有一套呢？”

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

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3日。

大有人在”。

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①

6月14日，光明日报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

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20多人。

汽车司机赵文说：“从储安平到报社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他的思想感情跟我们不一样。”

“储安平的‘党天下’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要搞掉党的领导。”

锅炉房工人张静如说：“有的读者，就到报社来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总编辑？我回到家里，我的孩子问我：你们那个总编辑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和这种人站在一起。”

老工人冯桂林说：“我街坊有个老太太，平常排队买猪肉，也常为此发牢骚，她听到储安平的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很不满意，问我：‘你们怎么有这个总编辑？’储安平想将光明日报开倒车，我们要坚决挡住他。”

排字房青年工人刘嘉启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很气愤。他说‘党天下’的谬论，是颠倒黑白。”

炊事员唐文刚说：“我们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储安平的任何挑拨离间，决不能使我们和党分开。”^②

6月14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5日。

会上，24 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中央常委茅以升首先在发言中表示：“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

常务委员袁翰青“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

他说：“6 月 9 日我去找他，问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以前，为什么没有同九三学社的商量，并且批评他说的‘党天下’是错误的。”

“他说：‘错误问题以后再谈’，对为什么不和九三学社的人商量的问题，他说是‘没时间’。”

“他还说：准备检讨。我问他：如何检讨。他说：‘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我当时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①

袁翰青还质问储安平的发言稿“为什么一定要给罗隆基看。”

“储安平的发言是和别人商量过的，而且在行动上配合的，那么，他的政治企图是什么？”

严济慈说：“储安平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这是储安平不满意党的力量强大，想取消党的领导，消灭党。”

叶恭绍着重批评了“储安平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她说，“储安平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消除宗派主义，就要取消党的领导”。

斐文中说，“开始我还在考虑储安平等人所讲的，算不算是人

①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15 日。

民内部矛盾。现在看清了，他们是借此机会把蕴藏在心里的反动言论都吐露出来，方法也极巧妙，用了种种方法来隐蔽自己，把个别党员的缺点夸大起来，但终究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面目。”

薛愚、恽震等人建议九三学社召开中常会“处理储安平的问题”。^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发言中指出：“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

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②

6月15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

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

“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③

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

马寅初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5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③ 《文汇报》1957年6月15日。

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①

○ “对农民大发雷霆，斗地主躲躲闪闪。”

6月15、16日，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开始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党天下”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

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首先发言，对储安平的问题作了声明。

他说：“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从储安平的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他们说，“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之后，首先宣传了他的办报主张，认为：今天主要学习解放前的旧报纸的工作经验；他不同意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

“储认为报纸只是管登新闻，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报纸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闻，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

“在鸣和放的报道工作中，他的主张是不断的揭露，并认为揭露是报纸的任务，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报纸的责任”。

高天和张友又进一步汇报了储安平对报纸言论工作的看法。

“他认为在他来报社以前，光明日报的社论有两种：一种是歌功颂德的社论，这是指阐述成绩的社论而言；一种是四平八稳、教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5日。

条主义的社论。因此，他主张，要写社论，就要写他所谓的‘监督’的社论。”

储安平在高天和张友发言之后，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

李毅在发言中说，“储安平有些主张，和章伯钧过去的有些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

他着重批判了“‘是事实就要发表’那种不问政治影响有闻必录的错误观点”。

章伯钧又说，“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根基的，有一贯性的，逢到政治形势改变，就会借尸还魂。因此我还是请安平同志，也包括我在内，要好好查一查这个思想。”

最后，储安平承认“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时他说明这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署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是他的错误”。^①

6月18日，民革中央委员会对光明日报被一度篡改政治方向事件发表声明。

声明说：

“光明日报是我们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报纸。近两个月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把光明日报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储安平更假借‘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发表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对于章伯钧、储安平这种利用职权，有意篡夺光明日报的行为，不能容忍，极为愤慨，严加谴责，并声明如下：

.....

储安平在章伯钧支持下，在编辑方针上强调只报道共产党和政府的偏差和缺点，拒绝发表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社论；不加批驳地刊登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量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闻，企

① 《大公报》1957年6月19日。

图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且不经各民主党派同意，用光明日报名义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企图在各地集中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应该完全由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负责。”

声明最后说：“对于章伯钧在这一时期内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储安平假借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反动言论，我们决定要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①

6月21日晚，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6次扩大会议。会议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副秘书长李毅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并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

最后，储安平作了简短发言。

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在为他的发言喝采的时候，他感到很沉重。”

他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②

6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江西省进贤县钟陵乡农民给储安平的公开信——“储安平在土改中就露出反动立场”。该信的副标题是“对农民大发雷霆 斗地主躲躲闪闪”。

信中痛骂储安平利用整风的机会，“企图挑拨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信中认为储安平“的确是很反动的”，“我们对你这种行为表

① 《大公报》1957年6月19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示愤怒”。

信中说：“你极端的仇恨共产党，我们却无比的爱戴共产党，你疯狂的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衷心的拥护社会主义。”

“你仇恨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是你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的露骨的表现”。

“你对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是留恋不舍，而且存在着幻想和野心”。

公开信还以储安平在1952年1月到3月随中央政协土改团到钟陵乡参加土改的情形为证，来揭露储安平的“反动立场”。

信中揭露储安平在土改时，“成天的板起脸孔”，“动不动就发脾气”，“不采纳我们的意见”。

信中说：

“为了分田的事，你曾和农民胡结才吵嘴相骂。”

“有一次分配地主的浮财，为了一口脚盆的分配不合你的意，你大发雷霆，拍桌子凶人，样子实在难看，群众见你害怕，背后骂你和强盗一样”。

“你以为自己了不起，旧知识分子臭架子十足，根本不把我们种田人看在眼里，你和我们之间不仅有高墙，而且有大海隔着。可是你在对敌斗争上，总是缩头缩尾的，没有掌握过一次斗争会场”。

“我们在斗争地主，你就在会场边看看和溜溜”。

“人们想了一下，你那次来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参加土改，只是看了一看”。

“你的立场是大有问题的”。

信中最后警告储安平“需要很好的清醒头脑，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作严格的批判，接受工人、农民以及

各阶层人民对你的批评和分析。”^①

6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赵玉祥的“‘党天下’的原版”的文章。

文章把解放前储安平在旧“观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政治专论其中一段的数言摘了出来，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鉴别储先生关于‘党天下’和‘莫非王土’的发言是否正确？是否现实？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1947年3月8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的专论文章。

其中第四节写道：

“坦而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

赵玉祥在照录了储安平这一反动的言论之后，说，“今天——1957年，祖国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储安平先生仍在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但是究竟储先生心里还要说的话是什么？还要向共产党劝告、建议些什么？我们还不得知哩！”^①

6月29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的一封信。

编者按：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写信给本报，表示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来信原文如下：

“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返家。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作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②

信中的最后落款为：储望英。时间：6月26日。

7月3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

文章比较系统地揭露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文章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储安平先生提出了所谓‘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的谬论，向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② 《文汇报》1957年6月29日。

权提出挑战，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有他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

“同时这件事也向我们表明了，在储安平先生的思想深处仍然牢固地保存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仍然在一些知识分子心目中阴魂不散。”

文章揭露了储安平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就极力提倡走所谓“自由主义的道路”，即所谓“中间路线”，并以主编观察杂志而闻名。

文章说，储安平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散布了许多恶劣的反动的影响，阻碍了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使许多知识分子“踌躇徘徊，不能早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文章还说，当时的储安平先生和观察杂志“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敌友不分，经常将苏联与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甚至散布反苏滥调。”

在国内，储安平先生“尽力散播改良主义的毒素，标榜出所谓革命以外的自由主义的道路。”

“而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观察杂志，储安平先生才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参加了革命”。

“但是曾几何时，储安平先生竟露出了尾巴，又对共产党进行诽谤诬蔑，又狂妄地要夺取工人阶级领导权了”。^①

.....

对储安平的揭露和批判逐渐深入，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 “向人民投降”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

在强大的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储安平受不了了。他不得不开始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反动”言论的来由和跟“章罗联盟”的关系。

7月7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由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关于储安平与章、罗的关系问题，储安平强调“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是由于光明日报才有业务上的联系，说什么章伯钧对他‘很冷淡’。”

他说，“由于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的做法刚刚符合于章罗联盟的要求，不用指点，已经为他们做得很好了”。

“储安平实质上否认了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

储安平还想继续讲下去，会议主席涂长望指出：“储安平应该争取主动，老实交代，不要总讲这些别人都熟悉的东西”。

九三河北分社的张岩愤慨地说：“我们没有时间来听你这样的交代，你要再讲这些已经谈过的问题，我立刻就走。”

“毛主席、周总理是六亿人民爱戴的领袖，‘老和尚’、‘小和尚’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储安平根本没有接触自己的思想。”

王之相指出，“储安平企图用些历史材料说明他同罗隆基伤了感情，但事实证明，他和罗隆基不是伤了感情，而是很好。他这样检讨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储安平接着为他“把光明日报变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进行辩解，说什么“他去报社后强调报纸要‘放’，强调光明日报要‘独立自主’，把这张报纸变成高级知识分子的论坛”。

他说，“派记者到九大城市开座谈会等活动，目的是要‘把报办好’，现在才认识到这些都是犯了很大错误。”

“至于错在什么地方，企图何在”，他并没有交代。

当会议主席问到“他到北京大学看了那些人”，他才交代“最近三次到北大看过的人”。

他承认“他在统战部的发言内容事先同钱伟长谈过”。

储安平发言后，江镜涛指出“他还是不老实，想欺骗过关”。

光明日报的徐亦安、梅挺秀列举许多事实，说明储安平“如何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光明日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徐亦安指出，“其中许多事实储过去是承认的，但现在又否认了。这说明储安平态度越来越不老实”。

楼邦彦说，“储安平让他把辞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的消息告诉浦熙修，今天看来是为了让文汇报发表消息，希望有群众出来对党施压力”。

楼邦彦说，“人民日报6月8日开始反击右派以后，浦熙修对他说她睡不着午觉。那时只揭发了储安平的问题，罗隆基问题还未揭发，为什么浦熙修就睡不着午觉？

“可见他们是有联盟关系的”。

楼邦彦还说：“浦熙修约他和彭子冈一起去找费孝通谈‘党天下’问题，谈话中右倾空气十分浓厚，浦熙修问道：党究竟该在国之内还是在国之上？党为什么能与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费孝通则表示怕搞到自己头上，不肯对这个问题写文章”。

此外，楼邦彦还揭发了储安平“想联络一批人在九三学社中央‘打天下’的事实”。

孙承佩揭发说，“储安平几次要找许德珩主席看他的检讨稿，是希望许主席保镖过关”。

大家要储安平当场答复已经提出的问题。

储安平“轻描淡写”地谈了一点，他的“敷衍”态度引起了大家的极度不满。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对储安平说，“你今天的交代是敷衍

的”。

“我们已经开了五次会，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帮助你，你曾表示要深入检查，诚恳交代，我们期待着你，但是你还是不老实”。

“我劝告你以今日的我向昨日的我作战，老实脱裤子，不要自误。九三学社对右派分子绝不会温情的，在反右派斗争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①

由于压力太大，储安平不得不比较系统地交代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7月1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不得不作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储安平说：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

“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

.....

“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来执行。……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

“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8日。

“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

“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

“我在五月十九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

……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

“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

“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

“而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

“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

“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

“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

“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未结束，要直到他被“撞”得“头破血流”、被驳得体无完肤才算罢休。

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排‘能手’”的文章。

文章说，储安平是一位“擅于运用编排的政治性来俘虏读者的‘能手’。”“在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就曾强烈地表现出来。”

1947年12月27日出版第3卷第18期的“观察”上发表了两封“读者投书”，总标题是“左鞭右打”，第一封引用了香港“华商报”的通讯，说“左派鞭它”，第二封引用了南京“中央周刊”的论文，说“右派打它”。

文章指出，编者给这两封信加上这么一个标题登出来，其意在于“显出这本杂志的不左不右，公正无偏。”这正是“一种拉拢读者的手段”。

文章说，“储安平想借此引起读者的同情，使人感觉到储安平之流因为公正而遭到左右的鞭打”。

“然而事实是怎样呢，储安平只是貌似公正地对国民党轻轻地推一把，对共产党重重地踢一脚”。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文章最后感慨地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①

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对“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的文章。

文章首先说：“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罪行的同时，对编辑部工作进行了检查”。

“我们不能不愤怒地来控诉章伯钧、储安平把我们的报纸拉出了社会主义轨道，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工具的罪行”。

“感谢党及时向我们发出了警号，指示我们从错误中清醒过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把我们的报纸转回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文章从“处处点火的九大城市座谈会”、“歪曲宣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企图把民主党派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党领导高等教育”、“煽动大学生闹事”、“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反动的编排手法”等七个方面来揭露章伯钧、储安平企图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轨道的罪行”。

文章指出，“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的不满，把正在蓬蓬勃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涂成一片漆黑，妄图达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在大学生中点了火。在他的直接指挥下，5月26日发表了‘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

“储安平在本报一方面坚决贯彻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一方面对于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感到兴趣。而部分记者和编辑，同储安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共鸣，因而他在报道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上和组稿上犯了错误”。

“在储安平反动的办报方针的指导和影响下,本报编辑工作人员采取了一系列反动编排手法,使得其源出于章罗联盟的‘黑云’,笼罩了一时期的整个版面,对党在八年来领导六亿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的真相,起了遮天蔽日的作用”。

.....

文章最后说,“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对于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从我们编辑部工作同志来说,也犯了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错误。”

“过去的错误是无法挽回了,我们的任务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利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教育自己”。^①

8月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长”的“党天下”的文章。

文章说,储安平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对共产党的“恶意诽谤”,是“极端反动”的,其目的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②

8月6日的《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的文章。

唐小丁首先指出,“一切明眼人,都已经看到储安平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之说,是彻头彻尾可恶的”。

“在我们四川,也有人说‘共产党行一党专政之实,不负一党专政之名’的”。

接着,唐小丁分析了“右派分子所谓共产党‘一党专政’的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8月4日。

恶意”。

“‘一党专政’，势必排除非党；这样，共产党便是不能克服宗派主义的，而本身倒成了个宗派主义的大本营；要反对宗派主义，就必须反对党。这是恶意之一”。

“‘一党专政’，‘专政’是对敌人的，一切非共产党员皆受共产党‘专政’之苦，皆无‘民主’，何不群起而攻之？这是恶意之二。”

“‘一党专政’，所谓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不合所谓‘联合政府’的精神。‘联合政府’者，乃不要共产党领导，彼此‘平行’，达到排挤和最后打垮共产党之目的也。这是恶意之三”。

唐小丁从中得出结论说：“右派老爷们的用心，可谓毒矣！然则，从其反共立场和出发点观之，也并无多大奇怪之处”。

“恶意如斯，便可见右派分子的说法是完全应该‘厚非’的，是完全‘不可以’的。”

唐小丁接着从“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宗派主义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有不可混淆的界限”、“共产党的领导权不能动摇”这三个方面来批驳“党天下”的说法。

唐小丁最后说，让我们“把‘党天下’之类的毒箭，扔到垃圾箱里去吧。”^①

9月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天下究竟应属于谁？”的文章。

文章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是章罗联盟“用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一”。

“他们要通过这个‘理论’，使人民的天下成为右派分子的天下，使社会主义的天下成为资本主义的天下”。

文章说，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是集中地从组织方面向

^① 《四川日报》1957年8月6日。

党的领导发动进攻，企图要党领导干部下台，以便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同时，“把党形容成为‘谋一己私利’的宗派，说党领导的国家不是‘为人民所有’，而是‘为党所有’；党‘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是‘共产党专政’，而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文章还指出，储安平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是“故意歪曲我国政府的性质，模糊我国政府的任务，企图把我国的历史拉向后退。”

文章最后正告“右派分子储安平之流，你想要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完全是痴人说梦！”

“这梦幻尽管十分‘美妙’，但是人民的铁拳已经把它打得粉碎！”

“今日的天下已定，它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是属于社会主义的。”^①

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的文章。

文章首先指出，“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虽然用了‘偷梁换柱，声东击西’的手法，并不公然说出他的真正用意，但是他的发言里充满了矛盾，一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他是反对我国立国的根本制度。这是六亿人民所绝对不能答应的。”

文章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论点。然后，得出结论说：

“储安平和一切右派分子首先要求的最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其次，要求资产阶级右派代表参预中央政权做主人，来贩卖一些资本主义毒素，破坏社会主义；再其次，他们也要求有局

^① 《人民日报》1957年9月2日。

部的机构脱离党的领导，不以党为核心，而由他们右派分子做主，实现局部的资本主义化。这就是他们的狂妄的阴谋，这就是储安平为章罗联盟提出的极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纲领”。

文章最后说，“储安平就是用党天下谬论，妄想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让他们右派坐上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交椅，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拉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道路！这是绝对做不到的！”^①

11月24、25、28三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

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1000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大会由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和光明日报社社长杨明轩等共同主持。

在会上首先发言的是许德珩。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驳斥“党天下”谬论。

他认为，中共中央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驳斥‘党天下’谬论的有力证据。”

他指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想达到其与党分庭抗礼的卑鄙目的，以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种狂妄的企图，终于被人民所粉碎了”。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从国家制度这一方面来驳斥“党天下谬论”。

他说：“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各省的省长、副省长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占了很大比例，从那里可以找到如储安平所说的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呢？”

^① 《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8日

接着，李祖荫分析了储安平所谓“由党外人士坐此交椅”指的是谁。

他说，“如指的是宋庆龄、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则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从国家制度说，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都不能同时兼任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而从现任职位看，副委员长是排在副总理之前的。说穿了，储安平是想为章伯钧、罗隆基争取总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斐文中代表他和严济慈、潘菽、尹赞勋、杨钟健等5人联合发言。

他们一再强调说：“在我们看来，与右派分子储安平恰恰相反，按现在的情况，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员同志还嫌少”。

他们最后说：“我们不但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而且自己要求加强自我改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专家。储安平要取消党的领导，简直是丧心病狂！”光明日报董卓明、徐亦安、丘林分别在会上批判、揭发、控诉了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罪行”。

他们说，“储安平的办报路线是与他的党天下谬论是一致的。他妄想在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办一张反对派的报纸。”

“他认为报纸的任务是：揭露，揭露，再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

他们还说，“储安平还进一步利用光明日报做工具，妄图把民主党派变为资产阶级反对党。”

“他认为民主党派应该站在共产党的对面，来争取自由民主。”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孙承佩揭发了许多事实，指出“储安平在解放前后，一贯从事反共活动，而且是右派分子中最凶狠的一个”。“原来是一个反共老手”。

大公报副社长常芝青就储安平在解放前所编的“观察”杂志的“反动本质”，作了全面的批判。

他说,“储安平是一个反动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吹鼓手,而‘观察’为传播和散布亲美崇美的‘民主个人主义’毒素,尽了极大的努力。”

“储安平和他主编的‘观察’在那个时期,最巧妙最恶毒地起了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帮凶作用,也最巧妙最恶毒地起了反共反苏的急先锋作用。”

常芝青分析了“观察”上所登载的许多文章,认为“储安平是用‘大骂大帮忙’的诡计来达到作为国民党反动派帮凶者的目的,并以此来达到其反苏的卑鄙阴谋”。

常芝青着重指出:“从‘观察’的创议、发刊和出版,从它的产生、发展到被查封的两年零数个月中间,是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向中国人民施展阴谋诡计,力图巩固和独霸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观察’却千方百计为美国这个恶毒的敌人的对华政策张目,这是‘观察’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一点。”^①

常芝青还专文“批判储安平主编的旧‘观察’”,该文发表于1957年11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

●常芝青认为“‘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观察’曾是一个人民革命底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这不是武断,这是一种科学的说明”。^②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程希孟以他在英、美等国的耳闻目睹的事实,就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三个方面,揭发储安平“所崇拜的资本主义民主的黑幕”。

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从三个方面驳斥了“储平的‘党天下’谬

① 《光明日报》1957年11月30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6日。

论，认为“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人民团体中，党员担任领导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正体现了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从理论上详细地分析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

他认为储安平于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这个发言，“彻底而露骨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全部政治野心 and 政治阴谋，它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纲领，它把攻击点集中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三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二、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三、关于党的中央、党的领袖的核心作用问题。”

孙定国以两个小时的发言，全面地批驳了储安平的“反动论点”，认为“储安平以‘党天下’来攻击共产党，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任凭储安平对党中央、对党的领袖进行怎样恶毒的攻击，都是无济于事的。”

孙定国还在1957年12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专文——“储安平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彻底批驳了“‘党天下’谬论”。

在会上，工人代表、北京市石景区钢铁厂的王广，农民代表、北京市昌平区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魏国宾，学生代表、北京大学的陈松岭都先后发言，对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表示万分愤怒，斥责他的“反动罪行”。

魏国宾发言特别严词指责储安平用“老和尚”、“小和尚”等字眼“侮辱全国人民敬重的领袖。”

他说，“我们农民今天能有幸福的生活，永远不会忘掉共产党的恩情的。我们决不再过二十斤玉米面就交换一个闺女的日子。右派分子的反共企图，一定要被我们劳动人民打得粉碎。”

陈松岭愤怒地指斥“储安平想到北京大学点火放毒的罪恶企

图，并进一步揭穿储安平的阴谋伎俩。”^①

……
 会议最后宣布：“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及其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自6月8日开始受到批判以来，其反动本质早已昭然若揭，经过这一次的连续集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予以系统批判，党天下谬论，已彻底破产。^②……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经过马拉松式的揭发、批判与控诉，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了储安平的头上。”

1958年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

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已换人。……
 大量储安平及其“党天下”的谬论，渐渐地变成了历史陈迹而遭人们淡忘。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这或许是时代的一种特征吧。

……

……

……

①《光明日报》1957年11月30日。

浦熙修·“能干的女将”

浦熙修，1957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

**“不仅用墨水，
而且是用鲜血来写新闻”**

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几百人，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伫立浦熙修遗像前。

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几百人，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伫立浦熙修遗像前。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史良，以及胡厥文、季方、胡愈之、杨静仁、钱昌照等到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

“浦熙修同志是一个优秀的人民的新闻战士。”

这次晚来的追悼会，在浦熙修含冤去世后整整10年举行。

参加会议的人们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嫉恶如仇”。

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

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她“对党无比信赖。”^①

然而，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中，这样一个“卓越的新闻战士”，生命之火，事业之花却是熄灭得那么快，凋谢得那么突然，那么……

悲痛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浦熙修，1910年出生在江苏嘉定县一个职员家庭，早年随母亲和姐姐到北京求学。

1929年暑假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

1936年春，随丈夫袁子英去南京。不久以一篇关于妇女的职业问题的文章应试，考入南京一家地产公司。发榜那天，公司负责人对她说：

“你考得不错，但是公司不打算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同意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你去新民报。”

她同意了。进入《新民报》营业部。

一天，《新民报》社社长陈铭德让她采访一条新闻，完成得不错，就被调到采访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民报》内迁重庆，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也正式开始了。

一到重庆，她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关系，采访的最初

① 《人民日报》1981年3月27日。

的伙伴是中共地下党员黄薇和子冈。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也从不把她当外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谈判开始到南京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她始终进行了采访，被称为“国共和谈新闻的专家。”

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治主张，她巧妙地为政协38位代表每人写了一篇访问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人的访问记均按顺序最早见报。

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民党特务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造谣，制造混乱。浦熙修毅然与《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一起，团结了大批在重庆的记者，联名写了揭露事件真相、驳斥中央社的公开信。

公开信在几家报纸发表后，在山城重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6月23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了从上海来的请愿代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时，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在现场采访，为了保护雷洁琼，她自己也被特务打伤。

但是她毫不畏惧，坦然表示：

“别看我的眼睛打肿了，倒是更明亮了，能看清究竟谁要和平谁要战争。”

她的坚定鲜明的立场，赢得了党的充分信任。

1947年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临别她去梅园新村和周恩来、邓颖超道别。

周恩来嘱咐她“今后多点书吧。”

同年冬，浦熙修赴北平，采访了一批政界和学界名流，如李宗仁、吴晗、钱伟长、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等，探讨中国今

后向何处去的问题。

《新民报》被国民党下令停刊后，她受徐铸成委托，为香港《文汇报》写南京通讯。

1948年11月16日夜，她正在家中为《文汇报》写《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一文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浦熙修在狱中70多天，一直和狱中的共产党人一起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不屈斗争。直到李宗仁上台，国共和谈之门重启，她才作为政治犯被释放。

上海解放后，她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开会期间，毛泽东亲切地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

由于她的影响，当时新民、文汇、光明等几家报纸都欢迎她去，她毅然选定了文汇。

抗美援朝期间，她以饱满的热情三赴朝鲜战地采访。回国后，又选择了铁路未通、路途遥远的新疆，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报告工作。并先后写出了《朝鲜纪行》、《新疆纪行》等脍炙人口的文章。

当时的浦熙修，浑身洋溢着革命的激情、朝气和生机。

渴望为人民的新闻事业多作贡献。

.....

“知人知面不知心”

1956年后，浦熙修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同时，她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以后，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论述，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感奋。

全国上下都在议论。

浦熙修也不例外。

她身兼两头，一方面要及时准确地把中央的声音、北京的动态告诉上海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参与民盟市委的一些日常工作。

当然，在每天繁冗的工作结束后，她也注意放松一下自己，走出金鱼胡同里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斜对面的“乃兹府”胡同，是她时常去的地方。

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就住在这条胡同的12号一个四合院里。

快10年了，她与他一直“过从甚密”，浦熙修一贯很敬佩他，他也一直依恋着浦熙修。然而他们却“欲结婚而未曾结婚。”

这几个月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们的接触更多了。

浦熙修也经常就一些问题，诸如对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向罗隆基请教。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中央统战部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罗隆基等应邀参加。

中央认为，“这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是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①

浦熙修为了及时掌握这方面的情况，时常去“乃兹府”请教罗隆基。

6月初，罗隆基离开北京，去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议，他们的谈话暂时中止了。

①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

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中央认为,有“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①

很快,循着这条线索,民盟系统内“揪出”了“章罗反党联盟。”

乘胜追击的结果,就是从各地的民盟组织中挖出了“章罗反党联盟”的骨干。

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反右的矛头顷刻间转向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18日以后,“章罗联盟”在北京的“据点”被攻破,据称包括浦熙修在内的,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黄药眠、钱端升、叶笃义等“骨干分子”“控制了民盟中央”,“向全国各级组织发号施令。”^②

浦熙修震惊了!

24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划清界线,参加战斗》一文,这是浦熙修在舆论高压下的第一个反应。

她表示要认真检讨,和“章罗反党联盟”划清界线。

可是,到底划清什么界线?怎样才算划清?她茫然无所知。罗隆基是她一贯比较信赖的人。

这时候,她连说话的人都不好找了。

在紧接而来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大家要求她深刻检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友石在28日的会上质问浦熙修:“文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8月19日。

汇报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河北日报的言鲁则质问她，“整风中文汇报到处点火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浦熙修和在场的徐铸成都一再表示，罗隆基和文汇报并没有什么关系，文汇报没有接受罗隆基什么指示。

朱友石又进一步揭露说：

“6月26日光明日报载叶笃义揭露罗隆基6月23日的谈话，罗隆基也承认，文汇报要复刊时，他曾叫徐铸成不要听文汇报内党组织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

“6月26日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黄琪翔的揭露：6月9日，章伯钧曾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浦熙修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通知文汇报。’这很清楚地说明文汇报不仅听罗隆基的指示，而且还听章伯钧的指示。”^①

一连串的质问，使浦熙修非常窘迫。

是啊，你浦熙修不是在接受“章罗反党联盟的”的指示吗？

7月1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伟大领袖深刻指出：“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猖狂的进攻”，“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民盟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位能干的女将”，“浦熙修么！周纳得多么巧妙！”^②

浦熙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是要‘由右向左转’还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

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否认”。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

浦熙修表示，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①

7月2日，《人民日报》以“‘能干的女将’干什么？”为题，报道了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揭发浦熙修“反动活动”的情况。

问题升级了，事态严重了。

文汇报叶冈说：“浦熙修领导办事处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来自民盟中央的右派集团。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野心分子的谬论。8日下午，她就打电话给陆定一同志，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

“这天下午她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商量所谓批评储安平的说理文章。”

“10日以后，办事处记者主动提出要访问文教界进步人士发表谈话，驳斥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反共谬论，但是浦熙修十分消极，不同意这样做，并且说，新闻记者难做，我们还是写些琴棋书画吧。”

他进一步指出：“浦熙修对反右派斗争是一直抗拒的，直到章伯钧、罗隆基的野心家面目被揭露，文汇报在标题上把章、罗、储并列，她还特地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编辑部表示不能同意。”

梅朵揭发说：“当‘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分子的时候，我们几次向浦熙修提出，应该立即组文教科学界进步人士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谈话，而浦熙修却一再表示不同意，认为报纸上反击右派分子的言论都不是以理服人，不能解决问题，自己却坚持要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找费孝通、楼邦彦等写一篇从国家体制出发的‘以理服人’的文章。”

他指出：“浦熙修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企图用‘以理服人’作为幌子，组织费孝通、楼邦彦等写文章为储安平打掩护。”

听到这些，浦熙修脑袋“嗡嗡”直响，可是，她还是尽量耐心地听着。她深知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她也深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党的一贯原则。

她继续耐心地听着、记着。

谢蔚明接着发言。他说：“我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八年来的印象，罗隆基和浦熙修是接触频繁的，浦每逢重要事情，都向罗请示。”

“195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开会，协商政协全国委员会新闻界委员的名单，浦熙修应邀参加，她在会上提出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的名字；开完会，浦熙修回到办事处，把提名经过和我谈了。接着她打电话给罗隆基，谈起这件事，罗责备她说：‘你太幼稚了，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

谢蔚明进一步推理说：

“当天晚上，浦熙修写了一封信给新闻工作者联谊会负责同志，信里的内容我虽不了解，但以后真是浦熙修当了政协委员。我觉得，这是罗隆基抬高浦熙修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法。”

“后来，浦熙修又当选了民盟候补中央委员，可能也和罗隆基的活动有关。”

记者刘光华最近也遭到批评，为了表明他的立场，他也作了检讨，表示对自己所犯的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极其痛心的。”

他揭发说：“《北大民主墙》这篇通讯是浦熙修指示我根据一封北大学生来信，补充了一些材料写成的。这篇通讯，对大学生中的不正常情绪和大字报的作用加以片面渲染，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引起混乱。她在稿子写好后还去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她对这

篇稿子还表现了比别的稿子远为浓厚的兴趣，除亲笔附函外，并打长途电话坚决要求上海编辑部发表。”

记者姚芳藻也痛切地说：“罗隆基排斥民盟左派，也影响到我们的采访工作。明显的例子如写潘光旦的访问记。原来潘光旦是罗隆基的亲信，因此浦熙修和潘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潘的错误言论也就得以上报了。”

摄影记者陈根宝说：“就我在京一段时期所知，浦熙修传达许多政策，大半来自民盟或者就是罗隆基个人。”

读者来信组组长郑永欣说：“这次浦熙修来上海曾和我谈过一次话，她说，‘罗隆基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根本没有什么恶意。’又说，‘储安平正在闭门思过，还说储也没有什么问题。’”^①

甚至连徐铸成也“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并“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②

.....

对浦熙修的批判越来越和批判罗隆基联系在一起。

批判会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批判。

《文汇报》上海编辑部全体编辑、记者、职工组织的批判。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全体同志组织更为直接、更为深入的批判。

浦熙修精神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作为一个孤身在京的女人，她感到实在难以支撑了。

每天批判会结束，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想着诸位同仁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的揭发，只能付之以无可奈何的苦笑。

马上又要抓紧准备第二天的检讨。

7月4日，《中国青年报》，以“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标题文章，揭露“浦熙修的一系列两面手法。”

文章指出，“中国有句古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对右派分子‘帅’字号的人物，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浦熙修在6月24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彻头彻尾欺骗人民的文章。标题是‘划清界线，参加战斗。’”

“她在这篇文章里，除去一些假仁假义的‘台词’外，主要的篇幅是用来替文汇报辩解，为罗隆基打掩护。但她的阴谋伎俩是瞒不过人民的，人民知道她的底，了解她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别的‘人物’？”

她“首先欺骗人们说：‘再也没想到，他们（指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却心怀叵测，趁着党整风之际，想不要党的领导，自搞一套政治资本，走资本主义的方向。’这是浦熙修伪装自己的第一套外衣”；

“她又继续说：‘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文汇报完全是一种人民的报纸……。’这里是她的第二套外衣，企图把她同罗隆基的秘密关系笼罩起来。”

文章进一步指出：

“遗憾得很，浦熙修为什么不想想楼邦彦在6月18、20日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揭发的那件事呢？”

“楼邦彦在谈到和储安平的关系问题时说：‘储安平的谬论发表后，我只感到‘真尖锐’，居然敢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直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和‘石景山钢铁厂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报道刊出后，我才感觉有些问题，……就在同一天，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打电话给我，说人民日报对储安平的批判‘太猛了’，要我向记者发表谈话，从国家体制的角度，

‘平心静气’地批评储安平发言。”

针对浦熙修“我和罗隆基有十年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辩解，文章尖锐地指出：

“这也许就是浦熙修对罗隆基‘深刻的体会’与‘体贴’吧！”
“浦熙修和罗隆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切事实证明：浦熙修离不开罗隆基。”^①

可怕的弦外之音，私人友谊和政治问题已经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浦熙修有口难辩了。

○ “犹抱琵琶半遮面”

斗争继续深入，揭发和批判不断地升级。

7月2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向人民请罪”，全体“职工愤怒揭发浦熙修的阴谋活动”。

副总编辑刘火子深刻指出：“罗隆基和浦熙修关系是二而一。”

编委黄裳说：“浦熙修在北京约稿时，排斥民盟左派，谩骂吴晗的文章是教条主义、官僚架子。”^②

同日，浦熙修参加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举行的“坚决粉碎右派向人民新闻事业的进攻”的批判会。

在强大的政治威慑和与会革命同志的轮番进攻下，她开始了深刻的检讨。

表示要“揭发罗隆基的政治阴谋。”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在会上摘录了罗隆基在1950年、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4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

1954年和1957年5月间给她的三封信中的片断，以图从中发现罗隆基的“政治阴谋”，从而表明自己和罗隆基划清界线。

浦熙修说：“1950年8、9月间，严宝礼要我到上海文汇报工作，我又想随沈钧儒老先生参加西北访问团去西北，正在迟疑间，罗隆基对我说当然应以报社为重去上海。”

“罗隆基在9月9日给我的信中说希望徐铸成和严宝礼能够团结，把文汇报搞好，他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

“1954年我在上海，罗隆基来信说：‘表面上我总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

“今年4月间我在黑龙江视察，接到罗隆基来自北京的信，说文汇报的记者问他对百家争鸣的意见，他认为文汇报不要在人民日报后面追赶，文汇报原来有自己一套做法，例如电影座谈会等等，已开风气之先。今天应自想办法，不要别人做什么也跟着做什么。”

“同信中罗隆基还说：‘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指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浦熙修表示，这些信只是罗隆基给她的信的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信“一时还找不出来”，她将继续“寻找”。同时，她表示，愿意将罗隆基给她的信件交给民盟中央整风小组。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最后，还表示：“感谢和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式，因为‘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浦熙修这番苦心的挖掘并没有起到预料的效果。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对她的发言“避重就轻、敷衍搪塞、不检查错误、不彻底交代章罗反党联盟通过她利用文汇报作为向党进

攻的工具的事实的狡猾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怒。”

大家纷纷递条子，要浦熙修交代“她在罗隆基和文汇报编辑部之间如何挂‘帅’的‘事实’。”并坚决要她“交出罗隆基给她的全部信件”。^①

“自称和浦熙修曾经是二十年老朋友的彭子冈，在会上说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

她说，“直到上星期浦熙修到她家里找她帮助分析自己的错误时，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描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

“彭子冈希望浦熙修好好揭露章罗妄想在中国促成匈牙利性质的事件，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②

浦熙修更加孤立了，彭子冈的确是她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她的话是有份量的。没有人怀疑她揭发的“事实”的真实性。

随后几天的斗争，更加深入。从现实联系历史，从历史对照现实，斗争者是越战越勇，浦熙修则节节败退。

7月4日，《文汇报》京、沪两地职工又分别举行批判大会，揭发浦熙修的“反动言行”。

在上海《文汇报》社。

编辑陆平着重指出“由浦熙修主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忠实执行了章伯钧、罗隆基反动联盟的意图。在党宣布整风后，北京办事处发来了很多煽动性、破坏性的专电。”

他举“五月为例，北京办事处报道整风的专电见报的共有58条，其中56条，完全是或基本上是带煽动性、破坏性的。”

“5月20日发来一条报道高教部边整边改的专电，消息中无中生有地说，高教部党组认为‘必须改变目前（高校中）以党代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4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政的情况’、‘学校人事处是否需要存在，也可考虑。’这不仅是客里空的报道，而是充分暴露浦熙修执行章、罗企图取消党领导高校阴谋的具体表现。”

记者朱熹树说，“浦熙修对学校的教育业务不感兴趣，我向她汇报情况，她不爱听，但是波匈事件发生后，北大学生讨论民主问题，却引起她的兴趣，她天天要我汇报情况。她为什么对这些政治性的新闻特别感到兴趣呢？是不是在为章罗联盟搜集情报呢？”

副总编辑唐海揭发说，“罗给浦的信中除了‘熙爱’两个字外，谈的一般是政治问题，而浦熙修却说，她只是有时去吃晚饭，一起散散步，难道他们见面就不谈政治吗？”^①

同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梅朵继前几日的揭发，进一步指出：

“浦熙修对党是怀着敌意的，她还挑拨党群关系，以削弱党的威信。”

“她常说中宣部教条主义最严重。有的从中宣部约来的稿子，她还没有很好的看，就说这是教条主义的东西，枯燥乏味。”

杨重野揭发说，“浦熙修对党和盟抱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在民盟小组会上说，她非常爱民盟这个团体，认为给她很大教育和帮助；而她对党却不是这样。”

“浦熙修就这样耍两面手法。”^②

7月5日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更是热闹。浦熙修和徐铸成被勒令继续交代。

一周多以来的批斗，已使浦熙修“狼狈不堪”了，她支撑不了，病倒了。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5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根据会议的议程，她必须继续交代。

下午4时，她拖着病弱的身体，走进会场，立刻就遭到与会的300多名新闻工作者的一致“声讨”。

人民日报记者高集，10年前在“下关惨案”中和浦熙修一同被殴打的那位大公报记者，“严正斥责了”浦熙修“交代问题时躲闪、掩饰和耍赖等恶劣态度。”

他指出：“浦熙修是章罗联盟中一个重要‘角色’，她在罗隆基出国后替他撑了半边天。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浦熙修一方面派人去光明日报观察气色，另一方面自己出面张罗费孝通等人写文章为储安平辩护，指挥若定，想以螳螂之臂压倒全国人民反右斗争的声势。”

高集愤怒指出：“浦熙修在座谈会上装出一副诚恳的面孔，说自己‘天真’、‘糊涂’、‘无辜’；但是在交待和罗隆基的关系时只拿出罗隆基给她的三封信……和罗隆基‘十年密谋，同床共语’，难道和他的关系只有区区三封信吗？”

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张恨水等5人向浦熙修作了“联合宣言”。

宣言说，“十年前，罗隆基在重庆、在南京披着进步的外衣，作为骗取政治地位和女子爱情的资本。那时我们就看出罗隆基是个轻浮浅薄而又阴险卑劣的政客，多次向你进忠告，希望你不要上当。不幸的是你终于和罗隆基结合了，成为他的俘虏。你把罗隆基看做是你的唯一的思想领导者，但是十年以来，罗隆基帮助了你什么呢？你在解放后不但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是一节一节地往后退。很显然，你中罗隆基的毒太深了。”

他们进一步提醒浦熙修，“罗隆基的面目如今已被揭穿了。罗隆基阴谋把社会主义的社会改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其中必然有许多组织活动，你一定会知道的，为什么还不说？”

“今天，是走向社会主义呢？还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呢？何

去何从，你自己应该有一个决定。”

“罗隆基利用着你，要你去给他打江山，夺天下。这是背叛人民的事，也是决不会成功的事！你应该彻底地交待，你要‘猛醒’，要不然，你必然要为人民唾弃。”^①

谢蔚明愤然指出：“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是答应了的。”^②

一言既出，语惊四座。

斗争已深入到如此程度，看你浦熙修再敢“耍赖”、“狡猾”。

浦熙修崩溃了，病弱的身体再也经不起车轮般地进攻，思想也乱了，理智的防线失却了。路只有一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她最后表示：“我愿意交代，但请容许我再多想一想，准备得充分一些，在后天会上交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友石等指出，“浦熙修和章罗联盟的关系，根本用不到‘想一想’和‘准备’，坚决要求她立刻在会上交代。”

“在群众声势浩大的压力下，浦熙修在会上先后作了四次‘交代’”。

“浦熙修发言时，群情激昂，大家一再起立发言揭穿她的阴险手法。”

最后，她向大家保证，“在明天的会上老老实实、彻彻底底交代和章罗联盟的关系。”^③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5日。

② 《大公报》1957年7月6日。

③ 《大公报》1957年7月5日。

漫画家华君武对浦熙修的自我检查也非常愤慨，7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

“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漫画，揭露了浦熙修和罗隆基在政治立场上的关系。

○“得意杰作”·“吐露内情”

全国“章罗反党联盟”已成定局，章罗已早成“过街老鼠”，浦熙修终于败下阵来，按照批斗中革命同志的要求和暗示，吐露所有“真情”。

7月10日，《人民日报》以《罗隆基怎样控制文汇报？浦熙修开始吐露内情》为标题，详细披露了浦熙修交代的“真情”。浦熙修说，

“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其实这是报纸上早就定好的调子！）”

“去年8月在北戴河，他们首先是想篡夺盟内的领导权，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左派，争取中间，团结右派。他们对于史良副主席大肆攻击，他们认为沈钧儒主席应该退休，高崇民副主席无足轻重。”

“罗隆基还曾和曾昭抡密议如何安排盟内人事。他们还协商过要通过民盟基层组织把各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抓到手里。”

“罗隆基还搞了许多次知识分子串连座谈会，找的都是有问题、意见多的人。罗还自称要替这些人伸冤：

“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

“罗隆基和曾昭抡的关系最密切。罗隆基的公开发言，都要请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三人去协商。”

“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

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报纸，这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

“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罗隆基常向我夸口”，“把我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是他最拿手的杰作。”^①

18日、19日，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继续举行，浦熙修继续交待。她说：

“章罗联盟有着长期的酝酿，从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罗就不再骂章伯钧了。章伯钧在那次大会上作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工作报告，是在‘为了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强调钻研业务，代替思想改造，罗表示完全支持。”

“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章罗提出大发展的方针，以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别有用心地提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浦熙修还进一步揭发了罗隆基和另一些人的暧昧关系：

罗隆基和张东荪暗中是否来往，“值得追究”；

“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电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和这个特务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余上沅被释后，余的妻弟的老婆曾打电话向罗隆基道谢。这是什么关系，罗也应该交待”；

“罗隆基曾一度和他的干女儿梁文茜（梁实秋的女女儿）来往很密切。”

.....

浦熙修的揭发和交待“深刻”得多了。她进一步指出：

“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

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

“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

“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

浦熙修还对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更加系统的“交代”，以便尽快从“章罗反党联盟”中解脱出来。

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鲁西良等人指出，“浦熙修在1952年后和罗隆基的关系并未疏远，到底为罗隆基小集团做了些什么事，必须继续老实交代。”^①

可见，斗争远没有结束，浦熙修休想解脱出来，“揭露”得越多，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联系就越多，关系越密切，罗隆基是彻底倒了，她也没有能站稳。

8月12日，“被罗隆基称为他的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浦熙修，”在民盟中央第七次扩会议上，再一次揭露“罗隆基去年以来有组织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些具体事实。”

“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孙大雨诬告党员案是罗隆基策划的”；

“罗隆基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官，过资产阶级生活’”；

“罗隆基所谓的有职有权是要取消党委的领导，以达到他专横独断，为所欲为的目的”；

“罗隆基在全国解放前夕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勾搭，策划反共”；

“罗隆基胁迫陷害故张澜主席的阴谋，完全是事实”。^②

一枚枚“重磅”炸弹顷泻到罗隆基身上，罗隆基“粉身碎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② 《大公报》1957年8月13日。

骨”了，浦熙修也没有逃脱飞溅的“弹片”，她自己也被击倒了。

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重重地扣到了她的头上。

悲剧开始了。

她被免去了《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的任职。

民盟中央撤销了她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常委和副秘书长的任务。

她潜心改造自己，她表示，“我相信党，我拥护党，我问心无愧。”

对党来说，她是“问心无愧”了，可是，对朋友呢？对罗隆基呢？她是很苦闷的。

1959年10月，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之一，浦熙修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她对工作，对党依然是满腔热情。

不久，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组长。

表明党还没有完全抛弃她。

她表示：“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当旧闻记者吧！”

晚年的浦熙修，并没有逃脱1957年反右的阴影。

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含冤去世。这期间她在精神上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1968年11月她在病床上写的自传，折射出她的痛苦、孤独和

.....

“1965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12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1966年1月动手术，后来又到医院休养，直到6月7日才出院。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11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12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1967年3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象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结束，我努力完

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①

^① 《人物》1981年第1期。

徐铸成·“未甘盛世作‘遗民’”

徐铸成，1957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宣传主任，《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鸣放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徐铸成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通知，要他翌晨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

第二天到了会上一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和赵超构、吴永刚、姚文元等都到了。宣传部长石西民告诉大家，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昨天才得中央电告，希望各位辛苦一下，会毕即回去料理公私事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上火车。

第三天上午，到了北京。下午他们就去了政协礼堂听毛泽东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

声音很清晰，令他兴奋不已的是主席讲话的内容：国内形势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党外朋友帮助。

谈到整风时，毛泽东很风趣的讲话引得徐铸成和其他人哄堂大笑。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似的和风细雨。听来真是轻松愉快，兴奋、舒畅。

听完录音，他便和傅雷相约来到中山公园聊天，深感党的“双百”方针的英明、正确。都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

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特地到会场作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还有疑虑。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著名演员石挥也担心，“这正如京戏《甘露寺》里所说的，是贾化（假话）。”徐铸成也有不少疑虑。

10日下午，刚散步回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已在焦急地等着了。他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约定时间已到，我们赶快去吧。”

到了中南海内一处院落，他们被引入客厅，毛泽东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着康生介绍，毛泽东立即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

“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松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不错！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其他报纸。”

听到主席的赞赏，作为报纸总编的徐铸成心中涌起一股感激的热流，无比温暖，无比幸福。

坐定以后，康生先说话，“今天，毛主席约邀新闻出版界的朋

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可提出来。”

会场沉寂了片刻，邓拓轻轻对他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

徐铸成看了看会场和主席，恳切地说：

“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泽东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了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还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他接着又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接着金仲华等人也提问，毛泽东一一作了答复。

后来，毛泽东又问道：“各位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徐铸成稍作思考，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当说得不对时，可让人慢慢再加以说清，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样才能求得批评。”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铸成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的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

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正反一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

徐铸成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谈话进行了约两小时。道别后，他立即赶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把毛泽东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和对新闻出版界谈话，告诉全体同志，大家很受鼓舞。

12日晚，徐铸成又将毛泽东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代表的情况，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上海代表作了详细汇报。

会议结束后不久，徐铸成被任命为团长，率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前后44天。5月中旬回国时，国内的“鸣放”高潮已接近尾声。

○ “‘墙’是能够拆掉的”

返回上海后，徐铸成以全部精力开始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有时去报社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正式上班。

不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来到他家，希望他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仿中央成例，吸收党外代表性人士参加，帮助党整风）。徐铸成说，“我正赶着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员和非党同志关系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可提。”

第二天，白彦又来了，告诉他“会议开得很热闹，一定去听听。”因为会议快结束了，“我们准备给你发出席证，你拿我的出席证，今天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完就掏出自己的出席证交给他。

盛意难却，徐铸成当天就去了会场。他看到发言者确实争先

恐后，发言的内容几乎都是集中在消除党群间的隔阂——即所谓拆“墙”问题上（据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提出来的）。他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这种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说，

“在苏联的最后几天，看到国内开始整风，各地开始大鸣大放的消息，很兴奋，也很躁急，再不回来，怕自己思想上要远远落后了，所以我回到上海后，主要是抓紧时间补课，补看过去一个多月来的报纸，听听各位同志的发言。”^①

第二天，他就来到会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谈了拆“墙”的问题。

他说，“文汇报在去年十月以前，是受到歧视的，内部的‘墙’也是筑得很高很牢的。”“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这些报纸一向采取改造逐步消灭的办法”。

他强调说，“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高压下，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②

这里说的“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说来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1956年春，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的报纸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加上全国“一面倒”，各条战线都学苏联老大哥，教育部模仿苏联，创办教师报，徐铸成奉命带文汇报原班人马赴京办《教师报》。5月份《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

不久，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鸣放”。但是，知识分子都不敢“放”。想到《文汇报》与知识分子

① 《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② 《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有历史的联系，如果由《文汇报》倡导“鸣放”，知识分子就敢于说真心话，敢于“鸣放”了。于是，决定上海《文汇报》在国庆七周年时复刊。

听到这个消息，徐铸成心中非常激动。

是啊，《文汇报》倾注了他多少的心血和感情啊！……

1907年6月24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他生在物产丰富、山明水秀的太湖之滨——江南名城宜兴。1922年考入设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未等毕业，他又提前一年借高班同学的文凭应考清华大学，一投即中。

在清华只读了半年就“东窗事发”。1927年经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介绍去天津南开大学借读。因学杂费太贵，不久又离开南开去了设在保定的河北大学。同年暑假又凭别人的文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时经其舅父介绍到国闻社北京分社任抄写员和编辑。

1928年6月，国民党军攻占京津，改北京为北平，定都南京，大批官僚政客南下“宁国府”，国闻社新闻减少，他给国闻社社长兼《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写信，建议国闻社采访中心转向文化消息，开辟新稿源，受到胡政之赞赏。他开始兼任《大公报》采访任务，从此正式成为记者。

不久，他因采访在太原举行的华北球类比赛和在沈阳举行的华北运动会，大获成功而再次得到《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和胡政之的赏识。

令他平生最得意的一次采访是1930年初，他三赴太原，了解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曲折过程，又千方百计，瞒过电讯检查官的检查，将冯、阎联合反蒋和冯离开太原的绝密消息，以丧电的形式电告胡政之：

“天津四面钟对过胡霖表兄鉴，二舅真晚西逝。但请勿告外祖，以免过悲一寿。”

这里，“四面钟对过”是《大公报》社址；“胡霖”是胡政之

的姓名，但时不为外人所知；“二舅”隐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真”是11日的电报韵目代号；“西逝”者，“逝者如斯夫”，可作西去解；“勿告外祖”，自然是说不要公开发表。

结果，《大公报》在12日要闻版上，很巧妙地发了一条消息：“北京电话，据太原来说，冯玉祥于十一日晚起不见客。”这是一种“录此存照”的手法。当内幕揭开后，读者会恍然大悟：《大公报》不是不知道，而是认为消息不应该过早披露罢了。

1932年初，他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1933年下半年，受胡政之托，协助赵惜梦在汉口创办了《大光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为他以后创办《文汇报》提供了经验。

1936年2月，他回到上海，参加《大公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4月1日报纸出版后，任要闻主编。

1937年“八·一三”抗战结束后，上海成为“孤岛”，《大公报》停刊，他离开《大公报》。

1938年1月，应邀为创刊的《文汇报》写社论，2月起任该报主笔，从此和《文汇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的主持下，《文汇报》宣传抗战，反对卖国投降，立场鲜明，受到“孤岛”上的爱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发行量近6万份，跃居当时上海各报之首。

1939年秋季后，他重回《大公报》，任香港版编辑主任。香港沦陷后，又辗转回到国内，先后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重庆《大公报晚报》主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6年3月辞去《大公报》的职务，主持复刊的《文汇报》。他邀请进步人士张锡昌、马季良、唐弢等参加工作，使《文汇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成为国统区影响最大、最广的进步报纸。

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党查封，他谢绝了各方面的拉拢，表示，“我是唱惯了麒派的，怎么能改唱正宗谭派呢？”

1948年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请他去办机关报。他提出，要办就办《文汇报》。9月，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冒险去了香港。《文汇报》在香港创刊后，他任总经理和主编。

1949年2月，应中共邀请，他和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宋云彬、曹禺等20位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3月份到达北京。

9月，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这一切，在徐铸成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到上海，把《文汇报》办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作贡献。

回到上海后，他担任了《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

1954年8月，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在得到陆定一、张际春等中宣部领导肯定的答复后，他马上请来钦本立和浦熙修，共同商量《文汇报》复刊后的方针和重点。但大家都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他心中很踌躇。

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突然想到，邓拓同志对文汇报非常关切，“是否可以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

“自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以来，”徐铸成“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气度就非常钦佩，”加上“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托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登门拜访。

到了邓拓家，邓拓满面笑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徐铸成、浦熙修、钦本立等在客厅落座后，话题就展开了。

徐铸成简单地谈及了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到编辑方针，他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具体如何一条条写出来，思想上还不成熟。

邓拓象对待老朋友一样，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

“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弃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只有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

徐铸成仔细地听着，还不时做着记录。

“其次”，邓拓接着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闭了多年，你们应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的研究，提高水平。”

“还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开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一些经验，谈谈这些问题。”

“此外，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部分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写出旅行通讯。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不谈问题，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有利于得到真实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到来。”

说到这里，邓拓停了下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看到徐铸成、浦熙修等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就继续说了下去。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限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历史的关系，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

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这就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①

听完这些，徐铸成感到十分亲切，而且切中问题的关键，真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感。当然，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这种非常准确的办报方针，后来成为他“堕落”为右派的重要罪证之一。这是后话。

回到家中，他按照邓拓的意见，写好了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计划，又征求了钦本立、浦熙修的意见，他们完全同意。

第二天上午，他们将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面呈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

张际春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后，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回上海后不久，中央的指示也下来了，除“照准”二字外，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徐铸成看了，内心深处非常感谢党的信任。

10月1日，《文汇报》正式复刊了。

……围绕拆“墙”问题，徐铸成接着在会上发言。

他说，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文汇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有些同志还天天怕挨整”。

“文汇报去年十月复刊，同时，中央和市委也帮助我们解决了内部的一些矛盾，拆掉了我们内部的高墙。”把一位“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但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的副总编辑，和“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秘书调开，另外“调几位

^① 《书林》1989年第1期。

过去曾在文汇报工作或对新闻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来参加工作。”

他指出，“当时，那两位被调开的同志还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撤出文汇报了’，并且对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志威胁：‘你们回到文汇报去，入党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徐铸成提高了声音。

“但是，文汇报并没有按照他们想法发展，党的领导加强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党支部改组不到一个月，提出入党申请的同志就达五六百人。大家都从具体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党的关切和温暖”。

他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内部已经完全没有矛盾。但是，矛盾的对抗性是消失了，墙，基本上已经拆除了；沟，也基本上填平了，事物发展中总会有矛盾的，对问题的看法总不会完全一致的，但我们能够把所有问题摊开来谈，经过讨论甚至争吵，最后总能得到共同的结论。”^①

徐铸成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他再三解释，我“不是来介绍我们拆墙的经验，因为每一个单位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而且从我们自己来说，还要继续努力，巩固团结，填平残余的痕迹，防止新的隔阂。”

接着，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谈了几点体会。

“第一，拆墙，固然要本单位的党和非党两方面一齐动手，但领导方面必要时也应该动手。以文汇报为例，我们的墙筑了不只一月一年，为什么领导方面一直没有注意呢？首先在调派党员干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是否恰当，最好能够对这个事业有感情有联系的，至少也应该对这一行有起码的知识的，否则就没有法子工作，更不用说领导了。一些品质差的，没有这些条件，又不虚心学习，就必然要外行充内行，利用党的威信来欺侮人，压制人了。

^① 《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第二，作为一个非党的负责同志，对党的拥护，不在于对个别党员的顺从依附，而是对人民事业的忠诚。……

“第三，去年，我也曾怀疑一个非党同志究竟能不能实际负责领导工作？党委领导和个人负责又如何具体贯彻？现在，我对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任何事业总是离不开党的领导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结合党委领导和个人负责，应该根据这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文汇报今天不仅有党委，最近并且已经成立了党组，但我和严宝礼（《文汇报》社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同志都觉得有职有权，我们的民主党派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坦率地讨论，坦率地相互批评。”

他建议，“为了不断加强各报内部团结，为了充分发挥各报工作同志的积极性，希望魏文伯同志、石西民同志和白彦同志不仅要保持和我们这些负责同志的接触，也要抽空到各报社去看看，找我们的编辑、记者、校对和工人同志谈谈，这就会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发生的矛盾。”

最后，他表示深信：

“不管我们的墙多么高，我们是一定能够把它拆掉的。”^①

○ 阴谋·阳谋·牛鬼蛇神出笼

回到报社后，钦本立问他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徐铸成说当然见报。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是一片热情，想介绍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息平大会上‘墙’能不能‘拆’的争论”。

5月19日，《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发言：

“‘墙’是能够拆掉的”

在《文汇报》头版登了出来。

① 《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很快，这篇发言就被指控为推广“反党经验”的大毒草。随着反右运动匝地而起，又成为徐铸成作为大右派的重要罪证之一。

毛泽东主席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天然的规律。

情况日趋明显，徐铸成的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

邓拓十分关心徐铸成和《文汇报》。他曾电告钦本立转告徐铸成，“争取主动，先自我检查”。

徐铸成表示想不通，也不知如何落笔。直到深夜才赶出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反响。”

6月16日社论见报后，毛泽东立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深刻指出：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

让大家鸣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①

徐铸成宛如掉入了井底。困惑、迷惘、彷徨……萦绕着他。他尽力去挖掘自己思想深处的东西。……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他开始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

他说“文汇报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面的批评，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唤醒了我们，把我们从危险的道路上挽救过来。我们正在检查我们的错误。”

他说，“我从这次严重的错误中得到了以下的教训：一时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一刻也不能忘记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作为人民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必须加紧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正错误，在党的领导下，把报纸办好。”

他在发言中表示，他“没有说过文汇报曾接受罗隆基指示的话”，“文汇报并没有被罗隆基等所利用。”

但是，《光明日报》记者黄卓明指出，“徐铸成曾说过罗隆基曾经给过文汇报指示，这是他在去年一次光明日报、大公报的民盟盟员和文汇报在北京的民盟盟员联欢会上，听徐铸成亲自说的。”

他对徐铸成的否认“感到非常奇怪。”^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友石在会上质问，“文汇报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河北日报的言鲁质问，“在整风中文汇报到处点火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朱友石又说，“6月26日光明日报载叶笃义揭露罗隆基6月23日的谈话，罗隆基也承认，文汇报复刊时，他曾叫徐铸成不要听文汇报内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罗隆基还曾在他的家里为文汇报大宴宾客”。

朱友石还指出，“徐铸成说文汇报为了使报纸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因而滋长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难道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和向社会主义进攻有什么共同之处吗？”^②

《人民日报》以“新闻工作者座谈会批判徐铸成浦熙修的错误言行”为标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很明显，问题的性质还没有太严重。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然而，形势急剧变化。

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点了徐铸成的名，他自己也感到问题严重了。

钦本立说，“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

见了石西民，他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求柯老。”

于是，徐铸成又设法去见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一见面，柯老就说：

“这事不能由你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坑里了。’”

徐铸成一听，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柯老停了停，似乎慈祥了些：

“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办法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

接着的话就更让徐铸成“惊心动魄”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①

徐铸成和钦本立谢了柯老的指教后，就惶恐不安地告辞了。

想到伟大领袖犀利的社论文字和柯老精辟的指教、忠告，徐铸成更加彷徨了、胆怯了。……

○“盛世遗民”·“以盟代党”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揭露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企图推翻共产党的右派阴谋”。

^① 《书林》1989年第一期。

章、罗问题的升级，带动了一大批人问题的升级。徐铸成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了。

2日，《人民日报》指责徐铸成“执行民盟中央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徐铸成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逐步瓦解了，发软打怵了。……

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并“揭发”了一些“事实”：

“1948年我从上海去香港办文汇报的时候罗就指点我报纸的态度不要太左，要超然一点，不要和共产党太接近。”

“去年文汇报复刊后，4月间我和罗隆基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你这样迁就的态度是自由主义。’”

“人民日报的社论不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人民日报。不要迷信党员，党员马列主义水平不一定比我们高。”

“他知道我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因此就暗示我不要相信党的领导，在单位里可以独断专行，不要服从党组的意见。”

“他主张我们在北京出版，因为中央的政策到地方就走样了，在上海不好办。”

“他还建议我们在复刊之初首先开展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他还说肃反工作问题很大。”

“他们知道文字改革问题最能打动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最能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章伯钧、罗隆基都想抓报纸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文汇报就被他们拉上了右派报纸的道路。”^①

徐铸成觉得，检查得越多，挖掘得越深，自己就越能解脱了。然而恰恰相反，一些很平常的话被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反而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朋友。对他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步步升级。

文汇报工作人员连日召开会议，批判徐铸成“公开抗拒党的领导，利用整风推涛作浪的错误罪行”。

编委徐里平说：“上海宣传会议期间，党已经发现右派分子要放火，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的阴谋。会后，柯庆施曾和徐铸成谈过，说方针是只放不收，但希望注意歪风。然而，徐铸成却认为上海的做法是‘收’，与中央的精神不对头。”

“他说在整个方针未明确前，不准备写社论。而且说，我们都是政治经验的，不能随风倒。”

编委黄立文揭发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徐铸成在编前会议上说：知识分子是一群老鼠，好容易才跑了出来，现在一顿足，老鼠都跑光了。”

“徐铸成又说，人民日报是‘蛇头’，各报跟着走，‘蛇头’转几个弯，我们‘蛇尾巴’就要垮了。不知道徐铸成这些话是什么意思？”^①

曾在文汇报工作现在教师报工作的张树人以“在拆墙中被拆掉的党员”的身分，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排斥共产党员是徐铸成一贯的手法，徐铸成曾经先后三次排斥在文汇报工作的三个共产党员，往往都是在文汇报‘向右转’的时候。”

当徐铸成“辩解说文汇报‘向右转’是最近的事”的时候，张树人严正指出：“这是一个大谎话。”他敏锐指出，“过去只是小暴露，现在是大暴露、特暴露。许多事实都表明文汇报在复刊时就开始‘向右转’了。”

文汇报唐海揭发“徐铸成解放前就和章伯钧、罗隆基有关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

系，也曾经执行过章罗的意图，使文汇报‘向右转’，走第三条路线。”

面对连珠式的炮轰，徐铸成精神上几乎瓦解了。

他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承认文汇报被右派分子利用，是他的立场问题，是他对党的态度问题。他说他一直没有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没有站稳人民的立场。”

他说：“人民日报和大家对他的批评，特别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唤醒了他，拯救了他，把他从危险的道路上拉了回来。”自己“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毒辣，也更加明白自己被利用对党对人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为了表明自己的觉悟，他又进一步“揭露了一些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编辑部，使报纸成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阵地的情况。”^①

但是，文汇报全体职工大会指出，“徐铸成这种检讨是不老实的”，是“企图蒙混过关”，是“两面派手法”。他“一贯抗拒党的领导排斥进步力量”，“貌似进步实系右派”。

对他的“诡计”“表示了极大愤慨”，“决心深入开展斗争”。^②

斗争还在深入，徐铸成日益孤立。也日益希望自己被挽救过来。

8月份，他的“交代”又逐步升级了。

他开始承认“忠实执行章罗传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针”，“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向党争夺新闻工作的领导权”，他检讨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为人民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4日。

^② 《文汇报》1957年7月10日。

的损失。”

但是，他的检讨并没有引起在家的同情，在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对徐铸成这种不老实的交代，到会同志都极为不满，先后有50多人要求发言”，揭发他“二十年来一贯反共。”

一贯与他“合作得很好”的中共文汇报党组书记、文汇报副总编钦本立严正指出：

“右派分子徐铸成一贯抗拒党的领导，打击进步力量，直接受章罗联盟指挥，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

“徐铸成有一套本事，他善于颠倒黑白，把反动说成进步，长期以来，他就是这样欺骗了许多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终于变成了民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工具是早有预谋的。”

钦本立指出：徐铸成“攻讦党组在‘以党代政’”“和他‘无职无权’的真正目的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就是让他在行使职权的合法外衣下，把文汇报变成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工具。”

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柯灵，“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徐铸成一贯是个右派，是老右派。”

柯灵揭露，“解放之后，徐铸成在政治态度上最初是装出一副灰溜溜的‘盛世遗民’的面孔；在报社工作上则是消极怠工，在报社内部则是制造不团结。这也就是他的隐伏的右派活动。这种情况直到复刊之后突然大变，明朗的站在右面，露出他那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

还有不少人严正指出，徐铸成规定的四个“戒条”：“一、不写应时的社论；二、不做人民日报应声虫；三、不刊登经验总结；四、不登地方指示。这四个‘戒条’，实际上就是他在新闻工作中反党纲领的主要部分。”

民盟文汇报支部主任委员、编辑蒋定本在发言中警告徐铸

成：“你在文汇报民盟中的信徒已一个个的被揭露了，你在群众中已完全孤立了，你一定要把头低下来，彻底认罪。”^①

8日，《文汇报》以鲜明的立场，发表了《上海新闻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再一次批判了徐铸成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组织的一次空前的复辟运动。”^②

徐铸成终于最后崩溃了。

他承认自己是“文汇报的罪人，是人民的罪人。”

14日，他表示“在同志们面前向人民低头认罪。”

22日，《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徐铸成的检讨：

《我的反党罪行》

全面系统地检讨了自文汇报复刊以后，特别是1957年5月以后的“严重反党罪行”；彻底清算了“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同时再次“挖掘”了他“和章罗及其他民盟右派分子的关系”。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来一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我灵魂的丑恶。”

“我痛恨自己，尤其痛恨过去我还冒充进步，卖弄我有老经验，是老报人。”

徐铸成从灵魂深处真正给自己搞了一次“革命”，搞了一次彻底“清洗”。

他痛心地说：

“像我这样一个思想上一贯右倾反动的人，如果不痛下决心，努力改造，改变立场，那只有自趋末路。”

“我不仅在文汇报首先打开人民新闻事业的缺口，而且希望和鼓励其他党外报纸也走上这条资产阶级的道路，一起挖党的墙脚，……挖到思想深处，看到我的政治野心，就是要造成自己在舆论界的权威，和党报分庭抗礼，这种政治野心，比想当什么局长、部长之类的野心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4日。

② 《文汇报》1957年8月8日。

更毒，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更大。”

“我起先也没有认识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但检查我的罪行，我坚决把文汇报变成章罗集团的工具，而且执行章罗的指示，企图在文汇报推翻党的领导，企图向党夺取新闻工作的领导权，……动摇党的领导，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和社会主义的基础，难道还不是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么？”

“我痛恨自己，我认识犯这样大罪的主要根源是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反抗党的领导。”

给自己无限地上纲上线，希望能得到宽恕、解脱这是徐铸成的基本心态。

■ 徐铸成表示：

“党一再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改，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彻底交代检查，把我从泥坑里救出来。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涕零。”

“我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请求党给我处分，我决心彻底悔改，重新做人，从此永远老老实实跟着党走。……努力改造，做好工作，向人民赎罪。” ■^①

这次检查，虽然还被认为“对罪行批判不够深刻”，但历次别人批判时批判和暗示的材料，几乎都写进去了，对他的“穷追猛打”才暂时平缓下来。

当然，柯老对他也不再“挽救”了，只是一脸秋霜地给满面愁容的徐铸成丢下一句话：

“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检查交代，争取重新做人。”

一顶右派的帽子，稳当当地飞上了他的头顶。

1958年1月31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上，徐铸成和其他三十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取消了人大代表的资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22日。

格。

文汇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早就换人了。

下半年，他和王造时、沈志远等四十多名右派，被下放到上海郊区颞桥，集中到一个专政学习班，半天劳动，半天检查。

1959年春，又转入嘉定县外冈乡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继续“检查思想，挖阶级根源”。半年后才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

10月，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徐铸成和沈志远等142人，被列入“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之列，宣布摘掉“帽子”。

但是，“帽子虽摘，痕迹依旧”，徐铸成一直被列入“另册”。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曾再度被“两报一刊”点名：“鼎鼎大名”的“大右派徐铸成把持的文汇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最欣赏的报纸。”

1980年6月，经历了二十多年磨难的徐铸成，和章乃器、龙云、费孝通、钱伟长等21个有全国性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右派分子”被最后摘掉了“帽子”。

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

然而整整一代人的光阴已经流逝了。

费孝通·“章罗联盟的军师”

费孝通，1957 年为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文教部部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

○乍寒乍暖早春天 草色遥看近却无

费孝通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所有变迁，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地道的西式教育；既是才高学著，见闻博洽的学者，又满怀政治热情，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一代政治明星。费孝通也正是同时具备了这样特殊的学术、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国内国际社会影响，他便常被人视为中国社会与政治变化的晴雨表。

1957年，这支运转多年的晴雨表却出现了异常剧烈的震荡。一会儿还是来势猛烈的暖流一浪高过一浪地滚滚而来，转瞬间却又是寒潮的狂飚突起。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迅速突然，显得那样合情合理，却又那么发人深省，至今让人回味悠长。

上半年，费孝通异常活跃、忙碌。直到六月中旬，他所感受到的仍是扑面而来的暖流。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已身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剧变、一场迫使他缄默十五年的动荡。

三月的北京仍是满目的枯枝衰草，很难觅得一点春的气息。3月24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7版的一篇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为题的文章却在寒风紧裹的京华泛起了阵阵春潮。这春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塞北江南。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居然一下子成了抢手货。那些平日愁眉紧锁的知识分子竞相传阅着那篇文章，他们都想早一刻目睹那些成为铅字的久已想吐的话。从那里，他们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理解、支持、鼓励。当然，作者的名字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不就是那个“民主教授”费孝通么。

在国内，更多人是读散文才认识费孝通的。他的散文是一绝，这也许得益于早年在名师指点下圈点《庄子》和《史记》，从老庄和太史公那里悟得了行文自然流畅、飘逸洒脱的真谛。如今，他的笔力更显出几分炉火纯青的深厚。

开门见山，他便道出自己要为谁说话。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的心情。”^①

这心情首先是一种喜悦。

这喜悦来自于一批知识分子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研究，再也听不到“墙外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在北京，召开了著名人口学家陈达的论文讨论会，沉默已久的社

^① 《光明日报》，57年3月24。

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也在《人民日报》上发有了文章。费孝通由衷地赞叹：“春到人间，老树也茁出了新枝。”他说自己也把一部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先喜后忧，费孝通接着提出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两大难题。

第一，教师急于提高业务，而学校的具体领导不够。教师的处境一直十分尴尬。“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把原来学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口头上重复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著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总之，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做教师这个行当也不容易搞了。”

因此，他举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新年愿望是“要做一个专任教授和专任研究员。”四川的康振黄教授总结许多同仁的心愿是“一间房，两本书。”^①

费孝通认为帮助教师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不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领导不够。”据他了解，有的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结果只“吹皱了一池春水。”有的学校重教轻研，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冲突后，学校领导“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

第二，百家争鸣的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缺乏应有的积极性。

① 《光明日报》1957年3月24日。

在费孝通看来，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自觉“表示了他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他们不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但简单的思想改造却使知识分子在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上陷入混乱。他们在转变立场时，对“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违背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①

费孝通称赞百家争鸣方针为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让他忧虑的是，百家争鸣政策贯彻得比“向科学进军”更差。他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两方面原因。

其一，从知识分子方面而言：“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是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多些的是怕出丑……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爱受到影响。”^②

其二，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也不全弄清了百家争鸣方针。有人以“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来搪塞；有人把方针圈了个

① 《光明日报》，57年3月24日。

② 《光明日报》，57年3月24日。

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有人在鸣放后就敲警钟：“唯心主义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鬼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费孝通对这一局面的概括相当精妙：“草色遥看近却无。”

他批评知识分子对世界和国家大事，麻木不仁。他举例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文章的结尾，他一口气用了五个问句，引人深思。“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問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赘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①

费孝通的这篇文章行文流畅，仿佛是一气呵成。然而这篇文章见报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按他的话说是“收”、“放”了好几次。

1956年8月至1957年2月初，费孝通去西南地区作了长达半年的学术考察，他同时代表民盟中央去了解当地知识分子的情况。在回京后的两次汇报会上，有人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说话。2月中旬，他写完初稿，反复修改了几次，让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2月下旬，他正要发稿，一位朋友在听完关于毛泽东批判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报告后，赶紧跑来告诫他，“天气不对，看形势要收了。”第二天，他又从一个新闻界的朋友那里听到

^① 《光明日报》，1957年3月24日。

了类似的话，那位朋友评论别人的文稿“口径不对，暴露太多。”并说：“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了。”^①

可“天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几位看过文章的朋友极力催促他公开发表。他“夹在寒暖之间，欲说不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把那些锋芒显露的棱角磨圆滑了许多。2月27日早晨，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出了《早春》一文，也正是在这一天，中央发表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扩大会上的讲话，即有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费孝通那天忙着接待外宾，没有听到毛泽东的讲话。晚上，住在隔壁的潘光旦兴冲冲地来找他，把讲话的内容向他作了详细介绍。看来天气确实未变。第二天一早，他再次修改了文章后半部分。文章见报又是几个星期后的事了。

《早春》一文的发表首先在费孝通的朋友中引起了两种见解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说：“有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一个马后炮么？又有朋友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耽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费孝通却很平静，淡淡地说：“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② 文章发表了，他无疑如释重负。

按计划，4月17日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的陪伴下回江南故乡。此行并不是省亲探友，而是重访那个与他的学术成功紧密相连的故乡小镇——开弦弓村。

隆隆南驰的列车仿佛把他带回了二十多年前那一段沉重辉煌的岁月。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② 《光明日报》，57年5月31日。

1935年12月，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带着新婚的妻子王同惠，深入大瑶山瑶寨作实地考察，他不幸落入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外出觅援溺水身亡。次年六月，费孝通回到故乡吴江养伤，他一边养伤，一边在姐姐推广养蚕技术的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在短短的三十天里，他忘却了精神和肉体正在遭受的痛苦，全身心投入了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之中。

1936年，他漂洋过海来到了英国，也正是以他在开弦弓村收集的资料为基础，他在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写成了优秀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此书中文名叫《江村经济》，江村是费孝通给开弦弓村起的学名）。从此，费孝通这个年青的中国学子便和江村一道蜚声国际学术界。

这次重访的时间依然很短暂。正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局势发生了突变。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民主党派纷纷向中共提出批评和建议。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肯定了民主党派的作法。自5月8日起，统战部又连续召开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鼓励他们对中共的缺点、错误大鸣大放。

和北京那热火朝天的鸣放场面鲜明对照的是，费孝通在吴江农村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平静的乡村生活。当他漫步在乡间小道，与乡亲们亲切交谈时，他的朋友却在北京言辞激烈地抨击中共，指责共产党人的偏狭、专横，腐败、无能。他成了政坛“墙外人”。这对费孝通来说也许是一大幸事。他与开弦弓村的关系也由此抹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她成就了他，她保护了他。

5月15日，费孝通从乡下回到苏州，对时局有了初步了解。从一叠旧报中，他看到了人们关于《早春》一文的不同意见。

在4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两篇有关《早春》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在《早春

寒意消，园丁快育苗》一文中呼吁：“不能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他认为：“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不响，关键在于放手得不够，在于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没有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①

如果说陶大镛教授与费孝通在知识分子问题是“英雄所见略同”的话，那么九三学社的倪鹤笙却是要在这个问题上与费孝通商榷、争鸣一番了。

倪鹤笙开篇便说：“尽管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节了。但读了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 57 年 3 月 24 日），仍不禁有丝丝凉意……文中某些弦外之音，好像漠野上吹来的一股冷风，乍听之下，颇使人有‘倒春寒’的感觉。”^②

■因为在他看来，“红杏已出墙头了。”

他认为，书难教在于教师长期受到各种教条主义束缚，应当“把书架和大社会结合在一起。”“向科学进军主要靠各显身手。”不在于领导是否得力。知识分子缺乏政治热情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争鸣是缺乏历史传统和习惯的。”^③

这些文章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标题下刊登的。费孝通扣不出什么“弦外之音”。在太湖之滨的旅舍里，费孝通边欣赏着秀丽明媚的太湖春色，边提笔作答。

这便是 5 月 31 日《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早春”前后》。正是在此文中，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揭盖”论。

“2 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作一个口头汇报……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

① 《人民日报》，57 年 4 月 27 日。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7 日。

③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7 日。

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了冲开为妙。”

至于《早春》一文是否有寒意、吹冷风。他说：“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李清照‘乍暖还寒’一语，后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了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觉得还是用不上。”

他正面回答了另外三个问题。

第一，“天气说对了没有？”他明确‘早春’是指过去半年的天气。

第二，有人提出，自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花开不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他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上升了，而条件跟不上，“表现出领导落后于群众。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突出了。”^①矛盾不解决，积极性可能转化为消极情绪，这正是他以早春天气作比喻的实际。

第三，“一间房，两本书”和“两耳不闻窗外事”有什么关系？费孝通否认自己在宣传重业务轻政治，因为“房里不一定没有报纸和收音机，书本上讲的又为什么不能是天下事呢？”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不通过实践是搞不通的，实践就是各人的学术思想工作，那就是业务……通过业务来改造，通过业务来服务，其中无处没有政治，而也必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须有了政治才能这样做。”

他依然那么自信。未了，他说：“‘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吧。”^① 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说下去了。

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早春”前后》的当日，费孝通从苏州回到了北京。一下车，他便驱车直奔《新观察》编辑部，那里的编辑黄沙是他在清华时教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他急切想得知目前北京的局势。黄沙当然是最合适的消息发布员。黄沙的介绍让费孝通大吃一惊。局势瞬息万变，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已经掀起了批评共产党的狂潮。

六月初，北大学生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骚乱，一些人发表了攻击党政部门的煽动性讲话。学潮一触即发！

六月六日，费孝通亲自开车把黄沙接到西郊的民族学院。黄沙向他详细汇报了北大学生闹事的情况，费孝通越听越激动，他脱口而出：“这次学生运动比‘五·四’还重要，这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② 当晚，费孝通参加了章伯钧主持的文化俱乐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曾昭抡，黄药眠、吴景超、叶笃义、陶大镛、钱伟长。这便是有名的“六六六会议”（参加者中有六位教授）。与会者为学生的政治热情所感染，他们争相发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费孝通慷慨陈辞：“今天我非常激动，在这事件中（学生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受的冤枉），我完全同情学生——学生正在到处寻找领导——（他继续说问题是由于制度引起的党外知识分子无权，党员专权。）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曾明确地说，我不参加共产党……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这么想，清看吧，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6日。

在选举中群众是否支持我。”①③

会后，他们向统战部递交了“对时局的意见书”。

○“我犯下弥天大罪”

局势却并没有照费孝通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下去。

知识分子们的“猖狂进攻”让党有些招架不住了，决策者大吃一惊。毛泽东急忙“关门整风”。6月8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内部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正式展开。寒潮开始肆虐！

费孝通从此被卷入了无穷无尽的批评、检讨、揭发、再批评、再检讨、再揭发的漩涡之中。

6月10日晚七时，正是京城华灯初上时，民盟总部的那间中型会议室已座无虚席，民盟中央小组将在这里举行第三次座谈会。参加者除了在京的中央委员外，还有各大报的记者。今天，人来得特别早、特别齐，走进会场的人找到座位后便默默地静坐在那，会场内外也少了往日的那种嘈杂、喧嚣。费孝通坐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与往常不同，今天从他脸上找不到一丝微笑，眼神略带几分忧郁、迷茫。

七时半，会议开始。民盟副主席章伯钧首先讲话。他从理论上驳斥了中央侯补委员陈新桂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的观点。紧接着，中央常委邓初民和中央委员张毕来对陈新桂进行了批判。当主持大会的叶笃义按发言顺序叫到费孝通时，一直呆坐在那里的费孝通微微一

③ [美] 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中译本。第197页。

怔，从衣袋里迅速地掏出发言稿。他仍未改绅士风度，没有忘记在发言之先向听众报以微笑，今天他却笑得十分勉强。

他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说：“我最近内心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既要解除顾虑，又要辨明是非；一个是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防止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

他提出几点意见：“第一，他认为应继续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这里我们必须完全信任党的保证，就是‘言者无罪’。”“言者无罪”四个字他吐得很慢，他的声调明显提高了几度，他是想展示一种自信，让自己和朋友们那颗彷徨不宁的心在这高亢的音调中获得些许慰藉，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声调又恢复了原样，他认为应该让“一个论点的正反两面都有机会在社会上发表。”。同时应有公开纠正错误的勇气。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再次发生了变化，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躯，以一种缓慢的商量式的口气说：“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的空气中，思想是容易真正改造的。我赞成采取小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他略微停顿了一下，迅速扫视了那几位坐在边上的记者，他们正忙着记录。他接着说：“我觉得最近座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① 记者们仍在低头记录。费孝通小心翼翼地收起发言稿，用期待的目光环视了一周，急切等待着别人的高见。紧接他发言的却是在会上受到围攻的陈新桂，他表示同意费孝通的发言，并指责《人民日报》对错误言论的批判是开帽庄。

气氛非但没有缓和下来，而且越来越紧张。费孝通的朋友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被指控进行反党阴谋活动。费孝通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不断在内心反思、检讨自己近来的言行。就在这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样不断的自责中，他度过了一个星期。最后，他静了下来，相信自己已找到了万恶之源。

6月17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去中南海参加座谈会。费孝通以专家局副局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他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他明白了他过去脑袋里存在的许多糊涂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自己的立场没有站稳。”立场不稳是因为自己具有严重的温情主义，因而他不能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划清界限。

他举例说：“我在6月8日那天看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因此10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只是在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把我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我的话用小标题联系了起来，我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

他还说，“他在报上看到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为什么他不多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来呢？’”他觉得在这件事上，“没有对储安平尽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

他对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发表了不少对于知识分子估计不正确的言论”表示“很痛心”。他否定了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立场问题已在思想改造中解决的观点。他高声宣布：“我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要跟共产党走，不要跟野心分子走。”^①

把憋了好几天的话一口气倾吐出来，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畅快。

接着发言的国务院参事万枚子却认为费孝通的检讨未触及到思想深处，有一种在“过关”的印象。

费孝通确实想过这一关，就这样他过得去吗？自责并没有换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8日。

来半点安宁，他的检讨反而成了别人拽在手里的一根辫子。

在6月24日民盟北京市委第八次常委扩大会上，费孝通成了批判的“活靶子”。他刚刚开始自责，一位平素与他不和的委员阴阳怪气地问：“费孝通，你不是与章伯钧很铁么，他到底对你怎样呀？”人们争相附和，催逼费孝通交代与章伯钧的关系。费孝通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的嘴唇动了好几下，一个字也没吐出来，脸上的肌肉一点也不听使唤，他觉得自己仿佛正在推动两扇沉重的大门。人们的呵责声越来越大，他终于挤出了半句话：“我，我，我交待……”能言善辩的他，居然口吃了。

他揭发，6月5日下午，他与钱伟长、曾昭抡到章伯钧家里，向他汇报北京几个大学的情况。“章伯钧听到学生和教师如果联系在一起就会出乱子，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是举足轻重的。6日晚，在会上，章伯钧对紧张的局势幸灾乐祸，并提出了三点反讨意见。

他说：“那天（6月10日，括号为作者所加），章伯钧约我去，章伯钧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帖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重复了不止一次。”^①

费孝通只觉得那天章伯钧说话时的那张脸又出现在眼前，离他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大……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了。人群再一次骚动起来，费孝通央求道：“我需要认真回忆一下，我保证继续揭发、继续检讨，继续……”

费孝通在漩涡中越陷越深，那漩涡是一个让每个坠入其中的人都处于相互攻讦、揭发、指控的痴迷状态的怪圈。在那里，正义、良心、友情、公正统统成了魔镜中的怪物，被扭转、颠倒、肢解。费孝通渴望恢复平静，祈求解脱，揭发自己的朋友、同事也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6日。

成了救命稻草。

“6月25日，民盟中央举行小型会议，他在会上揭发罗隆基赞扬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称进步人士为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揭发清华大学校长钱伟长曾在6月6日的六教授会议上说，教师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否认），几天以后，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师生的炮轰下，揭发费孝通把他拉进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①

在7月3日夜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费孝通被指控为罗隆基小集团的成员。他在发言中承认，几年来他被罗隆基利用，他揭发了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阴谋。

他揭发，章、罗消除前嫌，是为了替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是没有见诸文学的，但章罗的言行写出了这个方针。”

他罗列了罗隆基的阴谋手法。“罗隆基两年来，对我拉拢得很厉害，他想利用我去联系知识分子，他原是一个出名的吝啬鬼，但是这两年为什么变了？他利用我住在郊外，吃饭和休息不方便，多次开会完了邀请我去他家里便饭和休息。在这些时间，他就宣传他的意见，来影响我们，说进步分子的坏话，我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史良副主席的坏话……”^②

他对自己深恶痛绝：“我们这些已被他们拉入了右派泥坑的人，正是揭发他们的见证人。我们想控诉他们的罪恶，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

费孝通已是众矢之的，一支又一支犀利的“箭”射向了他。大火终于要烧身了！

在7月4日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讨论会上，中共一大代

① [美] 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中译本，第206—207页。

② 《人民日报》197年7月4日。

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作了《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的发言。

李达认为：《早春》一文的中心思想表明：“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不容易才盼到了乍寒乍暖的早春天气。”费孝通写《早春》的动机是向党进攻，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早春》“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它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①

在第二天的《文汇报》上，有人攻击《早春》一文：字里行间，毒液四溅。^②

在人代会的小组会上费孝通又开始了揭发和自责。

在7月9日上午人代会的分组讨论会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他再次揭发了储安平在6月11日晚的言行。并第一次交代了自己在6月6日应浦熙修之约，向《文汇报》记者叶岗发表的一篇附和储安平的反动言论的发言。他自责：“这篇谈话证明，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是完全相合的。”^③

7月11日，费孝通的同事，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夏康农在人代会上揭发了费孝通。“章罗联盟的军师”这一头衔第一次加到了费孝通头上。夏康农以1956年费孝通为人民代表批评政府而高兴的事为据，指出费孝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由来已久。他指责费孝通对帝国主义分子奴颜卑膝，《早春》一文是“一株奇异的毒草，是公开煽动放火的第一声信号”“整篇文章贯注的是章罗联盟的反动旨意”“由费孝通的名字发表的文字，在反映章罗同盟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② 《文汇报》1957年7月6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0日。

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方面，留下了整篇的，有连贯的供状。”①④台湾当局对《早春》一文的“喝采”、“一咏三叹的赞赏”也成了费孝通的罪行。

7月13日，杨东莼以《知识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为题在大会上发言。他极其愤怒地揭露费孝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他指出：“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则是两篇包藏祸心的文章，字字句句埋了鸡骨头，行行段段搀杂了砒霜。他一方面倾泻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纪末的颓废的感情，大谈其自己的‘体质’与‘气候’的适应关系，以便来感染那些在伟大时代仍然有落寞之感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不怀好意地煽惑人们去揭盖子：先揭‘百家争鸣’的盖子，后揭‘互相监督’的盖子。他不主长‘欲揭还罢’，而主张‘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②⑤

一些与费孝通关系密切的师长、朋友、亲戚不得不在不同的场合对费孝通的“反动”言行表明态度。

与费孝通过从甚密的著名作家冰心（她是费孝通在清华时的老师吴文藻教授的妻子）也在人代会上“指责”费孝通。

“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两篇文章中，我们感到了彻骨春寒的阴郁寂寥的空气……他戴上了浓黑的眼镜，把‘一时之感，一隅之见’概括扩大到解放后的八年光阴，到新中国的四极！这样就模糊是非，混淆视听，使得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的人，不加思索地起了共鸣，推波助澜地作了右派野心家的应声虫，结果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路子！”③⑥

.....

④ 《大公报》1957年7月12日。

⑤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3日。

⑥ 《人民日报》197年7月13日。

一篇篇言辞激烈的发言有如一发发重磅炮弹轰得费孝通晕头转向，一场场群情激奋的批判会让费孝通心惊肉颤。他从小翼翼地顺应潮流，到茫然无措地随波逐流，现在他却被狂奔咆哮的恶浪抛上摔下，直颠得五脏翻滚，遍体鳞伤。他害怕黑暗，害怕闭上眼睛。一闭上眼，他便看到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在眼前飞速地转动，他很快就被卷向涡心，他的呼救声、他的四肢、他的躯干、他的头颅，一件接一件从他眼前被那黑漩吞噬，只剩下一片苍白，一片死寂的苍白。他更害怕睁开眼睛，只要一睁眼，一见光，便分明看见自己被剥得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被抽得皮开肉绽，孤零零地站在一团白光中。一群似曾相识的狰狞的面孔正围着自己狂啸、狞笑、吐着猩红的舌头……他觉得冷得出奇，心早就不跳了，仿佛是到了犹太所居的冰窟……“我就这样完了？”他问自己。眼角一阵湿润，眼镜模糊一片，他看到了前妻王同惠在深情地微笑，看到慈母抚摸着自已的脸庞，看到导师马林诺斯基，那个倔强的波兰老头，衔着烟斗，闭目仰坐在伦敦的那间办公室里，聆听自己宣读博士论文，他看到自己的朋友李公朴在血泊中呐喊，闻一多怒目圆睁，拍案而起。他赶紧摘下眼镜……他再也记不得自己在那半生半死、半梦半醒、半人半鬼的状态里是用血还是用泪在作那悲辛、苦涩的忏悔。

1957年7月13日在费孝通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一个值得追忆，祭酋的日子，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黑色礼拜六”。

按入代会的日程安排，7月13日应是大会讨论。上午，费孝通一进场便要求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一开始，便有众多代表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卑劣手法。最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毕鸣岐就自己的错误的言论作了检查。费孝通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上午。

下午，大会的第一个发言人便是费孝通。他的手哆嗦不止，怎

么也辨认不清发言稿的前几行字。心里越是惊慌，便觉得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求生欲越来越沉重压迫着自己，他凭着一丝游走不定的记忆开始了发言。一个低沉的、略微有些嘶哑的声音回荡在会议大厅里：“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会场一阵骚动。

费孝通一口气揭露了自己的十四条大罪：

“1，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文教委员会工作。为了要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通过组织各种小型座谈会，邀请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言，一吐衷曲……我在这项工作中实际上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方针，并设计了实行这个方针的工作方法。

2，一九五五年年底，我到南京、苏州、杭州视察，向这些地方的盟组织推广了上述串联活动，发生了不良影响。

3，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罗隆基那个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发言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4，章罗指定我参加民盟第二届代表大会盟务报告的起草工作，其中后来为右派所利用的几点，我当时是支持的。（我）把章罗的反动方针，隐蔽地渗入了民盟的正式文件，为他们的阴谋服务。

5，我去西南参加少数民族调查工作，盟中央要我视察当地盟务，（我）片面反映了落后分子的意见，……我那段工作实质是为章罗阴谋埋下了火种，在落后分子中起了组织作用。

6，我在成都和昆明，在盟内宣传了我对于‘互相监督’资产阶级本质的理解，并通过这两地盟组织进行了活动……这不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实在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是资产阶级在野党的做法。

7，今年二月，我在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极其荒谬的反党论调……两个盖子实质上是：学术上没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没有开放资产阶级民主。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

8，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经罗隆基看过，他怂恿

我发表。这篇文章用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

9，今年3月，我提出了盟今后工作应当着重帮助盟员提高业务水平，通过业务进行思想改造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以强调业务来抗拒或削弱改造，这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基本方针……我主张盟应当发生‘组织监督’作用……事实上，我是要求盟组织利用一切公开场合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影响社会舆论，离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0，在上海文汇报，在中共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争鸣月刊，我一再反对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要求恢复，并且要求及早安排那些改行了的旧社会科学工作者归队。这是资产阶级复辟思想的反映，而且已进入活动。

11，在江苏视察时期，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意见，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

12，我在视察期间还在苏州和无锡两地盟员座谈会上提倡‘大鸣大放’，鼓励他们大胆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章罗阴谋在这些地方点火。

13，6月初刚从江苏回到北京，虽则只有几天工夫，我积极参加了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讨论和起草……我又参加了学校党委制问题小组的讨论，提出了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6月6日我和文汇报记者谈话中这样说：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来挑起国家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这要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话，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而同工。

14，我既然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6月5日（我）找到章伯钧门上，6月6日参加了文化俱乐部的会议6月8日我又附和了章伯钧向人民日报社会完全荒谬的谰言……（他）要我向统战部转达他可以帮助党来收拾局面的话，我被他用来送了一封向党讹诈的口信……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这两年来究竟搞些什么？究竟为了谁？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

影响下，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抗拒党的教育。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①

费孝通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感到一阵眩晕。他害怕那些让人肝肺撕裂的幻影，求救似地望着人群。人群静得出奇！有人惊讶于他交代的详实、细致，有人为他当众出丑而幸灾乐祸，有人对他的罪大恶极已出离地愤怒了，有人为他的无可救药而摇头苦笑，也有人为野火烧身而坐如针毡，要多的人沉默了。一个著名的学者、政治活动家完全抛弃文人的矜持、做人的尊严、身前身后的名誉，为生命的苟且残存，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悲鸣，这当是怎样沉重的一种悲哀啊！这悲哀压迫良知喘息不止，刺得每一颗善良的心剧烈地颤抖……

费孝通呆坐在那里。他沉默了，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从学术界、从政坛消失了。然而“复仇”之箭一刻也没有停止射向他的要害、前面还有刀山、火海等着他……

○“白脸”挨打

正当费孝通在人大会议遭到围攻的时候，与他关系密切的《新观察》编辑部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特别“关照”。编辑部从7月9日开始，连续召开反右斗争大会。“池鱼”也要遭殃了！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7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林今的《质问“新观察”》。从费孝通那里流出的祸水正式被引向了《新观察》杂志社。

两天后,“一代笔阀”姚文元也赶来助阵,以一文《“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给《新观察》杂志社定下了五条十恶不赦的大罪。姚氏所指的那一支毒箭,就是5月16日刊登在《新观察》上的一篇介绍费孝通等人言行的小记——《蓓蕾满园乍开时》。^{①①}

编辑部的反古斗争大会一共开了十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但把费孝通与杂志社的关系搞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揪出了两个右派分子:费孝通的弟子、朋友、黄沙,杂志社的主编戈阳。

费孝通在7月9日的人代会小组讨论会上交代:“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

杂志社的人揭露:费孝通“曾建议‘新观察’应组织一支作家队伍,把他们包下来,使读者只能在‘新观察’上看到他们的文章。他还建议说:‘我看你们办成一个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刊物吧,现在高级知识分子最缺东西看,哪怕只发行万把份也行了。后来又对该刊一位记者说:‘过去你们不重视储安平是错了,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费孝通今年奏去江苏农村作农村调查时,曾向编辑部吹嘘,他这次调查如何重要,将来要在国际上发生影响等。编辑部还特地派了记者和摄影记者跟他去。当他那篇“重记江村”的稿子寄到编辑部后,他接连来信来电报,要求一定在人代会前夕6月1日出版的刊物上刊出。”“他说:‘别人在鸣放期间都是算旧账,只有我是在提积极建议,对整风会有好处’。他是想以此作为在人代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会上进行阴谋活动的政治资本。”①①

“费孝通还处处表示对‘新观察’特别‘关心’，在他去苏州前曾两次到编辑部，畅谈‘新观察’还没有‘解冻’……编辑部的一部分人正是被这种思想俘虏，写成‘蓓蕾满园乍开时’。”

“费孝通在苏州时，对‘新观察’的记者说：‘苏州鸣得很不好，党和群众关系很恶劣，党员90%不好，只有10%是好的；知识分子90%受群众拥护，只有10%是不好的。’他还进而给记者出题作文：‘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题目是‘骑在墙上的人’。现在有一种人专替党和群众砌墙，墙砌得越高越好，他可以骑在两边说话，像胡愈之就是这样的人。’②②

.....

有人再次从《早春》一文中探到了“新大陆”。8月10日《光明日报》2、3版上发表了一篇八千多字的批判文章，作者何明申明自己是要扯出费孝通的狐狸尾巴，他用了心，批得很、斗得凶，当然逮在手里的狐狸尾巴就不止一条。

第一条，费孝通“对知识分子装出一付笑脸，一付媚态……知识分子们，我的朋友啊！共产党把你们当作‘墙外行人’看待的，‘好事情’没有你们的份啊！”

第二条，费孝通抓着了在某些学校还没有很好解决科研和教学的矛盾，大作文章。“暗示共产党对科学是外行加胡闹，是不能领导科学的，知识分子们要向科学进军，得另找领导者。”

第三条，费孝通以红脸、白脸分别比喻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是在污蔑：共产党搞的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胡闹，是小儿游戏。”

第四条，费孝通挑起知识分子对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不信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6日。

任。“别看共产党提倡百家争鸣，他们懂什么学术呢？过去的所谓‘学术批判’是起哄，阴森可怕，并且这对共产党是‘积重难返’的啊！”

第五条，“费孝通大谈‘科学’，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热心的是政治。……他把我国政治制度描写成共产党独裁，没有丝毫民主，以致高级知识分子全都成了麻木的阿斗。”^①

8月初，费孝通所在的国务院专家局也举行了一连串的反右大会。费孝通是大会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些与他同去西南的人揭发他，在西南“恶毒地用‘西南山高地远，风刮的慢’，西南高等学校只会‘奉公守法，闻风而起’，‘西南一、二级教授太少’，‘评价不公’，并说西南民盟的人是‘木头人’，‘不会动脑筋’、‘百依百顺’”。

揭露费孝通在成都时，曾拍着胸脯说：“我费孝通是来解决问题的，否则我没脸再来四川”。又说：“我费孝通就不奉公守法。高等教育部要我们民院订什么科学研究规划，我一个电话就给顶回出了。”他还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医学教育会议，有些盟员代表到民盟总部反映了意见，民盟总部通知卫生部，结果原来的会就不算数。”

有人揭露，费孝通的两篇《重访江村》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毒草，费孝通在文中“用暗示影射，虚虚实实的笔法，极尽了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之能事。”^②

费孝通的朋友雷洁琼揭露了费孝通同潘光旦的关系，以及费孝通过去同美国一些特务的关系。

专家局副局长赵守攻认为：费孝通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他

① 《光明日报》1957年8月10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丑恶的政治野心家。”①③

专家局局长齐燕铭指出：费孝通的一系列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讲划、有步骤的……还不能说他是已经真正向人民认罪。

之后不久，齐燕铭以《费孝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做了些什么？》为题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他全面批驳了费孝通在56、57年的一系列言行。他认为：“费孝通的政治企图是不可告人的，因之他的手法也是非常隐蔽和非常阴险的。”他要人们记住，“费孝通这一条毒蛇曾经是怀着吞象的野心，想改写人类的历史。”他警告费孝通，“只有彻底投降，此外是毫无出路的。”②④

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汪金丁的文章《驳费孝通等“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汪金丁指责费孝通等人，“置雄辩的事实于不顾，毫无根据地把目前高等学校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都归结为高等学校之有了党的组织或党员之参加了高等学校的工作。诬蔑党内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政权机关等同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③⑤

他认为《建议》是章罗联盟向党、向社会主义阴谋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民族学院自8月初以来连续召开了五次批判费孝通的大会。费孝通的学生、同事、朋友也参加到批判者的行列。他的同事，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在《工人日报》上以《阴险丑恶的费孝通》为题发表文章，批判、揭发他。刘荣焯、余胜椿联名在

③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④ 《光明日报》1957年9月2日。

⑤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七千字长文《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

刘、余二位对费孝通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的文章也写得面面俱到。两人把费孝通的新帐旧帐翻了个底朝天。他们知道，“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比如：1930年，“费与张君勱、张东荪相勾结”；1931年又与潘光旦、吴景超勾结；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在美国，费孝通勾结“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1947年勾结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孝通是“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解放后，1951年，“他和美国特务张东荪和潘光旦、吴景超等右派分子密谋反对（院系调整），使院系调整工作推迟了一年。”1953年，总路线公布后，他便和罗隆基“进一步勾结起来”。

刘、余二位不仅知道，费孝通“早已和章罗搭档图谋复辟。”为章罗联盟制定反动路线，并“企图把罪恶之手插入学校和国家的领导中，”而且连费孝通“连偷带枪的学术本领”又能给他举上几项。他们告诉人们：

“费孝通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解放后，他更加不读书、不学习，甚至连报纸也不看，把马列主义视为教条，根本不看在眼里。因而，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为了搞点所谓学术性的著作，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费孝通下流到窃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稿略加编改而成的……甚至连‘早春天气’也是由冰心帮助写成的。他在学术问题甚至在普通常识上一贯是强不知以为知，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的。例如，他家里根本没有‘廿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廿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里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廿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来大

吹大擂，炫耀自己。”^①

刘荣=、余胜椿对费孝通的这些指责还够不上学术批判，一场精采的“学术批判”的帷幕即将拉开。

○ 学术批判？政治围攻？ 到底为哪桩？

1979年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大会上传出的消息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轰动。人民中国要恢复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把在中国恢复这门社会科学的重任托付给一位年近古稀的学者。这位学者就是费孝通，他所要恢复的就是他曾为之受尽屈辱的社会学。

中国的社会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四十年代末，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学都设有社会学专业。中国也有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者。1952年，苏联专家一句不经意的话：“苏联没有社会学”就使学术园地里那株刚要萌发新芽的幼苗丧失了生命。中国的高校不再设社会学专业，原来从事社会学工作的人员也被迫改行，费孝通被安排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民族问题。社会学在中国并非寿终正寝，它体销而神不散，费孝通等人也在秘密“卫道”，到了“早春”天，他们的这些私下活动也就更频繁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8月30日，《人民日报》对他们那些幕后活动的蛛丝蚂迹来了个大曝光。

“今年1月，右派分子吴景超就在‘新建设’发表了‘社会学在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

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3月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

12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求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4月10日,‘新建设’召开了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问题座谈会。

4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陈达访问记,大事鼓吹陈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张……

4月23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推定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八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酝酿在适当时期,设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

在费孝通的督促下,6月9日下午在陈达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擅自篡改‘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为‘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私自选举陈达为主任委员,他们明目张胆的计划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打算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他们还打算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里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图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①

在中国,学术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那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从这一系列活动中也嗅出了许多异味:费孝通等人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叫嚣下,进行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阴谋。“他们企图以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社会学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实现章罗联盟夺取文教界领导权打开一条门路,……企图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名义下,纠合一切对党不满的人,为章罗联盟招兵买马。”

他们揭露,费孝通极力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吹嘘,说他们比“没有受过毒的人”“对社会识得更深刻,比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并且拍着胸脯说:‘我愿意保举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0日。

这一批人员。”^①

8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大会，批判费孝通等人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大约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一连开了好几天。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8月29日的发言中指出，反对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斗争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尖锐的阶级斗争。”他号召：“一切真正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起来战斗。”^②

8月31日，曾在4、5月间作为费孝通的助手去江苏吴江进行调查的周叔莲在座谈会上揭露了费孝通进行江村调查的阴谋。

周说，费孝通去江村是“先有结论再凑材料。”他在调查中想方设法去贬低农民生活提高的意义。“费孝通知道计算了各个阶级的平均收入，将会证明绝大多数劳动农民在合作化后比解放前收入必有很大增加。因此他不要他的助手们分阶级计算农民的平均收入，而混统地计算1936年同1956年开弦弓村全村人口中每人的平均收入，以便冲淡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解放后收入增加很大的事实……（他）毫无根据地诬蔑人民政府忽视农村副业生产，以致影响了农民生活。”^③

同日，杨成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揭开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盖子”》的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新华日报》上也发表了署名莫远人的批判文章《费孝通在江村干了些什么？》

.....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0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日。

③ 《文汇报》1957年9月5日。

费孝通在解放前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也被人拿出来重新“扫描”，大批特批。

9月8日，余胜椿撰文批判《花蓝瑶的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中的观点，并再一次举例详述了费孝通“抢掠学术成果”的本领。他也记述了费孝通的一件“趣事”：“他有一次对民族干部作报告，讲到苏联有一部很出名的关于民族工作的小说，说不上书名，当场有人告诉他，小说名叫‘阿里泰到山里去’，他就连声说：‘是的，是的’。接着又以教训的口吻告诫干部说：‘你们要向阿里泰学习！’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原来阿里泰是一个民族败类，是美帝的走狗，革命后，人民清算他，把他赶到山里去了。”^①

彭明朗揭露费孝通于1948年版的《乡土重建》给反动派打了一剂强心针，费孝通在书中“一再为地主阶级开脱历史罪责”，“对为非作恶的保甲制度火上加油”他提出“乡土工业”的中心意图是为帝国主义服务……^②

……

爱翻旧帐的人实在不少。

9月24日至9月27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批判费孝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反动罪行。

会上有人揭露：“费孝通曾无耻地说：‘在农村调查方面，我们搞不过共产党；但对于少数民族调查方面，共产党还没有做过什么，我们可以抓。’”

“费孝通无耻地拉笼一批青年人，经常以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来腐蚀他们，劝他们应多读书，多搞业务……”

“1935年，他得到广西军阀黄旭初的资助，第一次带着他接

① 《光明日报》1957年9月8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10月15日。

受的功能学派和种族歧视的反动学说去大瑶山进行‘调查’，结果，给反动统治者送交了情报，使大瑶山无辜的瑶民在1940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瑶族人民痛恨地控诉了他的罪行……”^①

.....

9月22日贺致平在《费孝通的“盖子”底下的秘密》一文揭露了费孝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诬蔑：“像我样的代表，尽管是每次开会没有缺席，甚至在会上也说了话，但是所说的话除了公式以外还能有什么呢？手里拿着文件，瞪着眼看，除了做语文修辞教员或义务校对之外，还能提什么意见？”

他指责费孝通等人，“妄想效尤英美，把民盟变作政府的反对党，（费孝通）他们要揭开人民民主专政的盖子，装进‘巴力门’毒液。”^②

陈沂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再次批判费孝通的《早春》。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在9月30日发表了批判费孝通的文章《焚火和放火》。

哲学家金岳霖在《争鸣》上发表了《费孝通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呢？》的批判文章。

.....

10月初，批判费孝通的浪潮逐渐平息了下来。些时距费孝通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过半载。费孝通被彻底打败了！他明白自己真正错在什么地方吗？

10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费孝通：

“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

① 《光明日报》1957年9月28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9月26日。

成都、武汉、无锡等各地都有，他在那具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①

毛泽东说的是真心话。

○ 并非尾声的尾声

费孝通是第二批被定为右派的六人之一。

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工资和待遇也降低了一级，但他仍住在民院的教授套房里，并继续留在民院的研究所。

1959年12月4日，他作为已改造好了的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1972年，尼克松访问了中国，费孝通作为中西文化间人，开始接待外国来访者，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沉默。

1976年，“四人帮”垮台，费孝通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八十年代，费孝通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六届中央主席。

1993年1月，中国最有权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刊登了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作为学者的费孝通用平实的笔调总结了自己在大半生里对中国城乡问题的研究。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们期待早一天见到，作为政治家的费孝通对自己几十年政坛生涯所作的回顾。那也许是一卷厚厚的回忆录，不过我敢肯定，他会说：五七年我被卷入了一场倏忽而至的政治风暴，那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的一页！

^① [美] 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

曾昭抡·“大把头”和“恶婆婆”

曾昭抡，1957 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意见书”与“秀才造反”

“曾公平时拘谨持重，岸然似老，但一接近他就会感到他那么平易、和蔼，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神气。……曾公之为人为学，我叹不如。”

“他是个勤恳的园丁，满园桃李花开，……他不抢在人前自耀，又不躲在人后指摘，因为他不是以学科来为自己服务，而是以自己

的一生能贡献给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满足。……”^①

这是当代名流费孝通教授所撰“一代学人”中的几句摘语。文中所提的曾公，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曾昭抡。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生于山水秀美的湖南湘乡县荷塘乡。13岁考入长沙雅礼中学。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

1920年赴美留学。1926年以优异成绩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

学院教授希望他留于美国工作，他回答说：“我很热爱母校，但更热爱我的祖国”，毅然辞别导师，回到祖国。

192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兼任该校化工系主任。

1931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提倡科学研究。他是我国化学界提倡学校要搞科学研究的创始人。

他规定了学生必须做毕业论文的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现今我国各大学实行的毕业论文制度，最早就是从他入北大化学系后开始的。

他的学生满天下，我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王葆仁，有机化学家蒋明谦、量子化学家唐敖庆以及我国第一位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等，都是他亲自教诲和指导过的助手和学生。

193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被选为首届理事。次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创刊，他任该刊总编辑。

1938年，他任西南联大教授，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支持抗战的活动，是当时著名的进步教授。

1946年，他赴美考察原子能。回国后，被选为中央研究

① 《读书》，1984年第4期。

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系主任。

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全国科联副主席：

1951年，他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至1957年，任高教部副部长。

.....

1957年，党中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党外人士积极帮助党整风，清除“三害”。

曾昭抡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他作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的报告，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研应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①

5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

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

他指出，“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

① 《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

“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

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他还提出了两个意见：

第一，“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

“‘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

第二，“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

“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

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①

接着，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成立“临时研究组”研究有关我国科学规划问题。

他们在“广泛征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交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的报告。

《光明日报》于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说：

“这一件事，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向来说，是有新的意义的。”

“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说，也是有新的意义的。”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意见书”就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第二，“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被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

“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墙。”

……

第三，“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

“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立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规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

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第四，“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

“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

“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

第五，“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拨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

“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

“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

“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①

.....

曾昭抡满腔热忱地主持起草了这份报告，同时也满怀喜意地等待着中央领导人的“亲睐”。

但是，他错了。

他做梦也未想到，这些意见和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打入了“冷宫”，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而横遭批判。

与此同时，大鸣、大放之风在全国渐达高潮，特别是在教育界掀起阵阵狂澜。

形势咄咄逼人。

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这六个人就是著名的“六教授”）、叶笃义、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等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讨论当前形势并采取行动。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6月6日这一天异常闷热。电风扇在转个不停。从天气得知，暴风雨即将来临。

会议的气氛就有如这天气，时而有人慷慨激昂地发言，时而静悄悄地，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这是一次极为紧张的集会。

曾昭抡在会上慷慨陈辞地说：

“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

“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他认为，“过去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

“同时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他又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得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

“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

“目前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

他还说，“西安交大已闹事，上海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会后，章伯钧“得意忘形”，“觉得共产党已经弄到进退

不得，要‘收拾残局，舍我其谁’。”^①

形势一触即发，秀才能造成反吗？

○“头上一顶大帽子，脚下一双大鞋， 拖一个小尾巴，肚子却很空虚”

随着形势的急转，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反击“右派”，揭发“章罗联盟”。

民盟自6月18日开始盟内整风，揭发“章罗联盟在盟内的右派分子”。

座谈会、交代会、批判会接连不断，一批批“章罗联盟分子”纷纷落马，撤职、审查、下放、停止工作。

在当时的国度里，哀莫大于政治生命的丧失。

况且，对于曾昭抡这样热爱工作、事业心这样强的人，停止工作就意味着丧失了生活的乐趣。

他开始慢慢回忆他与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一块战斗、工作的经历以及他在整风运动中鸣放的言论。

他想到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想到了“六教授会议”，想到了……

看起来，事态严重了。

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

他迷惘了，发怵了。

他暗自一喜，党和人民不是历来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办事吗？

唯一出路就是尽快向党和人民交代。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7月11日晚，民盟高教支部整风小组召开整风扩大会议，由曾昭抡交代他同章、罗的关系，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会议由民盟高教支部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沈一凡主持。

曾昭抡首先交代了他与章伯钧“携手同走中间路线”的历史。

他说：“他从1948年起才同章伯钧有政治上的联系。当时民盟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章伯钧表面赞成跟共产党走，但他要两面派。”

“一方面表示同共产党合作，一方面背后主张走中间路线。”

“那时他从国外回到了香港，在香港被章伯钧拉上了关系。章伯钧当时主持了一些右派性质的座谈会，他因思想上也留恋中间路线，被章伯钧拉着参加了那些座谈会。”

接着，曾昭抡承认他同罗隆基的关系“更久更密切”，“两人都是旧清华的学生，美国留学生，意气相投。”

曾昭抡揭露罗隆基“对共产党是一贯反对的，他曾经有条件有办法到解放区去，可是他不愿意去。”

罗隆基“从1949年底到1950年就开始搞小集团”，“他就是那时被罗隆基拉下水的。”

“当时小集团中的人有罗隆基、张东荪、潘大逵、刘王立明、陈新桂和他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

曾昭抡还说，“罗隆基曾经常同张东荪在一起发牢骚，对人民政府不满，不满新社会和他的地位。”

“罗隆基认为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太低了，他应该当部长。”

“罗隆基的阴谋是抓各地民盟组织，排挤别人，安排自己的亲信。”

“罗隆的活动中心是想抓上海、北京和四川，想把彭文应、陈仁炳安排在上海，具体替罗跑的是赵文璧。”

“从1950年到1951年罗隆基的小集团搞得最凶，几乎每天见面，罗隆基对马哲民最为欣赏，因为马对罗的活动最有力。”

“罗隆基的小集团也是有变化的，罗看谁使用价值大就拼命拉紧谁，否则，就疏远不理了。有一时期罗拉他很紧，想把他安排在民盟文教领导岗位上。”

曾昭抡还说到，“罗的为人，和章不一样。章是十足的两面派。罗表面上好像什么话都讲，实际更阴险。罗对什么人都瞒一手。”

“知识分子问题，罗说‘主要是党和非党的矛盾’，说‘民盟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发挥更大作用’。”

曾昭抡承认自己“同章罗一起安排盟内人事工作”，并承认“反对党领导科学工作的活动是他发起由他负责的，钱伟长和费孝通最积极。”

曾昭抡说：“在他们设计的那个‘意见书’里，保护科学家的提法是钱伟长搞的，还有总的部分和自然科学部分也主要是钱伟长搞的，但他也同意；社会科学部分原是千家驹负责的，但费孝通给篡改了。”

曾昭抡揭发，“‘六教授会议’上钱伟长讲话很多，但始终没见他交代。”

“钱曾说：‘北京学生的问题很不好解决，因为蒋南翔是彭真一手提拔的，办法是动员三百万解放军，可是不好；或收，也不好；唯一的办法是民主党派出来讲话，继续鸣放，内外一起讲’。”

而章伯钧“听了钱的话很兴奋，讲了一套，说‘合作化工作搞的不好，农民骂毛主席。’”

曾昭抡还揭露了章罗活动的手法：“一、不满镇反、肃反等运动，有机会就发表他的谬论；二、歪曲中央负责同志的言论。”

会议主持人沈一凡最后说：“曾昭抡初步交代了他的问题，但解释很多，具体的东西很少。……希望曾昭抡好好想一想，老老实实在地作进一步的交代。”^①

当时，科学家范长江针对曾昭抡的交代态度和内容，归纳了一个公式：

“头上一顶大帽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犯罪），脚下一双大鞋（从新做人，彻底改造），拖一个小尾巴（还要继续交代），肚子却很空虚，枝节问题交代不少，主要方面很不老实，即自己思想深处和政治阴谋活动的实际情况不肯交代。”^②

于是，代表们同声警告曾昭抡妄想“蒙混过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科学界的大骗子， 凶恶的把头教授”

曾昭抡错估了形势，他并未能从“宽大为怀”的方针中得到任何恩赐。

群众对他企图“蒙混过关”的交代态度表示出极大愤慨，强烈要求召开揭发会。

曾昭抡在劫难逃了。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② 《大公报》1957年7月24日。

7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100多人举行座谈会，批判曾昭抡等人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座谈会上下午分别由郭沫若院长和吴有训副院长主持。

科学家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曾昭抡加以揭露和批判，以同志般的友爱对他进行帮助。

郭沫若首先指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他质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

千家驹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他说，“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

华罗庚在会上说：“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他认为“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①

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科学家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也对“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批判。

科学家们对曾昭抡在会上的表现“非常感昌”，纷纷要求继续声讨。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15日晚，民盟高教支部继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

会议主持人沈一凡首先说，“11日晚上曾昭抡作了初步交代，这是好的。但是他的交代还极不老实，许多重要事情都还没有谈。”

他揭露了曾昭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等地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曾昭抡在昆明时就同罗隆基有来往，同其他右派分子潘光旦等也有来往，关系很不平常。是否那时他们就有了小集团的基础？是否就进行了第三条路线的活动？”

“曾昭抡在昆明曾经对人讲过，‘国共对峙起码有五十年，昆明大有可为’。这是什么意思？”

“1946年‘李闻事件’以后，他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钱和护照溜到美国去了。”

“他不仅参加过右派座谈会，还搞了其他活动，如担任过有名的反苏反共的刊物‘时代评论’的总编辑。”

教学指导司李洁民接着发言。

他说，“我认为曾昭抡交代的态度是不端正的。”

“仅从报纸上揭露的一些材料已足以证明，曾昭抡是一个披着科学家外衣，摆着一副慈祥面孔，在人民内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阴谋家；是章罗中间的一员骁将，冲锋陷阵的先锋；是章罗的军师、章罗小集团的灵魂。”

李洁民质问：“曾昭抡曾幸灾乐祸的认为目前中国局势紧张，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要发生匈牙利事变，时局一触即发。他身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为什么唯恐学校不乱？居心何在？”

“曾昭抡还企图以救世主的身份出来收拾混乱局面，多么狂妄？”

“曾昭抡向他们小集团泄露国家机密，策划活动，挑拨党

和人民、和青年的关系，唯恐天下不乱，希望这一场大火烧垮中国共产党，使资本主义死灰复燃。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罪恶多么严重！”

留学生管理司陈端仪说，“曾昭抡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典型，他一贯崇拜帝国主义的民主，崇拜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而且一贯积极地为这些丑恶的东西作宣传。”^①

接着，高教部朱其芳驳斥曾昭抡说：“曾昭抡说他害怕思想改造运动。他为什么害怕呢？一个人思想上有了恶毒的东西，心怀鬼胎是要害怕的。”

“曾昭抡污蔑这个运动是‘违反知识分子规律’的，这种谬论与否定建国以来的建设成绩是异曲同工的，其目的在于煽动知识分子的反党情绪，争取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

综合大学司陈荷英责问曾昭抡“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为什么那么欣赏。曾不仅欣赏章的‘设计院’，而且积极实现这个‘设计院’。”

“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由曾发起的，这就是曾设计出来‘设计院’中的第一批货色。”

陈荷英还质问曾昭抡：“除了参与章罗这一设计之外，还设计了什么？”^②

特从北大化学系赶来参加会议的四位教授，孙承谔、蒋明谦、邢其毅和唐有祺也要求发言。

曾和曾昭抡同事过17年的北大化学系系主任孙承谔首先揭露“曾昭抡在北大期间，利用小人排挤老教授，搞得大家不团结。”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7日。

“‘三反’的时候，曾昭抡则逃避检查，我曾亲自到高教部来请他回北大去开会，他去了却说是给大家作‘报告’。大家揭露他的丑恶行为时，他竟然根本不去。”

蒋明谦教授，曾作过曾昭抡的学生和助教。

他在会上“愤慨地揭发了曾昭抡过去一贯玩弄权术，操权弄势的丑恶面目”。

他说，“曾昭抡在北京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时，一贯在教授间挑拨离间、排挤打击。刘云浦等好几位教授都被他排挤离开了学校，和他在北京大学同事了十七年的孙承谔教授，他也排挤。”

“他担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以后，还不肯放掉化学系主任的位子，继续玩弄了一年多的权术，最后所有教授因为不满意他的把持，退了聘书，他才不得不离开北大。”

蒋明谦还揭发了“曾昭抡几件玩弄权术的丑行”。

“第一是1950年，曾昭抡故意拉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仅有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把化学研究所拉垮，原因是没有让他做科学院副院长。”

“第二是从1933年到1951年，曾昭抡一直把持着中国化学会。”^①

.....

唐有祺教授揭露了曾昭抡在科学界和化学界的“野心”。

他说：“曾昭抡他们在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里写道：‘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同时提出了‘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完全是为了拉拢和欺骗科学家和青年人，挑拨青、老关系。”

“新社会的科学家根本不存在保护与否的问题，如果说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要保护，也只有党才能保护。”

“曾昭抡这些右派分子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说要‘保护科学家’，用心是恶毒的，他们要‘保护’的是那一小撮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家’。”

曾经受过曾昭抡“排挤”、“打击”的邢其毅教授愤慨地说：“我今天以一个受尽气的小媳妇向恶婆婆——曾昭抡控诉。我们吃他的苦头，几天也说不完。”

“他原来在外国是学化工的，留学回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于德国在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在抗战胜利后，曾昭抡拿伪国防部的钱到美国去，回国后又拿原子作招牌来吓人，其实曾昭抡懂什么原子能？”

“从他这一系列的行径看来，简直是一个科学界的大骗子。”

会上还宣读了工业教育司全体工作人员给曾昭抡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曾昭抡要收起狡猾的手法，认真彻底地交代问题”。^①

7月16日，中国科学院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曾昭抡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会议一开始，就有30多位科学家要求发言。他们之中很多都是曾昭抡三、四十年前的老同学、老朋友。

傅鹰首先发言。

他认为“曾昭抡自己是被章、罗所利用，完全是一种谎言。如果是被利用，为什么在拟订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要叫钱伟长去摸摸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底呢？为什么还要抢先发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7日。

表呢?这种做法根本不是什么‘分庭抗礼’,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在领导科学’。”

傅鹰认为“曾昭抡这种野心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三反’时候,曾昭抡的一位学生告诉人说,曾昭抡素以权术待人,应与他划清界线。”

赵九章也在发言中向曾昭抡提出质问,“在前一个时期,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之间的矛盾,好像闹得很厉害。这种矛盾到底是客观的事实呢?还是有人在兴风作浪故意挑拨呢?你曾昭抡几年来是否起了制造矛盾的作用呢?”

杨石先质问说:“曾昭抡是罗隆基小集团的重要人物,由来已久,曾一心和罗隆基勾结,其目的决不只为在民盟内部搞宗派,是否还有别的企图?”

“曾昭抡在6月6日章伯钧所召集的会议上说的话,具有强烈的反党情绪,他为什么这样不满呢?”

杨石先指出,曾昭抡不仅有“和党‘分庭抗礼’思想。事实上,他是要取而代之。”

郑振铎在书面发言中着重指出,“党和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科学家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严厉指责曾昭抡和钱伟长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

他希望“所有的科学家彻底揭露他们的底子,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翦伯赞说,“许多右派分子都说‘被利用了’,‘被拉下水了’。曾昭抡、钱伟长总不能说是被利用的,应承认就是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在搞反动科学纲领时是主动的,而且把自己的意见写入纲领内。”

他说,“这个科学纲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

义进攻的前哨战。”^①

黄子卿说，“他和曾昭抡认识 30 多年，青年时代就是同学。他了解曾的为人是一贯地好抓权弄权，对人不对事，以个人爱憎为标准。”

他指出，“曾昭抡把持化学会 20 多年，从化学会成立到 1952 年一直是化学会的主要人物。我国化学界不团结症结主要是由于曾的把头作风。”

张维指出，“曾昭抡、钱伟长把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说成是短时期内偶然的事情，这是和事实不符合的。他认为他们的活动就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②

7 月 17 日，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预定举行四天，20 日结束。

会议首先由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的科学家“交代”。

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

很多科学家要求在会上发言。

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钱三强首先说，“曾昭抡在交代中说他没有参加预谋。我们问曾昭抡是什么人？曾昭抡一直是民盟右派，……他同右派分子张东荪一直到现在还有关系。曾昭抡居然说是糊里糊涂掉在泥坑里，完全是骗人。”

吴有训揭发曾昭抡“1949 年曾说想做科学院院长，要他

① 《光明日报》1957 年 7 月 17 日。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7 日。

检查交代。”^③

18日，“全国科联会议”继续召开，继续驳斥曾昭抡、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

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常委秉志说，“他和曾昭抡是30多年前的同事。曾后来慢慢地离开实验室，和章罗搞在一起，每况愈下。30多年后的今天，曾掉入了右派泥坑，这不是偶然的。”

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涂长望说，“从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曾昭抡、钱伟长的阴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和有步骤的。”

他说，“在科学规划这个问题上，曾、钱所起的坏作用比章、罗还要大。”

全国委员会委员茅以升在会上指出，“曾昭抡、钱伟长对党对科学的领导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企图抓知识分子作政治资本来在科学方面打开一个缺口。”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罗庚揭发曾昭抡、钱伟长“使用阴谋诡计，拖他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

他质问曾昭抡：“这个反动科学纲领的稿子为什么没有征求大家同意就拿出去发表。”

他说，“曾昭抡和我到美国去考察国防科学时，他向我介绍俞大维说，‘俞大维不是国民党员而是靠自己本事起家的’。他还说：‘国民党不好，老蒋不好，陈诚还好。’”

他说，“曾昭抡当时是脚踏两条船，一条是陈诚派，一条是民盟。”^④

③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④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22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继续举行。会上继续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曾昭抡、钱伟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同时也批判了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柳大纲说，“曾昭抡一贯欣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后来他又亲自提议搞民盟中央的所谓‘科学规划临时小组’，说这是偶然想起来的，绝对不能使人相信。”

王葆仁认为“章罗联盟利用了曾昭抡、钱伟长；曾昭抡、钱伟长也利用了章罗联盟。”^①

23日，中国科学院继续举行“反右派”座谈会。会议由张劲夫副院长主持。

出席会议的科学家警告曾昭抡、钱伟长“不要自外于人民”，要他们“彻底交代罪行”。^②

23日晚，民盟北京市委整风小组举行扩大会议，继续揭发和批判曾昭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会议由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主持。

会上，先由曾昭抡继续交代。

曾昭抡交代说：“1949年10月，民盟同志在北京市支部的院子里举行了一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会，会上章伯钧说：‘和共产党合作不容易，共产党是老虎。’”

“他在‘争鸣’月刊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经歪曲‘百家争鸣’的方针说，不仅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鸣，有关政策问题也可以争鸣。”

曾昭抡承认，“他实际上是章罗联盟中的一员大将，是他们的帮凶。”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3日。

② 《大公报》1957年7月24日。

他说，“他明确地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思想，是没有的，不过，从6月6日那种反动思想发展下去，是可能会发展为叛国叛民的。”

接着，与会者开始揭批曾昭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北大化学系张青莲教授说：“曾昭抡一向挂着化学家的招牌，招摇撞骗。曾昭抡把他搞的一种比普通温度表稍短一点的温度表称作‘曾氏温度表’，还有所谓‘曾氏熔点器’。”

他说，“曾昭抡还出版过一张什么‘原子周期表’挂图，这是不通的。我们只知道有‘元素周期表’，没有听说过什么‘原子周期表’。”

费孝通在会上交代说，“曾昭抡在‘六六阴谋会议’前后，一再强调学生闹事的情况十分严重，他是以了解高等教育部所掌握的情况的姿态出现的，因此他所说的话的分量是重的，他应该检查，为什么那样肯定的一再强调形势严重，是何居心？”

他说，“曾昭抡对思想改造是抗拒的，他认为思想改造是对知识分子的侮辱，不但自己拒绝改造，而且煽动别人不接受改造。”

钱伟长在会上发言说：“曾昭抡曾交代说，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总的方面和自然科学方面都是我起草的。在我质问以后，他又说只有自然科学方面主要是我的意见，他不过同意我的意见罢了。”

他说，“‘这个草案主要是曾昭抡的意见’，对这个纲领的起草和修改曾昭抡也要负全部责任。”

吴晗最后发言说，“曾昭抡交代得很不够，有很多重要政

治问题都没有交代。”^①

24日，北京科学界继续在中科院举行座谈会。会议由郭沫若院长主持。

郭沫若在发言中揭发了曾昭抡“玩两面派手法”的一件事实：“今春曾昭抡访苏回国后，向郭沫若等汇报说，苏联有两个学校的负责人认为科学研究中心放在苏联科学院是错误的；曾昭抡背后却在教育界兴风作浪，说苏联的科学研究中心从科学院移到高等学校。”

历史学家尹达着重地批判了曾昭抡等在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所提出的恢复社会学、重建社会学等说法。”^②

郭沫若最后在发言中指出，开了五天的座谈会今天暂告一段落，今后还将继续举行。

这样，对“右派分子‘曾昭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的揭发、批判就暂时落幕。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7次扩大会议召开，决定撤销曾昭抡中央常委、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曾昭抡的人大代表资格，他所担任的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也随代表资格的撤销而撤销。

他的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早就换人。

.....

对于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戴帽固然可怕，撤职、降级、停止工作则更为可怕。

工作的丧失，意味着人生一大半乐趣的丧失。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5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5日。

曾昭抡未能逃脱这一厄运。

幸运的是，1958年4月，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邀请他去武汉大学任教。

他欣然前往。

由于过度劳累和经受精神折磨，他患了绝症——癌症。

历史似乎太无情了。就在他与病魔作斗争的关键时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尚未摘掉的“大右派”的帽子使他天天遭受红卫兵小将们的批斗。他的爱妻——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维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

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使他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68岁。

1980年4月，中国化学会在京召开全体理事会议，当年勇于“挾伐”曾昭抡的杨石先、柳大纲、王葆仁等科学家，纷纷向中央提出应尽快给曾教授摘帽。

历史还算是公正的。1981年3月3日，经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曾昭抡教授平反，恢复名誉。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主持了追悼会。

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在追悼会上宣布，关于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决定予以改正；对他参与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1985年4月，武汉大学设立了“曾昭抡化学奖金”，以存永念。

钱伟长·“科学界的捐客”

钱伟长，1957 年为民盟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

○ “六六六”秘密会议

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根据中央的指示，欢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当时身为民盟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教授很认真地投身于其中，并在科学和文教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6 月以后，反右运动开始，形势逐渐逆转。钱伟长也遭到批判，他的言行受到驳斥。有人要他交待同右派头子的关系，交待“罪恶活动的具体事实”，但钱伟长只承认在工作中有失误，不承认有什么罪恶活动，坚持认为自己主观上是为了社会主义。钱伟长的辩解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也招致了更严厉的

攻击。但是，从哪里能找到缺口来攻破钱伟长的“防卫”呢？

6月20日和24日，陶大镛和费孝通在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相继披露章伯钧曾于6月6日上午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主要参加者为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六教授，又揭露钱伟长曾在那天会议上说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若与教师联合，就要出乱子等等。^①

随后，章伯钧被迫交待说：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来我家，说有重大的事找我，他们说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把清华大学的情况说得很严重。并且问道：现在是放还是收？还说，清华党委已不能维持了，要放我们就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我们有把握。^②

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也说，当他们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③

这些揭露无疑是颗重磅炮弹，清华大学顿时炸了锅！

因为恰在6月19日的清华学生自由论坛上，有人曾问正在讲演的钱伟长，6月初找章伯钧去作什么，他对学生说是找章伯钧谈科学规划的事。当时有人说他与章伯钧、储安平等右派有关系，钱伟长否认说，章伯钧是政治野心家，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与章、储有联系。

那么，钱伟长在6月6日座谈会上到底讲了什么呢？据一本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题为《1957年的春天》所写，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那天上午，章伯钧在会上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费孝通和曾昭抡两人随后发言，主要讲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学生们因此情绪激烈，一触即发，如果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

钱伟长听了他们的话，接着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果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要我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象‘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的积极分子，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南翔校长（清华大学校长）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

“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费孝通显然有些激动，他打断了钱伟长的话，又说：“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

钱伟长点了点头，接着说下去：“目前学校里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

力量的。学生们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①

清华看到报上的消息，立刻让钱伟长交待。钱伟长深知，章伯钧被批，他越交待，就越说不清。于是，他拿定主意在心里，便推说那天他中途小便过几次，没有听清章伯钧讲些什么话。师生们听了自然不肯罢休，就连续举行大会，批判钱伟长是右派向文教界进攻的急先锋。

7月3日，报纸上公布了揭露章罗联盟的消息以及吴景超在揭发中谈到有关钱伟长的一些材料。一时间，清华园又新贴了许多大字报和标语，责令钱伟长彻底交待反动言行。

当天晚上，民盟清华支部举行批判钱伟长的第四次大会，会场四周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

会议一开始，主席陈士骅就要钱伟长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钱伟长被数日来的批斗弄得疲惫不堪，听到又让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反党反革命！”

一言出口，全场寂静。

钱伟长望望无声的人群，稳定了一下情绪，以平静的口气说：“我交待！我愿意先交待与储安平的关系。”

“那是1952年的人代会上，经过费孝通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今年5月22日，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上说26日他先到北大，再来清华找我。”

“26日那天，储安平到我家，我们谈了有一个小时，内容吗，全是政治性的。”

“储安平谈的第一件事，是说他已有了一些材料证明肃反是有问题的，准备在人大开会时谈谈，而且要向毛主席提意见。当然啦，他没有告诉我材料的来源，我也没问。我们谈的第二件事，储安平谈他要揽《光明日报》了，我当时建议他多叫工程界和中小

^① 《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

学教师‘大鸣大放’，后来我们又涉及了所谓‘家天下’问题。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北大‘民主墙’。储安平说要求《光明日报》向《文汇报》学习，把这些墙报报道出来。自然，这件事受到《光明日报》党组织的反对……”

此时，会场上骚动不已，台下纸条雪片似地飞来。原来，听着听着，人们渐渐觉察到，钱伟长只说远不说近，只说小不说大，而且许多交待内容都是从别人的揭发材料中搬来的。更要命的，就是钱伟长竟然不谈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

会场上有人站起来打断了钱伟长的“交待”，大声嚷道：“钱伟长！6月6日前后你干了哪些政治阴谋活动？要老老实实交待！”

递上来的一张张条子上面也写着“交待6月6日的反动罪行！”“交待……！”“交待……！”

钱伟长却仍然平静。待会场稍稍安静下来，他又说：“我之所以掉到章、罗圈子里，主要费孝通要负责……”

钱伟长的话又一次被打断，人们此刻关心的不是费孝通，不是储安平，而是钱伟长，是钱伟长与章、罗的关系！

钱伟长也有些急了，抬高嗓门说：“我没有什么政治阴谋活动要交待！”

什么？没有阴谋活动？他竟敢耍赖拒绝！会场被激怒了，人群中有人喊道：“钱伟长态度恶劣！”“言行反动！”……

钱伟长“别有用心”的发言被制止，批判大会自然要接着开。许多人起来发言，说钱伟长是个十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头子有四方八面的联系，他抓住时机，打开缺口，策划密室，点火基层，是右派分子的一员上将，是章罗集团向高等学校和科学界进攻的急先锋！

会议要结束了，主席陈士骅站起来说：“钱伟长，你要在近期内老实交待！我们盟内外的全体同志，要坚决参加反右派斗争，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①

看来，钱伟长的“皮”要一层层往下揭了。

○理工合校大签名

钱伟长的罪状中，有一条是“一手制造六千人的大签名”。

钱伟长很早就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增强，原来学科越分越细的倾向已逐渐被取代。所以，他主张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也必须向综合化方向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钱伟长对1951年第一次院系调整中的某些做法就持不同意见，他不愿意理工分家，不愿意拆散清华大学。后来他也一直主张改变理工分家、社会科学和理工各科分家的现象。

1957年6月1日晚，一些学生到钱伟长家中作客。交谈中，有同学提到科学馆前面在搞理工合校签名，钱伟长听了很感兴趣，就表示大力支持，希望能早日促成理工合校。

反右运动中，他的有关言行被指责为“煽动学生闹事！”

7月13日，钱伟长被迫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做第五次检查交代。之后，人们又向他展开了攻势。

待学生代表发言时，工程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赵葆初说：“我要揭露钱伟长，他一手制造了理工合校的六千人大签名！”

“那天晚上，我们班二十多位同学去访他。他有声有色地吹嘘解放前的学生质量多么高，说什么三、四年级写出象样的论文根本算不了什么，又吹嘘老清华学风。”

“他的花言巧语打动了我们的心，煽起我们的不满情绪！”

“有位同学讲，科学馆前面在搞理工合校签名，钱问‘有多少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人签名了?’我们告诉他有六百多人。钱说‘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还差不多，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

“他再三强调要斗争，经过斗争总会胜利的。有人问，钱先生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呢？他说，我出面不方便，你们去搞好，高教部已经承认这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错误。”

“当时钱伟长还提出了几个方案：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来，或者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其它和人大合并叫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的牌子挂到人大去，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

“钱伟长又说，就是不能和北大并，至少要唱对台戏才好。只要清华搞起理学院来，很多名教授都会来的，有的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只要清华搞就一定会来的!”

“第二天，一个规模浩大的理工合校工作组成立了。”

“工作组决定在全校大搞，到每个班上去组织签名，而且多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一出来，就要声势浩大，全校震动。”

“工作组由钱伟长亲自指挥，钱非常得意，具体计划都是他同意后才执行的。”

“当时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请全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华罗庚来讲话。钱伟长非常清楚，他俩的话是同学们听得进的。只要他们说理工合校好，大家签名就会很踊跃。”

“华罗庚当时刚从医院里开完刀，身体不适于作报告，钱伟长说，这是小病，可以讲，还是要去请。后来大概没请到。对钱学森，钱伟长知道他不愿讲理工合校这个问题，当时就决定表面上去请钱学森来作技术科学的报告，实际上在会上叫人递条子逼着他回答这个问题。”

“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擦亮了同学的眼睛，这个计划才半途停止，钱伟长的阴谋未能得逞!”

“钱伟长就是这样阴谋策划煽动的!”^①

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指出，这是钱伟长在政治上向党的“敲诈勒索”!^②

○“反动的科学纲领”

1957年春，受民盟中央直接领导的《争鸣》杂志，就当时科学界所最注意的科学体制问题，约请一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钱伟长也在被邀之列。

6月9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报还特地写了积极的短评。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共分五部分，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文中既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改进。

该文后来被批得体无完肤，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险纲领”。钱伟长是起草人之一，批判的大火自然也烧到了他身上。

在7月3日的批判大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说：“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很重视钱伟长等人，他们完全有充分机会表达自己意见。但是他们还去搞了个民盟的科学规划小组，这是什么意思？”

“《光明日报》短评说，这规划是广泛的经过全国各地讨论的，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而实际上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的！

“短评还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是，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作用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这就是说作为国务院下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方案不能代表科学家的正当利益，而必须民盟组织才能代表！

“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规划也没有经盟中央通过，而实质上是章伯钧盗名义向中央施压力！

“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1）丑化党，借以收买人心，达到篡夺对科学的领导权；（2）煽动挑拨；（3）抓人事权；（4）反对科学院的领导！”^①

7月13日，张维教授又“深入”批判了这个“反动”纲领。然而，他的批驳同以前有了些区别：

“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们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中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

“我们这样肯定他们的活动的这种反动性质，是有根据的！

“第一，长时期以来钱伟长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广泛了解情况，进行挑拨煽动。他反对党对于科学研究的领导由来已久，长时间来他花了许多力量在摸各地科学家的底，了解那些人对党有些什么不满情绪。

“第三，他有组织、有计划地拟定和贯彻这个毒恶的科学纲领。他从3、4月间就开始进行活动……”

钱伟长等人“炮制”的纲领，究竟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的，还是“长时间以来花了许多力量摸各地科学家的底”之后写成的？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6日。

张光斗教授批驳这个纲领时说：他们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①

在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保护科学家”这个问题是备受“关注”的，现在不妨看看钱伟长等人到底是怎样写的。

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一）时间问题

认为一些科学家因担任行政职务过多、从事社会活动过多，所以无法保证必要的业务工作时间。他们建议：

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

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请政府考虑规定教授和研究员的休假进修制度。

除少数例外，科学家担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一般只限担任一职，地方的不兼中央，中央的不兼地方。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

招待外宾，非必要时，不应作为科学家的任务。

（二）助手问题

有些科学家还缺乏必要的研究助手或行政助手。影响工作效率。

建议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如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应配备一定的适当的助手，且应由科学家自己选择。

（三）设备问题

建议应按需要与可能从速予以充突向科学进军的“后勤部”。

（四）资料问题

建议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

（五）经费问题

建议在高等学校里设置研究专款，以保证研究计划不致因经费缺乏而不能完成，并设置科学基金，作为机动之用。科学经费，一般应允许跨年度使用。

（六）“归队”问题

希望对一些用非所学的科学家重新加以安排。^①

.....

上述意见被批判者斥为是“诬蔑党和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右派分子提出要“保护科学家”，使我想起解放前的“救救孩子”，好象现在要“救救科学家”。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得到科学家的拥护，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以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这是非常阴险的用心！^①

罗常培认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

有人“一针见血”地揭穿道，钱伟长等人希望六十岁以上的科学家不要做行政工作，而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张副院长虽然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他们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②

科学家李宗恩就时间问题发难说，“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这是什么意思？科学有们通过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可以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你们这样建议，是不是想使科学《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马列主义的学习呢？^③

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认为，所谓“保护科学家”，实质上就是“保护”知识分子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④

不论怎样讲，这个“意见书”已成了钱伟长等人“篡夺科学和文教的领导权”的铁证之一。

○工程师问题

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钱伟长写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文章认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是教学工作的中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

③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

④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心问题。教学改革以前，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是漫无目标的通才教学。在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以后，我们学到了围绕一个明确目标进行有计划的教学工作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办法。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从苏联教学计划的规定翻译来的，叫某某工程师。在苏联、作为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工程师”，是在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德国也是如此。日本模仿德国，把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这个称号翻译成“工学士”，其实只代表受有一定的工程基本训练的“工程人员”，只是“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的意义。

这种“工程师”的称号，和我国习惯上沿用的“工程师级称”的要求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

假如把苏联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工程师”的要求，和我国习用的“工程师级称”的要求混为一谈，就必然会造成对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的过高要求。

要求过高，学生负担就会加重，而且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掌握得不好、不熟，独立工作能力较差。另一方面，要求不切实际，专业分得过细过专，不适应我国目前技术的迅速发展变化，学生分配也有困难。

如果实事求是，放弃使学生一毕业就当工程师的要求，而把高等工业学校的训练看作是工程师的基础训练，就给我们为祖国培养更高质量的工业建设人才提供了可能性。

文章最后说，提供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我们学习苏联进行教改的成果，更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把工程师看作我们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方向，而非五年培养的目标。

钱伟长后附记中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他的谈话，但未经他本人过目，有些地方如基础即数理化等词句，过分简单化

了，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①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各种意见接踵而来。虽然也有人上纲上线，但从总的来看，最初还是基本上属于争鸣性质。

钱伟长被当作右派揪出来以后，这篇文章就被定了性：向教育界散布的毒素。

在7月3日晚上清华举行的批判大会上，机械系副主任金希武指出，钱伟长的这篇文章是对教学改革进行挑衅。这篇文章里，对教改的成绩一字未提，相反的，从实际上否定了教学改革和向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钱伟长力图否定按照一定培养目标的专业教育，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老路上去。^②

清华大学教授江坦在报纸上批判道：“从钱伟长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他要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认为培养工程师不现实，还说‘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

“……综上所述，钱伟长的意图还不清楚么！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

“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

“如果青年知识分子都受了钱伟长的影响，不接受被当作‘工程师’的培养，岂不阻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前程？！这是别有用心！”

“这是别有用心！”

副校长张维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议论，他说：“钱伟长所主张的，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

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只学习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完全是照搬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一套！

“钱伟长说专业课没有理论，用不着学，学生只要学好了数理化，就可‘举一反三’，专业课不学自懂，这是非常荒谬的！”

“钱伟长反对专业课，不仅因为他不懂专业课，更严重的，是他企图通过否定专业课来达到破坏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性！”^①

钱伟长是徒劳的。

他没有想到，自己郑重地写了附记，人家还要抓他的“辫子”！

他没有想到，他一再申明，向苏联学习是一大进步，但是他还是被斥为“否定向苏联学习”！

他更没有想到，他希望“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经过别人的深入理解，成为“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

○“有职无权”论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这是5月11日上午钱伟长对记者讲的话。

那时候，许多人已对他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他本不想再说什么，但经不住记者的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决定一吐为快：

“我是副校长、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

^① 《光明日报》1957年8月5日。

一样。”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做出决定时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为‘进口’和‘出口’。”

“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比方说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在高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不仅清华，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

“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看呀，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部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

“就拿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来说，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令人悲哀！”

“不向有经验、专长的老教授学习，向谁学习呢？再不扭转过来，危机就到了。！”

钱伟长猛抽了一口烟，眉头紧锁……

这篇谈话发表在195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7月份，便被斥为“挑拨党与高级知识分子及非党人士之间关系的谬论。”

在7月3日的批判大会上，吴晗就此事质问钱伟长，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是人民给你的！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

随后，梁思成教授也激动地说：“钱伟长，你曾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

“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么你的前途是什么呢？”

“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①

据报载，钱学森当时为钱伟长下了一个评语：钱伟长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超级自大的万能科学家”

揭穿了钱伟长的政治野心，还要剥下他的科学外衣。

不知钱伟长曾何时讲过自己是“万能科学家”，反正他又被抓住了“尾巴”，揭发材料有一大筐。

证据一：著作是抄来的。

刘仙洲教授揭发说，1953年，钱伟长写了本《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该书中天文部分抄竺可桢的著作，数学抄李俨的著作，火药抄冯家升的著作，建筑抄梁思成的著作，机械、灌溉、纺织抄刘仙洲的著作，原书上的错字也抄上去了。

证据二：窃取劳动果实，偷天换日。

郎世俊教授说，1956年，在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中，有一个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小组，钱伟长是组长。他拟出一个八千字的小组综合任务说明书，大家一致认为内容空洞，且有很多错误，不得不采取分段执笔集体讨论的办法全盘重写，钱伟长未参加执笔。而当印出来时，执笔人却变为钱伟长！

证据三：毛主席不如我。

据揭发，毛主席的《实践论》重新发表以后，钱伟长“大言不惭”地说，《实践论》早已应用在力学上，毛主席虽然伟大，但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力学不如我。^①

证据四：不懂医学，胡说八道。

清华大学校医室的一位医生讲，钱伟长说过，“吃西药阿司匹林到肚子里还是阿司匹林”。这是缺乏常识！阿司匹林到肚子里，早已分解，哪还能是原样呢？^②

.....

钱伟长既然是右派分子，证据自然许多，不管是有影的还是无踪的。不过还好，尚没有谁去蹲在他家窗下偷听吧。

○明哲保身远离钱伟长

钱伟长在1957年夏季真可谓世人瞩目，他头上的“桂冠”多得数不清。

当时身为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③

钱伟长不用“夺权”，有人愿意推他当清华大学的头儿”了。

在6月中旬，有些学生看见一些大字报攻击钱伟长，立即在其旁边贴大字报反对，认为“侮辱了科学家”！

后来支持者日益减少了，最终消声匿迹，有些人虽然同情钱伟长，但也不敢公开表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运动已经向深入发展，人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右派分子已经孤立”。

许多与钱伟长打过交道的，都想谴责一番，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与右派头子划清界限。

在5月份，钱伟长刚刚向记者称赞了自己的得意弟子胡海昌、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2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1日。

叶开源，驳斥了一些人对他们的非议。然而，仅过两月，他的学生也被迫声讨老师。

胡海昌在7月20日的批判大会上说：“钱伟长在科学研究上究竟给青年多大的指导呢？现在看来，深刻的指导很少。”

“钱伟长在有些人面前说，他反对学生唯唯诺诺，毫无自己的独立见解。”

“但是，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好的学生是既听话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其次是能力较差但听话的人，最后是不听话的人。”

“大家看他在自己学生面前多么强调听话啊！如果有谁真正照他的话去做，那真是危险的事！”

“在钱伟长的许多学生中，看来最听话的要算叶开源了。”

“钱伟长把叶开源看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而加以宣传，其实在我们看来，叶开源的缺点多于优点。钱伟长所以赏识叶开源，无非是听话这一点。”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钱伟长为了个人目的，不惜采用种种可耻的手法。”

“我获了科学奖学金，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作了不正确的介绍和宣传，去煽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教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

“根据我的体会，钱伟长指导青年很不真诚，我向他请教，只能在饭后或休息时才能找到他。”

“他工作时间做什么事去了呢？根据最近揭发，大部分时间是进行右派活动！”^①

叶开源是钱伟长，“最听话的学生”他也不敢迟疑，在胡海昌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

后面紧接着说：“钱伟长是我的老师，我也曾为他所说的培养目标、理工合校等主张迷惑过。”

“我要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我们要正告钱伟长，不要再存任何幻想！”

“假如你不幡然悔悟，就是连你认为最可靠的学生，也不会再跟你一起工作下去！”^①

是的，“毒草放出的，只能是毒汁，不能幻想钱伟长的嘴里吐出过象牙。”

“他引导青年走的道路，就是一条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个人主义的道路。”“离钱伟长的道路愈近，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便愈远！”^②

所以，大家都尽量离钱伟长远点，除了批判他的时候。

钱伟长受到八方攻击，身陷重围，但他就是迟迟不承认自己是章罗联盟的一分子。自己说错、做错些什么是有的，可这也不能说明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

钱伟长被逼急了，干脆否认自己有任何动机！

但人们不能理解，钱伟长是右派分子，怎么能没有动机！

钱伟长被称作“无赖”。

梁思成先生便认为钱伟长无赖。他说：“钱伟长睁着大眼说瞎话，说他没有任何动机！”

“最后就索兴撒赖，说不知道有什么动机，要我们帮助他分析他自己的动机！”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无赖到了极点！”

“当然，他的动机是什么，连我们都知道了，他还无耻地说不知道！”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2日。

②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0日。

“他可以承认所有的事实；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愿意戴一切帽子，就是在这最根本的一点上，说找不出动机来！”^①

梁先生也许真的难于理解，钱伟长真的没有他们所想象的动机。然而，这却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被人相信。

钱伟长终于被划为右派。

1980年9月，党中央承认他是被错划，予以改正。

整整二十三年过去了，钱伟长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然而，钱伟长的心情并不甚轻松。这年12月，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对于我的过去，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这个公正的结论，正象对于许许多多遭受不幸的人们一样，必然会影响到他和他们的未来！”^②

① 《争鸣》1957年10月号。

② 《羊城晚报》1980年12月16日。

吴景超·“章罗联盟的干将”

吴景超,1957年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198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指示报告》,决定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摘帽平反。

吴景超就是“六教授”中鼎鼎有名的一位。

吴景超,1901年生于安徽南部的一个山清水秀、名人辈出的小地方——歙县。

他幼年聪慧,1914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

校,1923年夏毕业。

同年8月赴美留学,入明尼苏达大学主攻社会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当时美国久负盛名的社会学家派克、汤玛斯等,仅用三年时间连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28年毅然放弃优越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辞别导师归国。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讲授《社会学原理》和《都市社会学》等课程。

1931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次年接掌清华教务,并与胡适共同主办《独立评论》杂志。

1936年后辍学从政,随同翁文灏等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与经济部秘书,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三青团经济处副处长、中央训练团教官、战时生产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务。

1937年2月出版其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46年任善后救济总署顾问,在各省考察救济工作,并就所见所闻,有感而成,写成《劫后灾黎》一书。

1947年,他离政从教,回清华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翌年,主编《新路》周刊,发表《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等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平津即将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绝乘飞机去台湾,坚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951年夏至次年6月,他赴南宁参加土改工作,任北京三大学土改工作团副团长。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他出版了《在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一书,规划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

1956年10月19日,苏联的“真理报”上,登载了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费多塞也夫所写的一篇文章,报导了国际社会学会第三次会议的情况。

这篇文章除叙述了在会议中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斗争外,在文章的末尾,特别强调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文献,但是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对于它们进行分析与批判。这一点,应当很快地加以纠正。”

这篇文章大大地触动了、震撼了吴景超那早已不平静的心。

他想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非乐观状况,想到了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想到了许许多多。……

他山之石,可以为措。1957年1月3日,吴景超在《新建设》上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

这篇论文是他的一得之见,它的发表再次展现出他秉笔直抒、敢写敢言的大家风格。它在社会学界掀起了阵阵“狂澜”,引起了科学家们和领导者的高度注视。

他说,“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

“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

他认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我国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

“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

“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①

这一“揭露”和“建议”,是对那个年代里“凡资产阶级的东西皆视为毒草”的观念的绝大的冲击。

他胆大包天,他大大地触怒了“领导”。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为1952年院系调整时取消的社会学系而“鸣不平”。

这成为他遭受揭批、戴帽的命运的最大“罪行”之一。

1954年3月3日,他在《新建设》上又发表了他的一篇“佳作”《中国人口问题新论》。

他首先检讨了他在解放前写过许多谈论中国人口问题的文章的错误。

他曾说:“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

“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

他说,解放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从上面那种错误的分析出发,他就“幻想中国能够有一天因生育率大量的降低,而使人口从四亿五千万减至二亿五千万,或一亿五千万”。“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所有这些错误的来源,“就是由于过去没有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问题”;“没有把人口问题放在一定的

^① 《新建设》1957年1月号。

社会经济形态中来研究,没有了解人口问题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密切联系的”。

这种错误的结论所起的作用,“是掩盖了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罪恶,迷惑了群众对于当时主要矛盾的认识,混淆了革命斗争的对象。这一切,我都应当深刻地检讨。”

然后,他设计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案。

他说:“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①

.....

吴景超主要抓住了两条:一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必要性,一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

吴景超这些正确、合理、有创见性的建议和方案,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却被攻击为“阴险”、“算帐”的说法。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前途暗淡”、“没有办法”,“尽管你们干得再起劲,也不过是胡闹”,“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②

这确实是时代的悲哀。

1957年4月底,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党内拉开了战幕。接着,整风运动迅即地普及到全党、全国范围。广大党外人士遵照“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地大鸣大放,实已达到

① 《新建设》1957年3月号。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4日。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

中国人民大学的整风运动也迅速广泛地展开。6月份以来，教师和职工们凡1000余人分成85个小组，已普遍开过好几次会。

校党委召集的非党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上的座谈会已举行了7次。许多教师在各种形式的会上开怀畅抒己见。

吴景超教授就党委制、教条主义、教员水平和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党委领导学校这一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党委制。”

加强党委制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遵照宪法第17条所说的办法去做：‘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他认为，“人民大学党委会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

“例如，在过去两年，分校与否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人民大学全体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商量决定的，我们大多数非党的教员、学生以及民主党派，从来也没有被邀去征询意见过。”

“自从1956年以来，我们受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伟大方针所影响，开始对于校务采取了一个积极过问的态度，但是由于传统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过来的，我们能够过问的事还是很少。希望总有一天，我们的主人翁感觉由于真正能够过问学校大事而树立起来”。

在谈到人民大学教条主义的时候，吴景超认为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影响到许多人的世界观”。

他说，“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

“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那些少数民

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并没有去搜集有关美国、英国的大量事实来进行分析，而只知道背诵列宁在1916年所提出来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使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欧洲大战那个阶段。”

他最后深恶痛绝地指出，“教条主义者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开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①

吴景超这些话准确地指出了当时人民大学党委存在着的弊病，形象地描绘出教条主义者把马、恩、列、斯所说过的话当做“万金油”来使的嘴脸。但在那个年代里，这些苦口的良药却被人攻击为“企图篡夺高等学校党的领导权”，“是在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干着谋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行”。^②

当时，与吴景超同场发言的还有另外三个“大右派分子”李景汉教授，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王德周。

6月5日、7日两天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继续邀请党外教授、副教授、讲师座谈。

吴景超一方面批判了葛佩琦的错误思想，说：“党委领导学校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要求“学校设立一些委员会，特别重要的，就是成立财务委员会，以及教学人员聘任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只是研究性的，咨询性的，对于学校某些方面的问题，经常进行些调查研究工作，并在这种工作基础上，提出建议，学校党委和行政，有这些委员会作助手，只会把工作做好，而不会

① 《北京日报》1957年6月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

产生任何坏的影响。”^③

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了几个知名学者开了一次紧急会,讨论当前形势并决定行动。

吴景超与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黄约眠(这就是著名的“六教授”)和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都参加了这个会。

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很多人慷慨激昂地发了言。

吴景超在会上向章伯钧“汇报”了人民大学的紧张情况,发表对形势的“看法”,最后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对于出席这个会,许征帆在后来揭露他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参加“‘六·六’阴谋会议”,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④

既然吴景超的言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必须对他进行揭露、批判和控拆。

○“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堡垒”

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员工4000余人在北京西郊集会,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核心的谋士”吴景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会上,吴景超“避重就轻”,“百般狡赖”,不肯认真交代,但在大家有力的揭露和批驳下,他的“反动丑恶面目”还是暴露于光天化

^③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④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

日之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作仁、余肇池、杨承祚、项冲和讲师陈锡润揭穿了吴景超“所谓‘学者’的外貌”，从历史上说明了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下的一个官僚、政客，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孔祥熙的走卒”；吴景超早就是“反共、反人民的”。

“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吴景超不愿意北京教书，跑到蒋介石血腥统治的南京城”。

“抗战前夕，全国男女老幼，凡是有爱国心的人都一致要求抗战，吴景超却在反动刊物‘独立评论’上写稿，主张五十年后再去抗日。”

“后来，他做了伪经济部的高级秘书，还跟随孔祥熙到英国参加过英王的加冕典礼”。

“抗战以后，他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做了十多年的官。并创办‘新经济’杂志，叫喊利用外资，投靠帝国主义”。

“不久他就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了机要秘书”。

“吴景超与臭名远扬的蒋廷黻、胡适的关系很密切，直到现在还‘廷黻，廷黻’的叫着，而胡适日记也称他‘景超、景超’。”

陈锡润说：“吴景超在1948年与反动教授刘大中（现在美国）在北平办了一个‘新路’杂志，跟储安平办的‘观察’南北合唱，公开宣传第三条路线，阻挠和破坏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吴景超还见过蒋介石，向蒋献过策。”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他历史上是有“严重罪行的”。

陈锡润还说：“吴景超是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他在这个集团担任着谋士角色。他们之所以能彼此结合，是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愿望的，即反党、反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

“吴景超和费孝通、潘光旦三位一体地组成了罗隆基小集团中策划反党阴谋的智囊”。

“罗的主要反党言论都是事先与吴景超等研究讨论或直接由吴起草的。

“吴景超和章罗联盟的又一个骨干分子费孝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是章罗手下的谋士同僚。费孝通在今春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吴景超曾参与这篇文章的讨论，并承认这篇文章是代表了他的观点和思想”。

计划统计系讲师鄢韶春揭穿了吴景超“篡夺高等学校党的领导权的阴谋”。

他说：“吴景超是章罗亲自策划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问题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

“6月4日，他和黄约眠、陶大镛等共同讨论研究了阴谋篡夺高等学校党的领导权的反动纲领”。

“6月7日，吴景超在人民大学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就根据这个纲领的基本内容，发表了他事先准备好的企图在中国人民大学取消党委制的方案。”

“吴景超在这次发言中，污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如何脱离群众，并说这是违反宪法的。”

“吴景超在主张‘加强党委制’的幌子下，提出‘新的民主办校的制度’，来代替党委制。”

“吴景超要学校‘多设一些委员会’，‘特别重要的，就是成立财务委员会及教学人员聘请委员会，把学校行政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放在民主的基础上’。这也就是说，他要利用委员会的名，把共产党对学校财务和人事方面的领导权篡夺过去。”

计划统计系助教汪有芸说，“早在6月2日吴就参加了章伯钧以盟中央名义召开的北京各高等学校盟组织的‘汇报会’，这实际上是‘六六’阴谋会议的重要准备会议。”

周有榜助教揭露了吴景超“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作为进攻马列主义的武器的活动”。

他说,“早在今年1月,吴景超就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在这篇短文里,他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是为1952年院系调整时取消的社会学系而鸣不平,叫嚣要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增设社会学系。这是右派分子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先声”。

“他提出恢复旧社会学的实质,就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夺取思想阵地”。

人大副校长邹鲁风在会上作了以“为吴景超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方案作注”为题的发言。

他说:“在整风运动以前,吴景超就一次再次地向党委和他本人谈过这些污蔑党、篡夺党在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

“吴景超曾对邹鲁风说,实行了他的办法,‘共产党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就没有了。’”

邹鲁风愤慨地说:“共产党向来光明磊落,是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你们右派分子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才应该彻底交代。”

邹鲁风还说:“参加这些阴谋活动的,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阴谋也是‘高级’的。说它‘高级’,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企图发动匈牙利事件,使千百万个人头落地。”

他号召“大家起来,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坚决粉碎他们的猖狂进攻”。

.....

最后,大家警告吴景超必须“老实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如果继续顽抗,将被全国人民所唾弃”。^①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的文章。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3日。

许征帆在篇首开宗明义地指出：“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

许征帆举出了几件“大事”，以为证明。

第一，“首立‘汗马功劳’。”许征帆说，“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分‘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许征帆还说，吴景超“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行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第二，“为右派筹建政治大军”。

许征帆说：“为了建立一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大军，吴景超和他的同道们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准备高速度地发展民主同盟的组织。……吴景超利用了他的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主委的职权，力图贯彻章罗联盟的组织路线。他主张突破民盟只发展知识分子‘中上层’（教授、讲师）的界限，要在助教以及超龄团员中找发展对象，以便有传种接代人，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于是他在最近竟发展了右派分子许孟雄、王衍臻等，并把葛佩琦、贺安等这些牛鬼蛇

神作为联系与培养的对象。”

“另一方面讨好旧知识界中的落后分子，打击工农知识分子。”

“为了笼络旧知识界中的落后者，吴景超恬不知耻地给这部分人搽粉抹胭脂。把他们形容得完美无缺。……比如，他就把右派分子李景汉等捧上天。而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工作中，他又一贯漠视盟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对盟员说：一年至少必须拿出两篇科学论文来，其他（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都是废话。”

“他还当面向章罗建议，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再建立一个由各种专家（即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策委员会，以取消党的决策权。这个建议，得到章罗采纳，而发展成为臭名远扬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

第三，“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今年1月间，吴景超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短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要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必然要反对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景超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教条主义’，咒骂‘它已经影响到许多人的世界观’，责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马恩列斯不敢‘批判’他们的著作，不敢打倒这几个‘偶像’，因而成为‘教条主义’者。”

另外，“吴景超竟提出以是否敢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分界线。这种问题的提法，正好暴露了吴景超原来是在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干着谋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行”。

第四，“一马当先向学校党委制开火”。

许征帆认为，章罗联盟分子要“篡夺党在科学与文教界的领导权”，就“非扫除党委制这个碉堡不可”。于是，吴景超“一马当先，向党党委制开火”。

“他一方面吹嘘他那些校务会议、财务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等

等的优越性，一方面咒骂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内幕’，有‘见不得人的事’，‘独断独行’，与我国宪法第十七条的精神相违背。”

许征帆还认为，吴景超企图通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的止下夹攻、包抄侧击”，把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化整为零”，“消灭得一干二净”。

第五，“‘六·六’阴谋会议前后”。许征帆说，“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许征帆还说，“6月上旬，对吴景超说来那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句啊！”

请看这个活动日程表：

“二日，参加了章伯钧召开的北京五大学的汇报会”。

“四日，参与主持民盟中央的取消党委制的阴谋会”。

“五日，与刚刚见过章伯钧的费孝通密谈”。

“六日，出席‘六·六’阴谋会议。”

“七日，和刚刚从章伯钧那儿来的费孝通订立攻守同盟，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点火”。

“八日，借与于毅夫同志谈话的机会，替陈达、李景汉吹嘘，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辩护”。

“九日，参加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会议，并在当天晚上企图在民盟‘人大’支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章伯钧捏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指示’。”

最后，许征帆根据吴景超“参与策划与执行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过程”，归纳出吴景超从事“罪恶活动”的几个特

点：

“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个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

“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

“第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

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①

这样，吴景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劳动人民少生育，资产阶级多生育”

对吴景超的“口诛笔伐”还不断地进行，并渐趋白热化。

8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费孝通等图谋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的文章。

文章指出，“右派分子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活动，是章罗联盟反党活动的一部分。这绝不是什么学术活动”。

吴景超在“新建设”上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文章，是“右派分子进行恢复资产阶级旧社会学阴谋活动的信号弹”。

吴景超在这篇文章里，用“曲折”的手法，“诋毁”在院系调整时取消社会学课程这一措施是“错误”的，主张在各大学哲学系设立社会学的基础课程，而在其他有关院系设立社会学的其他课程。

吴景超在“人口新论”一文中，说什么“要两个农民养活一个工人，挑拨工农的关系。”^②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同一内容的文章，认为费孝通、吴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8月30日。

景超,“是章罗联盟反对共产党的急先锋”。^③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潘梓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粉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认为吴景超与费孝通、陈达、李景汉等人进行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是“蓄谋已久,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④

9月4日,《文汇报》发表了“恢复旧社会学是个政治阴谋”的文章,报道了中国科学院于8月30日和31日连续举行座谈会的情况。

文章指出,在座谈会上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李达、李景汉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并不是单纯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而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而且这个“阴谋”,是“章罗联盟整个政治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⑤

9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林聿时的“从‘政治设计院’谈起”的文章,指出:在今年3月间,吴景超在他的“提高民主党派建议质量”(见“人民政协”第二期)的文章中,提出了“在各民主党派里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于国家大事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建议,这实际上给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做了“具体设计”。^⑥

9月21日,首都和来自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地的20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揭发和批判费孝通、吴景超等“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

哲学家关锋说,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文

③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0日。

④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日。

⑤ 《文汇报》1957年9月4日。

⑥ 《光明日报》1957年9月23日。

章,是“右派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放出的第一枪”。这篇文章写得“文不对题和不合逻辑”,这是吴景超“故意”这样做的。

“哲学研究”杂志编辑林聿时说,“吴景超在国家统计局的座谈会上大肆攻击国家的资料保密制度,正是为了实现他的要共产党‘对国内国外发生的问题,随时供给民主党派以足够的资料’的主张”。

“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正是吴景超亲自参加的政策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第一个杰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麦农、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举出了吴景超“在近三十年中极力为帝国主义,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事实”。

严中平说,“吴景超在解放前曾经大肆宣扬买办洋奴观点,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掠夺作辩护。”

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在会上论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所谓社会调查的“反动本质”。

他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传布,对于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坏的作用”。^①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范文澜的“走火和放火”的文章。

范文澜认为,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右派分子”是“国家放火犯”、“学术界败类”。他们“假借名义,实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不是学术界中的一家”,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家”;他们“当然不得享受百家争鸣的自由”,理应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的迎头痛击”。^②

① 《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9月30日。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

李普说,吴景超很擅长“算账”,很注意“挑拨农民,挑拨工农关系”。

他说,吴景超在新建设3月号发表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文,“满身披挂着马列主义词句,因此曾经迷惑了一些人”。

“他们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彻底打垮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粉碎他们的诡计”。^①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务善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些什么货色”的文章。

文章指出,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阴谋”,是“反动科学纲领”的一部分。他们“相互勾结,表里为奸,实行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企图资本主义复辟。”^②

1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炯忠“驳斥吴景超关于阶级的谬论”的文章。

刘炯忠指出,“右派分子吴景超早在1935年就在前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的‘阶级论’来向马列主义猖狂进攻”。

吴景超曾说:“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欲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及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人的天赋是不平的”;“分工说与遗传力量说是分不开的”。

刘炯忠说,吴景超这一套“分工说”是“为资本主义、为阶级社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4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

会的‘万古长存’祝福”，是“在替反动透顶的帝国主义理论——吃人的‘人种论’作辩护的”，是“用‘螳螂当前，黄雀在后’的‘弱肉强食’的‘生物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

刘炯忠还说，“吴景超在谈到‘改造社会问题上’，他是极端仇视劳动人民的，他叫劳动人民少生育，叫资产阶级（他们所谓的优等人物）多生育，因为‘上层阶级，在遗传方面胜于下层阶级’。

.....

最后，刘炯忠认为，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吴景超远在二十年前的丑恶脸谱，他不过是披着‘学者’、‘大学教授’外衣的中山狼。作为今天章罗联盟的谋士的吴景超，就是昨天蒋介石、阎锡山这些匪首的帮凶。”

“在这次整风中他和我党猖狂进攻，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向马列主义开火，目的就是叫人不要接受马列主义的指导，以便接受吴景超那套‘姜记’的资产阶级的陈腔滥调。”

“但是，右派的企图是始终达不到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反右斗争以“全胜”告终，“右派”的“阴谋”与“阳谋”都被彻底打垮。

象许许多多教授、象许许多多社会学家，吴景超同样未能逃脱挨戴帽的命运。

象许许多多右派分子一样，吴景超也遭受着撤职、降级、停止工作的命运。

.....

人生多舛。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景超又遭迫害。

1968年5月，吴景超因病逝世，带着许许多多的喟叹、冤屈

.....

黄药眠·“章罗联盟的参谋长”

黄药眠，1957 年为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艺报》和《文学研究》编委。

○ “愿变成巨大的竖琴， 为千万人的悲苦抒情”

“转眼之间，我也已八十三岁，回顾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少，渺小得很，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没有做坏事，可以说对得起人民。”

这是黄药眠先生 1985 年写的一段话，在他自选集的前言里。今年，是他逝世六周年。

36 年前，黄药眠却被打成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急先锋——大右派！

那是 1957 年……

5月初的一天，中共整风的指示刚发表不久。

黄药眠坐在家里，桌上摊着一叠纸，地上散落着揉皱的纸团。

今天这是怎么啦？

黄药眠有些焦躁，这是很少见的。

他站起来，慢慢地踱着步。一会儿，他又停下来，在身旁的报纸里翻着。

《光明日报》3月24日。

“唔，是这张。”

黄药眠自语，他的目光停在一行标题上：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是费孝通的文章。

黄药眠仔细地看。这篇文章他很熟悉，因为他不止读过一次。

黄药眠又重新坐下来，陷入了沉思……

1903年1月，黄药眠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日趋没落的家庭里。母亲可怜的身世和苦难的生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旧社会叛逆的种子，栽上了向往美好明天的幼苗。

“五四”运动时，黄药眠还是个不经事的孩子，却挥动着“民主”与“科学”的纸旗出现在游行队伍里，并参加过抵制日货的斗争。后来，黄药眠担任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的秘书，他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自豪，自称“岭东爱国一少年”。

1921年，黄药眠中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报考了广东高师英文系。在大学里，他爱上了文学，并开始写诗。

“尽管大海巨浪翻腾，倾山倒海，但仰视苍天，还是岿然不动，照旧静静地注视着海上的波涛。”

泰戈尔的诗，使他受到思想的启迪和对诗的更深的爱好。

穷困艰辛的生活，使他更接近穷苦的人们，他爱他的善良、纯朴和真诚。

他心里有爱，有更崇高更伟大的爱，尽管当时还不十分的确。

1927年秋，几经辗转，黄药眠逃亡到上海。成仿吾介绍他在创造社任副编辑。创造社左转，使他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整个世界，教给他分析问题的方法。黄药眠从迷雾中看到了贫穷的根源和通向革命的大道，认识到要干革命就得有牺牲；为了祖国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就不应吝惜自己的血汗，甚至于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从此，他立下志愿要为人民美好的未来献出自己的一生，甚至生命。^①

1928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觉得自己真正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1929年秋末，党派黄药眠到设在莫斯科的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此前，他曾一度想去日本留学，想做一个诗人，但为了党的需要，黄药眠抛弃了一切。

在列宁的故乡，黄药眠如饥似渴地学习，积极地工作。那里的一切都会他感到兴奋，感到温暖。然而，对苦难中祖国的思念，又使他时时感到不安。

1933年冬，他终于放弃在莫斯科的平静生活，又一次踏上了黄浦江的土地。

回国后，黄药眠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做地下工作。为了革命事业，他情愿又放弃在文学领域的耕耘。不到一年，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苦刑和折磨，却不肯透露一句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的话。他的两鬓过早地斑白了，但他的理想和斗志无法被剥夺。

1937年“八·一三”事变，革命志士在狱中绝食响应。他由八路军保释出狱，恢复了自由，奔赴延安。

^① 《黄药眠自选集》“编后记”。

1943年到1944年,黄药眠随国际新闻社到香港,协助廖承志同志搞国际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回到内地,以卖稿为生,迎来了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期,如长诗《桂林底撤退》,论《论约瑟夫的外套》等,都是此时发表。

1946年至1948年期间,黄药眠再度赴港,任农工党《人民报》编辑,同时,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叠出。^①

1949年春,北平解放的消息传到香港,黄药眠兴奋不已。“漫卷诗书喜欲狂”,5月4日,他踏上了回大陆的轮船。

在海上,黄药眠,这个四十六岁的流浪人、单身汉,和志同道合的女友蔡彻喜结良缘。

回到北京,黄药眠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欢乐驱走了过去的苦难、幸福治愈了他心灵的创伤。他豪情满怀,精神奋发,决心将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心爱的祖国和人民。

黄药眠被聘为北师大教授,并任中文系系主任。备课,写教案,写笔记,写文章……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培育新一代呕心沥血。这段时间里,他又坚持文学创作,进行理论研究,如《论食利者的美学》等,他还是在新中国的大学讲坛上,第一个编写和讲授马列主义文艺学的人。

黄药眠从来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命运。1946年他在香港加入了民盟。解放后,他积极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7年4月,民盟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他受委托起草了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会后不久,他被任命为民盟中央宣传部长。黄药眠希望民盟在作风上、机构上、组织上都要有所改善,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① 《北京文艺年鉴》1983年。

但是，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黄药眠热情投身其中，可总不是不太完全熟悉，又有一些顾虑……

黄药眠从往事中收回思绪，目光又停在了费孝通的文章上。

他又拿起笔，把台灯向下轻轻按了一下，在稿纸上写道：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都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的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人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

“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来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

“至于目前知识分子所苦恼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多种多样的。

“从绝大多数的看来，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是得到了保证了。他们有的在埋头研究，有的在紧张备课……

“争鸣当然很好，但争鸣也得有资本。钻研业务的精神是提高了，可是他们社会活动都是很少的。

“有些人则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政治待遇，特别是一些过去曾经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或在过去曾经活跃过一时的人物，抚今追昔，又未免有点寂寞之感。

“以上两种人，问题都不是在于如何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来搞好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和如何更好利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政治学习和做些社会活动。

“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

“的确也有些人，社会活动太多，侵犯了他的六分之五的学术研究的时间。这种人，其实并不多，但也最容易嚷，而且他们的嚷也最容易被人听见……

“尽管社会活动很多，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太多了呢？我看还不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对于政治科学有深刻的研究，对于政治艺术没

有很好的修养，对国计民生没有十分关切的心情、对群众没有很好的联系。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目前的政治积极性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今后随着民主生活的日益充实，大家有更多机会说话，情况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斋，书斋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斋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向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斋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

“如果他能作出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为政府所接纳见诸实行，他一定会感到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近年来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大肯谈政治，主要就是有顾虑。顾虑别人说他立场不稳，说他有唯心主义。

“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知识分子多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了。

“难道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花了多年的劳动获得来的宝贵的知识，拿出来让大家品题，而甘于把它埋在心灵深处让时光送入遗忘的王国？

“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士大夫的传统，态度比较矜持，希望别人对他有更多的尊重，批评起来采取更委婉一些的办法……”

“但知识分子，也应该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奋斗经验和历史。

“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有时候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手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现在再就百家争鸣来谈罢。要真的争起来，就首先要求领导方面真的敢放，而且不要一放一收，或欲放不收。另外一方面，则知识分子要对于这个政策的贯彻有信心，有勇气。

“为了培养争鸣的勇气，提高争鸣的质量，我认为可以多组织一些小

型的读书会，小型的讨论会……由小型的座谈会到大型的座谈会，到讲坛上的争鸣和报纸刊物上的争鸣。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所担忧的就是，我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东西争鸣。但过后一想，争鸣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把幼稚的意见或甚至错误的意见拿出来，因而引出了层出不穷的真知灼见，那对我也是莫大快乐。因为真理难道一定要通过我的手里获得么？真理难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荷包里才算是快乐么？

“无论谁把真理挖掘出来，真理部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既然是共有的财产，当然我民就能分享得一分光荣了。因为想通了这一点，所以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黄药眠一气写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看表，已是深夜了。

5月10日，他的这篇题为《我的看法》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黄药眠的顾虑真的解除了，他相信党，他敢于说话了，甚至敢于大胆地提出工作中的某些阴暗面。

5月中旬，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黄药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认真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许多人都踊跃发言，会场气氛很热烈。

黄药眠耐心地听着别人的发言，有些意见确实很具体、很中肯。听着听着，黄药眠有些激动了。他是个直爽豪放的人，肚里存不住话，只要有意见有看法，就愿意毫无保留地端出来，要是梗在喉咙里，那多难受！更何况，这是共产党真心请自己提意见帮助整风！

黄药眠坐不住了，他要求发言：

“共产党与非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依我看，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

“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常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

“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

“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③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的组织处理。”

“学校里面，有些校领导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

“还有部分共产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对统战部，我也有点意见。”

“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

“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

“还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

“我倒还有几点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

“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商讨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

“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

“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

“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

职的应降级!”^①

黄药眠的话音刚落，掌声便响起来了，虽然有个别的人没有什么反应，但大多数人却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黄药眠太忙了。他刚写完《我的看法》，《文艺报》又向他约稿。他是该报编委，自然不应推却，更主要的，他认为文艺界也存在一些问题，他愿意谈谈。于是，他写了《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文中认为：

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首先是必须扫除思想障碍，而思想障碍中有若干是和文学现象的理解问题有关的。

人们爱引用列宁的话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个话是完全对的，可是列宁随后还说过另外一些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着：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无产阶级党的事业底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

由于忘记这些话，所以有些人处理问题时，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和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平均化，而无视文学的特性。

还有人处理问题时硬要来一个标准化，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相反。这样就抹煞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

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14日。

文学固然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但不应忘记，文学是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了解的过于死板。

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着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

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地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错着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多种多样。

因此，文学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能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

有些人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所以就要求文学要按着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简单的说教。

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里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务就是把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的意义。

但我们应认识到，人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在实践中，人们认识了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有时还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

有些人忘记了这些，认为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生活里有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的，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

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资料的搜集和堆积；想象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记载；同样，作

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①

.....

5月下旬，《文艺报》编辑部举行座谈会，黄药眠被请去主持。在会上，黄药眠的话又是一泻千里：

“当前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

“近年来，存在着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照树理的‘三里湾’就是这样。

“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为什么呢？因为《文艺报》说好。

“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协调。

“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或不满，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作家如果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拟讨论’为拒绝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的原因。

“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

“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

“至于作家对于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除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

① 《文艺报》1957年第6号。

“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

“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请他们创作。

“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

“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么为什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

“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间接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疏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尝就少呢？

“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

“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

“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

“要考虑主编的意图，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

“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越来越少。

“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

“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

“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

“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

“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里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至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

黄药眠发言过程中，时不时地听到人们的会心的笑，但渐渐

的，大家的表情都严肃起来。

会后，黄药眠把这次发言做了整理，编者把它发表在《文艺报》上，题目为《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①

近一个月来，黄药眠很累，但却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山雨欲来风满楼

黄药眠总是这么忙，来去匆匆。因为他要教课，要当系主任，要在民盟做工作……

蔡彻劝他多休息，但黄药眠只能摇摇头，他的事太多了。

5月中旬，民盟中央成立了四个小组，黄药眠为“党委负责制”负责人。

6月5日，北师大中文系举行整风座谈会，百忙中的他准时进了会议室。

6月6日，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知名学者开紧急会议，黄药眠在六个被邀教授之中。

此前，民盟要拟一份《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这副担子也落在黄药眠育上。为了如期完稿，他只得躲到西山去写。

这段时间里，黄药眠几乎没机会坐下来搞学问。他希望忙过这一段，能静下心来，捧起书本。

黄药眠没有想到，反右运动开始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黄药眠有些不解，但他没有多想。待文章写完，形势已极度转向，他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右派分子一个个被揪出来，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

^① 《文艺报》1957年第9号。

黄药眠是民盟常委，他又要参加许多会议了。会议还是鼓励大家发言，但内容已变了。

连日来，黄药眠眼里见的，耳里听的，都是“章伯钧反党反盟……”、“罗隆基反党反盟……”

他这个民盟宣传部长，也应该表态了。

6月20日，《光明日报》上登载了他的发言：

“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他是一向主张中间路线的。

“1927年大革命时代他就是主张反对共产党走中间路线的。1948年香港民盟三中全会时，民盟坚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跟共产党走，章伯钧是从心底里反对的。

“解放后来到北京，他看见形势不同，表面上就装着左的姿态。

“到了去年初，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于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到了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他的反动思想就更加活动，到了毛主席报告了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将要作根本的改变。

“因此，他就想假借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趁整风的机会，利用知识分子企图重新建立新的中间力量，反对党的领导。

“所以，章伯钧的反动思想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同时也是和世界的修正主义思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恶毒进攻……

“罗隆基是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

“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他都没有受到批评，他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可以说是原封不动……

“思想这件事，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但政治立场必须划清界限，必须斗争……”

黄药眠讲话一向负责，尤其在这样的场合。他要求自己讲清楚，也希望别人听清楚。《大公报》报导了一则失实消息，黄药眠

发现后，马上写信予以澄清：

编者同志：

顷阅你报6月20日在揭露章伯钧罗隆基反动言行的标题下，有黄药眠解释说：“陶大镛在师大的关于讨论高校党委制的活动，的确是黄药眠因为自己工作忙，委托陶去作的，和章伯钧罗隆基没有关系。黄药眠说，这个讨论如果有什么错误，他愿负全部责任”云云。（这好像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由我负责似的），我想这是由于记者同志，对事情的经过，不十分清楚，所以把意思了解错了。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很大，希望你们更正如下：“黄药眠承认，当时的确是他提出由陶大镛在师大去了解一下教师们的关于学校党委制的意见。并不是章罗提的。关于这件事，我在事前没有征求盟市委的意见，我应该负责检讨。至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什么错误，我愿负全部责任。”^①

5月24日，民盟北京市整风领导小组成立。在市委会上，费孝通揭发了6月6日的座谈会，并谈到了黄药眠。

黄药眠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震动，他想，在座谈会上，他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也没有这种想法。他只是认为，1953年后，党对非党的知识分子不那么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相信年青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他觉得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这些话过分吗？或许是吧，黄药眠弄不清楚。但黄药眠能肯定，他说的话不反动！

只是，那天会议是章伯钧召集的……

○ “愿意从泥坑里跳出来”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2日。

越来越多的右派分子被点了名，许多人是黄药眠所未曾想到的。

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近来，他时常做恶梦，每次都是相似的内容：被人盯梢，脱不了身……

大火终于烧到了黄药眠的身上。

进入7月，北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和民盟师大支部多次举行会议，对黄药眠进行揭露和批判。

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也被揭发。

7月15日，他被迫在人大会上做了检讨：

“我今天是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发言的。

“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在思想上犯了错误，后来我才知道是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性的错误。

“过去，我曾以‘进步’自封，但是自从五月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我就完全暴露出了我丑恶的面貌。

“首先，我做了章罗集团所阴谋计划的四个临时工作组当中‘有关学校领导体制’的召集人（根据章伯钧和浦熙修自己所坦白的材料，这个组的召集人，他们原来是预定要费孝通的，那时费孝通还没有回来，所以把我点上了）。

“五月十三号，我还召集了小型会议，而且还起草了‘我们对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建议（草案初稿）’。

“在这个文件中，尽管我批评了‘党团退出学校’和‘教授治校’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这并不能掩饰这个文件本身也是反党的。

“比方我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民主治校’，既然要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又来一个‘民主治校’？

“这岂不是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了么？这岂不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变成空的，而‘民主治校’才是真的吗？当然，这是很适合于章罗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的。

“其次，我强调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而把党对学校的组织领导完全忽视了。党如果不掌握学校里的人事和财政权，那么它的领导岂不是没有了物质基础吗？

“再其次，我一方面说，要以党委或党组作为领导的核心，而另外一方面又说校务委员会是最高的领导机构，

“这样一来，校长就变成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的执行人，只有了民主而没有了集中。党组领导核心也就很难体现。

“很明显，这些都是带有纲领性的错误。

“其次，我在向师范大学的领导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根据团结的精神、协助党搞好工作的精神来提意见，而是对师大党的领导作了恶毒的进攻。

“我没有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改造的一方面，反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

“我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自己个人可能没有攫取权位的野心，但他们总是企图以他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对学校来说，也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办学校。

“章罗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确怀有夺取学校领导权的野心，而我恰好在客观上做了他们的工具。

“第三，是我参加了6月6号章伯钧召集的文化俱乐部的集会。

“……但是就我自己的发言来说，也就够荒谬。

“比方我说1953年以后，党对非党的知识分子就不信任了。其实党对非党知识分子是很信任的……

“其次，我把‘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概括成为整个北京

党的现象，这显然是对北京党的污蔑。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说这些话，是正当章伯钧野心勃勃认为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候。

“这里，我正是加进了右派集团的合唱队。

“有人问我，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以为会天下大乱，会出现‘波匈事件’？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确没有这种想法……

“我之所以会犯一系列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我自己存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第二，正由于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再加上我的工作岗位上的某些党员的缺点，这就使得我有很大的不满……这当然是为章罗集团的人物所十分欢迎的。

“第三，我错误地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知识分子中间只存在有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需要长期来解决的……

“我完全不了解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中间还有强烈的阶级斗争。

“这使得我在章罗集团的阴谋活动面前，完全失去了嗅觉。

“再加上我在生活上脱离群众，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一来，我就很快堕入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

“最近由于章罗集团的阴谋的揭发，我才了解到他们的整套的罪恶的计划。

“我痛恨他们，尤其痛恨我自己。

“但我决不因此就丧失勇气。

“现在我愿意从泥坑里跳出来，紧紧跟在党的后面，重新拿起马列主义的武器，为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集团而奋斗到底。”^①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

人代会闭幕了，“右派”黄药眠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中。
他的头发又白了许多，他的心好沉重。

○“卖假药的葫芦”被打碎

黄药眠卸下了许多担子，头上只有一顶右派帽子，他真希望不再被“打扰”。

可是，往后的日子却令他更难熬。

他起草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被认为是向党委制实行了全面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进攻，说这个建议恶毒攻击党和党员；穷凶极恶地干涉党的内政；想把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①

8月6日，北师大举行全体大会，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会上，有人首先揭发他在中文系整风会议上的反动言论：

“黄药眠说他当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是被人当玩具玩，并说这与党的整个的领导和制度有关。

“他说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

“他认为不能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

“黄药眠还说，办学校不是打仗，不能用带兵的方法；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法律办事；不是炮台，没什么不可公开的。

“他还污蔑学校的评级工作，说师大的评级是用政治力量来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

提高学术地位……

“黄药眠还诬蔑党近年来‘纪律废弛’。他说党员当中有不少的人有升官发财的思想，说青年人入党就是想留作助教想出国留学；

“他甚至用极其恶毒的字句来侮辱党员，说‘有的人像蚯蚓一样的拼命钻进党里去……’”

讲师杨占升说：“黄药眠在检讨中说他没有估计到知识分子总是企图以他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认为知识分子没有野心攫取权位。

“而黄药眠自己就积极地执行了章罗联盟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总计划，

“这不正是在大胆地、猖狂地向党进攻，企图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吗？不正是在攫取权位吗？”

谭丕模教授发言说：“黄药眠说‘党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

“黄药眠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协理事等等，这难道说党不信任他？对待异己分子能够这样吗？”

中文系副主任肖璋反驳黄药眠的“有职无权”论，说：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几年以来，他一直闹辞职，不到系来工作。1954年不闹辞职了，系里的事，也仍是不大过问，那只是由于他自己嫌麻烦……

“黄药眠说受限制，什么‘许多事不叫你管，许多事不叫你管知道’，学校有分工，你是系主任，难道校长的事，教务长的事，都要让你管？系里的事对你说，倒是你不耐烦管！”

历史系著名教授白寿彝以《揭开黄药眠三块遮羞布》为题，做了长篇发言，他说：

“黄药眠在检讨中谈到其草拟的反动纲领时，曾用了三个‘尽管’来作幌子，妄图使人相信他本意是好的，客观上却成为反党

的了，这三个‘尽管’其实是黄药眠的三块遮羞布！”

语言学家陆宗达说：“黄药眠在历次会上态度极不老实，一贯玩弄手法：

“一是撒谎；二是抵赖；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图反攻；五是躲闪，故意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六是有的问题根本不谈，有的谈得很少，有的却又反复地谈。”^①

.....

8月7日，大会继续举行。

每位发言的人，都一致的以严正的口气警告黄药眠，希望他“幡然悔悟，不要再利令智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师大的师生。”

北师大教授马特在报纸上撰文，说“黄药眠为了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曾经制造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仿佛知识分子是超阶级的神人，无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是革命的力量。”“黄药眠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已经不需要改造，党必须‘礼贤下士’地来对待知识分子。”

马特认为，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根据列宁的指示而制定的。而黄药眠“之所以把党的政策歪曲为利用、限制、改造”，目的就在于否定历次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巨大意义，企图在党和知识分子中间制造鸿沟，孤立党，以便于达到自己反党的目的，并最后篡夺党的领导。

文章最后说：

“黄药眠的知识分子‘理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在知识界占领阵地，夺取领导打下‘理论’基础。

“黄药眠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要我们知识界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要我们知识界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服务，而是为资

① 《光明日报》1957年8月7日。

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而服务。”^①

《人民日报》8月14日登了一篇题为《打碎黄药眠的卖药葫芦》，文章说：

“读了‘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鼻子里就像闻到一股烧焦东西的味道。

“黄药眠埋怨近几年文章写得少，而且往往为了完成任务，以前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里有舒畅之感……

“这里所谓‘以前’者，解放前之谓也。

“在黄药眠的感觉里，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些年头，对他真是‘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不要说‘百般顾虑’，那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自由得很……

“黄药眠找他所谓的‘影响了创作的发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领导思想’……

“请问黄药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这是你从什么地方挖出来的‘领导思想’？

“你在哪个领导人的哪篇文章、哪个报告里，看到过这样的论调？

“谁告诉你要‘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请他们创作’？……

“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老实的人是没有好结果的。这等于给黄药眠之流算了命……”

张光年先生也写了文章批驳黄药眠的“百般顾虑”，张先生的“风趣”不象前者那样表现在题目上，而是贯穿着全文，包括后面的附记。

张光年先生在文章里给黄药眠的诉苦加上了“准确”的注释：

“……几年来我写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想粗暴）不能粗暴，（想讽刺）不能讽刺，（想说俏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8日。

皮话又)不能说俏皮话,(想否定权威又)要照顾到权威,(想骂倒大作家又)要照顾大作家,(想压制新生力量又)要照顾到新生量,(想反对领导又)要照顾到领导首长,(想打击老先生又)要照顾到老先生,(想挑拨又)要照顾到统战,(想投机,因此)要考虑主编的意图,(想赶浪头,因此)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怕投错了机,赶错了浪头,因此)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

“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为的骗人),许多‘考虑’(考虑如何骗人),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口是心非的话就越来越多了)。

“文章力求委婉(多绕弯子),力求面面俱到(怕露出破绽),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使你看得见,抓不住)。

“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为了装璜门面)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

“肯定之后(哪里是真肯定?)必须来一个‘但是’(使你摸不透),否定之后(怕否定出毛病来)必须来一个解释(使你摸不透)。

“文字上力求多加上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使你摸不透真实所在)。……”

黄药眠真是“顾虑”找顾虑!

张光年先生在附记里说:

“本报那次召开的座谈会,是请黄药眠主持的,他的发言我没有听到,事前也没有看到他的发言稿。

“为了‘照顾统战’(这是黄药眠先生讨厌的‘清规戒律’之一),我同意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当时也没有发现它的错误的严重性……”^①

张先生真是大度,大度到给右派分子以发表反动言论的机会。

黄药眠解放以后一直在北师大,中文系师生应该对他的文艺思想最了解,所以,如果反击他的“反动文艺思想”,一定会“正中要害”。

^① 《文艺报》1957年19号。

当时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组讲师钟子翱曾说，黄药眠的文艺思想、文艺观点里面的问题需要仔细研究。^①

过了三、四个月，这项“研究”的成果出来了，由北师大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组集体讨论，钟子翱执笔的《黄药眠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②

这篇文章有19页，2万多字，全面而详细地论述了黄药眠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思想改造、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等方面“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对”。

黄药眠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力、科研的权力，他整日就是挨批挨斗，干累活、脏活，拉砖、掏粪、种菜、烧窑……

他的妻子蔡彻也被列入“另册”，下放劳动。与体力不相称的劳动，使她的身体日渐消瘦；而听到自己的丈夫被打成右派，被骂作“狼扮外婆”、“三窟的狡兔”，她内心更是痛苦。

黄药眠虽然遭受百般磨难，但他没有唉声叹气，他坚强地活着，劳动着。看到妻子愁容满面，他就笑着说：

“我看你这样想不开，假如你处在我这种境地，我想，你早就该自杀了。”

黄药眠是豁达的。他有着乐观的精神，可他的内心，又有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这真可谓“志士凄凉闲处在，百花零落雨中看”！

① 《文艺报》1957年23号。

②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叶笃义·“党派取消论”

叶笃义，1957年任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政治地位超过一切”

凡是亲历过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和夏季的人，无不知晓“章罗联盟”，亦无不知晓“章罗联盟联络员”——叶笃义。

叶笃义，1921年生于长江之边的一个风景秀美的城市——安庆。1930年考入中外闻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攻读政治学。

曾受教于张东荪，且为其得意门生。

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张东荪来到汉口。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参与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任宣传委员。

1946年6月23日，代表民盟迎接赴南京请愿的上海和平代

表团，在“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

1948年民盟被迫解散，他留于上海坚持工作、战斗。

1949年9月，他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他作为民主党派中的“少壮派”，以一颗年轻而又火热的心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

.....

1957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清除“三害”。

5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关系问题的座谈会。

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踊跃发言。

叶笃义发表了“党派是否需要在一等学校中进行组织活动”的意见。

叶笃义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认为“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

他在会上谈了两点意见。

第一，“清华大学是党群关系较好的一所学校，尚且问题很多，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应该更加重视起来”。

他认为，“应把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摆在一个重要地位，并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

第二，“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

他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

他说，“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

他认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

校长就是校长，教授就是教授，两人之间关系就简单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些了”。

“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些，矛盾就少了。”

显然，叶笃义的这一意见，包括“主张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

他还说，“七、八年来，民主党派组织生活都过得不好，这一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每半月或一个月开个会过组织生活，对知识分子有无必要？”

“他对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那一套，是不是正确的方向，表示怀疑”。

“他对于民盟组织在大学中的活动，究竟对学校有帮助呢，还是添了麻烦？也表示怀疑”。①

叶笃义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与会者窃窃私语。

5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仍马不停蹄地举行。

在此之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在会上发言者已达30人。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

“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

困难，并且不必要”。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①

在民主党派的组织形式上，叶笃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也可以说是“大胆的主观幻想”。

他建议，“把民盟、民进、农工、九三这四个民主党派解散，重新组成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这样，就可以避免“党派分工不科学”和“抢人现象”。^②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

“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

“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

“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

“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5月17日。

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

另外，“当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

“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

有鉴于此，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

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委员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

“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

这样，就“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①

5月22日，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渐趋“深刻化”，“大鸣大放、乱鸣乱放”者越来越多。

叶笃义在会上以“朋友”和“同志”的称谓为例，谈进行拆“墙”填“沟”的问题。

他说，毛主席、周总理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时，都常说“同志们，朋友们”。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

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委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

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一个党之内的；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①

他说，“美国总把我国的共产党以外的人士叫做‘共产党的同路人’。在他们也许是出于讽刺，但我认为这是对的，我们就是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路人’”。^②

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

“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③

随后，民盟中央小组过了两次组织生活，检查盟内每个人在整风运动期间“鸣放”的言论，对错误言行实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会议由小组长黄约眠主持，在京的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积极参加。

叶笃义针对5月7日他在清华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所引起的误会，加以阐释。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他说,“我讲的不是各党派退出学校,以后不再发展了,而且怀疑到党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内如何发挥组织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

他认为,“在机关和学校,党派不要成立基层组织,但可以发展成员”。

“现在大家提出要拆墙填沟,由于在学校多一层关系,多增加一层矛盾,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①

叶笃义的发言的主干内容仍是5月7日发言的继续,只是变换了一下说法,显得更加“清楚”、“明朗”而已。

叶笃义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态度暧昧者也有之。

○“资产阶级思想冒出头来”

形势直转而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反击“右派”,开始把“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作为章伯钧、罗隆基的老战友、老部下,会不会因“过从甚密”的关系而列入挾伐之列呢?

他迷惘了,胆颤了。

6月9日晚,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上,时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吴晗批驳了他,并把他的言论“上纲上线”。

吴晗说,叶笃义主张“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片面的。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

他认为，叶笃义主张“中共党委退出高等学校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这同各民主党派的章程、政协的章程和宪法都是抵触的”。

“至于说民盟组织在大学里不起作用，给学校添矛盾，这要看民盟组织究竟是在进行什么活动。”

“如果醉心于同共产党争领导权，那么，当然会增加一些不应有的矛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民主党派是可以起良好作用的”。

他认为，叶笃义主张“各党派在机关、学校里可以发展成员，但是不要建立基层组织”的说法，“很难使人理解”。

“一个党派没有它的基层组织，怎样来领导、教育它的成员呢？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党派”。

叶笃义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①

这样，吴晗就把叶笃义的意见提到了“党派取消论”、“取消党的领导”的政治高度。

而吴晗在当时是著名的“大左派”，是民主党派成员中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好同志”，他的意见一般是正确的。

看起来，在整风运动中的“过激”言行和跟章伯钧、罗隆基的密切关系，使叶笃义难逃遭批判的命运了。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叶笃义想到了他才刚过而立之年，想到了他家中的老母娇妻少儿，想到了党和人民历来奉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想到了……

以退为进，先交代者为上策。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召开了第四次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盟中央的工作人员显得特别积极、踊跃，人数差不多超过前一次会议的一倍。

会议从8点钟破例地开到了11点钟，一直在非常热烈非常紧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张的气氛之中进行。

显然，某些民盟盟员，特别是某些民盟负责人最近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未表示明确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盟员和盟的中央委员的异常的关切和极大的不满。

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之下，叶笃义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自我批评。

他说：“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对民盟本身的威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错误的”。

“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

接着，他批判了他提出的：“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的错误说法。

他说，“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

他纠正说，“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第三，叶笃义批判了他提出的：“民主党派可以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的错误论调”。

他说，“这个想法既不符合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它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

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它们的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

“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第四，叶笃义认为：“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旧的反动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会冒出头来。我的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首要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务”。

叶笃义最后说：“我一方面要加紧自己的自我思想改造，另方面也热烈地要求盟组织给我帮助”。^①

与会者对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认为态度比较端正、诚恳，要求同时进行检讨的储安平、陈新桂等人要好好地 toward 叶笃义“学习”。

7月15日，《人民日报》以大半版的篇幅登载了叶笃义“检讨自己的错误”的文章。

这篇文章既是叶笃义在6月13日民盟座谈会上的“自我批评”的继续，又是对他尚未曝光的错误进行检讨和批判。

叶笃义说：“我的错误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系列的。这说明我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错误思想一有机会就强烈地表现出来”。

比如，我建议“把四个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合并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这种“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建议，“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

“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

“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调他们合并”。

叶笃义承认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思想根源的”。

首先，是“立场不稳”的问题。

其次，“主观上立场不稳了，自然随之而来的是外邪侵入”。

“我不但思想上作了罗隆基的俘虏，并且政治上也作了他的工具”。

最后，“自己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主观上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学习也就放松了”。

这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相左的。

“立场不稳是先天不足，放松学习就缺乏营养，自然就抵抗不住经常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细菌，终于使我产生了上面所说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言论”。

文章的末尾，叶笃义向党和人民发誓说：

“我决心加强学习，改造自己，一方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同右派分子，主要是章罗阴谋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我坚决地站在全体民盟同志的斗争行列中，誓把章罗联盟的全部阴谋和组织干净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①

○ 同志乎？朋友乎？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反右浪潮的震荡声中，名人只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顾保惜自己，什么旧情、什么昔谊，见鬼去吧！

叶笃义不得不积极地加入挾伐罗隆基之列，以换取自己的清白之身。

6月21日，罗隆基从科伦坡飞回祖国昆明。

6月22日，罗隆基飞抵北京机场。

随后，罗隆基即接到一份发自民盟中央要揭批他的“通知单”。

单上注明：时间：6月25日晚。地点：民盟中央会议室。参加者：民盟在京的中央委员。

6月25日晚，罗隆基被“架入”了民盟中央会议室，参加揭发和批判他的会议。

会议主持者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号召大家积极帮助他“扒”罗隆基的“皮”。

叶笃义在会上积极“扒皮”。

叶笃义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是不算旧帐的。但是对于坚持错误，坚决站在反动立场的人，为了帮助他正视自己的错误，帮助他认识错误的根源，谈一谈历史还是必要的”。^①

这样，叶笃义揭发了罗隆基20年来的一些“罪恶活动”。

他说：

“1936年，正当抗日战争前夕，日寇制造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时候，罗身为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总编辑，但是他却主张在北方只谈反蒋，在南方只谈抗日；”

“后来，罗又拿日本人的钱开办研究所，罗隆基的抗日态度就是这样的”。

“解放前，国共和谈期间，罗隆基与国民党的雷震勾勾搭搭，不晓得都搞些什么鬼把戏”。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6日。

“1948年，济南解放了，罗竟对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美国的马票买错了，如果把援助蒋介石钱，拨十分之一给民盟，也比给蒋好。”

“1948年底，吴晗由北平过上海去香港，罗托吴晗带了一封信说，中共应妥协实行和平外交，否则民盟将退居在野党。这封信目的是以此要挟中国共产党的。”

“1949年初，大陆基本解放后，罗要求盟内中共党员从盟内退出，这是什么意思？”

“解放前夕，罗对外声言被国民党软禁起来，其实他是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受到国民党的招待”。

“1949年6、7月间，罗从上海到了北京，在张东荪家里，与美国驻北京总领事会谈，那时，毛主席已经提出外交政策一边倒的方针，罗还和美国外交人员有什么可谈的？”

叶笃义最后提出两点质问罗隆基：

“〈一〉储安平的发事事先究竟看过没有？”

“〈二〉与文汇报究竟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为什么对徐铸成讲‘不要听报社党组的话，有事直接到北京来反映’？”^①

叶笃义要求罗隆基老老实实交代上述问题。

7月15日，叶笃义在《人民日报》上专文揭露了罗隆基的“本来面貌”，以让罗隆基的“丑恶面目”彻底曝光。

• 叶笃义指出：“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首先，罗隆基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无所不为的人”。

.....

“其次，罗隆基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搞阴谋活动的人”。

① 《大公报》1957年6月26日。

.....

“再次，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和反抗党的领导的”。

“他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组织过一个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小团体，名叫‘大江会’，参加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台湾”。

“回国以后，他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月’，专门写反共的文章。当时他们自称为‘新月派’”。

.....

“再次，罗隆基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的野心家”。

“他经常对人说：‘民盟的前身是政团同盟，名人有名人小圈子（主要指救国会同农工民主党），假如盟内无党派分子不组织起来，我们在盟内就会吃亏’”。

“他又说：‘统战部安排民盟的位置是照顾各方面的，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指多少人）’。”

“章、罗二人都是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冲突，同时也当然可以为了达到他们的阴谋而互相结合”。

章、罗联盟就是在“互相利用”和“心心相印的勾结”之下组成的。

“最后，罗隆基是有现实罪行的”。

“罗隆基在今年三月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公开地说：‘今天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

他曾说：“‘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统战部或政协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明显，是号召反对肃反，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

“这充分暴露出他的制造混乱，向党疯狂进攻的恶毒企图。这难道还能说他没有达到现实罪行吗！”

叶笃义最后愤怒地说：“对罗隆基这样一个没有民族气节，专

门同反动势力勾搭，一贯反共和搞阴谋小集团的阴谋野心家，我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我控诉他的现实罪行”。^①

○ 反揭批与戴帽子

在反右年代里，常常是今日我在“攻”别人，明白我即遭别人“反攻”，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戴帽”的命运。

继吴晗同志批驳叶笃义的文章见诸刊头之后，7月9日一篇《质问时事手册编辑部》的文章登载于《人民日报》上，该文署名余文岑。

余文岑通过批驳《时事手册》第11期登载的“先生乎？同志乎？”的题目，来批驳叶笃义。

余文岑认为，“先生乎？同志乎？”的题目，“直接附和了叶笃义的一个说法”。

“叶笃义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攻击共产党员，说他们把民主人士叫做‘先生’，而不叫做‘同志’。”

“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引为‘同志’”，也就是“把阶级和阶级的界限，党和非常的界限一笔抹杀掉”。^②

8月12日下午，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召开。

大会彻底干净地“剥下了罗隆基‘反蒋有功’的迷惑人的外衣”。

会上，罗隆基的“亲密朋友”浦熙修既揭发了罗隆基进行“反动活动”的一些重要材料，又揭露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浦熙修认为,“章罗联盟许多事都是通过叶笃义这个联络员进行的”。

“那时叶笃义来看罗隆基的次数最多,罗隆基对于民盟提出的150多条意见也是叶笃义转达章伯钧的”。

“罗隆基要策划阴谋,与人约谈都是由叶笃义去约的”。

“叶笃义在统战部座谈会要成立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的荒谬发言,也就是罗隆基的意见”。^①

至此,叶笃义已陷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境地。

10月29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了第十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会上继续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忠实走卒叶笃义的反动言行”。

据会上揭露:

“右派分子叶笃义远在1930年到1934年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司徒雷登的干儿子,是美国特务傅泾波的密友,又是以反共著称的张东荪的得意学生”。

“1938年,他同张东荪到汉口,阴谋促成所谓‘中日媾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叶笃义反动的二十年历史,就是从进行汉奸活动开始的”。

“1946年,叶笃义成为国社党头子张君勱、罗隆基等人与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的牵线人。他充当了张君勱的私人英文秘书”。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不咎既往,给了叶笃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从1949年起,他就参加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反共集团,成为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

“1956年,章罗联盟形成以后,叶笃义又充当了章伯钧、罗隆基之间的联络员,成为他们的忠实走卒,大肆宣扬章罗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政治路线”。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叶笃义在整风第一阶段大鸣大放时期，曾经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放出“两支毒箭”：

第一支“毒箭”是“叫嚣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和企业”。

第二支“毒箭”是“要组织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现在已经有许多事实表明，叶笃义的这支毒箭是为了实现章罗联盟控制知识分子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而放射的”。

“叶笃义在交代中承认‘我完全变成这两个野心家的驯顺仆从了’。

会上，曾经同叶笃义一起工作的马正信揭露了叶笃义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利用副秘书长职务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马正信说，“章罗联盟盗用民盟中央的名义，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了设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

叶笃义跟着章伯钧一唱一和地说：‘要搞就大搞，不但政协全国委员会要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名省、市也要成立，就这样一直线下去，号召作用才大’。

“章伯钧企图把政协全国委员会变为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实行资本主义的两院制，叶笃义在政协曾积极为他帮腔”。

“叶笃义说：‘我主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个什么委员会，政协也有一个什么委员会，同一个问题，人大的委员会讨论，政协的委员会也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就是一个一个地对着的，上院有一个什么委员会，下院也有一个什么委员会’。

“叶笃义还参与了章罗联盟阴谋向共产党进攻的四个工作组以及章伯钧6月6日召集的六教授会议等反动活动”。

“此外，叶笃义还利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编印‘民盟中央工作简报’，贩卖章罗联盟的私货”。^①

会上，叶笃义“避重就轻”地交代了他的“罪恶活动”，大家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日。

认为他的态度很不老实。

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警告叶笃义，要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章罗联盟的反动活动”，“不要自绝于人民”。^①

.....

这样，叶笃义跟章伯钧、罗隆基、浦熙修一样，也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叶笃义中央常委、中央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罢免叶笃义人大代表的资格。

.....

星移斗转，转眼20多年过去了。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给叶笃义平反搞帽，恢复名誉。

叶笃义老先生迎来了他的新生。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日。

潘光旦·“帝国主义撒下的恶毒种子”

潘光旦，1957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揭密·“土家，一个兄弟民族”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近来经常参加一些会议和集会。他的行踪，为北京的知识界所熟知。可是“近几年来，在报章杂志上很少读到潘光旦先生的文章”，什么原因呢？

1956年11月20日下午，带着这样的疑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赵宏成，匆匆赶到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潘光旦先生的住处。

进了门，潘先生微笑着，想站起来和赵宏成握手，赵宏成知道潘先生腿不方便，赶忙走上去，扶住潘先生。

“潘先生，请别客气，您坐着。”

潘先生坐下，也请赵宏成坐下。

两人寒暄了几句，很快就转入采访的正题。

赵宏成问潘光旦，“潘先生最近进行了哪些工作？有什么著作？”

潘光旦很谦虚地说：

“这几年其实也没干什么事，浪费的时间不少。”

“1956年5月和6月，去了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八个县和湖北来凤县，访问了那儿的‘土家人’写了3万字日记，收集了不少资料，现在正在继续写作《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的外编，约2、3万字，明年2月可望写成。”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最近准备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去湖北看看，实际上是上次湘西北之行的继续，仍是访问‘土家’。”

赵宏成赶紧插了一句：

“请问潘先生是何时开始研究‘土家’人问题的？”

潘先生回答说，“从1953年起，我就开始研究‘土家’人。”

“几年来，一直在写着《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的论文，我认为湘西北的‘土家’和古代的‘巴人’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我已发现他们之间前后贯串的若干特征。”

说到这里，潘光旦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这毕竟是他几年来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取得的成就啊！

潘光旦腿上缠满了绷带，行走很不方便，他的眼睛也不方便。长期的伏案工作，使他患了视神经萎缩症，有些字迹潦草或字写得太大的材料和信件，只能请朋友或家人念给他听。写作当然也就受影响。

近几年来，他没有在报刊上多发表一些文章，原因也就在于此。

说到兴头上，潘光旦笑着说道：

“上次我离京，和向达先生同车，我对他说，根据我的研究，

他可能就是‘土家’。向先生也说很可能。”

“那时同车而又同房间的还有田汉先生，无论这两位和‘土家’有无关系，他们的姓氏恰好是我所要拜访的‘土家’人中最繁盛的两个。”

潘光旦“喜欢书，爱读书，爱买书是出名的，他生活简朴，把钱都用来买书了。”

这是赵宏成早就有所耳闻的。

“和他相处过的人，都称赞他学问渊博，书读得多，范围广。”

话题转到读书上，潘光旦很谦虚地说：

“我以往读书，泛滥无归，是不好的，不结合实际更是不好的，近年来才算稍稍收心，渐能脚踏实地。”^①

这是一次非常普通的采访，赵宏成回到办事处后，很快就将这则采访以《潘光旦先生和他的研究工作》为标题发表在《文汇报》上。

不过，后来这次采访成为《文汇报》勾结抬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重要罪证之一。这是后话。

转眼到了1957年年初，潘光旦完成了他的关于湘西北、川东南、鄂西南的“土家”人的初步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确信这里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而又客观存在的“兄弟民族”——“土家”。

作为一名学者，一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潘光旦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觉得自己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赖，这是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党和人民作了自己微薄的贡献。

一种幸福感油然而升。

他约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补充论证，准备向中央反映。

3月18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潘光旦和向达，以

^① 《文汇报》1956年12月10日。

政协委员的身份，作了

“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

的联合发言。重点就 1956 年夏、冬委在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山区视察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对有关民族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他们谈了“土家”自治区的问题。潘光旦、向达认为：

“在湖南成立‘土家’自治区域，与早已成立了的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分合关系，是必须郑重考虑的”，“分也许比合更为适当。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发现苗与‘土’之间有过长期的隔阂的，而这隔阂也是中原统治者所一手造成的。”

“严格的说，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是存在于‘土家’统治阶层与‘土家’人民及苗族人民之间。”

“在不甚理解阶级矛盾的道理的前代，总像矛盾是存在于‘土家’与苗族之间，就是把阶级矛盾完全看作民族矛盾。”

“这种看法虽属错误，却是一个客观存在，解放只有得七八年，至今也还继续的存在。”

“我们在视察中所接触到的苗族干部同志，对‘土家’的民族要求，乃至对政府为此而派出的调查人员，大都表示冷淡与不欢迎，我们认为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有顾虑，顾虑着‘土家’的统治也许要卷土重来。”

潘光旦、向达进一步指出：

“这种错误的看法与态度，也影响着我们的地方行政，致使‘土家’的民族要求问题拖延了过多的时日。”

“无疑的把历史上早已存在的隔阂又加添了几分。”

“这些事实是不幸的，毕竟是事实，历史事实，也是当前还反映着的事实。”

“在考虑苗，‘土’区域自治分合问题时，必须充分估计到它。”

“联合自治，使他们可以更紧密的合作，从而消除过去的隔阂，对同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易于作通盘的筹划与调剂，这当然是好的。但这样一个考虑是否全面，是否考虑到了这种密切合作在现阶段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而如果各搞各的自治，前途紧密合作的可能性是否反而要大

些，都还值得研究。”

他们提出：

“在正式作出决定以前，还须多多的协商，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多费一点时间。有米不怕饭迟，既邀承认。终必自治”。

“苗族与‘土家’之间须要充分的协商，合好，还是分好，能合，固然好，但也不要勉强，勉强合，不如分。”

“‘土家’人中主张分合的两面也必须充分与反复的协商。”‘主张分的‘土家’人大多数是几年来对自己民族成分的肯定问题奔走呼号出力较多的人，而主张合的则大多数是一向对这问题并不关心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各级行政机构里以‘汉族’的成份工作了多年的人。这两方面的人，在思想与感情上，不可能没有距离，这距离也必须通过协商，加以消除；如果协商不够，而草率与片面的作出分或合的决定来，那显然是不好的。”

潘光旦和向达强调，

“不同意见的各方面同志们，要破除成见，心平气和的从事协商，同时要满怀的信任我们的政府，在协商的基础之上，一定终于会作出合乎政策而使各方面都获得满意的结论来。”^①

其次，他们重点谈了“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问题”。

潘光旦、向达指出：

民族政策在“别的民族地区的情况，我们不熟悉，但在‘土家’人或其他巴人后裔的地区，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是显然的没有做好，没有做够。”

“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所产生的作用是两面的：对兄弟民族是一面，对汉族又是一面。”

“一个兄弟民族的受到承认，需要通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客观上有足够的民族特征，如聚居地、共同语言、习俗、信仰等。二是主观的民族意识与要求。”

“一类民族或可能的民族，”“在数千百年大民族主义的积威下，他们

^①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对暴露自己的民族成份，怀有极其深刻的顾虑，他们甚至‘想’做汉人，至少做到表面上要和汉人分辨不出来。”

“于是，首先，他们把自己固有的特征掩蔽起来，至少在同时有汉人进出的场合里，不说自己的语言了，不穿戴自己的服饰了，不履行自己的习俗与信仰仪式了。”

“其次，客观特征的经久不能自由表达势必导致主观意识的日益趋于淡薄。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一声解放所能改变，只有通过足够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的影响，才能改变。只有在情况改变之后，他们才会把内心蕴蓄着的应有的要求自动地表达出来。”

潘光旦、向达批评说：

“我们在汉族干部方面，民族政策的宣教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也正唯其不够，大汉族主义思想还未能消除，从而使‘土家’问题的解决遭受不必要之拖延。”

他们表示：因为“在最近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听到毛主席的十二点指示，其中一点就是大汉族主义必须彻底清除。认为这种清除的工作必须从做好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入手。听了指示以后，又结合到我们所曾接触到的‘土家’问题，加以思考，自信有了些新的体会，所以敢在此作为一个建议提出，供政府参考。”^①

潘光旦和向达的发言，在当时显然没有引起过分的喧哗，因为当时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代表很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政协委员们都本着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愿望，畅所欲言。

会上，提的意见建议也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尖锐激烈的不少，但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5月初至6月初，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整风运动，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先后参加。潘光旦没在被邀之列，显然他的资历还不够要求。

^①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1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很快，章伯钧、罗隆基被定为民盟内部的“反党联盟”。形势逆转而下。

潘光旦在这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也被冲来冲去，身不由己了。

.....

○四支“毒箭”·“恶毒的种子”

从6月18日开始，民盟中央为了反击盟内右派分子，开始了整风。以座谈会的形式，动员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深入批判章罗钧、罗隆基“反党联盟”问题。

作为中央常务委员，潘光旦是应该参加的，但最初大家考虑到他腿不便，会议有时又是在晚上进行的，加上会议最初还不那么太激烈，他就没有参加，而是自己在家学习、检查、反省。有时，参加会议的同志第二天就把会议的情况向他通报一下。

情况表明，形势越来越严峻！

“章罗联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揭发“章罗联盟”骨干分子的成果也在不断扩大。

特别是对罗隆基的揭发。

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史良、中央常委周新民，甚至连浦熙修，都站出来揭发罗隆基的“罪行”。与会的人都感到有压力了。

潘光旦再不能在家呆着了，他被要求克服困难来参加座谈会。

每个人都必须表态，每个人都必须说话，这是一个大是

大非的“原则”问题。

潘光旦无法再回避“斗争”了。

7月3日夜，民盟中央举行第三次整风座谈会。费孝通首先揭露了罗隆基的右派手法，还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信。

在谈到所谓小集团活动时，罗隆基表示，

“如有小集团活动，可以杀我的头。”

史良斥责他是“耍流氓态度”。

闵刚侯气愤地说，“你为自己辩护时，讲得那么清楚，要你交代小集团名单，你就说你忘了，现在我替你宣布”。

闵刚侯立即宣布说：

“罗隆基的小集团包揽：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刘玉立明、张东荪……。”^①

第二名就是潘光旦。

潘光旦必须说话了。

听到这个消息，潘光旦的思想乱极了。

怎么办？

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他苦思冥想，企图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

5日晚，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继续举行，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继续追查罗隆基的问题。

潘光旦来了。

会上斗争很激烈。

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首先向大会建议，“今天不许罗隆基像过去那样狡猾和消磨时间了，我们提问题，让他老实交代。”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接着史良、罗子为、杨一波都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罗隆基和“章罗反党联盟”的目的和阴谋。浦熙修也揭发罗隆基了。

潘光旦感到压力很大。

他深知“立场”和“界限”的意义。

上次会议闵刚侯宣布的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中可是清楚地写着“潘光旦”三个字。

最后，潘光旦终于站起来发言了。

潘光旦说，“据我所知，罗隆基的小集团，北京的是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刘王立明、范朴斋、张志和、张乔嵩、黄大能。上海的是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赵文璧、周永德、孙斯鸣。成都与重庆是潘大奎。昆明是李德嘉、陈复光。杭州是姜震中。苏州是陆钦墀。太原是王文光，南昌是杜迈之。”

很明显，他提供的这份名单是十分不准确的，与闵刚侯的名单相比，漏掉了诸如费孝通、吴景超、叶笃义这样的“大鱼”，他对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否认，有些已被批倒的他也无力回天，帮他们翻案，如曾昭抡、范朴斋、刘王立明等。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接着，他又重复别人批判过的话：

“罗隆基不止一次说过，北京而外，西南与上海必须控制在手里，西南是民盟的发源地，上海市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他地方，自然是能多夺取到一个好一个。”

“党提出知识分子政策及向科学进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系列的积极方针之后，章伯钧、罗隆基就认为机会终于来到，可以大搞起来。”^①

① 《大公报》1957年7月6日。

仔细琢磨潘光旦的批判发言，可以说是“不痛不痒。”

当然，他最终没有能“蒙混过关”。

随着伟大的反右斗争的进一步深入，“章罗反党联盟”的“黑幕”也越揭越深，身置其间的潘光旦，最后必然是“在劫难逃”了。

8月30日、31日，在民盟中央第九次整风座谈会（扩大）上，罗隆基被迫交代：

“解放后一直”在发展“反动小集团”，在北京主要是搞了“十人团”，最初的成员有“潘光旦、曾昭抡、刘王立明、叶笃义……”

潘光旦倒了。

新帐旧帐一起算。

他在“土家”民族问题上的“谬论”，特别是3月下旬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成了别人批判和“清算”的主要靶子。

8月初，湖南永顺等县土家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揭露”潘光旦的“恶毒阴谋”和“罪恶活动”。

31日，中共湖南省永顺县副县长彭武刚（土家族），根据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揭发的右派分子潘光旦利用民族问题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事实”，又“补充了一些材料，”进一步揭露了“右派分子潘光旦在土家问题上向党向人民出了放怎样凶恶的毒箭。”

彭武刚列举了潘光旦的“四支毒箭”。

第一支毒箭是“挑拨我族人民与党的亲密关系。”

他指出：

“1956年5月，潘光旦借视察湘西土家族的名义来到了我们永顺。他一来便与我县的土家族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取得联系，收集

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意见’和‘材料’，并发表谬论，吹嘘自己，说土家民族问题是他作了些调查研究，将资料整理报送中央后，才引起中央重视的。”

“还说‘现在的问题是省、州、县三级的党政压制了土家人民的要求，阻挠调查研究，不承认土家民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以才拖延五、六年之久’。‘州党委是从苗族的情感出发，压制土家民族的要求，把土家语言说成是土司王过去用兵的暗语，不承认是土家的语言。’‘过去有些领导对土家族人民在填写民族成份时，只准填汉族，不准填土家族，只许说汉语，不准说土话。’”

“他更无耻地声称：我是土家族人民的树靶。”这些诬蔑性的狂言妄语，其用心是很清楚。一方面想引起土家族人民对上级党政的不满，以破坏土家族人民与党和政府的亲密关系，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和威信；另一方面，他想贪天之功来抬高自己，骗取土家人民对他的信任，以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目的。”

第二支毒箭是“借北四县代管的名义，播是非，说这是上级党和政府对付土家人民的一种措施，不重视土家人民的一种具体表现。”

彭武刚愤怒指出：

“当时土家族人民还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好说是不重视土家人民的一种具体表现，何况代管不等于不管呢？……很明显的，这都是右派分子潘光旦企图在北四县人民中特别是土家族人民中点火，梦想煽动他们和他一起向党进攻，造成混乱的局面。”

第三支毒箭是“有意识地扩大民族间的历史矛盾，破坏苗、土家两族人民的团结和友好的关系。”

“今年3月18日，潘光旦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发言，……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强调苗、土家两族人民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为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强调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两族人民现在仍是不团结的，也是不能团结的。”

“他想在两族人民之间挖一条永远隔离的鸿沟，使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恶化起来。”

“他企图用一层黑布遮住光明的现实，否认党在执行民族政策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两族人民已由过去的统治阶级制造的不够平等、不普遍团结、有所歧视的关系，改变为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关系。”

第四支毒箭是“想利用我们‘土家族’的区域自治形式，来破坏我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彭武刚气愤地说：

“他横蛮武断地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在土家族的人民内部点一把分离的野火，其用心是很毒辣的。”

“右派分子潘光旦故意说主张‘合’与‘分’的不同，是思想感情上有距离，是一种阴谋活动。”“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挑拨。”

最后，彭武刚表示：

“现在我们土家族人民，通过对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已经使我们认清了右派分子潘光旦的狰狞面目。我们土家族人民对这个可耻的、披着做民族工作外衣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挑拨民族关系的罪恶阴谋活动，表示无比的愤怒的和谴责！”^①

“四支毒箭”最后击中了潘光旦自己。

批判和揭露潘光旦“罪行”的斗争日益深入下去。

8月30日、31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连续举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右派分子潘光旦、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到会接受批判，并作了一些交待。

1957年9月15日，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为契机，批判潘光旦的斗争又一次形成高潮。

15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在这次会上指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1日。

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潘光旦、彭伯沅蔑党的民族政策，竟然利用土家族族间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进行酝酿土家族苗族如何实行自治问题的机会，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疯狂进攻，企图掀起一场反共反社会主义和破坏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风波，但在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下，潘光旦、彭伯等的政治阴谋完全暴露和破灭了。”^①

16日、17日，中央民族学院也举行大会，“揭开了章罗联盟的核心分子潘光旦的丑恶面目。”

会上揭发，“潘光旦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到处点火，是章罗联盟的重要阴谋活动之一。”

“他还到苏州、南京等地进行知识分子的串联活动，在各地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中学中召开座谈会，他根据搜集的‘意见’材料发明了‘六不’主义和‘六不’思想的理论，又在知识分子中散播这些毒素。”

“他从江浙一带‘串连’回来，又挑拨说，‘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讲师太苦了，年纪多半是中年以上，子女又多，根本连饭也吃不饱饭。’”

“‘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潘光旦就捏造说：毛主席说党里有90%以上的高级干部不赞成百家争鸣。’并且破坏说，‘百家争鸣还没有到时候，起码要十年后才有可能，那时共产党才能培养出一些人来争鸣。’”

会上还有人指责说：

“潘光旦把那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说成是‘教条’，是‘卫道者’。还不知耻的说：‘我潘光旦的文章没有别的好处，就是没有这些教条主义。’”

① 《光明日报》1957年9月18日。

“潘光旦反对党的领导，说：‘监督分二部分，政策出来前，可先拿出让大家交换意见。现在我们都是事后提意见，是作治疗工作，而不是做预防工作。’”

“他认为党不能领导文教事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①

潘光旦有几次希望站起来解释一下情况，但立即被愤怒的“讨伐”声淹没。他脸色铁青，脑袋混沌一片。

会上，大家认为潘光旦“这个右派分子还是回避事实，无耻狡赖”，‘决心和他斗争到底。’

不久，阴法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继续揭批潘光旦的历史问题。

他深刻指出：“右派分子潘光旦、李景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根源。他们一贯地为帝国主义者帮腔，并变本加厉地诬蔑祖国人民。”

他气愤地说：“由于退回庚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就又增加了一大笔投资。帝国主义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受它的‘教育’和使用庚款的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也有小部分，如潘光旦、李景汉，如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等，阴谋破坏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一小撮右派分子身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撒下的恶毒的种子。”^②

“帝国主义撒下的恶毒的种子”！

这就是阴法鲁对潘光旦之流的高度概括。

潘光旦的心里流着泪，同时也流着血。

泪和血……

① 《光明日报》1957年9月18日。

② 《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9期。

○“独腿教授”·民主斗士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在江苏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秋，考取北京清华学校。

入校后不久，爱上体育运动，选择“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一个项目。在一次锻炼时摔伤了腿，不慎，结核菌侵入伤处，最后竟酿成了一生不可挽回的损失，1916年1月锯掉了右腿。

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全校同学参加了爱国运动他参加草拟学生代表团的各种文件和组织工作，是学生会中一个活跃人物。同学们称他“身残志不残”。

1920年后，清华学生会设立评议部、学生法庭、干事部三个机构。在学生法庭进行第一次选举时，他被推为“检察长”，学校处分学生，先经学生法庭审理，提出判定意见，然后再由学校当局公布处理；调停学生之间的争端，更是学生法庭的义务。

“检察长”潘光旦“为人宽厚，乐于助人，对人对事都是秉公处理，”他提出：“好朋友真交情，要以肝胆相示”；“好朋友真交情，全靠容人之量才行。”^①

这是他为人处世的真知灼见，也是他交友的指导思想。

潘光旦虽拄着拐棍，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是，他对“改良社会”的活动，都积极参加。

1921年初，他用“精神分析派”的手法，写了一篇《虞初新志·小青传》的读后感《小青的分析》，作为梁任公（启

^① 《清华周刊》第206期，1921年1月7日。

超)先生的《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课的习作,交了上去。梁任公阅后大为赞赏。批语写道:

“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澜。”

潘光旦此后“抑自兹不佞于学问一途,略知自勉者,梁先生有提挈之力焉。”^①

1921年6月,为了支持李大钊为首的北京教育界八校教职员“索薪团”请愿遭到镇压一事,潘光旦与清华学生举行“同情罢考”,结果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的处分。

在社会舆论的批评和学生们的力争下,1922年春,有关当局表示可以撤销留级命令,但学生必须填写“悔过书”。潘光旦认为“无可悔过”,甘愿留级而不写“悔过书”。

高班同学闻一多对他坚持原则,不以个人利害放弃原则的态度极为钦佩。赞叹道:

“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圣哉!圣哉!我的朋友光旦。”

在潘光旦等斗争下,学校当局也只好不了了之。

潘光旦于1922年5月结束在清华9年的学习生涯,7月赴美留学。

他先入纽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插班读生物学。192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不久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192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在吴淞政治大学、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厦大、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等。同时,兼上海《时事新报·学刊》与《书报春秋》主编。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优生学、家庭问题的文章，为蜚声海内的专家。

1929年的文化问题文化论争中，反对“全盘西化”，赞成“全力现代化”和“充分现代化”。

1934年8月，应聘到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翌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潘光旦不顾身残行动不便，随清华内迁。不久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

潘光旦一生中很重要的转折是在1941年。

这年秋，他加入了刚建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的委员、常务委员兼云南支部负责人。

潘光旦伤残的身体内蕴含着的巨大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他参加创办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经常与闻一多、吴晗一起与中共地下党员华岗、楚图南、尚铨等举行座谈会，交流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潘光旦签名《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1946年1月13日，和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联名签发《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

“在抗战过程中，人民为了成全抗战的努力，容忍政府种种限制人民自由的措置”，“但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却利用这容忍，一步步地加强它的积极性。思想言论、行动以及生存的自由，无一不被夺取”。

他们严正指出：这一切，“足够暴露过去几年来的政治本质了。”

6月26日，潘光旦主持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的招待会，楚

图南、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冯素陶、潘大逵等出席了招待会。他们严厉抨击国民党的罪行和独裁。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

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害后，他依然无所畏惧。继续和黑暗势力作斗争。被时人誉为“民主斗士”。

10月，潘光旦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北平，继续执教于社会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

作为民盟清华大学的支部负责人，他依然经常和费孝通、钱伟长等在吴晗家聚会，支持和配合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为清华大学师生迎接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这位“独腿教授”满怀激情，靠一条腿，两根拐杖，参加了开国大典上的游行，被传为佳话。

1952年10月，全国院系调整后，潘光旦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开始从事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强烈地希望靠自己的学术，为社会主义祖国作一点贡献。

.....

对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土家”族的研究，花费了他很多心血。

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查资料、做卡片，使他的双眼患视神经萎缩症；为了实际取得研究资料，他几度去西南，拄着双拐走进一家一户。走过沟沟坎坎，

但是，他没有怨言，他没有畏缩。崇高的理想支撑着他。他感到党和人民需要他的研究。

当他看到“四支毒箭”、“恶毒的种子”这样的字眼冲他而来时，他无法相信自己了！

他不知道这是真的！

他的激情消失了！

他慢慢地垮了下来！

.....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对盟内的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作了处理。

潘光旦被撤销了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但他“始终不怨不议”。

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潘光旦算一百四十二分之一。

但那只是形式！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

十年浩劫刚开始，他又被从旧档案堆里揪出来，“彻底批判”。

他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1967年6月10日，他扔下双拐，悄然离开已经“轰轰烈烈”的人间。

老友陈达听到噩耗，悲痛欲绝，挥泪写下：

《哭潘仲昂》

“廿年同事不平常，死去孤魂我断肠。

梦里寻君徒自苦，醒来犹自独悲伤。”

1980年6月25日，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国家民委等单位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潘光旦再一次被平反了。

可是，“孤魂”早已逝去，“伤悲”又有何用？

钱端升·法学界右派主脑

钱端升，1957年任民盟中央常委、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过路口，钱端升便望见了学院的主楼。此刻，她分外醒目。夕阳的余辉替她细细地描上了重彩，近旁那些寂寞了一冬的高大乔木已披绿成荫，她越发显得壮丽、典雅……汽车缓缓向前行驶，钱端升静静地欣赏着这辉煌的夕阳胜景。他突然觉得这景色似曾相识，努力搜寻着记忆里的每一角落。虽说已是夏日，这景色却只相宜于故乡松江的暮春时节。松江的暮春晚景更有几分“落霞与孤鹜齐飞”味道，那有这般绚烂、壮观？这不是泰晤士河畔的夕阳胜景么？一样的辉煌、一样的壮丽……他觉得这里似乎又缺点什么。记得那日自己是站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间阳台上观赏晚霞的，那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那如画风景里充溢着一

种学府所特有的肃穆、凝重。对了，那正是这里所不具备的。这遗憾化作一种重负紧紧地压在钱端升肩上，他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他想起了建校以来所历经的重重困难，想起了目前学校里的种种复杂矛盾，想起今天下午在整风座谈会上自己的那一番慷慨发言，想起与会者那热烈的掌声……“我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今天不是有那么多人理解、支持我么，只要有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政法在教学上绝不会逊色于伦敦经济学院。”他想。他感到一种坚定的自信给自己倾注了无穷的力量，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汽车已驶进了校园。

他刚在办公室落座，电话铃便响了起来，是他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

“是钱院长吗？我是《人民日报》的叶迈啊。钱院长，你刚回学校吧？你今天下午的发言真精采，那几点提得很中肯……”

“过奖、过奖，我只是有感而发罢了。”

“一点也不，真的，一点也不。钱院长，我们主编觉得你的讲话很有宣传价值，能和你约个时间谈一次吗？”

“可以，可以。嗯，这样吧，今晚七点在我家，行吗？”

“太好了，谢谢你了。”

“我家的地址是……”

“谢谢你，我已经知道了，晚上见！”

“晚上见！”

……

七时正，叶迈敲门时，钱端升正从书房出来，他把叶迈请进了书房。这是一间典型的学者书房，高高的几架书，有中文的，也有外文，一大摞打印的资料堆在屋角的椅子上，写字台上堆着一叠文稿、信件。

“钱院长，你能谈谈最近一段时间对整风的感想吗？”面对着这样学富五车的学者，叶迈感到有些拘束，他觉得自己的提问似

乎太生硬了。

“那好，我就谈点一孔之见吧。这段时间的感想总的说来，可用下午讲的那八个字概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在何处呢？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十六字的口号，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种局面，一种实际需要，特别是后面八个字，有可能使我们自由发变为更自觉地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从这方面讲，整风是十分需要的。”

叶迈飞快地记着，钱端升放慢了语速。

“我惧什么呢？从总路线的提出到目前整风为止，愈来愈感到大家的责任重了，负担重了，尤其是经过整风，可以预期党员的活动会更有组织些，非党的民主人士在国家机关和社会上的活动也将有增加而更丰富了，因而耽心自己跟不上必然增加的任务。所以，我今天下午又提出，除严格要求共产党员之外，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多花一些力量，想一些办法，加强自己。”

“钱院长，你是政法界的名学者，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很想聆听你对政法工作的高见。”

“哪里有什么高见。”钱端升笑了，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政法工作确实是我的老本行了，谈不出什么高见，只有几点想法。我觉得立法是当前的一件紧要工作，法院和检察部门都需要有法可依，目前也有条件来搞，可是现在搞的嫌慢些，不够大胆和放手。”

“那么，司法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在司法方面，办案质量是眼下一个关键问题，1954年办案质量有较快的提高，但同社会进步相比还是不相称的。而要提高办案质量，首先要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但目前由于教育力量太小，高等政法院系还不够多，所以目前应注意培养合乎规格的教师，增设院系和函授班。”

叶迈看了一眼预先写下的采访问题，继续问道：“钱院长，最近几天，在座谈会上，党外民主人士就党与非党关系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不知道在政法界这个问题表现得怎样？”

钱端升略微迟疑了一下，他说道：“总的说来，政法部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着不少缺点，许多事不尽人意，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啊！明显的不足有两点，一是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就拿刚才提到的立法工作来说吧，如果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就可能搞的快些。我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不是专职，就过问较少，党员负责同志的确辛辛苦苦地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但在工作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没有好好商量，连刑法总则草案最近是否提出一事，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干部口中知道的。”

“二是对于老的司法人员和老教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比如说，现任的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教授，他在政法学院时，我提出让他担任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但前后说了三次才得到解决。出现这样的情况则是由于过去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斗争性强，对于政法干部特别注重政治条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也往往因此而把参加党团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进步的界限。这样一条线，容易使政法部门的人变成清一色。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有些不是党团员的就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或本来可以考虑当审判员的让他们当了书记员。1955年以后比较好些，司法部门中的非党人员增多了，并由一些非党人士担任司法厅局长职务。”

“司法部门是有了改变。据我所知，法院和检察院的高级干部中还少有非党人士。”叶迈说道。

“是这样的，这两个部门的高级干部队伍中也应增加一些非党人士。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则不参加党的人总是有的，既然有，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估计，不然就会限制他们的积极性；一则

也可以巩固学习政法业的青年人的情绪，免得他们有前途无望之感。”

钱端升感到口干，端起茶杯，慢慢地喝着茶。叶迈的问题又提出来了：

“钱院长，你刚才谈到了政法学院的一些事，你在高校里工作了几十年，不知你对目前的高教工作有什么意见？”

钱端升放下茶杯，说道：“这个问题今天下午我已谈了一些，我就作一点补充吧。我认为；这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和中国实际结合不够，和老教师商量不够的缺点。在学校中只有依靠党员，而依靠教师不够。高教部在某些问题上，如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专业设置、教学工作量等，都是自己先拿出一套东西，从上往下看，即使交下边讨论，也只能有小小的修改，所以，自上而下，不依靠广大教师，不结合实际，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毛病。这样一来，非党的教师也容易对领导有意见。”

“他们对党委制有意见吗？”叶迈见缝插针地问。

“多数人觉得，学校的领导搞了两套班子；一边是党委会，一边是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势必使几个党员负责同志做许多重复的工作，浪费时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员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不要党并不是说党不领导了。”

叶迈看了一下手表，离预定的结束采访时间只有5分钟了，记录本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记起钱端升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大堆文稿和信件，虽然采访非常顺利，现在也不得不尽快结束。他抬头望着钱端升那略带倦意的面容，缓缓地说：“钱院长，下午你对‘把整风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这一提法表示异议，你能否作些详细的解释？这也是我今天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谢谢你对我的帮

助。”

钱端升点了点头，说道：“我是反对这一提法的。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教育吗，舍此无它，只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加强教育工作，不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把教育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要是教育工作被旁的工作挤了，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了。”

“那么怎么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呢？”叶迈忍不住又插了一句。

“机关可以保证两不误，而在学校拿出普通的提法就不行，学校的经常工作不能打乱，当然整风也得搞，因此，可考虑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法来保证两不误。至于到底用什么方法，这正是目前我考虑的问题，恕不能明确告诉你。我就谈这些，不知今天的回答你是否满意，谢谢你，谢谢！”^①

……

钱端升又参加了一系列会议，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既有和风细雨式的小型座谈会，又有急风骤雨的群众“鸣放”大会……

5月27日，他参加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组织的“首都法学界整风座谈会。作为学会的副会长，他理所当然要带头“鸣放”。他的发言博得了同仁们热烈的掌声。

这段时间，他特别忙碌。说来也怪，自己竟感觉不到半点劳累，反而觉得轻松愉快，他坚信自己正一步步地在实现自己的夙愿。

二十年后，他才真正明白，这一切不过是梦中的幻景，是一场悲剧的序幕。

○ “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恶梦开始了！6月11日，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曾在前两次会上慷慨“鸣放”的几位法学界人士，一下子成了别人批评、指责的靶子，有人甚至指控，在他们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敌我矛盾。钱端升感到会议的气氛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钱端升感到十分惶然。他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毛泽东的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他已看了不止十次，他没有找出任何一点足以解释这场变故的原因，他翻出最近的报纸和自己的发言稿，看了老半天，仍一无所获。他在书房里来回踱了几圈，又重新坐了下来，摊发言稿，逐句逐句地读，一个字一个词地推敲斟酌……他确信自己所说的都是事实，确信自己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共产党。烦躁不安的心稍微宁静了一些。他把身体紧紧地靠在沙发上，闭目陷入了沉思……

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钟骆成了批判矛头集中所指的对象。经过一阵无情的紧追猛打，俞钟被定为货真价实的反动大右派，钱端升预感到一场灾难正等待着自己。

钱端升的感觉没有错，灾难就降临在翌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它会来得如此迅速，更让他惊愕不已的是，灾难的开始竟是那么荒诞，那么让人心碎的一个场面。

21日的会，钱端升差一点迟到了。他一进会场，主持人便把他请到一个格外醒目的座位坐了下来。钱端升一抬头，他看见三位不常来开会的政法学院同事：陈光中、曾炳钧、于振鹏，并排坐在自己的正对面。让他感到奇怪的是，陈光中旁边还坐着一位老熟人——学院办公室的副主任周仁。“他怎么来旁听这个会？”钱端升想。

陈光中他们朝钱端升看了一眼，他们眼神让钱端升感到非常陌生，四个人神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便若无其事地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第一个发言的是曾炳钧，他声音洪亮：“我爱老师，我更爱真

理。钱端升是我的老师，但是为了真理，今天我要揭露他的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行。”

钱端升只觉猝然被猛击一棒，头皮发麻，双手不停地颤抖。他知道：灾难来临了！

“凡是和钱端升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为人骄傲自满，架子十足，脾气很大，脱离群众，解放八年来一丝未改，整风运动一开始，却变了，成为‘低身下士’，和气待人的，坐了小汽车到各个宿舍‘拜访’。他拜访的对象，是一些心怀不满的，肃反中被斗争、被批判和对评级评薪有牢骚的人。拜访时说的是一些破坏活动的话，我要问：‘钱端升，你这样一反常态多方活动为的是什么？’”

陈光中接着说道：“钱端升的这些活动在政法是有目共睹的。他必须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也是钱端升的学生。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了真理，我今天也要抛弃对他的热爱，揭发他的错误言行。自建校以来，他一直对党委制不满。当人民代表还没有来校视察时，就放空气说：‘党委制在北京政法学院行不通’。人民代表来视察，他自己提出了这个意见。在整风开始时，学生中流行一个错误的看法：‘党员学生毕业后当审判员，非党学生毕业后当书记员。’作为院长的钱端升不但不批评这种错误观点，反而把学生的矛头引向老干部，说‘老干部压制新干部、新干部压制知识分子……’他说这样的话，明显地是要老干部下台。此话一出，使一些落后学生纷纷不满老干部，有个团员甚至因而要求取消党委制。最严重的是：一个学生写信给钱端升，大有‘草木篇’之味，把今天的社会说成一团黑，说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致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还把参加暴动的匈牙利青年说成是追求自由、真理的英雄。钱端升隔一天就回信，信上说：‘一个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钱端升的意思，要他向新社会‘坚决斗争’。”

曾炳钧打断了陈光中的话，他愤愤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当时非常气愤，钱端升，你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企图？”

陈光中继续说：“钱端升还歪曲事实，煽动群众反对党组织。在一次党委座谈会上，他说，党组织只依靠党团员的汇报来作鉴定，是否可靠。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取消鉴定制度，否定学生档案制度。”

会议发言一开始，于振鹏便一直盯着钱端升的脸，他惊讶地发现，这张在平日里神色严峻的面孔竟是如此地富于色彩变幻。他似乎更乐意观赏钱端升那张脸由白而红，由红变灰的脸，而不在乎那些早已排演过几次的“台词”。陈光中的话一完，他便接上了茬。

“钱端升是民盟中委，政法学院盟组织的主委。他一向把发展民盟组织当作自己政治活动的资本。他对盟有三爱三不爱。三爱是爱发展盟员，爱和党分庭抗礼，爱听盟员中埋怨党的话；三不爱是爱盟务学习，不爱批评，不爱过组织生活。他在整风开始时的那些活动是和右派相呼应的。我要求民盟组织讨论钱端升的问题。”

于振鹏发言之后，会场上却出现了无人发言的沉默局面。

陈光中他们等待着钱端升进行反驳。

而此时的钱端升仍呆坐在那里，没有半点反应。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对一种突如其来的局面茫然无措，他万万没有想到灾难竟是这样开始的，万万没想到自己多年来亲手培养的学生陈光中、曾炳钧向自己开了第一刀……他感到一阵眩晕，眼角似乎有些湿润。“不、不，千万不能这样。”他一次次地告诫自己，一言不发地呆在那里。

陈光中等不及了，他打破了沉默：

“钱端升在政法学院所作的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看来，他今天不想回答，我就用他自己说的话来替他回答吧。他亲口说：‘在这

次整风中，要整（华北）革大的遗风，要打散（华北）革大的领导核心。’大家都清楚，北京政法学院的党员领导干部，大都是前（华北）革大转过来的，要打垮他们，就是要赶走老干部，取消党委制。钱端升心中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曾透路过两个办学方案：（1）恢复北大法学院，他作院长兼北大副校长，请在南京的一些法学界人士来当教授；（2）北大法学院不成立，他仍当政法学院院长，但人事应当作适当，由楼邦彦当教务长，由北大某教授当总务长（目前的教务长和总务长都是老干部。）归根到底，是要恢复旧法学院的面目，削弱党的领导。”

钱端升始终未发一言。^①

.....

首都政法界的会议继续举行，与钱升关系密切的楼邦彦、王铁崖被人揪了出来。钱端升自然成了反动集团的主脑。

钱端升的“后院”——北京政法学院也燃起了熊熊的反右大火。六月下旬以来，政法学院连日举行批判钱端升的反右大会。

此时，“章罗”联盟在人代会上受到了人民代表的严厉批判，这股风也刮到了法学界的座谈会上。钱端升与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便成了与会者关注的“热点”。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在会上质问钱端升：“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杨清源告诉我，章伯钧自己说他请你吃饭时，同你详细商量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你们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

同是，又有消息传来：马哲民在人大的小组会上揭发：“钱端升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

钱端升只得回答质问。

他说：“章伯钧经常说盟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应当连升三级，如钱端升就是。因此，我在加入民盟后很快就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6日。

升为中央常务委员。今年3月12日，章伯钧邀请我和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吃饭，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我对他很佩服，感到他抓住了形势。这次还谈了两院制的问题，我被他们抓住，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小集团的一个成员。”^①

费孝通揭露：在6月2日，正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钱端升向他表示：“我反正跟着罗副主席走”。

钱端升又被迫交待他与罗隆基的关系。

他说：“罗隆基和我同是清华毕业，留美。在清华时认得他。在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时期我和他过往较频。到了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据说罗考虑设一机构，有他也有我。现在追想，显然是在拉拢我……”

够了，在批判者眼里，这足以证明钱端升确定无疑地是章罗联盟的骨干。7月2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北京市主委吴晗到北京政法学院作报告，他宣布：钱端升是罗隆基的“无形小组”和“策划于密室”中的人物。

据报载，钱端升对此不服，还一再申辩，说他“在组织上未参加章罗联盟”，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的倾向”，“有野心也没有章罗那么大。”……

在政法学院的反右大会上，徐敦璋教授仍抓住钱端升与罗隆基的关系大作文章。批判会上群情激奋，钱端升只得再作交待。他说：“罗隆基以知识分子的大好老自居。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他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小组，摸摸知识分子的情况，乘机成立知识分子政党，以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说他对政法界知识分子不熟悉，要我找一些有问题有情绪的人在一起谈谈，我开了一个名单。我这是用费孝通所建议的串连办法。”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上次曾旁听政法界座谈会的周仁站了出来，他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曾被钱端升拉拢和利用过，他一直谋划在拉拢知识分子同党对抗上大做文章，‘八大’后，他忽然对学校工作感到兴趣了，他抛开学校党委准备好的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不顾，自己召开了一系列的教职员工座谈会，要大家只讲缺点，不讲成绩，他的目的在于另搞一套，与党对抗；并通过鼓励大家对学校的缺点提意见来证明学校的工作是一团糟，也可借此对教员进行拉拢。”

政法学院的民盟盟员刘裕中揭发说：“今年2月，钱端升突然一股劲儿要开会，讨论为什么民盟这几年发展得这样慢，所起的作用不大。他急于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盟员。”

楼邦彦站了出来，他愤愤地说：“我曾是钱端升‘口袋中的人’，今天我也要揭发他。他早就想把政法学院的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对抗。”

.....

在群众反右斗争大会上，曾被人提及的那位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杜汝楫走上大会主席台，他要立功赎过。他说：“在整风开始后，钱端升曾去‘拜访’我，他要我谈肃反的问题，我当时表示不愿再谈这个问题，他颇为失望，便别有用心地说：‘肃反是搞反革命，思想批判超出了范围’。我见话不投机，便问到评学衔，他借机挑拨说：‘党的领导方面不给你评，后来我坚持才评了，不是我替你说话，你连书也教不成了。’”

钱端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站起来，指着杜楫问道：“杜汝楫，你要实事求是，我真说过那些话么？”

杜汝楫冷笑着答道：“那你说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钱端升无言以对，他只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杜，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主动过去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没有想到杜汝楫

却凭空编出这么一大堆，他还能说什么呢。

那个给钱端升写信的学生也站了出来，他叫章文岳。他说，他曾问钱端升：“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钱端升立刻答道：“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他还当众宣读了钱端升写给他的信。

有人揭露，钱端升曾在学校的座谈会上说：“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校1954年毕业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有搞政法工作。”他继而又在电影晚会上鼓动学生说：“政法学院毕业生应该当审判员，但是当年把书记员也可以，不过当书记员太长不合理。现在整个司法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工农干部压知识分子，老干部压新干部。你们这次如果不把‘三害’反掉，将来可能当一辈子书记员。”

这人的话音刚落，便又有人上台发言。他说：“据我统计，我校1954年去天津有16人，计到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等政法部门工作的有十二人，非党团员占多数，其他四人也因特殊原因作了别的工作。如此看来，钱端升是无耻地捏造事实，他是有意污蔑党的领导，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戴克光教授揭发，钱端升把党员分成派系，破坏党的团结。他曾在教授会上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在第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来自革大的党员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等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说了。”戴克光揭露钱端升的用意说：“他把我校党员分成三类，并说他们的矛盾很厉害，要知识分子党员吐苦水，其实就是要将知识分子党员从党内拉出来。”

在政法界的座谈会上，陈光中、北大教授芮沐、龚祥瑞等揭露，钱端升对院系调整是十分不满意的，当时为了抗拒院系调整方针的贯彻，曾在清华大学和曾昭抡、钱伟长开会共商对策，又在楼邦彦家里召集了一些教授密谋如何抗拒。事后他主张打乱院

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来个“院系再调整”，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课程改革，来个“二次彻底改革”。

既然是学者们开座谈会批人，就免不了有人要揭一下钱端升的学术老底。

李祖荫说，钱端升是靠他和王也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起家的，这本书不过是掠夺式的作品罢了。

龚祥瑞不愧是钱端升的得意门生（钱曾对人夸耀他手下有“三大将”、“三剑客”——龚祥瑞、王铁崖、楼邦彦），对老师的学术门径了如指掌。他说：“比较宪法”是王世杰的，并不是钱端升著的。比较宪法只不过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板。钱的其他著作如“法国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钱的学术并不高明，学生们对外推崇他背后骂他一文不值，楼邦彦说他的著作是空疏的形式叙述，毫无已见；王铁崖说钱端升笨，食而不化。钱端升不是学者，向来是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①

戴克光，龚祥瑞、芮沐指出，钱端升站在右派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看，是毫不奇怪的。

他们揭发：钱端升1924年留美回国后，就参加了当时垄断政法教育的王世杰的学阀集团，把持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等校的政法院系，并在王世杰办的“现代评论”上散播反共反人民言论。他在1927年9月2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党治和用人”一文，他在文中恶毒地咒骂共产党为反革命势力。1940年6月，他在“今日评论”上发表“论党”一文，妄图消灭抗日核心一边区政府和红军。文中说，国民党“如容许小党公开。唯一可虑之点就是共产党的问题。”“今年11月而后，国民党的党治如能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取消，则中央政府更可有辞严令红军及边区组织取消。”^①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他还打电报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联系筹办“新路”杂志，并要楼邦彦代他出任编辑，宣传反动的中间路线……^②

○美帝培养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

7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在挖出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一大群右派分子后，胜利闭幕。下旬，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钱端升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并不是讨论、通过什么法律决议，而是反击右派。自7月底开始，与会的六百多名代表便日复一日地集会，声讨“一小撮”右派分子。

钱端升再次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他必须每天面对数百名愤怒的人民代表，上百次地回答他们的质问。他的那些如实的回答远不能使代表们满意，人们似乎对他那些众所周知的“反动言行”兴趣不大，而是一个劲地翻他的历史，一页页地细查，看来是要掘地三尺，穷追不舍了。钱端升的“罪行”一天天增多，“罪名”也不断地被加大……

他感到支撑不住了。一回到家，他便径直走进书房，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黑暗中。他把整个身子都陷在沙发里，他感到心力交瘁，知道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他也明白，眼前只有一条生路：认罪。一想到这两个字，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记得半个月前，当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

自己看到费孝通等人在人代会上的认罪书时，曾极端鄙视那种失去尊严和良心，苟且偷生的行为。没想到今天自己也不得不举步上这唯一的求生之路。他为自己，也为那些自己曾经鄙夷过的求生者感到无尽的悲哀，想到这里，他不觉老泪纵横……

钱端升的认罪发言刊登在1957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

他“承认”：“解放前，我有过长期的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反动派、亲美崇美的罪恶活动。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我以很大的信任和很重要的工作……但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心怀不满，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解放初期还和留京的美国特务记者见面多次，1949年和1950年还和美国特务教授费正清等通信。最后更趁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在政法学院削弱、摆脱党的领导，使政法学院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且诋毁政法部门和高教部门的党所领导的工作，企图从而削弱党对政法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领导。我是罪人，我的罪行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我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自章、罗抓知识分子问题以来，由于我自己有罪恶思想，妄以为章罗的领导（这领导实际上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接受了章罗在盟内的领导。这样使我愈陷愈深地走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越来越走入章罗联盟的道路。由于我和章罗联盟思想上的共鸣，客观上就产一了行动上的配合。”

“我由于对政法学院的党有严重的不满和对立，我就在政法学院和政法方面进行了反党的罪恶活动……整风一开始，我就公然提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来领导。由以我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来领导……为了最后达到削弱政法学院党的领导和提高我自己的地位，满足我自己的野心和肮脏目的，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我企图破坏政法学院党组织坚强的团结，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我诬蔑汇报制度、档案、鉴定等人事制度。为了削弱党的领导，我又寻找对党不满的对象，进行挑拨、离间、煽动。我看中老教授和司法人员，恶毒地说他们受到歧视；我对青年教师也同样进行挑拨。更突出的是，我利用青年讲师杜汝辑对肃反的不满情绪，示意他在整风中大闹特闹。在我院的毕业生中，有些人对

工作分配是有不满的情绪的。针对这一情况,我捏造事实,说1954年分配到天津的毕业生除一人外,都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在整风初期,我在学生中进行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我鼓动一个一贯对党不满的学生章文岳向党进攻……此外,我还长期地、明确地有着这样一个党闹对立的思想。我企图使盟有力量来和党分庭抗礼,通过盟员来了解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

“我要最后把政法学院变成我的独立王国,也不仅仅为了大权独揽,而是要把政法学院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办学思想根深蒂固,经常作祟,我也只接受了院系调整 and 教学改革的形式,而拒绝接受其精神实质,我仍然迷恋于较长期的和所谓“正轨”的教育,而实则就是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关于大法学院的各种方案,我没有谈过,在回国以前也没有听人谈过。但我的确是企图拉些教过政法的人到政法学院来担任教学工作。”

“我诬蔑政法部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诬蔑高教部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使我心目中的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很容易有工作……”

“我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长期以来,企图利用“教授”的好名称,来满足我的政治欲望,企图把学校作为地盘而增加我的政治资本。政治野心家的野心总是得寸进尺,总是没有止境的。尽管我在整风初期乱鸣乱放,大放毒素时,我还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样大的政治野心,但政治野心是水涨船高的,野心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我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我的罪恶活动的危害性,今天我认识到了,要远比我在作出罪恶活动时严重得多。我真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

“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在1950年6月30日给他的信中,我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的情况。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以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污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费正清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的所谓‘民主个

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我早年留学于美国，自1937年到1948年，十一年中去过四次，一次是跟胡适去的，目的是要求美帝国主义为蒋介石反动派打气。第二、三次是去出席美国反动的太平洋学会。第四次是卖身投靠式的教书……”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着长期的罪恶活动，而且1952年经过忠诚老实学习，我又不彻底交代我的罪行，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现在谨再向人民低头认罪。我甘愿受一切应得的处分和惩罚。我痛下决心，我一定要清算自己的帐，新的要算清，旧的也要算清，要彻底交代一切罪恶的活动，也要彻底交代一切错误的言行，特别是关于和美国帝国主义有关的罪恶活动……”^①

大多数代表接受了钱端升的认罪。当然龚祥瑞是不会同意钱端对‘大法学院’一事的辩解的，他觉得钱是“不敢拿出真诚和勇气加以承认”。他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文章，阐明他曾三次耳闻的“院系再调整”的消息，当然，他没有忘记捎上他的师兄弟——右派大殿前的哼、哈二将：王铁崖、楼邦彦。

.....

8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反右大会，钱端升作为法学界的大右派，再次受到批判。

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召集了科学院、北京各大学、中央政府、天津、上海等地的二百多人召开大会，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汇报中，钱端升、王铁崖等人被确认和章罗联盟有组织关系，“他们的阴谋活动，是章罗联盟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支肆无忌惮的、最猖狂的主力军。”^②

.....

○ “功过是非，留待来者细评说。”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反右斗争结束时，钱端升被撤销了行政职务。在民盟中央委员的名单上，他的名字也被划去了。

.....

1958年4月13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决定撤销钱端升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职务。

至此，钱端升只剩下两个头衔：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反动大右派。他顶着这两个头衔，又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①熬过了十七年。1974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钱端升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八十年代初，他作为宪法专家，为新宪法的制定呕心泣血，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右派的帽子早已被揭去。之后，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政治学学会名誉会长

.....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无疾而终，春秋九十。

他生前曾一再表示：“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②

对待死者，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

1990年2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钱端升逝世的消息。自然，《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没少官方对钱端长风雨一生的定论：

“.....

1957年，钱端升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他并未动摇对党的信念，并在81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① 钱端升：《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院出版社，第700页。

② 钱端升：《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院出版社，第701页。

逝者长已矣！只不知钱端升还满意此定论否？

沈志远·“魔手的俘虏”

沈志远，1951年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上海市经济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民主党派应当独立自主了”

1957年4月，北京。

沈志远这次来北京，已经有好些日子了。他和上海市民主党派的其他人士来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其他人都回去了。可是，沈志远还要参加即将召开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

北京的春天虽然不象南方来得那么早，可到了四月份，天气还是暖和起来。整个冬天都光秃秃的树，此时也都长出了绿叶。走在方块砖砌好的大街上。看着随风飘扬的杨柳，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

沈志远此时的心情，也被这春天暖得热烘烘的，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更使他对这次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当时的统战部领导，明确表示：民盟这次工作会议，中央不派人参与，完全由民盟自己作主。这个情况，章伯钧、罗隆基早已通知了沈志远。

沈志远没想到中央说到做到，坚决信守诺言。同时从内心里，他由衷地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感到高兴。

会议期间，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章伯钧认为，民盟应当与党有所区别。他提出今后民盟的中心任务，应当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当把向科学文化进军作为民盟的中心工作。

没想到章伯钧的这项主张，好比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在会议期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有的盟员提出，应当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作为民盟的主要任务。对此，沈志远等人是不同意的。

由于沈志远、黄药眠、费孝通、叶笃义等人大力支持，这次民盟工作会议通过了章伯钧的这一建议。

当时，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在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意见是有分歧的。

有的人主张：党与民盟的关系应当是批评与接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沈志远从维护民主党派的独立性这一角度出发，认为：“今后党和民主党派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应当独立自主了，今后不要一切依靠统战部，应当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

后来，在领导小组的座谈会上，不知谁说了三句口号：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地位平等，沈志远听后，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他

连忙用笔记下，后来在上海工作时，又在好几个场合说起过。

沈志远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思想，也十分欣赏。他在后来与黄药眠共同起草的盟务中心发言，在第一项任务中就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设立“国家政策委员会”。他说，今后民主党派不仅要施工，而且还要参与设计，要参加全部过程。

被北京的春天烘得浑身暖洋洋的沈志远，在这次会议上很有些引人注目。

先是他和曾昭抡教授一齐传达了宣传会议的精神，尤其是当他谈到民盟的今后任务时，他是多么高兴，当他谈到今后的任务是通过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反对修正主义时，台下台上一片热烈的掌声。连平日有些傲气的罗隆基，也投之以赞许的目光，更令沈志远心情激动。^①

经过推选。沈志远和黄药眠教授一齐担任整理发言稿的重任。为此，沈志远不无遗憾地谢绝了会议组织的游园活动。

他和黄药眠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终于使会议发言稿提前整理完毕。在这次文字处理中，沈志远删去了一部分代表的发言。如有的代表提出民盟今后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的代表认为应当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加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有的代表提出应在中共领导下执行相互监督。对于这些，有的是因为与这次会议的决议形成抵触，沈志远加之删去。有的是因为不说大家也知道的道理，加以删去。也有的是因为“过左”而被删去。

后来，在批判沈志远时，被说成是：“有组织的阴谋。”^②

会议临近结束，民盟中央的几位主要负责人都相继拜访沈志远。尤其是章伯钧对沈志远的思想和才干大加赞赏，专门请他到

① 《文汇报》1957年10月27日。

② 《四川日报》1957年9月2日。

家里吃饭。沈志远是浙江人，章伯钧专门从北京饭店请了会做浙江菜的大师傅，来表达自己的赏识之情。沈志远在北京还吃到了自己的家乡菜，也从心里很感谢章伯钧的盛情款待。

当时，沈志远和其他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如四川的潘大逵、湖北的马哲民等人，对这次民盟全国工作会议都感到相当满意。

后来，沈志远在上海盟内传达那次会议的情况时说，“这次全国工作会议的第一次特点是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来，这是第一个在完全没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具体帮助的情形下，在党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地位平等的方针下召开的，然而我们的会仍然开得很好、很成功。”^①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为了按照盟中央的要求，推动上海民盟的发展，沈志远与上海民盟的其他负责人如陈仁炳、孙大雨、徐铸成、陆诒等一齐登上南下的列车，盼望着尽早感受到黄埔江的春潮。

○“事前监督”论

1957年4月，上海火车站。

沈志远、孙大雨、徐铸成等人刚从卧铺车厢里出来，就发现在站台站着一些人，见到沈志远等下了火车，连忙热情地欢迎。虽说沈志远有些意外，但他还是迎了上去，同上海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民盟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一一握手，在站台发表了一个简短但不失热情的讲话，然后登车离去。

沈志远第二天就召集了一次小规模的会议，简明扼要地透露传达了这次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并且征求其他民盟领

^① 《文汇报》1957年10月20日。

导人的意见，决定在近期内传达会议精神。

在民盟上海市委召集的工作会议上，沈志远作了长篇发言，正式传达了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的精神，并且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些集中构成了他的“右派”言行。

“他首先指出这次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完全没有中央统战部的具体帮助，而会仍然开得很好，并再三强调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地位平等’，‘我们今后要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强调民主党派对党的监督，不应只限于所谓‘事后监督’而应实行‘事前监督’。”

“谈到民盟的组织路线时，沈志远说，在今年4月3日的那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说为了要使各党派成员发展到一、二百万，方针一定要改变以上层为主，以大城市为主的方针。章伯钧说上层人士年纪大，体力弱，不能担当重任，且不可能有大量发展，既要长期共存，就一定要多多吸收青年；还说除工农兵外，其他方面不管城市大小，都应当去大力发展。”^①

针对当时的党群关系，沈志远说：“假如在一千二百万党员与六亿三千八百万人民之间造成了一道万里长城，这是谁的损失！”

针对当时的学术界，沈志远说：“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时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

“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

“由于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2日。

“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好些教授常年没有书教，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

对于学术界党的领导问题，沈志远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政策事业的正确性去影响群众，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而不能单依靠组织措施来保证党的领导。”

“他在出版界方面，提倡‘开办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

作为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当然忘不了谈他的经济问题。

他说：“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①

“连草纸、牛奶都要管到！”^②

沈志远的这些发言，象一发发炮弹在当时的上海市委某些领导心里炸开了花。对于这些，沈志远并不很知道，他还在继续说。可是当时的中共市委，已经根据沈志远在民盟、高教、宣传几次会议上的发言，从内心里认定他就是大“右派”分子。

沈志远的一系列发言，以及他关于发展上海市民盟组织的指示，很有力地推动了许多青年、中年知识分子向民盟靠拢。

根据后来的统计，从1956年的8月至1957年6月，共发展了2000多人入盟，基层组织由34个发展140多个。

面对民盟蓬勃兴旺的景色，沈志远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后来在批判沈志远时，把他大力发展民盟组织说成是“要大胆向落后分子开门，一度使民盟组织踏上危险的边缘。”

○ “我在鸣放期间的罪行”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26日。

② 《文汇报》1957年8月31日。

1957年4月的一天，沈志远家。

沈志远正坐在书房仔细地研读俄文版的政治经济学书。这几个月民盟的事把他累得够呛，象这种安心读书的夜晚实在是很难得。

沈志远早年留学苏联，曾经与蒋经国等人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当时中山大学，受苏共政局的影响，没有什么课程，只要求学生积极参加运动。沈志远是难得的例外。在中山大学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都发奋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熟极了。凭借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后来他又考入中国问题研究所读研究生。学业完成后，他还担任过《共产国际》中文版的编译。回国以后，他的精力也主要放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志远从内心深处讲是热情的、支持的。总的来讲，他对建国以来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同时由于他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水平，使他对某些问题看得比别人更准，考虑得比别人更深。所以借着北京吹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股劲风，沈志远便在几次会议上老实不客气地大说特说，当然对于后来的变化，此时他是几乎一无所知。

突然，沈志远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扰。沈心里略有些不快，不过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礼貌地从妻子手里接过话筒，打电话的是从《新闻报》的副总编陆诒。陆诒热情地邀请他参加第二天的民盟《新闻报》支部的会议。

陆诒说《新闻报》希望在“鸣放”期间得到沈志远的支持。有了市委支持，《新闻报》的盟员才能挺直腰板“大鸣大放”。

沈志远一想到是为了工作，刚才那丝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连忙答应了下来。其实平时，陆诒与沈志远的关系并不太好。沈志远知道顾执中的学生之一便是陆诒，虽说大家都民盟的同事，可彼此也没有什么深交。倒是并非民盟成员的王造时，与陆诒关系比较好。

第二天沈志远准时来到《新闻报》社，陆诒见沈志远来了，连忙热情地迎进会议室。

会上陆诒放大炮了，主要对党员干部住房特殊化，脱离群众，领导作风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批评了一通。会上纪律比较差，有时陆诒的发言被热烈地掌声所打断，有时又有人起来反对，不过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总的说来，会场气氛相当热烈。

沈志远也被眼前的场面感染了，在大会快结束时，沈志远也象4月份在华东师大时那样，热情地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并且确切地告诉《新闻报》的盟员不要怕，有民盟市委给他们撑腰。

《新闻报》的“鸣放”如此红火，说句实话，还真的不是沈志远所料到的。他对陆诒的能量如今才算见识，深感“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倒是华东师大，沈志远还比较熟悉一些。

先是，华东师大的学生会邀请他这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举办各种讲座。华东师大同学的聪明、好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月份，他又应华东师大民盟支部的邀请，到师大观看“大字报”。

有的大字报刚刚贴上，还墨迹未干。有的大字报，旁边就是反驳它的文章。真可谓旗帜鲜明、针锋相对。

有的大字报主要是揭露当时学生们所看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对党员干部生活特殊化、在系里工作中不尊重老教授意见，只强调政治教育忽视业务学习等，作了批评。

华师大的许杰向沈志远汇报时说，同学们对此的兴趣都比较大。根据调查，大字报里揭露的问题大多也是属实的。据说大字报公布出来后，有些情况校党委也是第一次听说，震动比较大。许杰还委婉地征求沈志远及盟市委的态度，沈志远明确表态：大力

支持，并对许杰说，不要有所顾虑。这使许杰很受鼓舞。

进入五月份以来，沈志远几乎就没有空闲的时间。上海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各个单位都开始“鸣放”起来，作为上海市民盟的主要负责人，有时被这个单位请去看“大字报”，有时被那个单位邀去开会。忙得他是不亦乐乎。虽然如此，沈志远还是把重点放在《文汇报》、《新闻报》、华东师大和上海电影厂。

说起上影厂，沈志远心里是比较自豪。

象《文汇报》、《新闻报》这些报刊，虽说民盟都占有一席之地，可象《文汇报》的徐铸成、《新闻报》的陆诒，都不怎么受沈志远的指挥。可是，上影厂就不同了。

民盟上影支部的主要骨干如陈仁炳、吴茵等人，都是沈志远一手提拔起来的。特别是吴茵，是沈志远亲自发展入盟的。

沈志远在一次舞会上与吴茵认识了。那时吴茵已经是上影厂的台柱子，人又年轻漂亮。沈志远在与她跳舞中，发现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伶俐，并不象有些女孩娇揉造作，轻浮浅薄。沈志远对她产生了一种难以分清的复杂感情，他近乎宠爱般地喜欢这个使人忘却烦恼的女孩。

以后，沈志远和她逐渐有了更多的接触，发现吴茵在政治上也追求进步，于是便介绍吴茵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沈志远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民盟上海市委工作会议上几次讲话中，都提到了文艺界。有一部分材料就是吴茵向他提供的。

陈仁炳、吴茵等人在当时上影厂礼堂也贴了大字报。他们主要针对当时电影界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内行来领导，电影是不是要体现政治第一，导演应不应该有权展开大辩论，大字报贴了个铺天盖地，声势比陆诒在《新闻报》连开十次大会也不差。吴茵、陈仁炳等人还组织召开了上影厂五次座谈会。

这些情况吴茵都向沈志远作了汇报。

对于上影厂的“鸣放”声势，沈志远从心里讲是极为满意。建

国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电影一定要“政治第一”，很多电影大多是空洞无物，废话连篇。这一点，沈志远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因为沈志远爱看电影。

所以沈志远坚决支持陈仁炳、吴茵等人在上影厂“放火烧荒”，只是没有想到会成为他的一大罪状，世间的事有时就是这样难以捉摸。

○ “剥掉沈志远的画皮”

六月的北京，气候说变就变。

《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几篇社论，无疑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很敏感的政治信号。

不知是上海离北京距离太远，没有受到这风的吹击，还是沈志远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

六月中旬后，在一次高教基层汇报会上，他见许杰多次问起华东师大情况再一次表示支持华东师大的“大鸣大放”。

不过就算沈志远有意收回，也只怕是无济于事了，他在几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已送交上海市委柯庆施那儿，这次他是“在劫难逃”了。

1957年7月下旬，沈志远正式接到通知，参加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座谈会，检讨自己的反动言行。

会议在上海市政协礼堂召开。

沈志远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期到会。

座谈会推选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

陈望道宣布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是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时，沈志远不禁偷偷看了看，他发现除了民盟的徐铸成、陆

诒、陈仁炳、孙大雨等人低着头，无党派的王造时也在那里意兴阑珊。

会议一开始，沈志远便成了批判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他在今年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海几次会议以及“鸣放”期间的言行，提出质问和批评。

沈志远与复旦的陈望道平时接触不多，所以陈望道的批判近乎泛泛的。陈望道主要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我们知识分子是必须在思想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知识分子必须经常以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逐渐确立无产阶级思想，把自己放在劳动人民之中，而不是放在劳动人民之外、之上。”^①

座谈会的第二天，沈志远经过思考决定交代自己的问题。

沈志远在初步检查中承认自己是“十足的右派分子”，在鸣放期间的“几次谈话和发言是我鼓动群众向党猖狂进攻的最重大罪行”，他表示“向党向人民向学术界同志们请罪”。

沈志远作检查时违心地说自己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自己有追求名利的野心。

沈志远还检讨了自己在“两院制”、“上影五次座谈会”、“发展盟员”、“贯彻反动‘科学纲领’”、“贯彻反动‘所内放火’”等问题上表现的错误思想。

沈志远的检讨，并没有使参加座谈会的人感到满意。

王亚南说：“右派集团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右派集团的政治纲领。沈志远说 he 自己是根据这个反动纲领在上海进行活动的，但是他却没有交代具体事实，没有交代他在章、罗右派集团中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交代他们的整个右派集团。”

① 《新闻日报》1957年8月31日。

王亚南继续说：“为什么有些自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也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一门普通的科学知识，它是和阶级发生联系的科学知识，对于每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如果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普通的科学知识来研究，特别是不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那末他只能是标榜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亚南教授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发言。

接下来的发言更令沈志远如坐针毡。

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说：“沈志远的检讨是很不老实的。沈志远在检查中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割裂开来，只检查学术思想不谈政治问题，好象学术思想能够离开政治思想似的，这是唯心主义的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上海市经济学会的理事漆其生对沈的发言也极为不满，他说：“这个检查是来料加工，偷工减料，只不过是把大家所揭发的材料复述一下，并且还丢掉了大家揭发的关键性材料。”^①

这天批判沈志远的还有邹今朴等人。

这天王造时、杨兆龙两位法学家也受到批判。

座谈会连续召开了五天，沈志远最怕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他的“后院”起火了。

沈志远比较欣赏的吴兆洪和他比较疏远的刘思慕分别作了长篇发言。

吴兆洪说他不提成绩，扩大缺点，否定党的领导，主张“倒退”，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动盟员向党进攻等，说他所走的路线是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认为他是一个披着马列外衣的政治野心家。

刘思慕的发言更加全面系统。在沈担任民盟上海市委的主委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29日。

时，两人关系不好，沈志远一直有点瞧不起刘思慕。

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系统地分析、批判了沈志远的“右派”言行。

“沈志远以全盘抹煞新中国的伟大成绩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鸣放期间，沈志远已成为极端的“一点论”者。他把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涂成漆黑一团，把学术思想界说成死气沉沉……”

“沈志远进一步公开地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沈志远号召盟员帮助党员整风，但却不是主要整三害所代表的工作作风，而是要党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里的个别环节’，‘全面的大检查’。因为他认为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原因’是‘属于制度性质’，他强调要把‘滚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

“在政治制度方面，沈志远除了欣赏、推销章伯钧的‘两院制’、‘政治设计院’之外，还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自由，片面强调民主来破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鼓吹“多党制”，主张民盟成为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政党；反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人大成为没有真正工农代表参加的资产阶级议会。很明显的，沈志远妄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

“在经济制度方面，沈志远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他责骂我们的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讽这种制度把我们党和政府压得‘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说什么连‘草纸、牛奶都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国营，一切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

“他用极其恶毒的语句污蔑、丑化整个党。他把我们的伟大、

光荣、正确的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

“他爱找党的岔子，爱听关于党的坏话，恶意挑拨党群关系，把党和非党之间的‘墙’说成是一千二百万党员和六亿三千八百万非党员之间的‘一道万里长城’。”

“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于孙逸仙大学校内师生的反托派的斗争，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及至1931年回国参加党内的文化工作时，沈志远竟然因为害怕白色恐怖而脱离了党。后来他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更有好几次从真如老远跑到南京去参加康泽、谷正纲等国民党反动派主持的留俄学生会所发起的聚餐会。”

“无论从他的阶级出身来说，从他的爱好享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说，从他灵魂深处的思想意识来说，沈志远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

根据材料证明，1931年沈志远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文联委员，后来因为生病而脱离组织，而不是因为害怕白色恐怖。

至于从真如至南京参加聚餐会，是有的，

但发起人不是谷、康二人，而是留苏同学会。

沈志远听了刘思慕等人的反击发言，心情沉重。当时有人悄悄地告诉他，说只要他主动承认错误、检讨罪行，有人“保”他过关。

沈志远当时心里怎么想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他后来无疑是低下了头，多次发言痛快淋漓地作自我批判。

1957年7月31日，在座谈会快结束的时候，沈志远作了长篇发言，检讨自己的“罪行”；

1957年9月2日，沈志远在《文汇报》上发表长文《向党向

^① 《新闻日报》1957年8月31日。

人民请罪》；

1957年10月20日，《文汇报》又全文刊载了沈志远的《我怎样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一文；

在1957年8月召开的上海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沈志远又受到“质问”、“批评”，被迫承认错误，低头认“罪”。

由于沈志远对自己检讨得很“深刻”，“认罪态度”比较端正，所以后来还是比较顺利地过“关”了。沈志远先后担任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沈志远是这样批判自己的：

“总的说来，从思想体系上讲，我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从政治品质上讲，我是一个披着进步分子外衣的政治野心家。

“我为什么会对党对人民犯下这样严重的滔天罪行呢？首先，使我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我的极端浓厚的权位观念和贪婪无厌的政治欲望。”

“其次，我在形式上是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工作的人，但因为我仅仅是口头上谈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当做工具、当作敲门砖，来达到往上爬、争名利、争权位的卑鄙目的。”

“第三个原因，是在我头脑里盘据着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思想。”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虽然形式上长期参加了革命运动，实际上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参加过革命斗争，从来没有经受过严酷艰苦的革命锻炼。”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政治罪行的人。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七百万人民的代表交代我的罪行，并表示真诚的悔悟，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①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2日。

1965年，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逝世。终年63岁。

陈仁炳·长太息以算帐兮，点鬼火以销愁

陈仁炳，1957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治安策”与“旧帐”

1957年，陈仁炳是以“算旧帐”闻名的，这一点连陈仁炳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当然，他更未预料到，当他以“算旧帐”闻名不久，“群丑谱”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陈仁炳。

在陈仁炳名字下面，题了一首诗：

逢人点火幸成灾，
政治流氓索作来。
旧帐未清新帐欠，

一齐结算两应该。^①

陈仁炳未算成“旧帐”，反而成了欠债人。

当陈仁炳明白自己成了“欠债人”时，他或许早已追悔了。但一切为时已晚。

早一些的时候，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陈仁炳慷慨陈词。

那天他很激动。自从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出整风的指示以来，他便跃跃欲试。不久，统战部又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号召大胆对党和政府提出意见，他更兴奋。

这天的会议他是以书面形式发言的。

他说：“要让每一个基层单位都“鸣”起来，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

“我感到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里应该鸣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我听到会上揭发出来的一些矛盾后，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那几桩是令人痛哭的，那几桩是令人流涕的，那几桩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那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我把听到的情况也排了一下队，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

“因此，我建议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杀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建议这次整风中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问题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7日。

“我认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帐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帐来遮掩自己的错误。

“我希望党这次整风能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①

○帐单呢·算谁的帐·目的何在·赖帐么

1957年6月，距陈仁炳那次慷慨激昂的发言不到一个月，便有人主动与陈仁炳算起了“帐”。

14日，解放日报发出《论算旧帐》的社论，严肃指出：

陈仁炳还没有公开写出他的帐单，但是他在算什么帐，算帐的目的是什么？

16日，一个叫任晦的作者又在人民日报撰文说：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只要算新帐而不提他们自己的旧帐，我倒以为颇有点赖帐的嫌疑。因为，右派分子的帐，算起来实在不十分光彩。

又过两三天，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又谈到陈仁炳的算帐问题。

“他要算新帐，算解放以后共产党的帐，要提出几个共产党员处理处理。新帐倒是可以算的，也不怕算，我看就是旧帐算不得，而且也算不清。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心肝捧出来，说几句知心话。除少数人外，我们在旧社会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好事，干了些什么勾当。

“解放后，共产党把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及一切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教书的仍旧让他教书，做官的仍旧请他做官，这种宽大政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今天反转来还要向共产党算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也希望陈仁炳交待清楚。”^①

12日晚，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举行座谈会，陈仁炳参加了会议。会上，人们对陈仁炳展开了面对面的批评。

“我在一个月前宣传会议上的发言，可能和党的方针、步骤有矛盾。因为我当时没听到柯庆施同志的讲话，当时有惩办主义思想，对整风指示没有体会。”陈仁炳解释说。

“陈仁炳，你两天前在干部会议上还说过，很担心党的这次整风，因为整风的文章是要交卷的，交不了卷怎么办？”吴南说。

苏步青教授，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也参加了会议。他说：“复旦大学的盟员，也包括我自己，普遍不同意陈仁炳的发言。陈仁炳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内很糟、很偏、很乱。陈仁炳是民盟的中央委员，民盟市委的领导同志，希望能很好检查思想根源，好好考虑一下大家的意见，不要仓促检查，因为容易变过来，也就能变过去。”^②

这次会议开得很热烈，11点时，还有很多人要发言，但主持人说日后再谈，会才散了。

2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全体教师也举行了一次会议，把陈仁炳“请”去作检查。

陈仁炳首先检讨自己。

“我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对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理智上能接受，感情上是抵触的。思想根源是对党的领导有对立情绪，分庭抗礼思想增长，想不择手段替自己制造政治资本。……”

“你的检讨是不诚实的。你还在玩弄政客手段，这是不可原谅的。”陈仁炳一检讨完周予同便接上了话，“报上揭发的比你自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② 《文汇报》1957年6月14日。

讲的多得多，你应当老老实实，沉痛地交待。”^③

田汝康插上了话，“陈仁炳曾经说过，批判他思想时他每会必到，大不了检讨了事，至少做教授逃不了。今天他的态度就是这样。老实说，我们是欺侮不了的。”

丘日庆教授跟着说：“你们在北京、上海市怎样商量的，和罗隆基，章伯钧？你们一唱一合是怎么回事？”

“陈仁炳是一个不择手段、不考虑人民利益、为了自己的名位，善于耍花招的人。陈仁炳不要把别人当作傻子，应该老老实实交代。”历史系代主任谭其骧教授也说。

最后曹沛霖揭露：“在刚解放时，陈仁炳到南京大肆活动，以后知道南京不作首都，他就放弃了。”

陈守宴指出：“你陈仁炳已经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你今天的检查等于没有做。”^④

陈仁炳哭笑不得。

○ 面貌与灵魂

29日，民盟上海市委举行常务委员紧急扩大会议。在会上通过了即日起停止陈仁炳盟内一切职务的决议；同时，建议中央，停止他的中委职务。

报纸也开始大量刊登揭发批判陈仁炳的文章。把他与章罗联盟联在一起，称他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代理人，并和罗隆基另一心腹彭文应勾结在一起，打击和排挤盟内进步的同志，逐步篡夺了上海盟的领导权，一手操纵上海盟的天下，把上海盟变成章罗

^③ 《文汇报》1957年6月14日。

^④ 《文汇报》1957年6月

联盟的反动基地。

报上还揭露陈仁炳暗中物色不满分子，东拉一个，西拉一个。只要是对党不满的人，他满脸含笑，弯腰躬请这些人入盟，甚至连反革命也拉入盟。蓝衣社特务赵望（1954年已被捕）就是陈仁炳拉入盟的，他还为这个特务在中国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安了“据点”，发展盟员。陈仁炳还盗用盟市委的名义召开司法座谈会，在会上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说镇反案件错判的占34%。

当然，这时候报纸也少不了对他的历史的揭露。

其实，不用揭露，人们已会用公式化的思维去套任何一个坏人了。凡坏人，一切都坏。陈仁炳也不例外。

所以，报纸上有人便如下叙述了陈的履历和灵魂：

“陈是牧师家庭出身，在教会大学念书，毕业以后由教会资助去美国留学，迷恋美国的“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在美国时，他就参加了以宋子文为首，有孔祥熙、吴国栋等的一个留美上层学生组织。借着这点关系，他回国后曾做过国民党伪财政部专员，新生活会职员，加入过国民党和励志社，并且曾为三青团设计过团旗。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陈仁炳兴奋异常，在一次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参加的集会上，他用英语致欢迎词，卑躬屈膝，阿谀谄媚，丑态毕露，原来他又想受到美国主子的青睐，以便过过官瘾。可是，这时解放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作势如破竹的进军，美帝国主义无法挽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命运。陈仁炳一看苗头不对，立刻伪装进步，投机“革命”，一面到进步刊物“展望”做主编，一面仍在圣约翰大学讲‘三民主义’。

“陈仁炳的私生活也是臭不可闻的。在他的寓所的密室里，经常放美国黄色音乐唱片，开家庭舞会，而且带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到他家。有一次他在一个香烟摊买烟，看上了女摊贩，于是买下她所有的香烟，把摊主诱骗到了他住的公寓里。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时，在讲台上，他的一双鼠眼尽往台下瞄，看准那个女学生长的漂亮，下课后就请她跳舞去，如

果拒绝，他就扣分。”^①

由此看来，陈仁炳的履历极不光采，灵魂也不会干净了。

○“影院点鬼火”

陈仁炳的第一大罪状是妄想“算帐”，第二罪状便是在“影院点鬼火。”

7月10日，上海京剧院演员言慧珠在人民是报上揭露了陈仁炳。

她说：陈仁炳恬不知耻地以我的“保姆”自居，并且利用我来要挟领导，说什么“你们不安排好言慧珠，言慧珠会发疯，言慧珠要跑回香港去。”我要揭发，这彻头彻尾是陈仁炳无中生有的捏造。我从来没过过香港，何言“跑回！”……很可能他企图鼓动一些人到香港去。

这次我离开上海来北京，动身的那天，陈仁炳还特地告诉我，上海京剧院现在情况真乱，要民盟来帮助，某党员领导同志对王熙春有意见，等整风的时候，这些党员要好好整一整。……现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阴谋揭发了，使这群跳梁小丑，原形毕露，也使我擦亮了眼睛。

13日，新华社记者续磊、叶世涛又揭露了上影之“火”的“真象”：

1956年11月份以来，文汇报别有用心地敲响了“电影锣鼓”之后，陈仁炳马上抓住时机，亲自召开了五次电影问题座谈会。

事前，陈仁炳同上影的右派分子周密地拟定了一份出席者的名单。许多平时对党不满、牢骚多的人被请去参加，而党团员他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2日。

们却一个不要，就连平时接近党的人也大部分不在邀请之列。

讨论会一开始，陈仁炳就装出一副体恤群众疾苦的面孔，设下“温暖”的圈套，要大家谈谈党群关系，并欺骗说座谈会是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召开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会上有人说，今天是他解放以来第一次过“民主日”，有人说上影厂存在着“裙带风”，又有人说上影领导是“太上皇”，党员是“坐探”，批评领导就是“犯上”。

这时，陈仁炳故作惊异插进来说：“我听了‘民主日’、‘裙带风’、‘犯上’这些话觉得很刺耳。我不想责怪说这些话的同志，我奇怪为什么上影厂竟然还存在这样的事情！”

.....

上影之火熊熊地烧起来之后，野心勃勃的陈仁炳更加紧了他的阴谋活动，想要烧掉上影厂，烧掉共产党。

一位著名电影导演生病住在医院里，陈仁炳特地探望他。在病床旁边，陈仁炳对他恭维备至。谈着谈着，话头转了，陈仁炳谈起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活动，叹口气说：“那时一些不成器的朋友，现在人家已是党员、厂长了，象你这样的进步人士却被关在门外。你老兄哪一点比这些人差，从前共产党的剧本谁敢演？那些人都躲起来不敢出面，只有你老兄挺身而出把责任担起来，而现在你呢？……”导演听了这番话嘴里虽然说：“这怪我自己努力不够。”心里却着了火，一夜没有睡着觉。原来对党的不满情绪、发展成怨恨感情。^①

也是7月13日，光明日报披露：陈仁炳开始承认一部分反党活动。

陈是在民盟复旦大学整风小组会上承认的。

“我是右派分子，是罗隆基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13日。

“罗隆基集团有几条纲领，第一，结合一些将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以上的人，进行盟内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同进步的靠拢党的同志对抗。第二，公开地或隐蔽地反苏，第三，仅仅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新事物、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修正主义态度。

“我在电影、京剧、地方剧、文学、出版、国画等方面都放过火。……

“1956年后，我和罗隆基没有了联系。”

陈检讨后，人们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要他继续彻底交代。

7月18日，人民日报记者又揭露了陈仁炳招兵买马的手段：

陈仁炳常说：“××某位只要那几个知名人士争取过来，局面就是我们的了。”为了抓名牌，可以不惜一切工本，千方百计地用登门拜访、请客吃饭、汽车接送等卑劣的手段，甚至答应可以不宣誓、不写自传、不参加任何会议为条件。上海名歌唱家黄爱琳，曾被他们确定为发展对象，陈仁炳先通过别人的关系，一再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请她吃饭，几次都被黄爱琳拒绝了，最后黄被逼得没法，勉强答应了他的一次邀请，他便在席间大吹他对音乐的爱好，接着又向黄爱琳炫耀沪剧方面我们有丁是娥，越剧方面有玄雅仙，京剧方面有……就是音乐界盟员太少，特别是歌唱方面更少，所以希望你们名歌唱家也能来参加……”这席话引起了黄爱琳强烈的反感，当时就拒绝参加民盟，可是陈仁炳当时没有死心，一星期后又跑到黄爱琳家里动员她入盟，当黄爱琳一口回绝后，陈仁炳还死皮赖脸地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决定，还请你考虑考虑。”^①

在揭批陈仁炳罪行的时候，上海国画界滕白也给陈仁炳的信被抖出来了，滕白也在信中说：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仁炳兄：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当它无所事，决不可向打手们屈服，如果，你发表的言论是由衷之言，那你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意见，不怕一切，拿定自己主张，坚持到底，不再做什么检讨之类。

滕白也或者算作一个“顽固的右派”，他的“劝告”，陈仁炳没有听，他也不敢听。

不久，陈仁炳再次检讨，彻底揭露自己。

在交待了很多之后，陈仁炳又检讨说：

“以我和彭、孙为核心，以韩等为骨干，以沈志远为合作者的反党集团，欠下人民的债太大了，而我居然狂妄到叫嚣什么算旧帐。我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是沉重得不得了，我反而那样叫嚣，那简直是以德报怨，是忘恩负义，是说了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话。作为一个卑鄙的右派分子，我的“爱国”是大有问题，是假的，因为站在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立场，就一定有问题。我确是有敌我立场不清的问题。1952年思想改造，我向圣约翰大学党委崔毅作了一个假交代，说我女儿于1950年由新加坡去美是她母亲送去的，说我未同意，其实是经她由新向我写信得我1950年10月12日的信同意的。过了两个多礼拜，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座谈会，居然大发其言，拥护抗美援朝，我这是何等无耻的自欺欺人的两面派作法；我欺骗了党，我后来还有脸参加赴朝慰问。此外，对恶霸黄龙华案，我曾主张把死刑改死刑缓刑。我堂兄陈少山，是中统分子，解放后被捕，我曾企图包庇他。

“我今天交待了我们小集团反党活动的意图，作法，和主要的犯罪活动过程。我们主要的企图就是要在文化教育各方面造成群众对党的强大不满，离间知识分子和党，这样来把党的领导挤走，我们可以取而代之，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罪恶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

再三心二意。”^①

陈仁炳交代不久，有人评论说：想算帐反被帐算，点鬼火反被火烧。其言不谬吧。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6日。

彭文应·“阳光下的猫头鹰”

彭文应，1957年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

○所谓“报喜不报忧”

风吹雷响，人如潮涌。从1957年8月18日开始，上海市人民纷纷涌向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会场。这里正要召开以反右派为中心批驳所谓“老牌右派分子”彭文应的辩论会。群众个个义愤填膺，斗志昂扬，辱骂声、吼叫声，不绝于耳。预示着这里将要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

为什么会有这场大辩论？为什么彭文应会被冠以“老牌右派分子”的帽子呢？事情尚得从1957年整风运动说起。

1957年4月底5月初，整风运动在党内外全面展开。中共上海市委从5月始，多次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约请党外代表参加，请他们积极诚恳地向党组织提出批评建议。

彭文应以民盟在上海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为陈仁炳）的身份与会。

彭文应就报纸宣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他认为：“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地向读者报道出来”的情况。

他说：“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

“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他批评了“报纸有一窝风现象，一下子要读者穿花衣服，一下子又强调朴素，近日来从报纸上看，中国似乎一片矛盾世界，成绩毫无”。

他强调“这种片面的宣传应该快快的改过来。”

最后他建议：“报纸处理新闻也要‘和风细雨’，同时还应该‘春风化雨’”。^①

彭文应的上述话语后来遭到了严厉的批驳。

譬如，廖世承驳斥道，“鼓文应恶毒攻击我国报纸，现在我要质问彭文应，你凭什么说我们的报纸只报道成绩，不报道缺点，只报喜，不报忧。”

“只要稍有天良的人，没有一个不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成就。所以成绩是主要的，是铁一般的事实。”

“你要报纸不报道成绩来歪曲事实吗？请问彭文应报纸上夸大了那些成绩，抹煞了那些缺点？请你具体指出来”。

“你说报纸的报道面太狭窄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也应该大量登载试问彭文应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你对

^① 《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特殊好感？”^①

○战斗的号角开始吹响

随着整风运动的转向和“反右倾运动”的来临，一批批大肆鸣放分子开始“落马”。

彭文应是其中落下马来，摔得很惨的一员。

1957年6月29日，民盟上海市委举行常委会紧急扩大会议，吴承禧、申葆文、苏步青、韩学章等人在会上揭发了彭文应进行了“有纲领有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活动”。

揭露的事实表明：“彭文应与另一右派分子陈仁炳是盟中央在上海的代理人，他们在上海盟内打击排斥进步同志，诬蔑靠近党的同志为反革命，诬蔑积极分子是流氓打手桥头堡”。

在发展组织的方针路线上，彭文应与陈仁炳“忠实地执行了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在上海搞大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甚至连反革命分子也招入盟”。^②

会议通过了从即日起停止彭文应人一切职务的决议，并责令他彻底检讨，坦白交代；同时，建议盟中央停止彭文应的中央委员职务。

“民盟上海会议”揭开了批判彭文应的序幕。接着，彭文应遭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连珠炮式的揭露和攻击。

○“美人垂死英雄败， 一片相思负老彭。”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3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7月1日。

《文汇报》首先发表了“投机家彭文应发财的秘密”的文章，揭露彭文应“挂的是‘进步民主人士’招牌，实际是政客、恶棍和市侩！敲诈勒索，抽逃资金，盗卖银行押品，泄露国家机密……”

该文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早在三、四年以前中国银行上自经理，下至办事员，只要一提起彭文应，都会不约而同的骂他一声：‘真是无赖’”。

原来彭文应曾经利用“中外联合贸易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并打着民盟中央委员兼上海市民盟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三块金字招牌，“硬向中国银行借一笔数目不小的贷款”。

起初，中国银行认为“中外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经营能力，三无押品作抵，无法给予放款。

但是，“彭文应却使出了投机商人无孔不入的‘英雄’本色，利用他‘对革命有功’的‘进步民主人士’头衔，在北京弄到了人民银行副行长胡素云和前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的介绍信，凭着一只解放前存在伪交通银行的一笔2万美金的存折，硬向中国银行押借贷款”。

“当时银行负责同志为了照顾统战关系，破例给予信用贷款，先后共达人民币22000万元（旧币），并且代他介绍国外关系，希望他有所盈利，能够自力更生”。

但“彭是一个利欲熏心，毫无人性的卑劣市侩，他不但对人民政府从未表示丝毫感激，反而到处谩骂，责骂银行没有给他相等于2万美金的贷款，说什么‘阎王好见，小鬼难当’”。

而且彭文应在企业参加联营前，还大量抽逃资金，先后三次抽逃资金达14730万元，致使企业资金被抽逃一空。

当税务局指出这种非法行为时，彭文应不但不悔改，反而

“蛮横无理地叫嚣说：‘不但没有钱，有钱我也不还！’资产阶级的狰狞面貌和猖狂行动，实在令人发指。”^①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嘴脸”的文章，揭露了彭文应在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文章指出，“罗隆基在上海的第二员大将彭文应与罗经常有函电往来；

“罗隆基总是关照彭文应要把上海这个地盘把持住”；

“彭文应到盟中央去开会时，也是先到罗处去请示机宜，然后行事”。

“彭文应和陈仁炳一样是吃美国人奶长大的，……早年为了宣扬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办过‘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宪政’等刊物”。

“在抗战前彭文应就和国民党勾勾搭搭，1937年秋，彭文应还参加过蒋介石召开的庐山会议”。

文章揭露了彭文应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文章指出“彭文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手段是恶毒的，他经常昧着良心说，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尾巴’，‘没有民主’，‘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等等”。

他主张“在报上登美联社、路透社的消息来散播资产阶级的思想”。

“他公然倡议要搞海德公园式的‘民主’，到人民广场去设立民主讲坛”。

“一贯主张要开大会搞大民主。反对国家的保密制度”。

“彭文应在整风中，反对和风细雨的作法，而主张‘大进军’，向共产党开火。”

“在对共产党进行监督的借口下专门收集某些盟员与党有抵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6日。

触的言论，而且要把全部‘言论’印出来”。^①

.....

《人民日报》则发表了“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卖足气力——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忠臣”的报道文章，报道了上海民盟组织于1957年8月9日举行各级干部大会的情况，揭发和批判了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小集团骨干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行”。

文章指出，“整风一开始，彭文应就借视察的名义和民盟上海市负责人的名义，到工厂、机关和民盟的基层组织点火”。

“在5月14日上海民盟合体干部大会上，担任大会主席的彭文应更杀气腾腾地大放毒箭说：‘今天这个大会是誓师大会，是向民主大进军’，煽动人们向党进攻”。

他还和陆诒商量，要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搞成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论坛’”。

“彭文应还支持右派分子鲁莽在市宣传会议上疯狂攻击共产党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

“不仅立刻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鲁莽，还秘密策动其他党派成员签名支持他”。

另据揭露，“彭文应和罗隆基是同乡、同学，又同过事，自从1946年加入民盟后，就成为罗隆基右派小集团分子”。

“在上海忠心执行罗隆基的路线，对抗以史良为首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

文章指出，“彭文应在9日的大会上不但不认真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反而公然丑表功，大家对彭文应这种不老实的态度极为愤怒，纷纷举出事实逐一驳倒他的谬论”。^②

《文汇报》还特地登载了署名高潮题为“群丑谱”的数首七言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6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

和五言律诗，其中一首写道：

“睡倒商场梦不成，
可怜国际少行情。
‘美’人垂死英雄败，
一片相思负老‘彭’。”①

.....

皮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底，就看出了“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

自然，惩罚之一就是：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文应的中央委员职务。

○词穷与气壮

话题回到了篇首，回到了那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上海人代会讨论会场。

从8月17日，会场场场爆满，尚有许多人拥挤在大门口和站在窗台上在聆听着，场内，辱骂声、吼叫声、拍案声、泣诉声，……声声入耳。

在市人代会预备会的第一组，和“右派分子”彭文应的一场大辩论正在展开。

大学校长陈望道首先发言，“谁都知道：另一右派分子鲁莽在市政协会上疯狂攻击党外积极分子的发言，是得到彭文应的积极支持的，……可是，请大家听听彭文应在辩论会上的辩解吧：

他说：‘我是盲目支持了鲁莽’；……

又说：‘鲁莽发言批评民主人士，我认为有积极意义；即使发言中有说得过分的地方，但总的精神是好的’；……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7日。

又说：‘积极分子告拢党是应该的，但也要有个标准；肯定其中有些人作风不好。批评了拍马屁的人，是不是就算攻出了靠拢党的积极分子？’”……

狡辩不能否定事实。

彭文应的话音见落，列席会议的复旦大学副教授蒋学模立刻摆出具体事实加以批驳。

蒋学模针对彭文应所说的积极分子的种种“标准”，“拆穿了他的底细：他只有一个‘标准’，谁拥护党谁就是‘拍马屁’”。

陈望道深入分析了所谓“拍马屁”的倾向性。

他指出：“彭文应所反对的‘拍马屁’，就是指反对对党的颂扬，看上去好象是反对‘拍马屁’的人，而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党”。

一番辩驳，使彭文应“哑口无言”。

蒋学模追问道：“你现在对支持鲁莽的错误认识如何？”

彭文应顿了一下，说：“鲁莽的发言是错误的，我支持他的行动增加了错误的影响”。

曾经陪同彭文应视察公安局的张耀，拿出他当时所做的记录本向彭文应提出问题。

张耀说：“彭文应在视察公安局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系列别有用心问题。譬如：

‘上海一年来自杀的人有多少？’

‘因生活困难的自杀的人又有多少？’

‘肃反运动中群众检举的材料中诬告的有多少？’

‘肃反运动中打人的有多少？’

‘同时，他又利用视察的机会，要求提前释放他的同学、反革命分子·铁明。’

这位公安局的同志问他：你在视察中向公安部门提这样一类

意见，难道动机还是想帮助公安局做好工作吗？”^①

……辩论会上时常出现短兵相接的场面。

有人揭发：“彭文应曾污蔑中国大学教授的国际知识不如美国的一个管家婆”。

彭文应辩解说：“我只说不如一个房东太太”。……

在座的陈望道，苏步青立即质问：“你知道几个中国的大学教授，你知道几门学科？又知道几个美国的房东太太？你凭什么这样侮辱中国的大学教授？”

彭文应有些讪讪的。他只能当场认错，表示抱歉。

当彭文应在谈到“他曾介绍反革命分子入盟的问题”时，他噤嘴了一阵，说：

“我没有介绍反革命分子入盟，……我在盟内已交代，这里不多谈了……”。

蒋学模马上追上一句：“讲讲清楚，到底介绍了没有？”

彭文应立刻支吾其词起来：“我没有介绍反革命分子入盟，但事实上里面发现有反革命分子”。

再追问下去，他就“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曾介绍了好些反革命分子入盟”。

接着，蒋学模又追问：“介绍了右派分子入盟没有？”

彭文应知道“滑”不回去，于是说：“有，罗家衡，谢仿林……”。^②

论战还在继续。通过论战“右派分子”彭文应变得越来越“理屈词穷”，代表们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

○活报：又一场精彩的大辩论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21日。

② 《文汇报》1957年8月21日。

仅仅过了10天，上海市人民又与“右派分子”彭文应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的大论战。

论战地点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大会讨论会场。

论战场面异常地激烈。

苏步青首先说：“各位代表，彭文应这次要向大会作交代，我们希望他不要再耍流氓手段，不然，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一定更进一步来揭穿他的丑恶面目！”

接着执行主席说：“现在由右派分子彭文应作交代”。

彭文应“悻悻然”走上讲台，这时，代表有的“怒目而视”，有的投以“轻蔑”的目光。

执行主席说：“主席团收到不少代表递来的条子，他们说看到彭文应的发言稿的题目是‘人代会发言’，非常反感，彭文应并不是来交代反党罪行，而是继续向党进攻，建议执行主席取消他的发言，经过执行主席反复讨论，认为代表们对彭文应的义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让他发言。”

彭文应说：“发言稿上的题目不是我原来的题目，我原来是没有题目的”。

“当执行主席把彭文应亲笔写的标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改口说，来不及在清样上修改题目”。

彭文应“眨眨三角眼，开始念他的发言稿：作为一个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我现在把我所进行的一些主要活动的经过向大会交代……刚才苏步青代表说我顽抗，拒不交代，其实我是不会顽抗的，我经过四天四夜的斗争，我要采取老实态度，我不想在脸上擦粉，也不想满脸涂黑。……1947年10月我被推为上海民盟组织的负责人……这时，罗隆基搞‘中间路线’……章伯钧想搞武装，同共产党三分天下……那时我一点也不晓得，我就是这样的糊涂天真。”

听了这些话，全场掀起了一片“轻蔑”的笑声，代表们的条子从四面八方递向主席台。

彭文应接着说：“在人代会、政协、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他社会活动方面，我总是多动些脑筋，多提出些意见和建议，……我总认为，就我来说，宁愿我一个人说错，而不应该让党让政府或人民的事业有错……。”

彭文应的话音未落，“会上一片嘘——声。”

“人们对彭文应这种脸上涂脂抹粉的故技早已洞悉”。

“代表们忍耐地听他的发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料到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在大讲一番‘动机与效果论’之后，竟不根据发言底稿而插上一段话，说他自己不是章罗联盟上海核心分子”。

彭文应“露出一副凶相”，大声说：“这一两年来，我从来没有跟沈志远、陈仁炳一起商量过问题，没有串通过一个知识分子。……”

全场代表听了彭文应这些话，顿时“群情激昂”，代表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

“你当面撒谎！”

“你狡辩。”

“要求主席停止他发言！”……

执行主席面对着彭文应说：“你现在所讲的都为你自己解释辩护，没有交代反党事实，许多代表提出要你交代反党罪行，你在这里应该交代事实，进行反扑是不容许的。”

座中有代表站起来，指着彭文应的鼻梁骨说：“你是不是右派分子，你讲！”

彭文应“语无论次”地说：“为了我个人，我愿意承认。但有些事实，我要作说明。”

座中一位代表立即愤怒地站起来，喊道：“厚颜无耻的彭文应，

你在胡说八道，你老老实地交代！”

彭文应呆在台上，活象“一只阳光下的猫头鹰”，一言不发。

当执行主席问彭文应“在章罗联盟中究竟充分什么角色”时，彭文应“矢口否认和章罗联盟的政治关系，并说了一堆和问题无关的话”。

这时，座中又一位代表跳起来说：“请大家注意，拖延时间是彭文应的反动策略。彭文应，你要说得简单明了。”

彭文应不得不回答：“最近两年来罗隆基没有给我一封信，我曾经先后写给他三封信，一封是介绍同乡，一封是托赵文壁送礼给他，一封是称赞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有创造性。此外，就没有了。”

座中又有一位代表腾地一声站起来说：“你说谎！你说跟罗隆基就是一些关系，你为什么今年还向罗隆基打工作报告？”

彭文应答曰，“……各位代表同志们，……”

座中代表马上指着他说：“你不是我们的同志！”

这时，越来越多的代表递条子给主席台，对彭文应的疯狂反扑表示极大愤恨，纷纷要求执行主席停止他的发言，台下座中议论纷纷，他们用愤怒的眼光注视着这个连每一根汗毛都渗透着反动毒汗的老右派分子。

彭文应在众目睽睽之下，露出一副尴尬面孔。

执行主席说：“根据代表们的建议，经过执行主席反复研究，决定责令彭文应下次重新交代。”

彭文应在满场嘘声中“狼狈地”下台。

当他走过代表座席时，大家投以鄙弃的目光，有的说：“老实点！”……

彭文应“赛似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会场经过一阵纷纷扬扬的议论后，平静下去了。

执行主席又开始说话了：“现在请代表继续发言。”

在8月17日的预备会跟彭文应同一个大组、曾与彭反复激辩过的复旦大学副教授蒋学模又走上台去。

蒋学模说：“我本来准备发言揭露彭文应的狡赖的手法，现在已经由鼓文应现身说法，无庸我多说了。”

“但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彭文应发言稿的题目问题。”

“刚才彭文应说他来不及修改个题目，事实是怎样呢？发言稿清样是昨天中午送到他手里的，到今天上午才拿来，这中间经过了二十有半小时，他却说来不及修改，如果不摆出这个事实来，我们可又一次上彭文应的当了！”

会场顿时活跃起来，全场热情鼓掌。

接着，杨新富愤怒地站起来，说：“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决不容许这个老狐狸在庄严的讲台上要花招，向党反扑。”

“如果下次他再不老实交代，我们一定跟他斗争到底”。

全场热烈鼓掌。

刘德中也愤怒地说：“……在大放大鸣期间彭文应在提篮桥区盟员大会上说：‘我们要大胆地鸣放。革命一定要斗争，斗争一定要流血！’试问：你革谁的命？向谁斗争？要谁流血？”

会场气氛越益紧张，代表们愤怒到了极点，纷纷起立责问：

“彭文应，你革谁的命！”

“彭文应，你向谁斗争！”

“彭文应，你要谁流血！”

代表们当场要彭文应回答，彭文应走上台去，避开正面问题，叽哩咕噜地讲了几句。

代表们一致表示不满。

这时，代表座中出来一个淳朴的青年，大踏步走上讲台，他是农民代表周金楠。

周金楠激昂慷慨地说：“我们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流了不少鲜

血，我们决不容许资本主义复辟！”

“右派分子彭文应，你一定要老实交代，否则不放你过门！”

在上述几位代表发言的时候，主席台收到的条子如同雪片般飞来，有113位代表要彭文应低头认罪，重新交代。

仍然有许多代表要求发言。

但因时间关系，执行主席最后说：“我们接受代表们的意见，向大会主席团建议下星期一的大会同彭文应展开大论战”。^①

全场热烈鼓掌。

○“迷途的羔羊”乎？ “披着羊皮的狼外婆”乎？

通过几天的辩论，代表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充分研究了彭文应的“反动”论点，故辩论水平有所提高。

前几天，彭文应表现得“极为刁滑”，“死啃琐屑事实的细节”，进行“诡辩”，这几天，经过代表们的努力已开始接触到他的“反动理论体系”的深层次。

在辩论会中，彭文应曾以二个半小时的时间，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的用意“是为了帮助党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他却谈了他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干部政策等11个问题，并搬出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彭文应以留学美国，对“政治学有专门研究”的身分，对民主问题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套谬论，说：

“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多的民主，可是我国经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1日。

验不够，人代会政协会民主都不够，’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有质询权，我们没有，可以加以吸收’。”

在座的复旦大学教授胡其安等立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是两回事，绝不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关于质询权，且不谈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所谓质询权本身就是一个骗局，事实上我国人民代表是有质询权的，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4条有明文规定”。

胡其安当场宣读了这项条文。

在座的蒋学模质问彭文应“究竟是赞成资本主义民主还是赞成社会主义民主？”

彭文应假惺惺地说，“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完全赞成社会主义民主，决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

蒋学模等接着揭露了彭文应在今年3月底说过的一些话：“民主集中制使人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受限制之感。”

“现在人民内部问题不要适用大民主而要小民主，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即民主的框框愈来愈小了。”

蒋学模质问彭文应：“你这些话那里是赞成社会主义民主，完全是污蔑社会主义民主！”

列席代表吴常铭接着举出彭文应去年在政协会上发表的一套更为“露骨”的话：“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厉害，在群众中制造出一种像可怕的沉默那样严重的气氛，于是作客思想、看脸色讲话都来了。这样下去，结果就会像匈牙利共产党放下枪杆时候那样，人们就一窝蜂的起来了。”

这时，代表们纷纷质问彭文应“为什么要这样诋毁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美化资产阶级民主？”

彭文应“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抵赖不掉，承认他是‘夸大和美

化了资产阶级民主’。”^①

在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上，彭文应“借口反映群众的意见说：‘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尾巴、眉毛、包打听、拍马屁’。”

他又说：“民主党派作客思想，自卑感很严重。但如果共产党不自高自大大自尊，以主人自居，别人就不会这样自卑。”

苏步青驳斥道，你的言下之意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自封的，是自高自大，而不是群众拥护的。”^②

彭文应顿时无言以对。

在最关键的问题——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小集团的问题上，彭文应采取“矢口否认、坚决不肯交代”的态度。

他说，“小集团在1952年以前是有的，但并没有反对共产党”。

“这个小集团的另一首要分子陈仁炳当即揭露他说：‘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

‘小集团经常集会，接受罗隆基的指示，商量如何抓领导权，抓盟讯（民盟机关刊物），反对执行正确路线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反对统战部。’

‘对盟内的进步分子，尽管其中有好些人并没有批评过他们，我们也要反对’”。

彭文应看到他的老伙伴陈仁炳也起来揭露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全场上挤眉歪嘴摆出一副“无赖相”，

大家严肃地指斥了他的这种态度。

彭文应还在会上“公然污蔑现在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职无权，无权有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5日。

② 《文汇报》1957年9月1日。

职、有职业，有业无职、有赏无罚、有罚无赏，赏罚颠倒”。^③

他还为“反动透顶的‘五罢’（即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实行罢听、罢写、罢说、罢看、罢思）辩解，说这是有事实根据的”。

他说，“罢听是因为听了大学生的一些人说，学校里的政治大报告没有什么听头”。

苏步青当即“揭穿了他的谎言”。

苏说：“我就是大学教授，我敢担保没有这回事，谁说大学里的政治报告都是教条主义没人听？几年来幸亏我们都学习了一点政治，才能看穿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④

代表们还质问彭文应：“你建议公安局释放大批反革命分子，主张年老的要放，年青力壮的要放，有病的要放，有技术的要放，高级知识分子要放。你究竟还要留下什么人不放？你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这样有感情？”

彭文应在会上被驳得“哑口无言”，“承认大家揭露的都是事实”。

种种“谬论”被驳倒以后，彭文应又在会上把自己扮成“迷途的羔羊”，代表们同声驳斥他说：

“你那里是善良的羔羊，你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

○花絮·谎言·洋相

1957年8月23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张默、陈念云的文章“谎言当场拆穿——彭文应出尽洋相”，文章说：

“惯于自吹自擂的右派分子彭文应一向自命‘专家’，到处夸

^③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5日。

^④ 《文汇报》1957年8月21日。

夸其谈，赞美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不巧，在市人代会的辩论会上就有各行各业的专家。一场辩论下来，彭文应吹起的肥皂泡一一破灭。”

下面摘录的就是那几天小组会上的只缕花絮。

彭文应在视察监察局时，曾说：“现在公共汽车上不买票的有50%以上，人民看见也不义愤，要是给资本家来管理，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彭文应“唱的这支资本主义赞美歌”，立即在代表小组会上引起了一场激辩。

复旦大学教授吴常铭首先提出问题：“50%以上不买票，根据何在？是否造谣？”

彭文应起来回答：“有，有根据。我在车上留心过这问题有30次，也数过3次，发现上车的人一半以上不买票”。

①《人民日报》1957年8月25日。

一位农民代表起立插话：“我们农民进地坐车，没有不买票的。”

在座一位电台记者显然“气愤”了，于是他也站起来参与辩论，说：

“我过去就做过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解放前，国民党的特务、军官、流氓上车，我们不敢要他们买票，怕‘吃生活’，挨揍”；

“解放后，售票员责任心加强，乘客觉悟也提高，很少发现有漏票逃票的。”

“大家都可看到：现在乘客上车，售票员总先数人，再售票……”

彭文应完全没有想到在座还有老售票员，有些“慌张”。

吴常铭又问道：“你既然骂人民不义愤，作为人民代表，你看见这种状况，为什么不当场检举？你这个人民代表义愤了没有？”

“这个……”

彭文应的三角眼紧闭了一下，显然有些狼狈，但还是硬着头皮回答：“是要检讨；但是，如果我当场检举，也怕会下不了车，可能还会吵架。”

“‘狡辩！你严正检举，谁会跟你吵架？不要污蔑群众！’有人插上一句。”

吴常铭接着说：“不要认为这是小问题。”

从这句话就暴露了彭文应的为人，他一有机会，就歌颂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彭文应“支吾”了一阵，“悻悻然”坐下。

这真是“污蔑乘车客，巧遇售票人。”^①

.....

彭文应在辩论会上，曾经“张牙舞爪地污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说什么：“没有竞争，商品规格统一了，花色品种减少了，拿钢笔来说嘛，就只有一种黑的。……”

人民代表、商业局长胡铁生捧了一个大布包来开会。

他激动地站起来说：“1953年前后，曾经统一过钢笔的规格，那是因为当时原料不足，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不得不这样；可是不久以后，原料一增多，花色品种马上就增加了。”

他边说边打开布包，五颜六色的式样新颖的近百种钢笔出现在彭文应的眼前。

胡铁生问彭文应：“你看这是一种颜色吗？你能挑出同一式样的钢笔来吗？你能说这些都是假的吗？”

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再也“无法造谣”了。

彭文应“瞪”着大眼瞧了一下，只好“嗫嚅”地承认说：“当然不是。”

胡铁生还耐心告诉彭文应：“解放前，钢笔只有八种规格，二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23日。

十多种品种，合营前增加到三十八种品种，现在已经有五十多种品种了。”

他又进一步“义正词严”地质问彭文应：

“没有资本主义的竞争，花色品种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你说说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孰好，孰坏？”

“你这样闭了眼睛污蔑社会主义，用意何在”。

彭文应无言可答，“竟需起无赖来：‘我不记得我在什么地方正式提过这意见。’”。

会场上登时响起一片斥责声：

“明明在昨天上午你还这样讲过的！”

这真是“五彩生花笔，驳倒厚脸皮！”^①

○“三种人”·尾声

彭文应在1957年8月31日下午召开的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写了一篇题为“人代会发言”的发言稿。

他在发言稿的最后一段把一个社会里的人们划分为三种，认为自己是其中“推动历史进步的第三种人”。

他写道：

“一个社会里可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不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种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第二种人是很满意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愿意拥护它、保卫它。这种人看到了成绩，但忽略了缺点，或者还没有采取来消灭缺点。第三种人是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他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着的缺点与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23日。

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足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①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1日。

孙大雨·炼狱之行

孙大雨，1957 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委员。复旦 大学教授。

○ 只有上帝才能全面

对上帝虔诚的人，上帝一定要把他打入地狱，经受炼狱的磨难。孙大叔不是基督徒。他也不虔诚于上帝。然而命运女神却捉弄了他，使他饱尝了炼狱的滋味。

一切都源于 1957 年那个时代的幼稚和糊涂。

那一天的座谈会充满了火药味，那一天他慷慨激昂，他以毛泽东的“敌我矛盾分析法”把一些人分在了敌人的队伍之中。

这里不妨看看他的发言内容。

“解放前，复旦有个公馆派，这是 CC 在复旦作为培养 CC 走狗的根据地，在章益底下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有的已离开了，有

的至今还在发生作用。

“1952年思想改造前，在2月1日到10日，开华中高教界思想学习代表会议，复旦大学大约有30个人参加。今天在座的还有不少人，李正文（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笔者注）在这个会议上勾结了公馆派分子章靳以造谣、诬蔑，搞阴谋活动。我和陈子展、张孟闻等其他一些先生把他们勾结、造谣、别有用心的阴谋揭露了。他们造陈望道校长的谣，说陈望道在重庆带领特务逮捕进步学生。我说如果有，陈望道不能做副主任委员，如果没有，要章靳以对质，一对，证明是造谣，李正文和章靳以是勾结起来的。后来，李正文来复旦领导思想改造，重点的重点就是张孟闻、陈子展、孙大雨。……李正文就是打击报复、过去对公馆派有意见的，和革命者有若干关系的人都被打了，都被带上了莫须有的帽子。”

孙大雨以上的揭发还不是他涉及的主要的东西，李正文仅是个楔子，揭发他的真正用意在于引出另外的人、另外的事。当他把李正文引出后，他立刻涉及到了陈其五：

“1955年2月，我写信给陈市长（指陈毅——笔者注），因为我在协商会议上，看到市人民委员会的名单，我有意见，就写信给陈市长，揭露潘汉年有问题，他搞一个丑恶分子集团。上海统战文教工作搞得很不好，潘等应负责。如人民委员会的某某人等，就是丑恶分子集团中的人，是潘汉年扶植起来的。陈市长在2月9日邀我在文化俱乐部谈话。当时在座的有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陈其五一见我就说：‘你反党，反政府！你跟张孟闻、王恒守、陈子展反党、反政府！’陈其五并且不止讲了一次，讲了四五次，我可以要陈市长和柯书记作证。我说：‘这问题很严重，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根据很多，现在不可以给你知道’。陈市长当时也批评我很厉害，柯书记说我钻牛角尖。陈市长最后又对我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

人对你打击报复。

“1955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我叹了一口气，我早认为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没有错，我坚持了。可是，在肃反中，把我和张孟部都当成重点的重点。陈子展没有参加肃反运动。张、王两位都是在华东统战会议上揭露潘汉年的，王恒守揭露潘汉年在解放初在国际电影院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全杀掉也没什么。……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肃反中变成了重点的重点，变成反革命。这个重点是在党委书记杨西光副校长主持下搞的。

“……8月20日，外文系党支部书记通知我检讨。……在9月中旬又重新搞我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态度问题，搞了六次。

“思想改造后，院系调整时，薪水从折实单位改为工资分。有一些人包庇过关的，做打手的，都加了薪，从几十分到一百分。其他也有加三、五分，十分、八分的，点缀一下。

“去年评薪评级中，大家记忆犹新，其中有很大的不公平。凡是集团里的人都提高一级，凡是反对这集团的人，都降低一级。故我立场站得非常明确的。第三种是他們要拉笼的，也不是他们内部的，只好不高不低。

“有人说我是错误的。这里有几种人：第一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者，被坏人包围了，欺骗了，蒙蔽了。第二种是坏人，起来反对我，我受的压力很大。我早已有决心，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中国人民。我的生命不值钱，但我只有一个生命。而我，多大的压力也不怕。

“整风要很彻底，挖到最后的根，党内党外的都要挖出来，要对人负责。新闻日报说：有人将人民内部的事情说成是人民外部的事情，漆琪生还说，对我的发言要到法院去控告。我等到这个时候还没看到他控告，希望他早些去控告。上海的事情很复杂。

“我的讲话可能是片面的。只有上帝才能全面。真正的全面很

难做到，我的发言只能代表我一个人。”^①

不错，他的发言代表了他一个人。

但同时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格特征。也许经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孙大雨教授才悟出了这其中的悲剧意义来。

很明显，潘汉年并非特务，而孙教授自己也不是所谓的反革命。

但他没有超越过那个时代，同许许多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

因此，当他走到炼狱之中时，还不明白莫伊拉女神的冷酷和无情。

○ 莫伊拉说，众怒难犯

孙大雨的在复旦大学的发言登在了《文汇报》上。他立刻受到指责。

6月12日复旦大学民盟支部立刻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对民盟的“败类”孙大雨开始反击。

中文系一个副教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大会上说：“孙大雨的发言，说杨西光副校长和其他一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这是与反动派一鼻孔出气……储安平、孙大雨、陈仁炳似乎同出一源。”^②

6月28日，外文系又举行会议。

参加会议的哲学系教授全增嘏说：“孙大雨有一个奇怪、荒唐的逻辑，就是先肯定自己是革命，凡是反对他的是反革命。孙大雨已经走到了人民外部的边缘、已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刻。”^③

① 《文汇报》1957年6月9日。

② 《文汇报》1959年6月13日。

③ 《文汇报》1957年6月28日。

报上说孙大雨“1955年12月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长达七万字的信。里面诬指六十多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凡是上了他的‘黑名单’的人，都是他认为的‘大仇人’，比如：陈其五、曹未风、李正文、杨西光、周予同、胡曲园、刘大杰、蒋学模……”^①

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职工也派代表到了孙大雨家，质问他为什么说解放日报、新闻日报里有反革命集团分子。一个老工人怒斥他说：“今天人们让你住在八层楼里，你却恩将仇报！”

与此同时，杨西光等十四人以及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对孙大雨提出控告，报纸以醒目的大字印上这样的标题：以诬蔑好人遂行反革命目的，孙大雨触犯刑律。

与此同时，不断有人在报纸上控诉孙大雨。

这些人中，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周煦良。谢循初等。

谢循初揭露说：“大约在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孙大雨曾到过我家两次来看我的爱人。他知道我在1955年肃反期间被审查过，他和我两次谈话的内容主要都是关于肃反运动的。他在第一次的谈话中，说上海肃反是由陈其五同志主持的一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在打击上海各大学中政治‘进步的’和教学‘有成绩的’教授。‘你看，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也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为什么作为重点被斗争呢？事实很明显，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我说，‘事实不是这样简单，你的逻辑也成问题’。他带讥讽的口气说：‘你在政治上太简单了，你不懂政治斗争’。……

“我过去一直认为孙大雨是狂妄，狂妄到无理取闹，血口喷人。通过这次对右派斗争的揭露和斗争，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披着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5日。

‘硬骨头’的外衣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①

■ 这时候，报纸又少不了对孙大雨的个人生活进行“披露”。

文汇报披露一则短文：孙大雨见钱眼开。说现在，如果有人到孙大雨家去，孙大雨做贼心虚，坚决不开门。但只要说“送薪水来的。”孙大雨见钱眼开，立即开门接见。有一次有复旦工作人员去到孙大雨家，在他临走时，孙大雨恬不知耻地问：“下次还能送钱来吗？”

8月3日，文汇报全文刊载了投诉状。

投诉状内容如下：

控诉人：

陈其五 男 年龄 43岁

上海市高教局局长 住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

杨西光 男 年龄 42岁

复旦大学副校长 住复旦大学

李正文 男 年龄 45岁

高教部副司长 住北京高等教育部

苏步青 男 年龄 54岁

复旦大学副校长 住复旦大学

章靳以 男 年龄 48岁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住茂名路茂名公寓

漆琪生 男 年龄 52岁

复旦大学教授 住茂名路茂名公寓

全增嘏 男 年龄 54岁

复旦大学教授 住复旦大学

曹未风 男 年龄 48岁

上海市高教局处长 住上海高等教育管理局

杨岂深 男 年龄 48岁

复旦大学副教授 住复旦大学

① 鲜《文汇报》1957年7月11日。

李振麟 男 年龄 44岁

复旦大学副教授 住复旦大学

徐燕谋 男 年龄 52岁

复旦大学教授 住复旦大学

程雨民 男 年龄 30岁

复旦大学讲师 住复旦大学

谢受康 男 年龄 27岁

复旦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住复旦大学

龙文佩 女 年龄 31岁

复旦大学助教 住复旦大学

雷兰 解放日报职工代表

鲁平 新闻日报职工代表

被控诉人

孙大雨 男 53岁

复旦大学教授 住茂名路茂名公寓705室

事由：

为控诉孙大雨，污蔑诽谤，蓄意陷害好人，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

事实

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污指公开诽谤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之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兹将事实经过陈述于后：

孙大雨在解放前，曾由彭文应介绍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解放前上海大学教授的进步组织）。1949年5月上海初解放时，大教联改选。由于孙大雨在代理大教联主席职务的期间，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落选。孙大雨不但不作自我检查，反而因未能窃取到大教联的领导地位而不满，对大教联中的某些人士怀恨在心，开始到处辱骂控诉人章靳以、曹未风、漆琪生、李正文等为所谓“公馆派”（孙大雨诬指为国民党CC特务组织，解放后留在复旦大学的残余分子的反革命集团）。

三反运动开始后，孙大雨即乘机报复，他说：要搞好三反，首先要搞掉“公馆派”。而“公馆派”的头子就是李正文（当时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孙大雨这种诬陷行为，实质上是对三反运动进行破坏。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孙大雨坚持反动立场，初则拒不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继则拒绝参加学习，最后甚至全盘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说思想改造是“改糟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孙大雨态度更加恶劣，公然诬指控诉人杨岂深（复旦大学外文系代主任）和热心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投诉人李振麟、全增嘏为“公馆派”。

1953年底投诉人李正文在有高教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为了消除陈见，息事宁人，就关于孙大雨的问题作了发言，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但孙大雨执迷不悟，坚持污蔑好人为反革命，更在1954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肆意诬蔑李正文领导“反动残余复辟。”

.....

1956年8月，陈毅市长邀请复旦大学方面有关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座谈会。当时复旦大学出席会议的有投诉人杨西光、苏步青及陈望道、潘世兹、王零、徐常太等同志。在会上陈市长等对孙大雨予以劝告和解释，说明他所指控的李正文等同志为反革命全非事实。孙大雨仍极端蛮横，坚不接受劝告，再次公然说复旦大学在解放后还有所谓“公馆派”的活动，并当众拍桌谩骂投诉人漆琪生、章靳以、全增嘏、苏步青、曹未风、陈其五、李正文、杨西光等为反革命。

1956年12月30日，本市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时，柯庆施同志在报告中，也曾提到孙大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劝导。但孙大雨并没有因此改正自己的错误言行，仍在会上作长篇荒谬的发言。他当着一千余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面前诬告投诉人曹未风、李正文、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漆琪生、杨岂深等人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中文教方面的重要分子，大肆咆哮说：“我向党和政府控告，我向全上海市全中国人民申诉！”且申明有书面材料呈送中央请求调查处理。

此外，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同志和统战部长刘述周等同志曾先后严正地向孙大雨指出其所控诉的反革命全非事家，劝其改正态度，承

认错误。

但孙大雨蓄意陷害好人，更恶毒地利用复旦大学党委整风的机会，分别于今年6月6日、7日两天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及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又变本加厉地大肆诬蔑控诉人章靳以、漆琪生、李正文、杨西光、全增嘏、杨岂深、李振麟、徐燕谋、谢受康、程雨民、龙文佩等人为反革命，并污蔑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内也有反革命集团。

7月3日复旦大学工会召开教职工大会，对右派分子王造时、孙大雨、陈仁炳和杨兆龙展开说理斗争。孙大雨拒不出席，却送来反动书面发言一份，其中又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为反革命。

7月5日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两报社的职工多人，前往孙大雨家中，严辞质问他根据什么诬指两报社中有反革命集团时，孙大雨又污蔑上海市副市长、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同志为反革命分子，并说解放日报社编辑部也有反革命分子。

.....

孙大雨是别有用心，以诬陷好人为反革命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所有孙大雨的诬告诽谤，陷害好人行为证据俱在，且屡教不改，显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犯罪，为了维护国家法律和保障控诉人等的合法权利，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

此致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证据

1、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请向上海市政协调阅。

2、孙大雨于今年6月6日、7日两天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和复旦大学党委会所召开的整风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请向复旦大学工会调阅。

3、孙大雨在复旦大学工会会员大会上书面发言的原稿，请向复旦大学工会调阅。

4、孙大雨污蔑金仲华为反革命，并污蔑解放日报社编辑部也有反革命，见1959年7月5日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

控诉人：

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苏步青、章靳以、漆琪生、全增嘏、曹未风、杨岂深、李振麟、徐燕谋、程雨民、谢受康、龙文佩、雷兰（解放日报职工代表）、鲁平（新闻日报职工代表）

代书人：

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丘日庆、李树棠、杨峰、张衍杰

1957年8月3日^①

起诉书上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后，检察院立刻立案。

同时，对孙大雨的揭露和批判也马不停蹄。于是，便有人去剥孙大雨的皮，剥皮的结果，是孙大雨1942年投靠了反动头子孙科，由孙科和梁寒操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参加翻译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反动头子朱家骅的爪牙，大特务但荫荪在上海所组织的“大教协进会”，和朱家骅发起的反动组织“国际文化协会”。

当然剥皮的结果也少不了对孙大雨的人格添上重重的一笔。

“孙大雨的好利与自私，也到了惊人的程度。他写的一本十多万字的论诗，硬要出版社按30元一千字的稿费和最低定额来出版，因为出版社不同意，最后，不得不接受以18元一千字计算，而这仍是出版社现行的最高稿费。

“反右斗争展开后，他整日装病在家，不参加会议，学校几次打电话要他到学校，每次都由他妻子拒绝了。凑巧有一次学报编辑部也同时打电话通知他结算稿费，在电话机旁的孙大雨，一听稿费两字，立即一跃而起，接过电话筒说：‘我那篇文章是三万六千七百九十多个字，要给我多少钱我也可以告诉你……’”^②

.....

剥出皮的“孙大雨”已彻底地成了一个无耻的人了，不仅是

^① 《文汇报》1957年8月7日

^②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30日《》。

政治上的反动，而且也有金钱上的贪婪。

孙大雨被迫去批斗会“交待”他的“罪行”。

在一次批斗会上，孙大雨说：“我是右派分子，我是唐·吉柯德……”

没有人买他的帐。他的交待不会令人满意，这是时代已经注定了的。

有好几十人纷纷要登台发言。

南洋烟厂的一个女工卫雪珍在演讲台上非常愤慨，她指着孙大雨厉声质问：

“我厂工人每月最低工资 56 元，最高工资是 93 元，而每月生产的产值，最少的是 5550 元，多的 8977 元。你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国家津贴房租在内）是 462 元，可买大米 3000 多斤，比我们工人的工资多好几倍，你拿了这些钱，替人民做了些什么事？”

田汝康也积极上台揭发：

“有一次我到王造时家去叫王参加复旦职工的反右派大会，那时已经夜十时，忽然王家电话响了，原来是孙大雨约王造时去他家。王在电话中说我在他家不能去。第二天王还是没去复旦开会。我早晨又去王家，当时王为了孙大雨书面发言中污蔑司法部史良同志为反革命这件事，两人却商量了 48 分钟，这不是孙和王的阴谋吗？孙在交待中推说和王没有来往，这是骗人。”^①

○ 还有一块遮羞布·马路 政客·先砍下我的头

孙大雨还没有被批成一个最最阴险、最最毒辣和无耻的坏蛋。

^① 《文汇报》1957 年 8 月 10 日。

所以还得揭发和批判。

剥下了他的皮，他的皮下还有一块遮羞布。因此还要把那块遮羞布掀掉，才能看到“真正的”孙大雨。

于是——

他装疯卖傻，血口喷人，

他装死装病，想蒙混过关——开会时他一手支着拐杖，一手由人扶着，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一个代表在批斗会上宣读了他最近期的医生诊断健康检查结果：

“孙大雨体重 178 斤，内科检查正常、X 光透视心肺正常，神经内科检查正常。结论是：可以游泳。”

于是——

他 27 年一贯反动，1947 年甘心充当魏德迈的走狗，替蒋介石鼓吹呐喊。

他冒充专家，见钱如命——有一次他的母亲向他要些火油，他竟说：“先交钱，后交货，否则不给。”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某次向孙大雨借一块钱交民盟盟费，第二天孙大雨就寄明信片给他，要他立刻把一块钱交邮局寄去。^①

于是——

顾执中交出了孙大雨写给他的“密信”一封。在信中他给顾执中写道：“兄若在沪，当可和我一同作战，建立革命大功。”

孙大雨在围攻之下，退却了。

他承认了很多，包括和他“亲密战友”之间的关系。

但，他的“亲密战友”似乎依然顽固不化。

“马路政客”张孟闻态度仍很“恶劣”，

陈子展在座谈会上仍大骂“畜牲”、“混蛋”，并大叫：“让我

① 《文汇报》1957 年 8 月 22 日。

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带到棺材里去！”

他慷慨激昂：

“他们要砍下孙大雨的头，我陈子展的头首先伸出来。”

然而，谁也拗不过时代的巨臂。

1958年6月4日，文汇报登载了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徒刑的消息：

一再捏造事实，诬告诽谤我党、政机关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为反革命分子的孙大雨，前天被判处徒刑六年。

.....

被告上述种种行为，显然已触犯国家刑律。尤其是被告在进行上述罪恶活动的过程中，党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曾多次对他教育，但被告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诬告诽谤好人的活动却更加变本加厉，情节极端恶劣。为维护国家法律，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

这个判决宣布以后，出席旁听的复旦大学师生及其他旁听群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

六年的囚徒生活。

在西方人所开的中国百名大右派的名单中，他是唯一的一个由法院审判成为囚徒的。

这也许是时代的悲剧和个人的悲剧结合而生的悲剧之子。

他没有章伯钧、罗隆基那种大右派的名声，也缺少丁玲、艾青那种大右派的“功业”，但，他却受到了十六名教授、副教授或其他身份的人联名上诉控告，这一点是章、罗、丁、艾望尘莫及的，虽然有更多的人在谎言昌盛的时代编造了章、罗、丁、艾许许多多美丽的谎言童话故事来。

悲剧的时代产生了悲剧性的人物，悲剧的人物又产生了悲剧的故事。

这，大概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 春去春又归

孙大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对莎士比亚戏剧颇有研究。1930年回国后与徐志摩交往甚密。194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是罗隆基。加入民盟的直接原因是闻一多被杀案，激起了他强烈的愤恨。

但他自己却说：“我年轻时是个相当糊涂的知识分子，虽然早在1930年回国后就对蒋政权起了憎恶，在抗战前已对它不时痛骂，在重庆的四年中深感非打倒那个统治，国家没有希望。但决心走出象牙塔，参与实际的革命工作（动笔杆、口头、煽动、跑脚）还有不少的成分是李、闻的被杀激起来的。”

1947年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二〇事件”。孙大雨等起草了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运动宣言，征集了76位大学教授签名，宣言的中文在《大公报》、《文汇报》发表，英文本在《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美国的《民族周刊》和《新共和》上发表，塔斯社向全世界作了广播。5月26日孙大雨还在复旦大学和张志让、邱汉生、顾仲、卢于道等教授，会同交大、暨南等校教授于下午会见上海市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进行交涉，营救被捕学生，迫使国民党当局于当天傍晚释放了被捕的五位同学。

1947年7月杜鲁门派魏德曼前往中国调查，以决定对华政策去向，8月15日魏到达上海。经大教联策划，决定由孙大雨起草一份《备忘录》，与魏德迈谈判，以揭露蒋政策的凶暴、诈骗、贪污，阻止美国继续援蒋。孙大雨用英文写了七千字的备忘录，对蒋介石及其家族统治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揭露。备忘录得到中共代表团的认同后会同民主人士吴若安、沈体兰、张子让、陈遼等一

同去见魏德迈。送交备忘录时，孙大雨以流利的英语向魏阐述了备忘录的内容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对魏德迈为蒋介石所作的开脱之词作了有力的辩驳，使魏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中国人民的民意有了鲜明的印象。魏德迈临离开中国时在上海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批评蒋介石六、七点，基本上是备忘录所提供的。

世事沧桑，春去春归。

当年洒脱的孙教授，如今已进耄耋之年。回首如烟往事，几多痛苦，几多感慨。

曾经，1957年有这样一首诗来描写他：

世界上什么最聪明？蠢驴

世界上什么最文雅？野猪

世界上什么最笔直？“新月”、CC

世界上什么最“革命”？孙大雨

你可知道

孙大雨“革命”二十七年就开始

从参加反动的“新月”、至勾通特务CC

并且把罗隆基的卖国计划、亲捧给

魏德迈大使 ……

历史无情，但历史还是给人以迟到的公正。辱骂代替不了历史，谎言也写不成历史。

只不过，每个人只有一次不可重复的历史。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陆诒·“文章满纸书生累”

陆诒，1957年任民盟上海《新闻日报》支部委员。《新闻日报》副总编辑。

○“全聚德秘密聚会”

195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邀请文化、科学、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等各条战线上的党外知名人士参加。陆诒作为一名民主党派的著名记者，也正式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通知，登车北上。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正式召开。这次大会向全国全世界的人民庄严宣布：在中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我国从此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实

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召开的。

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对陆诒震动很大，尤其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使陆诒由衷地为党的民主感到高兴。

毛泽东说：“现在共产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几个东西还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展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整风的办法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

毛泽东的一席话，象一阵春风吹进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陆诒也打消了原来的顾虑，磨拳擦掌，准备以自己的积极行动来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

晚上，陆诒还去拜访了他的老师——顾执中。解放前，顾执中曾长期担任《新闻报》的总编一职。在顾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还培养了一批进步的新闻记者。陆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天晚上，顾执中邀请王造时博士、陆诒二人去全聚德吃烤鸭。

那时前门那边高楼大厦还不太多，多半是些平房。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就是在一个小胡同里。好在顾执中轻车熟路，领着两人边走边谈不一会儿便到了。

这三个人都是南方人，不过却都有一个嗜好：爱吃北京的烤鸭。尤其是王造时，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在学之余，偷偷地和几位好友出来吃烤鸭。北京“全聚德”烤鸭的松、脆、香三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仍是舌液生津。

席上大家兴致都很高。尤其是酒过三巡，更是天南海北无所

不谈。

当时顾执中看到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党又很尊重民生党派和党外人士。就向王造时提议，着手恢复救国会。

顾执中为什么要恢复救国会呢？救国会又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各界群众纷纷要求，共赴国难，保家卫国。救国会当时活跃在广大群众中的一个救亡组织。王造时、顾执中都是救国会的领袖之一。

现在顾执中提出恢复“救国会”的主张，颇令王造时感到意外。王造时毕竟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对于形势他并没有太大的乐观。王造时问到：“老顾，你认为现在发展组织合适吗？”这边顾执中还没开口，那边陆诒便接过来：“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王造时看了看顾执中、陆诒二人，沉思了一下说：“虽然现在恢复救国会太紧了点，但现在全国的形势这么好，恢复救国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来，干一杯！”

顾执中见王造时、陆诒都大力支持他的建议，心里也着实高兴起来。

王造时还谈了他对罗隆基的看法：“罗生很有才气。我和他谈过几次，他对国际局势看得很透彻。他认为世界局势未必能趋向缓和，和平解放台湾也未必能实现。现在全国各地闹事的不少，看来群众对党的确意见不少，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顾执中、陆诒听了王造时这一番话，更加坚定了信心。顾执中最后提出具体的几个措施：（1）恢复后的救国会，以发展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为对象；（2）由王造时、顾执中出面找前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史良等人谈；（3）根据过去的经验，要

尽量发动群众，最好能有自己的刊物。顾的这几项建议，王造时、陆诒都欣然同意。

正事谈完，余下来便是闲扯、品尝美食。从全聚德出来时，已是繁星满天，由于顾执中第二天还要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三人便就此分手，王造时、陆诒二人驱车直回招待所。

这次陆诒、王造时的酒是喝得恰到好处。刚才在车上，两人都有些昏昏沉沉，睡意浓浓。下车以后，被夜晚干爽的凉风一吹，顿时清醒了许多。回到房间后，陆诒、王造时喝了泡好的浓茶，话比平常更多了。

陆诒问王造时：“博士，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是否发言呢？”

王造时说：“发言稿是准备好了，不过我还拿不定主意，不知该讲不该讲。”

陆诒说：“博士的发言一定会很精采，如何可以不讲呢？不讲岂不‘虚此一行’吗？”

听了陆诒热情的话语，王造时也不免心里一热。忙从公文包取出稿件来，递给陆诒。

王造时说道：“请陆兄多多指教！”

陆诒仔细地看看觉得文章的确写得好。所言人之所不敢言，有勇气；所谈问题大多是时弊，有眼光；所提建议和意见又可行，有办法。陆诒看后，真是由衷地佩服。只是稿子中有一个地方似不太妥：“唐太宗少、魏征多。”陆诒向王造时指出，建议改成“唐太宗多，魏征少”更切合实际。

王造时想了一想，觉得陆诒这一改动，的确更好。于是动笔将原稿改好。两人又说了些话，各自回房休息。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陆诒忙着传达会议精神，加之《新闻日报》诸多事务缠身，便匆匆忙忙告别顾执中、王造时等人，乘北京到上海的特快，回到了上海。

在反“右”运动中，后来有人把陆诒在北京的活动说成是右

派大串联。特别是那次在全聚德吃饭，后来被称为：“全聚德的秘密聚会”。

○鸣放“三策”

陆诒回到《新闻日报》社后，便忙着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这年5月中下旬，鸣放进入高潮。

陆诒极力主张在《新闻日报》社召开有全体编辑成员参加的“鸣放大会”。当时，《新闻日报》党组也根据上级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召开了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

陆诒知道消息后，忙和编辑部里几个志同道合的编辑一齐，起草了一份发言稿，代表民盟支部发言。

当时有人劝陆诒：“陆公，树大招风，言多招忌，何必自己抛头露面呢？你应善自珍重。”

对于这些人的好意相劝，陆诒没有听进去。他的确头脑发热。这几年他一直在走好运，去年（指1956年——笔者注）刚从采访主任提成了副总编，前不久又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和毛主席一齐照相，亲耳聆听了领袖的发言，这一切都使他空前地热情，对形势的发展没有丝毫的估计和准备。

陆诒那天晚上的确放了一炮。

后来，在“反右”中他说道：

“首次鸣放大会，我代表盟支部发言，是我在报社编辑部内放火的第一炮。”

“丑化党员，诬蔑他们住房子享受特殊待遇，极力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大家起来鸣放，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①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6日。

其实，陆诒所说的“极力挑拨党群关系”主要是指他对当时那些专打别人“小报告”的所谓积极分子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陆诒的发言，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炸开了。

有些人认为陆诒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看法，于是发言表示支持。

当时《新闻日报》有个团员叫陈诏，他就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陆诒。陈诏还反映了一个情况：当时《新闻报》一位党组负责人曾经说过，《新闻报》有民主人士当家，报纸永远办不好。

陆诒第二天就去找民盟上海市委的主任委员沈志远同志，并且向他汇报了第一次“鸣放”大会的情况。

当时，陆诒激动的狠，说了句：“党团员在这次整风中起义。”后来，这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沈志远平时和陆诒接触不多，但为了了解《新闻日报》的“鸣放”情况，沈志远还是参加了《新闻日报》的“鸣放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党员、群众、编辑、记者纷纷踊跃发言，有的人提出批评和意见，也有人当场起来反驳，提出反批评的。

沈志远看后，明确表态：大力支持，并要陆诒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沈志远的态度，无疑是一枚“定心丸”，使原本还有些惶惑的陆诒，放下心来。后来，陆诒在编辑部内共召开了10次这样的“鸣放”大会，闹得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都知道了。不过，《新闻日报》每天都按时出版。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市委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整风”。

陆诒作为上海新闻界的代表之一，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当时《文汇报》的记者吕文，年轻气盛，第一个上台发言。

陆诒第二个上台，作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发言。

他说：“许多人批评报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根

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整天板起面孔‘训人’，写文章的人和读者之间，不是处于‘平等、友好’的地位，试问谁愿意来看你的报纸，天天受训？另一方面长期训人的结果，也使读者专等报纸上的指示，经验总结，结论等等，不再独立思考，也沾染着不少教条主义，反对来整报纸。”

“举例而言，解放日报登了一篇范瑞娟的文章，谈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新婚，我看没有什么，也可以登吧。但是读者来信雪片纷来，开会讨论，联合抗议，好像天下大乱。在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独立思考，也说明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结果。”

“谈到宗派主义，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和一部分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之间，有过长期‘共患难，共生死’的历史关系。今天解放了，不管我们旧知识分子身上还有多少缺点，多少错误，需要进行改造，可是党总不应该把我们当做‘墙外之人’。可惜，这几年来，党和非党的新闻界人士之间，竟然也有墙，也有沟，也有一层木板。”

“首先也要怪我们自己不主动，不积极靠拢党。其次，党内宗派主义思想的传统，也要负责任。有这样一种思想指导，必然有一批所谓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积极分子’，他们专靠打小报告、抓思想来靠拢。于是党群之间有了墙、有了沟、有了一层木板。党对积极分子的依靠，要有一个标准。第一要看他是否真正密切联系了群众，是否正确反映了群众意见。其次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切切实实地在工作，老老实实的学习，不能光听他对你歌功颂德，即封他为积极分子。”

“解放几年来，我们新闻界培养的人才还不多，但是被宗派主义者和那些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挤掉的人才竟不少。言之痛尽。”^①

陆诒的发言，博得一片掌声。只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在中间插话：“你们《新闻报》不是在搞大民主吗？”

不知陆诒是否听清了柯庆施话里的意思，还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他说：“柯老，我们《新闻日报》照常出版。”

陆诒上午在会议上发完言，下午市委柯庆施书记即约他谈话。

陆诒见到柯庆施就问：“柯老，这是谁给您打的小报告，说我

^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们《新闻报》在搞‘大民主’？柯老，您可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哟！”

柯庆施没有立即回答陆诒的问题，而是礼貌地请陆诒坐下。

陆诒坐下后，先向陆诒了解了一下《新闻日报》的情况，然后向陆诒介绍了当时上海市的一些情况。当时上海也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有几所中学正在罢课闹事，闸北工厂闹事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柯庆施委婉地劝陆诒不要再在《新闻日报》里召开类似的“鸣放”大会。陆诒并没有太注意分析柯老的话。

晚上，由于孙大雨坚持要请陆诒介绍情况，于是散会后王造时、彭文应、陆诒几个人也一齐到孙大雨家边吃边谈发言的事。

由于陆诒下午刚见了柯庆施，大家都想知道陆诒和柯庆施的谈话内容，于是就请陆诒先讲。

陆诒把自己上午的发言和下午和柯庆施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还认为上海市委可能后一段时间要“收”了。

陆诒还分析了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几天来的情况，他说：“发言是‘一边倒’，大家只鸣缺点不谈成绩。这种情况，也出乎市委意料所及。他们竟没有估计到下面的矛盾会有这么多，这样普遍。”

“只有三个党员上台发了言，但是讲得都不精采，不能说服人，特别是袁文殊的发言，引起电影界的不满。”

“过去是大家都不敢鸣放，特别是今年初人代会上由于大家学习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两点论盛极一时。但是今天形势毕竟不同了，大家敢鸣了。而且一揭开盖子，矛盾这么多。所以我看，唯其如此，你们的发言倒要详细考虑了。”

“最好自己不讲，多鼓动旁人来讲，这是上策。如果你确是看准了问题，一定要自己来讲，这是上策。讲得平稳一点。这是中策。最忌是人家讲得激昂，有人连‘为民请命’的话都说出了，而你为了要表示自己讲得更大胆，炮放得更响，那才是最不妙的下

策。”^①

听完陆诒的这番话，几人沉思有顷，异口同声地称赞陆诒的话有水平。王造时更是赞不绝口。表示一定要听从陆诒的宝贵意见。

接着，彭文应拿出他准备第二天在会上的发言稿，彭文应念了念，大家都觉得措词太激烈了些，都劝他改一改。

王造时也拿出他的稿子念了念，文中主要认为整风必须以各级基层组织为重点。大家都认为王造时的发言有创见，能解决问题。

不知不觉开饭时间早已过了，大家才觉得腹内空空。孙大雨忙叫妻子收拾了一桌酒菜，款待他们。

孙大雨在席上也拿出他的发言稿，还是谈所谓反革命分子问题。陆诒、王造时、彭文应都觉得老纠缠于此，也不太妥当，就劝孙大雨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正事谈完，他们便开始认真地品尝这一顿丰盛的家宴。孙大雨还特意拿出茅台酒来款待，其中彭文应最为满意。这些年来，他已经很久不做进出口生意，也难得喝上一次茅台。这一餐直吃了个杯盘狼籍，喝得大家没有十分也有八分醉意，这才各自驱车回家。

陆诒手下有名记者叫陈伟斯，当时组织了上海有名的法学家杨兆龙写了篇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不公布？”稿子送到陆诒那儿以后，陆诒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大笔一挥签发了。

杨兆龙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新闻日报》上发表后，引起法学界以及各界的强烈反应。

有的群众来信赞扬杨兆龙的观点，并对报社提出表扬。有的

^① 《文汇报》1957年9月6日。

群众则认为杨兆龙的文章无疑是一株“毒草”，对报社提出了批评。

针对这种情况，陆诒和报社的其他负责人一商量，决定由《新闻日报》组织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共同辩清是非。

根据这个决定，陆诒主持召开上海司法界人士座谈会。会上王造时、杨兆龙、何济翔等法律工作者几十人都作了发言，大多数人都赞同杨兆龙的观点，呼吁社会主义早日实现法治。

座谈会的纪录在报上发表以后，读者的反应更加强烈。《新闻日报》编辑部又及时组织文章，陆续刊载，有力地推动了关于“法制”问题的争论。

看着报纸一天天红火起来，陆诒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陆诒刚刚开始的努力，又被一阵风吹跑了。

六月九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是为什么》。由此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后来反“右”派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难过社会主义的“关”

陆诒所在的《新闻日报》党组，在“鸣放”结束后召开的“总结大会”上，对陆诒的发言说了这么一句：“陆诒对人民新闻事业的看法和我们有根本分歧。”

毫无疑问，党组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就对陆诒的言行作了定论，陆诒现在与党不是隔道墙的问题，而是已经被打入“另册”。

这天晚上，陆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王造时的家。

没想到，王造时家里还有彭文应等人。他们都感到这次《人民日报》的社论大有来头，大有文章。有人主张到市委解释一下。陆诒心灰意冷地劝道：“算了吧！越描越黑，反而弄巧成拙。”这

句话使这帮人一下安静下来。

由于心情不好，陆诒在王家没呆多久，便走回去了。此刻他才体会到：文章满纸书生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劳，有的时候还会成为累赘。

1957年6月下旬，《新闻日报》反“右”派斗争展开。很多人都提到了陆诒的历史问题，认为他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要求陆诒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这些天来，陆诒神情一直恍恍惚惚。夜深人静时，便油然而生感伤之情，实在是不知这次自己能否顺利过关。尤其是批判会上，有人提及他42年脱党的事，更是触及了他久藏在心中的一块伤疤。

抗战期间，陆诒一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直接受董必武、石西民领导。1940年，陆诒在华北敌后参加了一个记者记问团，亲眼目睹了前方八路军将士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感人事迹，心灵受到了震颤。一方面，他写下了许多优秀的报道，另一方面，与党更加靠拢，回来以后，陆诒便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陆诒被派往新加坡工作。其时正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继珍珠港事变，相继攻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地方。陆诒在新加坡工作，也只好跟着难民队伍到处乱跑，爬山涉水、颠沛流离，头上敌机盘旋，地上难民队伍，没少吃苦。这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讲，的确要有很坚定的信念、很坚强的毅力才能坚持过去。

果然陆诒一路艰辛地回到重庆以后，找到了董必武、石西民同志，提出退党辞职的要求。董老长期领导陆诒，深知他才气过人的确是人才，平时表现也不错，再三挽留陆诒。陆诒年轻气盛，随口说了句：“难道要我和你们玉石俱焚吗？”说罢，负气走了。

那时陆诒的老师也在重庆。陆诒便找到了他的受业恩师顾执

中。顾当时住在上清寺他的连襟钱大钧家。顾执中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他所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为我国培养了许多进步的新闻人士。陆诒是顾执中的得意门生。

顾执中在国民党的关系不少，尤其是与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更是生死之交。于是顾执中便介绍陆诒到陈布雷那儿，陈布雷原来打算介绍顾的弟子进《中央日报》社，后来陆诒自己思想通了，加上《新华日报》同仁的关怀，最终还是没有进《中央日报》社。

这一段经历一直深藏在陆诒的记忆中，没想到如今又有人重新提起，思前想后，陆诒最后还是决定承认下来，争取过“关”。

陆诒决心自己过“关”，便把自己知道不知道的情况都说一气，牵扯到王造时、顾执中、孙大雨、彭文应、韩鸣许多人。很多情况与事实都有很大出入，受陆害最深的当数顾执中。

陆诒不顾事实胡扯一气，使顾执中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例如，陆诒这样评价他和他老师解放前的报人生涯的：“在抗战前八年，在新闻报一直追随顾执中做一个同军阀政客来往敲诈勒索的旧记者，过的也是腐化堕落的生活。”

其实，顾执中先生是当时新闻界有正义感的大记者。他很早就参加了爱国会的领导工作，国民党特务多次把他列为暗杀名单。

至于陆诒，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有爱国心的青年记者。他多次上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将士，写了许多优秀的通讯。八一三会战时，陆诒又一次接受任务，在战火纷飞的闸北出没，向报社发回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报道。回到馆里后，才知稿件全被一个卖国的总编扣下，陆诒一气之下离开了新闻报。

陆诒满心以为自己彻底“交代”后，便可以过“关”了一事实没有这么简单，8月中旬，上海市人代会正式召开。会上陆诒和上海市的其他右派如沈志远、王造时、孙大雨、彭文应、徐铸成等一齐遭到批判。

会上，陆诒以“我的罪行”为名进一步交代了他的“罪行”。

尽管陆诒后来起劲地“坦白”、“交代”，后来他还是被划为“右派”，并被解除了《新闻日报》的职务，参加劳动。

后来，在一次偶然机会里，陆诒听说由于他的“揭发”，他的恩师顾执中也遭到了批判，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责备。他和顾先生既有师生之谊更有父子之情。虽说当时情势所逼，然而这终究是自己一生中人格的一大缺憾。

.....

在以后的日子里，陆诒白天都拚命劳动。晚上梦见自己的恩师，身着长袍，在雪地里踽踽独行，自己想上前去扶他，没想到脚底一滑。待他醒来，已是泪满双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诒也得到了解放，党中央正式作出了平反的决定，陆诒又一次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感受到了春风化雨的温暖、祥和。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陆诒已然明白文章满纸书生累的道理，然而他却并不后悔，他的心和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采访前方将士时一样，火热地跳动着……

宋云彬·“镜前妖形现”

宋云彬，1957年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主席。

○ 祸从口出

中国的文人大都爱管闲事，指三道四。颇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气魄。

这恰是祸从口出的根源。

1957年，无论是北京，无论是浙江，都潜存着文人们“仗义直言”的背景。

宋云彬也许算得上中国的文人，因此他也祸从口出了。

先是，浙江省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某地农业领导不准农民搞副业，强迫农民把鸭子杀掉或卖掉。

第二件，浙江省某县把其境内龙泉塔拆掉，烧毁塔中文物；是

为龙泉拆塔事件；

第三件，杭州西湖徐锡麟烈士墓给农业展览馆盖了房子，西湖上陶成章烈士、冯小青、苏曼殊以及武松等等的墓统统给挖掉了，后来经许多人（包括宋云彬）提出抗议，甚至进京告状，把官司打到北京，才又组织人马，在二十几小时内把那些坟墓统统恢复了原状。

宋云彬身为浙江省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对这样的事岂能熟视无睹？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些人破坏文物的错误。

当章伯钧被中共中央猛烈批判之时，宋云彬颇有点“不识时务”，在公众场合公开宣称：

“章伯钧是一言之失，不可以同储安平相提并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就卢郁文因指责右派收到恐吓信一事特发表社论，对右派之流进行猛烈反击。宋云彬又公然指出：这是人民日报中了计，社论发表后作用很坏，使人看后不敢再“鸣”、“放”下去了。

宋云彬毫无顾忌的指责，使他成了出头鸟，网中鱼。

但他似乎不知道，枪口已悄悄对准了他；巨网已经围住了他。

“显微镜”下的宋云彬

宋云彬是浙江海宁县人，生于1897年。

宋少年时曾受业于乡前辈朱起凤先生。朱起凤博览古籍，曾以30年精力著《读书通》。宋受他影响较大。

青年时，宋爱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受到进步思想影响。

1924年，宋南下广州，投入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任

《黄埔日报》编辑。1926年在武汉任《民国日报》编辑，兼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宋到了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为该馆“国学小丛书”编写《明文学史》。1932年开始，长期任开明书店编辑，编校出版了朱起凤的《读书通》（更名为《辞通》）。此后又编著了多种历史书籍。

1938年，宋赴武汉，参加以郭沫若为首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不久，辗转入桂林，任文化供应社出版部主任，并在广西桂林师院任教；又与夏衍等编《野草》文艺杂志，发表杂文多篇，后编为《被戒草》等两专集。1946年开始编著《中国近百年史》，1948年由香港新知书店出版。

解放后，宋被选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主席等职。

这是1957年以前的宋云彬之简历了。当然，这简历是寒风之后有人为他写的，当此简历写出之时，宋云彬早已成为九泉之下孤魂，他是看不到了。

但是，他看到过比比简历详细得多的他的“简历”，那是在“显微镜”下对他的“逼真”的描绘。

描绘人之一：民盟盟员杭州12中教师樊炳飏。

“我1951年参加民盟的，1953工担任中学教师。有一次，我身体不好，从医院出来到他（指宋云彬）那里去，他说：‘你脸色很难看。’我说：‘现在工作比较紧张。’他接着说：‘现在他们（指共产党）真是把人当作机器看！’他还问我：‘你们学校里有没有党员校长？’我说：‘有的。’他说：‘为什么不照顾你？’我说：‘现在学校教师都很忙，照顾也确有困难。’后来他就说：‘郭人权是民盟市委副主委，为什么不照顾你？这人真不行，不能做领导干部。’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好人，现在看起来是别有用心的？”

“宋云彬6月3日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以我的爱人

生病的事情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

“去年8月，我爱人因患中毒性甲状腺症住院。其间，因为我自己过去又曾经对行政有不满情绪，在宋云彬影响下，我的不满情绪更加发展了。我把我爱人生病说成是遭别人打击受刺激而引起的（实际上我爱人的病已有七年之久，当时由于没有发现，好好治疗而严重起来）。我去找宋云彬，我说我爱人病是由委屈而起。宋没详问，就抓住这件事，如获至宝，他叫我写一封控诉书给他，由他转交教育局。

“我写好控诉稿时，我爱人已病愈出院。当我把控诉信交给他时，他看了一遍，他要我把认为不妥当的词句加以修改抄清。这样，我就……抄了一遍送交他……”^①

描绘人之二：民盟盟员胡琦。

“宋云彬和我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秦始皇焚书政策。

“龙泉拆塔事件后，宋说：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

“他还对我讲过：肃反中出了许多乱子，到处逼死人命，在温州我的一个朋友被逼自杀了！”

描绘人之三：民盟盟民张曼红、钟文模。

张曼红：“宋云彬说过：省文联是鸣放得最早的，江华同志不得不下来。”

钟文模：“几年来，宋云彬对敌人，对帝国主义没表示痛恨，而对党的缺点，却拼命咬牙切齿，夸大事实，到处发泄，他不象个文人，而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客！”^②

1957年7月1日，民盟浙江省杭州市召开盟员大会。

这时候，形势已非常明显，许多人在惴惴不安中生怕大火烧

① 《浙江日报》1957年6月25日。

② 《浙江日报》1957年6月27日。

到自己头上，于是，未雨绸缪，自己先跳到水池中，浸湿自己的衣服、头发，甚至希望自己立刻变成一滩水才好。

因此，浙江民盟的这次大会，既是批斗宋云彬的大会，又是许多盟员慷慨激昂，要与宋云彬划清界限的大会。

浙江民盟主委姜震中、浙江大学教授方巽山、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孙恒、民盟浙江省副秘书长章渭煊、民盟杭州市副主委王若水，民盟浙江省副秘书长曹湘渠等，先后登上批判台，慷慨激昂，表示要与反动的右派宋云彬一刀两断，划清界限。^①

王若水早在6月中旬民盟召开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揭发，宋云彬对党有敌对情绪。这次表示要与宋划清界限也就理所当然。

可是滑稽的是，此后不久，姜震中，王若水等统统被扭出来，和宋云彬排成一队，并且，姜震中和宋云彬“关系十分密切”，王若水热心于为宋、姜“招兵买马”，成为宋、姜手下第一员新人。^②

这实在象一场闹剧。

宋云彬受到批判时，曾得到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的保护。沙、杨不象许多官员那样单纯做一个机器人，他们认为，宋云彬并不象报纸所言五毒俱全。因此，浙江省的反右比其他地方要显得冷清。

也主要因此，沙、杨二人不久便丢了乌纱帽，而换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6月中旬，宋云彬曾检讨为章伯钧辩解的错误。

他在检讨中说：

“本月10日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主要负责人

① 《浙江日报》1957年7月1日《江日报》。

② 《浙江日报》1957年7月27日。

座谈的时候，我居然为章伯钧辩解，说王昆仑同志在民革座谈会上对章伯钧的批评是深文周内，说浙江日报把章伯钧与储安平放在一起是很不妥当的。这充分证明了我政治水平很低。我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能够看出章伯钧的言论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一贯地自负，以为解放八年来自己多少有点进步，现在看来，非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

“这几天以来，连续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各方面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等等的辞严义正的驳斥，我才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我完全拥护立刻进行盟内整风的决议。这几年来，我们盟内的思想工作太不行了，必须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加强思想工作，先从整风入手。听说沈志远从北京回上海，传达章伯钧的话，说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章伯钧好大的野心！因此，我认为，在整风期间和整风后的一段时间内，必须暂时停止发展盟员组织。”^①

然而，没有人对他的检讨表示满意。

7月4日，浙江日报登出一篇文章：宋云彬是怎样的一个人？文章剖析了他的“罪恶”。

7月6日，浙江日报登载文章，揭露李士豪勾结宋云彬向党进攻。

同日，民盟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召开会议，再次批判宋云彬。

沈练之在会上对宋的学术表示极大的蔑视，

“宋云彬是冒牌学者，假历史学家，大家知道，研究历史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

被人揭发为宋云彬的得力助手张运铨，也戴罪立功：

“有一天，李士豪打电话叫我去写封信给章伯钧，大意是：民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9日。

盟浙江省支部是须成立的，党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以宋云彬比较妥当。第二天我把这封信交给宋，宋似乎先已知道，一看就把它放进皮包里。由此可见，宋云彬通过李士豪的关系，已投靠到章伯钧门下了。

“宋云彬还诬蔑苏联，说苏联的教条主义比中国的严重。”^①

7月10日，文汇报记者张煦棠生怕大火烧身，抖出了他和宋云彬工作联系上的事。

张煦棠声称：

“5月底，宋写信给徐铸成，徐派我到了杭州。6月6日晚，在宋云彬家，我见到了他。宋云彬对我说：龙泉拆塔事件，很恶劣，处理太轻，应该法办。我写了龙泉拆塔事件通讯，宋看后不满意。”

民盟省委工作人员柳城也讲了一件事：

“有一次，宋听说浙江婺州剧团老艺人江和义生活困难，就对我说：你会写文章，可以写一个稿子，我帮你转到文汇报去刊出。”^②

7月16日，浙江日报又揭露宋云彬怂恿章太炎之女、民盟杭州女中支部副主委章展，以其父章太炎迁墓一事对党污蔑。

陈训慈也在同日报纸揭露：“宋云彬口头上说培养青年作家，可他写‘西湖三墓’文章中墓的部分，完全抄袭了一个青年作者请他提意见的稿件。”

至于陈训慈如何了解宋抄袭了青年作者的作品，他没有详细说明。大概以后也无人再去详察这其中的奥秘的。

同时，还有人在浙江日报上揭露宋云彬跑到浙江越剧二团放火，浙江越剧二团的女演员姚水娟是宋的“密友”。当“浙江越剧二团一群艺术工作者”准备批斗姚水娟时，宋云彬阻止了他们的

① 《浙江日报》1957年7月7日。

② 《浙江日报》1957年7月10日。

行动计划。

7月24日，师慎又揭露宋云彬对人民残酷、对反革命仁慈之极。

师慎说，1955年肃反之时，宋云彬不断鼓吹大赦，以讨好反革命分子。去年11月下旬，全国人代会讨论的“关于宽大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决定”发表后，宋云彬从衣袋里掏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名单，要为他们平反。^①

8月3日，民盟浙江省委、杭州市委组织民盟整风大会。浙江大学曹萱龄颇有学富五车的教授气魄，他的发言题目充满了投枪的锐利：

宋云彬为什么轻视和仇视工农群众呢？

他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宋充满了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②

次日，民盟整风大会继续进行。

宋云彬在会上除了承认自己有错误之外还作了辩解：

“我没有参加任何小集团，跟章、罗联盟没有一丝半缕的牵连，跟罗隆基在浙江的据点姜震中没有联盟关系……”

“至于基层方面如高等学校，这两年根本没什么接触，中等学校的工作从不过问。

“自己对民盟工作一点不了解，根本没什么反动计划纲领。

“社会主义是我所向往的，党是我所一向靠拢的，我绝无反党领导企图。

“我之所以蜕化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立场不稳，没有政治观点，对新生事物有抵触情绪，党提出大鸣大放后，右派分子混水摸鱼，企图搅乱天下……我不自觉

① 《浙江日报》1957年7月24日。

② 《浙江日报》1957年8月4日。

地堕入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了。”

这是一个需要谎言装扮历史的时代，宋的辩解也好，检讨也好，统统没用。

更何况，宋一方面否认自己参加任何小集团，与章、罗无丝毫联系，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了自己是右派，他也间接供认了姜震中是罗隆基在浙江的据点。宋自己未必相信真有个章、罗联盟，也未必相信姜震中真是所谓的罗隆基的据点。

他的发言一完，便遭到曹萱龄的猛烈批驳：

“为什么一贯把党的小缺点夸大成大缺点，把个别错误夸大成全部错误呢？”

“从一般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同志，宋是仇恨的。如他骂工农出身的党员是大老粗，说高等学校中的党员校长都不配做校长，说江华书记不懂文艺，说上海的党委领导同志不行，甚至还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难道只是对个别党员的不满吗？”^①

○“照妖镜”前

通过“显微镜”分析之后，宋云彬又被拉到了“照妖镜”前。

“照”的结果，剥掉了宋的伪装。“狼披着羊皮终究还是狼”。

“照”的结果，宋的“家底”也全照出来了。

——他出生在一个剥削富商家庭。在他的家乡硖石镇，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称他为“云彬少爷”、“宋大少爷”。

当“宋大少爷”长大的时候，海宁县恶霸地主当权派查人伟、吴小鲁非常赏识他，查、吴当时为浙江省议员。

1921年，宋当了海宁县议会议员。

① 《浙江日报》1957年8月5日。

1924年，宋钻进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时，他逃跑了，叛变了革命。

建国以后，他常常为反革命分子呼冤。

他曾想把他的密友、反动大地主、硖石镇伪镇长马君松介绍到革大学习，后来没有办到，马君松被人民政府管制起来。宋很后悔，说：“以前想把马君松介绍到革大学习，想不到现在被管制了。”

又有一个蒋仙客，是国民党副师长，肃反中自杀了。宋云彬便说是被逼自杀的。

就是这个大坏蛋，在江苏盐城一次就枪杀群众达数十人。

宋的内侄周德群，是海宁县敌伪统治时期密探组长，被逮捕法办，强制劳动改造，宋非常不满。对海宁县公安局干部褚森华说：“回去告诉你们局长，把他放出来就医（当时周德群装病），不要叫周德群劳动了。”

1955年6月，宋到处放火，到处找共产党的缺点，他去乡下调查时，一再质问村长：“粮食交完后够不够吃？怎么定的产？是否群众卖了口粮？”

在石乡路，宋找到了一个69多岁的老太太卢春风，问：“老太太，你粮食够不够吃？”

“每天吃粥（当时春花已收，新米还未登场）。”老太太回答。

“为啥要吃粥？”

“现在春花刚上来，有豆、麦吃，有春花，也不是缺粮户。现在是在过渡时期，苦点也没啥关系。”^①

这时，又有人揭发，早在1927年，宋云彬就写文章诋毁鲁迅。可见反动性由来已久。^②

① 见1957年8月10日浙江日报。

② 见1957年9月25日浙江日报。

○“依葫芦画瓢”

在猛烈的打击下，右派分子纷纷落马，低头认罪。

大势已去，宋云彬也只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尽管有人指责他，两个月以来，在整风小组会议上作了六次交待，态度都极不老实。

宋云彬的检讨很有意思：

“我平时在公开场合或背后，绝口不谈成绩，所注意的只是一些次要的、局部的缺点和错误，并加以夸大，到处宣传。

“例如我把浙江几年来培养青年作家无成绩推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身上。我灵魂里专想指责缺点。

“我污蔑干部，说江华同志不懂文艺。

“我不懂马列，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拒思想改造。今年5月浙江史学会成立，讨论会章时，借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草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一句删去。

“我总想找机会向党进攻，到基层点火。龙泉拆塔事件后，我写信给徐铸成，让他派人来调查，以此向党进攻。

“我对肃反一直不满，一贯包庇反革命。

“我和姜震中原来矛盾很深，但听说章伯钧的两院制以后，便化仇恨为友谊，观点变化了，我们之间也就团结了。”

宋的检讨，完全是报纸上揭露的“罪行”，所不同的是，报纸上的“罪行”很零乱，而宋却把这些“罪行”连在一起了。

宋依葫芦画瓢。

众人听后，认为宋态度比原来好多了。

宋没有在检讨中牵出其他人，更没有想为了摆脱或减轻自己的罪恶，去揭发其他的“隐藏更深的”大右派：

宋在这一点上和其他许多人不同。

据说，宋云彬的笔下和口中，吐出了许多谩骂工农干部的恶毒字眼，说什么工农干部没文化，是大老粗，不能干大事。

因此工人、农民听说后便怒火冲天，找宋云彬理论理论。他们在省人大上踊跃发言。

省农民人大代表许万兴气愤地说：“我们农业社里有八百多户人家，在解放前，只有二十多人读书，如今读书的有一百多人，我自己在旧社会没有进过学校门，现在正上夜校。”

工作代表冯惠在发言中理直气壮：“右派分子宋云彬诬蔑我们工农干部不能办大事，右派分子！你看看我们厂里的事实吧。我们厂里的纺织车间，除车间主任一人是知识分子外，其余党支部书记、车间副主任和六个领班班长都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这些工人出身的干部不仅没有把车间的工作搞糟，并且纺织车间还被评为先进车间。”

嘉兴民丰造纸厂陈志蔚代表不胜气愤地质问宋云彬：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写字的稿纸，是我们造纸厂职工做出来的；你们吃的香烟，是我们造纸厂出的烟卷纸包的；你们口袋的钞票，也是我们造纸厂职工克服了许多困难才造成的纸张印出来的。而你们自己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只会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写反党反人民的文章。你们还无耻地污蔑工农干部不能干大事。”^①

陈志蔚的质问是富有推导意义的：

第一步，右派们既不会种田，又不会做工，所以也就什么不会干。

第二步，由上可得出一个结论：右派分子是靠工农养着的。

第三步，右派分子会干什么呢？他们只会干反党反人民的勾

^① 《浙江日报》1958年1月6日。

当，写反党反人民的文章，还会无耻地污蔑工农干部不能办大事。
一个可悲的逻辑。

○ 故纸堆中了余生

1958年，宋云彬进了中华书局，他的任务是编辑整理古籍。这或许是一种“恩赐”，因为这种结局毕竟比许多右派的要好。

他负责编辑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史记》、《后汉书》。此后又以白话译注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成《项羽》、《刘邦》两书，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右派帽子在头的宋云彬从此闭口不谈政治，也绝少与人交游。他默默地生活着，孤寂地生活着。

1979年，宋云彬寂然长逝。

●王毅斋·“恩将仇报的中山狼”

王毅斋，1957年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民主党派是花瓶、招牌、牌位。”

同上了年岁的河南人聊 57 年那场反右运动，十之八九，他们会向你提起这样两个在当年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一文一武，习武的叫张轸，那为文的，姓王，名毅斋。

王毅斋是河南杞县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解放前是河南大学的教授。1957年“整风”开始时，他官居河南省府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

中央国家机关开始整风运动五日后，中共河南省委才作出在全省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5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省直机关会议上作了整风动员报告。此时的整风只是学习一些文件。闲得无事，在参加完省政协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后，王毅斋便和其他几位副省长一道去农村劳动。《河南日报》的报道十分感人：“鬓发苍白的王毅斋副省长，领着另一帮人在常寨农业社修路。社干为了照顾王副省长的身体，请他到菜地改畦浇菜……后来王副省长见人就说：‘今天又学了浇地本领！’”^①

省政协会议闭幕次日，省委书记潘复生再一次向省直机关作了整风动员。在北京的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已大胆批评“以党代政”、党员的特权思想，要求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在省文化局、省工商联的大会上，人们提出的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16日，省委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座谈整风，王毅斋应邀出席。统战部长刘鸿文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要他们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鸣”、充分地“放”。他的话音刚落，郑州师专的景振国就站起来“鸣放”。他指责，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党群关系让党员弄得很不正常。他的同事董觉民对此表示有同感，董接着说道：“我是民盟盟员，民主党派在学校里只是‘花瓶’，民盟基层组织根本不起作用。民盟联系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处处看着党的眼色行事，那还要它作什么？”听到这里，王毅斋感到浑身上下有一股热流冲击着每一个毛孔，这冲动使他有些按捺不住了，他几次想举手发言，都让别人抢走了机会。会议结束时，他仍一言未发。“我不能再沉默了，明天我一定要第一个发言。”在回家的路上，他不停地这样宽慰自己。^②

① 《河南日报》1957年5月9日。

② 《河南日报》1957年7月17日。

第二天的座谈会是在上午召开，王毅斋一夜未睡好，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天一亮，他便起身下床，他坐到写字台前，想拟出一个发言提纲，写了半天，也没写出一句话来，满纸都是“花瓶”、“招牌”、“牌位”这几个词……

他走进会场时，人已来了大半。他发现几乎在座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发言稿或写着发言提纲的卡片。他感到有此紧张。

刘鸿文刚宣布完“开始发言”，七、八只手几乎同时举了起来。“倒霉！”王毅斋颇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把那只举起的手收了回来，还是刘鸿文眼快，他微笑着对王毅斋说：“王老，请你先发言吧。”王毅斋却紧张起来，他觉得有一股热流霎时间从双肩向全身迅速扩散，刚放下来的右的不停地颤抖，他眼盯着桌面，开始了发言。

“我先谈一下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感情不融洽，甚至破裂，就会造成一条鸿沟，影响团结。在我省许多地方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离心离德的情况，一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一是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王毅斋略微停顿了一下。他没想到自己竟有这么简洁的开场白。浑身上下的燥热不知什么时候已消退得无踪无影。他略微向靠背挪了一下身子，侧目看了刘鸿文一眼，刘鸿文依旧微笑着。

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党内宗派主义的表现，是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不信任你的阶级觉悟，不信任你的立场，不信任你的进步，这就是党外人士感到被轻视，感到不亲切。党外人士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党，而党员干部却很冷。像俗话说的那样，是‘漫地烤火一面热’，高攀不上。这是什么东西呢？只能说是宗派主义情绪。党内还有股歪风是：偏听偏信，‘护短护堆’。我在‘河大’几年，喝苦水可不少。有的党员干部很能干，但骄傲自大。他向一千多听众作大报告，听众递上四百多条子意见。但主持会

议的党员干部不是把大家的意见转告给报告人注意改进，却反而向听众大骂一通，而我自己呢，在许多场合常常不知道如何是好。要一讲话，有人来了：‘王老，你咋讲这呀！’要不讲，有人又说：‘王老，你咋不讲呢？’讲不是，不讲也不是，左右为难。”

他停了下来，浑身上下又是一阵燥热，他端起茶杯微微呷了一口茶，他看见对面有不少人正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自己。昨天的那位董觉民对自己竖起了大拇指……他又开始了发言：“我觉得昨天董觉民同志的意见提得十分中肯。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是党内干部宗派主义情绪加骄傲居功的结果。有职无权使你等于是个‘花瓶’、‘招牌’、‘牌位’；这是党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省文化局有一个非党员科长杨子固。科长，在我们这样的机关里也算是个‘柱子’。可是，他这个柱子上不能连顶，下不贴地。文件没他的，开会没他的，工作没他的，他曾经苦恼地向张柏园部长说：‘我今年五十岁了，就这样我死去也不甘心啊！’听着这话，使人寒心。我认为，有职就应该有权有责。有职有权就应该尽职尽责。不能尽职尽责，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本事，一是人为的。”王毅斋的音调越来越高，语速也越来越快。

“我们必须分清是非，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有职无权这对于党外人士是讽刺，是污辱！我自己也怀疑党对我的诚意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是在怒吼。会场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王毅斋觉得口干舌燥，猛喝了几口水。他的话还没有完。

“我认为，要解决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有职有权问题。我们用人是唯‘才’，唯‘贤’，唯‘德’，而不能唯‘资’唯‘私’。要有制度保证，不要以党代政。我坚信，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这没人怀疑。问题在于一部分党员能不能开诚布公地对待民主人士，能不能去掉‘优越感’、‘功臣自居’、‘防人’、‘训人’和‘整人’的思想。党员应该深入群众中去，先作学生，再作先生。现在有些党员‘党气’很重，咄咄逼

人，没有人情味。有的甚至‘师友不认’，‘六亲不认’。我建议：党的领导同志要经常采用各种方式与党外人士交谈，接触，增加感情，团结起来，办好事情。”

声调依然是那么高亢，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王毅斋微笑着环视了会场一周，刘鸿文仍在微笑，董觉民他们竟然站了起来鼓掌，王毅斋笑着向他们挥了挥手，他又重新端起茶杯，慢慢地呷着茶，他觉得这杯信阳毛尖特别清香，浑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仿佛每个毛孔都在极度地舒张……^①

紧接王毅斋发言的是民革河南省委的李静之。

18日，座谈会继续举行。科技界的人士批评“共产党包办代替，不支持科学研究。”在21日的会上，民革河南省副主任委员刘积学进一步抨击了宗派主义。王毅斋是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在这几次会上，也有人对他17日的讲话表示异议，这方面的电话他也接到不止一个。他觉得自己的一些话被人误解了，需要作一些说明。

5月23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省委决定广泛邀请党外人士座谈整风。23日下午，省统战部举行了最后一次座谈会。王毅斋再次要求发言。

他补充了两点意见：

第一，“党对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对于政协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肃反的主要成绩之外，还要承认肃反中发生的偏差不少，遗留的问题几乎到处都有，应结合整风加以适当处理。

第二，“我在此要解释两个问题。我上次发言曾提及一个青年干部作报告的事，有人说我弄错了事实。实际上，事实没错，是我把它的本质弄错了。这不能归罪于那位党员同志，那届学生是解放不久从苏州才回来的，内有不纯分子，经这次大说一顿，才

^① 《河南日报》1957年5月18日。

压下嚣张之气，把这说成官僚主义是不合适的。”

“我在17日发言中说：‘问题在于一部分党员能不能开诚布公地对待民主人士……有些党员党气很重……有些甚至师友不认……’在这句话，我说的是‘有些’、‘有的甚至’——这就是比有些更少一些，并且举出我侄子为例。这就是说，我指的是某些个别党员，谁也不会指所有党员，更不会指‘党’。但是，有人竟误会是指‘党’……由于我自己的水平关系，在发言中往往出错，如‘递条子骂人一则’就是错的一例。我想也一定还有谈出的意见与党的看法不一致的。所以我只能说供党参考，或希望党注意……”

他把目光转向在座的《河南日报》的记者，说：“我还要向你们报纸进一言，‘争鸣’，要作健康的‘争鸣’，‘争鸣’，要作正确的‘争鸣’。”^①

5月27日，河南省委邀请了二十八位党外人士进行座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他肯定了前一阶段大鸣大放的成绩。^②

王毅斋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他一言未发。此时，河南全省已掀起了鸣放高潮。在第八次座谈会上，王毅斋再次“鸣放”。

今天，王毅斋要替知识分子“鸣放”。

“我想反映一下一个高等学校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思想情况。”

高级知识分子对热爱祖国，热爱民主的思想，几乎是共同的。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富强的民主的祖国，而这几年国家的发展，正好逐步实现这一愿望。特别是与旧社会对比，光明与黑暗截然不同，这些现实，都不能不给高级知识分子以深刻的教育，因此说他们思想没有进步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知识分子告诉我，党对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缺点

① 《河南日报》1957年5月24日。

② 《河南日报》1957年5月28日。

……对于肃反运动，有不少知识分子，批评了运动中的偏差以及不作善后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顾虑重重，有人说：‘现在提意见当然不会遭到报复，但是，大权在他们老干部手中，将来随时都可以打击你。’”

“有不少知识分子，对于高等学校使用干部的宗派主义情绪表示不满……少数非党员作了干部，有职无权。有人说：‘党在高等学校中其实可以放放手，让教授来搞搞，反正知识分子造不了反。国民党时期大学校长和其他主要领导人倒都是教授兼的。’有人脱口说：‘清清时候，文官还是给汉人做的，只是武官才不准汉人做。’当然，这种比法是不正确的……”。

“至于有职无权、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是两个老问题，是两个普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早已引起党的注意，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解决。我建议党今后不要单纯对待一些党外人士所谓政治照顾，要用人唯贤，党政划清，不要以党代政，重新考虑建立新制度。”

“我在此要对省统战部提出批评建议：

（一）省统战部接触的人太少，面太窄，统上不统下……（二）要进一步加强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我看到、也听到不少人反映，‘不怕党，只怕某些党团员’，‘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有时自己好比‘孤儿’，‘没娘孩’。也有不少人怕打击，怕报复，所以就‘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不是没苦恼，而是泪向肚内流，不是没意见，而是敢怒不敢言，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主人翁感，发挥积极性、团结进步可言！”^①

……

6月9日，《河南日报》在第一版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河南，能及时明察这一社论的“伟大意义”的人确时不多。王毅斋还在民盟河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鼓励盟员大胆鸣放。

12日，风向大变。《河南日报》在第一版上，用大号黑体字刊登了这样两则报道：《郑州市工人举行座谈会，怒斥反社会主义的

^① 《河南日报》1957年6月5日。

谬论》、《谁要夺我们政权就坚决同谁斗争》。

河南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有职无权”、“六亲不认”

刘积学是第一个“落网”的大右派。他的“贫占富光，富占天光。”论被确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劳动人民的诬蔑。

也是在6月12日，王毅斋第一次受到了公开批判。民盟河南省委干事曹宜轩在省民盟座谈会上提出：“王毅斋发言中‘有职无权，对党外人士是讽刺，是污辱！我自己也怀疑党对我的诚意究竟如何’的说法，是不应该的……”

在13、14日的民盟河南省委座谈会上，河南医学院院长助理戴汤文、开封师院院长助理钱天起，不点名地批判了王毅斋对肃反问题的观点。

15日，王毅斋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要回击别人对他的指责。

他觉得别人的批评不是全面的看问题，只是抓住了假象。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对肃反的看法。就学校党委制问题，他说：“我主张党委制不离开学校，不撤消。有人主张撤消党委制，也不一定在思想上意味着就是反党（当然别有用心的人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民盟河南省委干部贺杰批评王毅斋：“发言的指导思想有问题。王毅斋的立场是动摇的，他在背后说的和在会上讲的不一样，他对章乃器、葛佩琦的反动观点是赞同的，并积极为刘积学辩护……”

开封市业余二中的教导主任文宛九表示：“王毅斋的发言，表

现思想非常混乱，对别人的批评，不是很好的接受，而是不满意，进行辩驳，王毅斋这样的对待批评，我是不同意的”^①

当然，这些批评还是相当温和的。6月中下旬，《河南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刘积学、李静之、罗绳武的文章。刘积学被驳得体无完肤，其在民革组织内担任的职务也被撤销。

6月26日，王毅斋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大会之后便是分组讨论会，1957年的人代会小组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并不是《政府工作报告》或其他什么法律文件，而是批判右派分子。6月29日河南省小组会批判了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王毅斋走后，民盟河南省委的座谈会继续召开，在北京批判张云川后，河南也纷纷响应。就在7月4日民盟河南省的批判张大会上，王毅斋也受到了指责。曹宜轩和贺杰要求王毅斋交代他和张云川密切往来、商谈的内幕活动。

在北京，王毅斋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章罗联盟成了会议关注的“热点”。在河南省的小组会上，与会者一再要求与章、罗关系密切的王毅斋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7月中旬，王毅斋在人代会的大会发言中对自己的错误言论作了初步交代。

关于“有职无权”问题，他说：“‘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在河南大学任秘书长时，长期认为自己是是有职无权，而且也能孤立地摆出一些现象，以资‘证明’。其实我说的有职无权，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第三种情况大致相同。即主要是那时我的思想没有改造，没有学会新的工作方法，思想意识、工作作风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样，自然无法尽到自己的职责。党员同志苦心孤诣地照顾全局，做好复杂工作，我不但不虚心向他学习，反而认为他使自己有职无权。”

^① 《河南日报》1957年6月18日。

关于“六亲不认”，“必须肯定；这名话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多年反共的一谰言，我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管动机如何，不管措词如何，都是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如同说共产党员最爱国一样，共产党员也是最爱人民的，最近人情的，最有人情味的……”

关于肃反问题，他承认：“我对于肃反的了解，只是通过文件的学习，没有参加斗争受到锻炼，体会得不够深刻，所以一接触有些人反映肃反中发生偏差的情况，自己就盲目地认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他表示：“我想我犯的错误决不止此，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好在我在大会闭幕之后，即回地方投入盟内整风，进行全面的检查。”

此刻，王毅斋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河南他已是“众矢之的”，成为继刘积学、李静之之后的又一个“反动大右派”，“全面检查”恐怕已难息众怒了，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7月18日，王毅斋和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回到了河南。在郑州车站，王毅斋一出车厢，就明显地感到气氛不对，接待他的人员都换上了一幅冷若冰霜的面孔，他预感到在他离去的这些日子里，河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对他不利的变化，他的处境不妙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从7月4日到14日，民盟河南省委连续举行揭露和批判王毅斋的座谈会。在会上，许多人揭露王毅斋一贯仇视、反对党的领导，对党员进行诬蔑、讽刺。

民盟河南省委副主任委员杜孟模说，王毅斋在统战部的发言

是他一贯歪曲事实，对党诬蔑的集中表现。他歪曲毛主席的话，对李静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学校党委制可以研究以消，其它地方的党委取消不取消也可以考虑。李静之受了他的鼓励，便向党组织进攻。杜还揭露：有一次省委统战部几个负责同志和王毅斋谈话，对他进行帮助，他当时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意见，事后却诬蔑说是对他的“三堂会审”。

民盟郑州市副主任委员杨乃秀说，王毅斋原来不知道卢治国是党员，极力拉他到民盟工作，知道后，他又非常后悔，攻击卢治国“和党一条心，身在盟内心在党”，见卢治国来了，就满怀恶意地说什么“上司来了”，“领导来了”，“党来了”，或者说什么“有个问题请示请示。”杨乃秀质问：王毅斋究竟要把河南民盟领导到什么道路上去？

陈邑美、刘毅敏、谢瑞阶等人揭露王毅斋不是有职无权，而是不尽职责。

刘毅敏说，王毅斋在管文教时，有许多文教部门他都不知道是属他领导。而对学校教育，他又说：“看我倒霉不倒霉，我一当上副省长，就碰到今年许多学生不能升学，这萝卜咋坐法！”

民盟机关干部郑洪来说，今年元月领导派他去鸡公山慰问伤病员，他却说风凉话：“这是领导上叫我去鸡公山避暑的，天气这样冷，明明有意来摆弄我这病号。”又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是死了，我姓王的也不能当孬种……”

与会者还揭露王毅斋不满新社会，诬蔑党的政策，拉拢落后分子，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

杜孟模说，王毅斋认为自己在“三反”时“受了整”，他说：“在河大几年，喝苦水可不少！”他特别疯狂地诬蔑和攻击肃反运动，到处搜罗“肃反”中的缺点和偏差，加以夸大和歪曲，向党进击。一说到肃反中的缺点就愤愤地说：“罪恶滔天”。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也十分不满，他谩骂：“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

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

杨乃秀揭发说，王毅斋说过：“统购统销后农民都吃不饱，人人面带菜色，说够吃都是瞎话！”

刘毅敏说，王毅斋经常诬蔑发展党的工作，说：“刘教务长的通讯员都能入党，真是‘扫帚戴项帽’都能入党！”还说：“校部的一些同志被批准入党是‘近水楼台’”王毅斋去年曾对我说：“党吸收的净是那些唯唯诺诺，说一不二的人。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就是白痴也能入党，象咱们这号人，一辈子也难入党。”

杜孟模、陈美邑、方晴初揭露，6月间，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张云川来河南进行反革命活动，王毅斋和他一同去找刘积学，交谈中，他们一致对向刘积学的反动言行开展斗争表示不满，张云川说：“刘积学年纪大了，不该这样斗法。”王毅斋也立刻对刘说：“你年纪大了，我来替你撑一阵。”

就在王毅斋回郑州的当日，李静之在民革河南省委的会议上揭发王毅斋“对党不满，辱骂共产党员、打击靠近共产党的人；趁整风之机大肆搜集材料，有计划地向党进攻。”^①

7月29日，民盟河南省委的座谈会继续举行，王毅斋受到了当面指责。

刘毅敏揭发说：“王毅斋曾对我说：‘我未到解放区，认为解放区很好，到了后，党不相信我，我很后悔，但像女人嫁给了人，还有啥法！党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党……毛主席现在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为什么呢？是形势逼迫的，现在的群众不像以前了，现在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党不得不这样。’”

谢瑞阶所说：“在鸣放中，大家对党提意见时，王毅斋亲自记录，凡是有某个人在对党进行恶意的攻击时，他记的很注意；凡属善意的建设性的意见或说成绩时，他都不记。我是个画画的人，

① 《河南日报》1957年7月26日。

有好奇心情，专好看人的神色，当时我觉得王毅斋很可笑，后来一联系觉得有问题了，知道他是专门搜集党的缺点，向党进攻。”

李俊甫揭发：“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秦鼎新参事对王诬蔑共产党员‘六亲不认’的反动言论进行反批评时，他就在公开会上辱骂秦是‘大放厥词’，骂秦‘像蝇子一样’，还说‘要是爬在我的鼻子上，我一定要把他拍掉’，会后又诬蔑秦是‘假充积极’、捧场也不是这样捧法，及‘拍马屁、溜沟子’等。”

与会者还揭露，1956年救灾捐献时，王毅斋捐了一些他不穿的破衣服，但却说：“我的衣服都是新的，质量很好，把我去年穿的大衣都捐了，恐怕这些衣服到不了农民手里去，县区干部就都抢光了。”王毅斋还辱骂女干部，说：“现在一些女干部，除了买衣服外，什么工作也不作，特别是有些男的当大老爷，女的成了官太太，这都是国民党作风！”

杜孟模、谢瑞阶说，大鸣大放开始，王毅斋认为有机可乘，积极搜集材料，向党进攻，他坐着汽车风尘仆仆，急不待，跑遍了郑州各大专学校及省直的一些机关，并派省盟机关干部陈美邑为他搜罗，先后布置十余人向他汇报材料。指示别人“不一定拿完整的材料，一条两条都可”，他支持农学院右派分子范濂向党进攻，说：“不要顾虑，谁要报复你，我拼上老命支持你。”他还要方镇中有开封放，他也伸进了郑州中学搜集材料，直到去北京前一个小时，还打电话向谢瑞阶索取材料。^①

7月31日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王毅斋一言未发，他静静地听着别人的揭发。

林野第一个发言，他说：“王毅斋是章罗联盟在河南的骨干分子，是这个反动联盟驻河南的专员。王毅斋从1950年就执行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章罗联盟的民盟组织大发展计划，公开提出民盟

^① 《河南日报》1957年7月31日。

要在河南发展到三十万盟员，而且这几年来，在河南也确实大发展了几次。我要求王毅斋交代他几次到北京开会时是如何和章罗勾结的。同时交待他和张静吾、罗绳武、范濂、杨乃秀、丁宝泉、郝士英等右派分子的关系……”

谢瑞阶揭发，1953年王毅斋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他在向志愿军致慰问词时，不按事先共同研究的讲稿讲，却在那里声泪俱下地说些什么“你们远离家乡，我很难受”等涣散军心、动摇斗志的话，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从朝鲜回来后，别人兴奋鼓舞地向人们叙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而他见了别人却总是说朝鲜妇女如何漂亮，如何温柔之类的无聊的话。

谢瑞阶收集的材料真不少，他的记忆力也不错，三、四年前，王毅斋说过的话，他也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记得，1953年省人委开会研究粮食问题会后，王毅斋夸大歪曲事实，说：“过去没有提过粮食问题，都是讳莫如深，现在到了再也掩盖不住的程度了。”还说：“现在是河南紧张、全国紧张、世界形势紧张……”1955年王毅斋在开封对贾子毅说：“我们这次检查以后，肃反政策就要修改了”。1956年，王毅斋对杨乃秀：“我在杞县认识的熟人都镇压完了……”

他从赵松竹那里得知王毅斋在开封住院时一些反动言论。比如：说什么“灾区几个妇女才穿一条裤子……”等等。

他从刘毅敏那里得知，王毅斋曾在鸣放期间煽动刘毅敏，说：“肃反中你们师范学院打人最严重，你知道吧？把沈东浦快打成肉酱了，还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厉害，你在学校住着弄啥，这些事情都不知道！”

这些话也使谢瑞阶记起王毅斋在统战部会上的“丑恶”表演。王毅斋除了自己大放厥词外，还鼓动张仲鲁说：“沈东浦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每次运动都是重点，肃反时打得直不起腰，现在还弯

着腰走”。并别有用心地问郝士英：“你们师范学院肃反打人没有？”郝说：“不知道”。王毅斋就说：“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你还不知道？”郑州师专的景振国在会上大肆攻击肃反运动，王毅斋原来并不认识景，但景讲完后，他就连忙走上去和景亲切地握手，以表示慰问和支持。王毅斋见了肃反对象孟照椿，即以煽动的口吻，拍着孟的肩膀说：“噢！你还活着，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谢瑞阶越说越气愤，他又记起王毅斋的三段反动言论：

其一，刘少奇在郑州向学生讲话，鼓励那些因教学设施不足而无法升学的学生走向广阔的农村。王毅斋却说：“我看到这些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真可怜……报纸上说，学生可以学理发，那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学生可以把毕业证书挂在理发挑子上，还可以理个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的头，用几何，代数算一算，看如何理……”

其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王毅斋说：“我们常说社会主义阵营是团结的、巩固的，看来问题还是很多，斗争很复杂。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传统的民主习惯。”接着他又感叹说：“唉！中国人就不行，中国的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

其三，在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后，王毅斋阴险地说：“我在北京听很多人谈这个问题，我再一想，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又说：“赫鲁晓夫这些人是否和斯大林都是一回事？是否都是托派？”

戴汤文是不会让谢瑞阶出尽风头的。他紧接着谢瑞阶揭发王毅斋破坏革命的罪行。

他说：“1948年8、9月间，中原大学刚刚成立，王毅斋刚刚到解放区，他未能当上大学的领导，心怀不满。当时，敌人曾企图进攻豫西解放区，党相信王毅斋，把这个军事机密透露给他。那知王毅斋乘机把这个消息向学生宣传出去，结果在学生中引起了

很大波动。”

他质问王毅斋：“当时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一定要老实交代。”

戴汤文的发言让许多人眼睛一亮。原来王毅斋的反动是有根有源，是一贯的呀！那么就应该从他的罪恶历史中刨出反动的根。这是一种思维定式。第二天，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刨根者的行列。王毅斋在解放前就是大名鼎鼎的了，既有留德博士的头衔，又是河南大学的教授。人怕出名。一出名，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当然就谈不上什么“隐私权”了，收集一点王毅斋的遗闻轶事，还不易如反掌。

还是杜孟模了解王毅斋，他揭发，1948年王毅斋被河大解聘后，一方面投靠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另一面又派他老婆穆镜函去南京见李宗仁，活动当反动某部的宣传部长或处长。开封第一次解放时，他居然躲了起来，等候穆镜函去南京活动的结果，后经再三说服，大势已去，才不得已去了解放区。

李俊甫说：“1946年，因王毅斋时常表示他如何进步、革命，我们提出可以介绍他入党，他却立即拒绝，说什么：‘戴上红帽子，被捉住了要杀头；戴粉帽子（指入盟）不要紧。’解放后，他想入党。不能入时，他就诬蔑党：‘当党员像入青帮’。王毅斋从来就没有革命过，‘六二’学潮，讨论教授罢课时他一言不发，投票表决时，他偷偷地溜走了。他在街上碰到游行队伍，只点点头，说两句应付的话，这便是他吹嘘的支持六二学潮’。他当天晚上就去特务头子杨尉那里，解释说自已说错了话。”

戴汤文揭发，曾是大同中学学生的张剑秋在加入共产党后，被国民党逮捕送进西安劳动营，1944年经保释后，在西安大街上碰到王毅斋，请求他把自己带出险境，王毅斋一口拒绝了。并对张剑秋说：“你不要叫我老师，不要说是我的学生。”解放后，张剑秋去河大看王毅斋，问他当时为啥不带她回来；王毅斋说：“我要是为你牺牲了，划不着。”

戴汤文气愤地说：“王毅斋，你才是师友不认，六亲不认。”

戴汤文看问题历来是很全面的，王毅斋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没有逃过他的锐眼。

他说：“王毅斋在政治上耍两面派，在生活作风上也是两面派。他一面假装正经，一面调戏妇女；一面伪善大方，一面苛刻人力车工人、保姆，扣索公务员和保姆的钱；当面奉承人，背后骂人说坏话，这就是王毅斋的丑恶原形。”

刘孟真揭发，王毅斋鼓动青年参加伪青年军，骂农民是“会谈话的禽兽”。

霍秉权说，大同中学的学生参加新四军，王毅斋却说：“这是共产党折我的台。”

葛福鸿揭露，解放前，王毅斋向刘镇华献策，要刘镇华把军事交给张轸，把政治交给他。

卢治国说：王毅斋曾对张轸说：“你是武，我是文，将来中国是咱们俩的”到了解放区，王毅斋却说：“开封解放后，我只希望作个市政府的委员，不用作事，有薪金就行。”在他当选民盟委后，有人向他祝贺，他却说：“屁松、屁松！当个中央委员算个**毬**！”

杜孟模再次发言，他说，王毅斋野心不达便大发牢骚。他给人写信，说：“我深深感到晚年的悲衰”。对机关干部说：“我象个刀子生了锈打不开，在旧社会目无全牛，奏刀立解，而在新社会里总是得看人家的眼色行事。”

王毅斋在人代会上作了四次检讨（都极不深刻），但背后却说：“我心服口服。”从北京回来，见了人就说：“我犯了错误，请大家帮助我。”但背后又对钱天起说：“你看我多进步，我会反党不？”

钱天起紧接着说：“王毅斋在领导面前总说他‘在党跟前就像孩子在母亲的跟前一样，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党看。’整风一开始，他就利令智昏地大肆诬蔑党，说自己是‘没娘孩’，王毅斋的

‘娘’是不是跑到台湾去了呢？要不他为什么‘泪向肚里流’？”^①

8月1日，民盟开封，洛阳市委也召集会议揭发王毅斋。

8月2日、3日民盟河南省委的会议继续召开。

民盟洛阳市委的岳仁夫揭发王毅斋曾对他当面称赞特务分子李光都，说：“李光都是个特务分子，可他对我很好，民盟应该特别照顾他。”

戴汤文揭发，王毅斋曾在开人代会期间对人说：“我参加批判章罗座谈会，捏着鼻子说了几句话，其实，我啥也谈不出来，不过勉强谈了那么多。”^②

卢治国在3日的会上，总结前几日对王毅斋的揭发，列出了王毅斋的十二条罪状。

继开封、洛阳批判王毅斋之后，河南省其他专区，县市也纷纷召开批判王毅斋的各种会议。《河南日报》也不断报道来自各地的消息。

来自汝南县的材料说，王毅斋曾阴谋鼓动小学教师。说：“小学教师穷得像要饭花子一样，工作搞不好，还要戴大串帽子，过去阳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现在多了一层，十八层地狱的小鬼小判跺跺脚，下边有人大叫起来，小鬼小判问道：‘十九层地狱是何人？’答曰：‘小学教师是也！’”王毅斋要小学教师“向恶势力作斗争。”

平兴县的姜随斌揭发，王毅斋曾对他说：“我这一辈子不入党了，常言说：一臣不保二主，入了共产党将来还有找不完的麻烦，不如现在两面光好。国民党领导，我是‘老王’，共产党领导，我是‘王老’，谁也不错待我。”

.....

① 《河南日报》1957年8月3日。

② 《河南日报》1957年8月3日。

8月13日，民盟河南省委的座谈会继续召开，王毅斋在沉默多日后，第一次对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

他申明自己与章罗联盟根本没有关系。否认自己收集材料是为了向党进攻，至于别人揭发他侮辱妇女，他解释说，没有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以致引起别人“误会”……

他还没有交待完便被人轰下了台。

第二天，戴汤文、钱天起两人各用了一个小时，严词批驳王毅斋，杜孟模、谢瑞阶、段宗三、霍秉权也在会议上愤然指责王毅斋，警告他如不悬崖勒马，彻底交代，必将在人民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王毅斋火了，8月16、17日，他先后两次在座谈会上为自己申辩。

他再次否认自己曾向党进攻。他说自己的一言一行均是从帮助党的目的出发的，自己当时还把这些批评意见视为献给党的“大礼”。他认为：“在行动的性质上，我是个右派分子，但是那些行动都是结合不上思想的，所以在思想上不是一个右派分子。”……

他的一再申辩只是激起了钱天起、杜孟模、李俊甫等人对他更严厉的指责。

李俊甫愤怒地指着王毅斋的脸，说道：“王毅斋说他在献‘礼’，这说明王毅斋的反动本性和“中山狼”一样恶毒。在他的所谓献礼中，王毅彻底否定了一切成绩，这都是他这条‘中山狼’要‘吃’掉党的反动本质的露骨表现……。”^①

座谈会的会场上挂起了一张两平米的红底黑字大字报，上书三个大字：“打恶狼”。

8月23日，河南省人代会第六次会议如期召开。此时，王毅

^① 《河南日报》1957年8月21日。

斋的那些“罪行”在河南全省几乎已家喻户晓。在会场上，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斥责、揭发地、哪里就有人高呼“打恶狼”……

在小组会上，早已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刘积学又重新被人揪了出来，他被迫承认，他和王毅斋、李静之、郭仲槐等人组成了右派集团，王毅斋是这个集团的头。

在南阳专区的小组里，绳武断然否定了他和王毅斋、张仲鲁“结成联盟”的指控。

王毅斋此时被分在开封专区的代表组里，批判、揭发王毅斋成了小组活动的唯一主题。赵昕江、关文汇揭露了王毅斋在慰问灾区时的反动言行。说他在灾民大会上一面吹嘘，一面煽动群众，说什么：“我王老，今年六十岁，为了关心灾民、自报奋勇，来到西平。看到你们生活如此艰苦，十分难过。现在郑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吃的雪白洋面，你们连饭都吃不上，这真不象话。”

和王毅斋同赴朝鲜的马应选、贺成顺、张龙等人揭露他在朝时辱骂工农业劳模和志愿军战斗英雄的罪行。^①

……

杜孟模以《揭露民盟内的败类王毅斋的凶恶面目》为题在大会发言中详细批露了王毅斋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他指控：王毅斋是河南省的反共联盟的首领，王毅斋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②

王毅斋被这种无休无止的批判折腾得精疲力尽，他明显地感到自己老了许多，他看不到一丝获胜的希望。

8月31日，王毅斋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了人代会的讲坛，他当着全省五千万人民的代表，宣布：我有反党罪恶言行。

他承认，自己犯下了八条大罪：

① 《河南日报》1957年8月29日。

② 《河南日报》1957年8月31日。

- (1) 仇视和丑化党的领导同志；
- (2) 丑化党团员；
- (3) 拉拢落后，庇护反革命分子；
- (4) 对劳动人民犯有罪恶言行；
- (5) 对党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 (6) 一向犯有严重的个人自由主义；
- (7) 消极怠工；
- (8) 在整风中犯有罪恶言行。

他刚交待完自己的罪行，钱天起、戴汤文、杜孟模、李俊甫、谢瑞阶、段宗三等人从代表席中站了起来，他们厉声呵斥王毅斋，指责他交代极不老实，警告他要悬崖勒马、不要自绝于人民，部分代表也跟着他们叫嚷起来……

王毅斋低头只顾念自己的认罪书。他认为自己之所以犯罪，在于：一、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二、有严重的个人野心；他说：

“几年来我丧心病狂，倒行逆施，常常闹情绪，说怪话，作出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为，要从革命列车中冲出去，要做一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中山狼……”^①

王毅斋再也念不下去了，代表们的斥责、辱骂声已远远地盖过了自己那微弱、颤抖的声音，他茫然地望着黑压压的人群，那愤怒的面孔，声嘶力竭的吼声，使他感到空前恐慌、孤独，他万万没想到，认罪的权力也从此失去了！

9月1日，李俊甫、杜孟模、钱天起、谢瑞阶、贾子毅、高仰源、李平一、戴汤文、段宗三、卢治国等十人在省人代会上联合发言。他们揭发了王毅斋犯有十大罪行：

密室策划，统一部署；收集材料，到处点火；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上下呼应，左右串连；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

^① 《河南日报》1957年9月1日。

肃反；拉拢落后，包庇反革命；两面作风，伪装进步；特权思想、流氓作风。^①

自9月8日起，《河南日报》又以《王毅斋外传》为题，连续公开披露王毅斋的“罪恶言行”。

王毅成了不折不扣的“河南省头号大右派”。

○嘎然而止的挽歌

在一次批判会后，王毅斋曾向友人悲叹：“解放前我是群众一大片，解放后成了一条线，现在只变成一个点了！”在省人代会后，他这个孤零零的点也被一顶重重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帽严严实实地盖住了。他被撤销了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剥夺。1958年1月，民盟中央撤销他中央委员、河南省主任委员职务。他就这样被那些自诩革命的人从政治舞台上抹去了。

1972年9月14日，他在极度感伤、悲愤中撒手人寰。

1979年7月5日上午，低缓、悲挽的乐音在王毅斋十分熟悉的省政协礼堂缓缓奏响，河南省委、省政协将在此举行王毅斋、张仲鲁、郭仲隗、侯连瀛四位民主人士的追悼会，会场布置得庄重肃穆，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河南省委、省革委、省政协送了花圈。

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

“王毅斋先生早年就是一个进步的爱国人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掩护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对学生参加日救国活动积极支持，为党输送了一批干部……解放战争期间，他热情支持广

① 《河南日报》1957年9月2日。

大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王毅斋先生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党地下工作同志进入豫西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解放后，王毅斋先生拥护赞成党的方针、政策，在从事民主党派工作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为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教育界民主力量，做出一定贡献。他热心公益，积极热情，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是我省著名的爱国人士。

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悼词中还说：

“王毅斋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强加于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要彻底推翻，平反昭雪，恢复名誉……”^①

赵文甫唯独没提“1957年”。

不知一向恃才放旷、不拘小节的王毅斋先生在阴曹地府是否已对这种有意的疏忽行为悻然大怒？

不知戴汤文、钱天起他们看到这篇并不完整的悼词没有？

也不知中州大地上还有没有狼嚎？

^① 《河南日报》1979年7月14日。

马哲民·“华中主帅”

马哲民，1957 年任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第一书记请教拆“墙”办法

1957 年 5 月 5 日。

武汉风景区东湖之滨。

武汉市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余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许道琦及省文教部、宣传部、统战部的部长们共四十余人，吃过早饭后，都乘车向东湖之滨驰去。

五月的武汉，春已渐归。正是梅黄时节，毛毛雨落个不停。

在东湖之滨一所精致的招待所前停车场中，十几辆小汽车冒雨前后驶至，人们陆续入室。

窗外，细雨蒙蒙中，珞珈山上英丽的古式建筑牧隐约可见。

室内，四十余人围在一个正方形的桌子周围，各述己见。建国之初，群心共振，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东方中国人民，扬

眉吐气个个竭尽全力，为建设祖国不遗余力，同时对政府的缺点也严厉指责。然而，众人之心，皆为早日强国而已。

王任重这位仍然充满勃勃之气的书记，更是踌躇满志。建国之初，他便随李先念一起经营湖北。李先念调至中央后，他主管湖北，短短几年之中，使湖北经济大有起色。然而，战绩之中，也存在缺点和失误。

不过，王是一个谦虚的人，也是一个对事业精益求精的人。对于中央关于大鸣大放的通知，他是赞成的，他更欢迎知识界的人士能给政府提意见。

在聚集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他真诚地请求他们说：“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说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处之处和必须教育的地方。”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很没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用整风的办法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育、文艺是外行，今天问大家请教打倒墙的办法。”

王任重的讲话，在二十多个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纷纷把心里想说的话抖出来，对国家的热爱，对政府的信任，使他们说话无所顾忌。

马哲民，这位中南财经学院的院长更是如此。当然，他的讲话发言，也就更加尖刻。

他慷慨激昂：“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分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

中国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

“我同意刚才有人提出的意见，党应该把这几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进一步总结一下，现在这问题还差一把火。

“放与鸣的关键问题在党的领导，搞好了，一方面可以放鸣起来，一方面是党的理论上的发展，对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促进作用。”

这是一次座谈会，一次由早晨开倒下午六点多的座谈会。报纸评论说，人们去拆“墙”了，去拆党和非党之间的墙了。一件无法估价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也开工了。^①

○ 继续放炮·全面反击

马哲民有从政的经历，但在野的时候多。而且马是一个书生形的人，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懂的不太深。他以为，忠言逆耳，但可以得到理解。更何况，中共中央自上而下发出号召，让人们大鸣大放呢。

所以，他也就积极行动，利用他的院长的身份，作报告，作演讲，对政府内部的缺点，进行尖锐地批评。

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

“要老党员对广大人民热爱，这对他们很不习惯。当然，过去他们也是团结人民的，团结热爱人民本来是党的目的，但是，那时候主要是打击、消灭敌人，因些团结人民发动群众只是了为打击敌人，目的变成了手段，本末倒置了，现在要他热爱人民反而、不习惯了。

① 见 1957 年 5 月 13 日文汇报。

“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经验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新同志则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便是主观主义。……现在大专学校中，青年学生、工友和党的矛盾现在已经超过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的矛盾，成了学校里党群关系最主要的最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

“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是‘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

“共产党员是木头人，没有脑筋。连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共产党的地位很危险。今天共产党员很骄傲，要我入党，我也得无微不考虑。过去有的党员退党，责任不在党员，同时也不是偶然的，与党内一团糟有关。

“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工厂，要防清党委制，老干部要退出学校。”①

马哲民对共产党的批评是极其严厉的，但政府既然允许大鸣大放，他也就没什么遮拦了。他也许没有想到形势风云突变。不久，对他的批判象倾盆暴雨扑天盖地而来。

他也许没有想到，民盟会对他进行猛烈地反击。

6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湖北地区最大的支部——华中师范学院支部，举行支部大会，对马哲民进行批判，许多盟员要求停止马哲民民盟主要的职务。②

6月26日，民盟华中农学院支部召开支委扩大会议，揭发马哲民的“罪恶活动”。

在会上，老教授傅光培向大家揭露：“马哲民是政治野心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国民党反动头子张笃伦养起来的，与国民党

① 见1957年6月21日长江日报。

② 见湖北日报1957年6月28日。

有30多年交往历史。”^③

6月28日，民盟武汉市委举行支部大会。

在会上，市民盟副主委戴今生提出要马哲民交待和白崇禧、张笃伦的反动关系，以及和罗隆基、章伯钧的关系。

其他人也纷纷对马哲民进行揭露。

陈中正说：“有一次我和马哲民到成都去，罗隆基也在成都，一天开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以后，罗隆基要请吃饭，同去的有马哲民、潘达边、罗隆基的秘书和我，他们谈了很多，给我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们对党的人事工作不满，说党依靠小辫子（姑娘）来搞人事工作，搞得一团糟，害死人。一说史良靠拢党是积极，是个歌功颂德的人。”

周培东说：“1949年我去北京，在留香饭店见到马哲民，那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的时候，马哲民却哭丧着脸对我说，你看，他们都在那儿做高官，我呢，回武汉教书，表示非常不满。”

黄伯雄说：“马哲民在月4日召集市盟干部谈话时说，现在美国在台湾有导弹基地，一旦发生战争，把几个大城市全轰掉，共产党就靠不住，你们还会不会退党？我是过来人，退过党的”。

吴紫银说：“抗美援朝时，马哲民幸灾乐祸，说民盟取得新生命了。”

杨静之说：“马哲民说过：土改时斗争地主，我觉得地主可怜，心也就软了。这是什么立场！”

周培东说：“1951年镇反时，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妻子来找马哲民，马哲民不但不拒绝，还对她说：你爱人救过我。”

周培东揭露说：“马哲民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游泰山，逛西湖，出了很多钱，都要公家报销，这是什么思想。”

戴今生在会上检查了自己表现不会，领导软弱，并表示要在

③ 见湖北日报1957年6月28日。

同志们督促下，坚定立场，明确态度，和大家一起努力，领导反右斗争。

但众人对戴今生的发言很不满意，并揭发了戴今生的一些言行。^①

7月5日，在中国文坛上居有一席之地之徐懋庸，也以《马哲民的“忘我”高论》为题，撰文在大公报上对马哲民进行有力地批驳。

徐在文章中挖苦了马哲民在国民党报纸上登报脱离共产党。并讽刺说：

“我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很尊敬马哲民先生，读过他的著作，因为他那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后来因为自己变成‘木头人’了，所以也就忘记了马先生。解放以后，竟有缘同马先生会面，知道他同民盟的一段曲折关系，而且知道他在解放后大读‘佛经’，为了‘忘我’。

……”

徐懋庸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没有多久，一顶或许多比马哲民的更沉的帽子，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不知徐懋庸自己有何感慨？

当马哲民从报纸上看到徐懋庸被划在右派之列受到批判时，他心里一片惨然。徐懋庸啊徐懋庸，你真是聪明过头了。他说不出是对徐同情还是对徐可怜。

同日，中南财经学院统计系的两百多名学生，聚会声讨他们的院长。

在会上、很多学生义愤填膺，有的同学揭发：“马院长说过百分之百学习苏联是教条主义。这不是在挑拨中苏万古长存的友谊吗？”

① 见1957年6月29日湖北日报。

有的同学揭发：“马院长老答应我们的要求，可答应后一件也没办，真是个大骗子。”

7月6日，湖北日报首先挖掘了马哲民的丑恶的历史：

马哲民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因此他得以过公子少爷生活。民国初年，他曾在武汉第一中学念书。毕业后，赴上海又去日本。在日本并未上过正式学校，在那里鬼混了两年又回来了。

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派到苏联学习。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他便脱了党，走上背叛工人阶级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马哲民到了重庆，参加了民盟。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后，马上摇尾乞怜于张笃伦（重庆市长），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张笃伦将他的信送交大公报发表。为此事，民盟要开除他的党籍，因为章伯钧帮忙，才马马虎虎搁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笃伦任伪湖北省主席。马哲民跟着赶到湖北来了。这时张笃伦对他特别客气，叫 he 到湖北农学院当教授。由于这些事实，使马哲民在解放以后，回忆起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恩惠，不由得经常事牢骚满腹，逢人便说：“蒋介石是不好好地搞，不争气”。^①

马哲民读着报纸上揭露他“历史的丑恶面目”的文章，哭笑不得。

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他东奔西跑，为生计，但也为民族。他有过失误或过错，但也有成绩，而报纸上现在却把他刻画为一个大坏蛋了。连在日本也是“鬼混了两年”。

他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丑化他，但他无可奈何。

不久，他又从报上看到他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批判和揭露：

^① 见1957年7月6日湖北日报。

6月22日，马哲民的家乡——湖北小黄冈县范家岗乡红星第二农业社社员齐聚马哲民家对门屋内开批判会，揭发“马哲民挑拨党群关系的事实，马哲志的侄儿、婶娘参加了会议。

马哲民的侄儿马复初说：“我二伯心毒辣得很，野心又大。去年他回来时，到陈欠楼，上巴河、程德岗等地去搜集统购统销的材料，找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今年，他又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捏造说群众生活没有改善，共产党领导不好，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要不是生产太忙，我要去问问他，你想干什么呢？想国民党和地主回来吗？我要告诉他，我虽然是他的侄儿，但我和他不是一条心，我和群众在一起，要和他斗争到底。”^①

1956年，马哲民曾回到过家乡。在家乡住了6天。

这时候，由于马哲民成了“反动的家伙”，于是有人以此大作文章。报纸上也出现了他的家家人纷纷揭露他的“罪恶活动”的文章了。

有人揭发他煽动农民“吐苦水”，

有人揭发他点鬼火。

黄冈县副县长李艾全的揭发更是入木三分。李艾全说：“马哲民一回程德岗，首先是‘三不见’：党员不见，团员不见，干部不见。同地主程来风、伪保长程子中和一个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的私商一见如故。有一次他专门去拜访地主分子程太婆。

“马德民在程德岗到处吹嘘自己，说：我是全国人民代表，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十几岁就在外革命，几十年不曾回家。我是中央视察团，你们有什么困难，我直接反映给毛主席，马上就能解决。

“马哲民在联盟五社买了二十多个鸡蛋没有给够钱，就扬长而

^① 见1957年7月13日湖北日报。

去了。”①

读着报纸，马哲民心里难受极了。他可以容忍一切指责和批判，唯有他的家乡的人，他的亲属，对他的“揭露”感到困惑。

他还不至于连二十多个鸡蛋钱就不付够便扬长而去的。

但，他有口难辩。

因为批倒批臭他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不敢争辩了。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

○ 天堂有路……

7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哲和黄绍竑、龙云等许多人一样，“向人民认罪投降”，进行了冗长的检讨发言。

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说：

我虽不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却是从旧社会来的旧知识分子，旧社会的恶劣生活习惯，沾染很深，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

最恶毒的是章伯钧故意歪曲4月30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制等，益促使武汉市的第一阶段的“鸣”“放”的歪风达到高潮，形成猖狂向党进攻的形势，并把民盟湖北省委员会在“鸣”“放”中的活动，涂上了和章、罗一脉贯通的色采，我是主任委员，当然要负责。

……

现在我愈检查我的思想深处，愈发现它的丑恶。我是多年受

① 见1957年8月31日湖北日报。

过党的教育培养，并在党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我对那为贯彻革命任务，而执行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能够怀疑和反对；我对那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百折不回，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骨干党员，能忍心加污蔑、攻击，而独独同情于因肃反运动所波及的那些落后分子，以为没有做到“有错必纠”，甚至不惜代表他们向党反噬，……

我的这种思想，我的这种言论，把我划在章、罗联盟一起，还有一点不应该吗？我愈想愈觉自己思想的丑恶，我愈想愈只有痛恨自己！我只有不辞任何惩罚，不计任何个人利害来向人民、向党承认这种错误。我甘愿承受民盟的整风来对我的错误和罪过，加以彻底清算！我决心要对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提高自己，并向人民赎回我底罪愆！我只有重新做人的一条道路！^①

马的检讨，和黄绍竑、龙云等人的检讨一样，在全家一些名报上相继登载。

马本身并非心检讨，他是被迫的。但他又没有办法。

在检讨中，他承认了章、罗联盟的存在。

同时，他又把自己排除在章、罗联盟之外。

事实上，他并不了解有个章、罗联盟，或许他根本也不相信有什么章、罗联盟。

但，他却违心地承认了章、罗联盟的存在。他内疚。

然而，不久以后，他便发现，值得内疚的事太多了。

一个人说一次谎言痛苦万分，一个人老说谎言便心安理得了。

他幻想“检讨”之后就可以“关”了。

他错了。

和许多人一样象小孩一样的天真。

① 原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报。

他的检讨刚见诸报端，便有人指责他避重就轻，妄想逃脱罗网。

武汉民盟不断打电报给在京的马哲民，令他迅速返汉，接受批判。

为了“迎接”马院长返汉，中南财经学院作了周密而又充分的准备。

学院 70 多年战斗报刊，赶制了 1650 张大字报，224 幅漫画，48 个专刊，把一个宽阔的校园，布成了一座大字报的城堡。

校门口，贴满了声讨他的大标语。

院部的大楼前，树起了巨大标语牌：

“彻底粹碎马哲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①

6 月 21 日，马哲民从北京返回政治。刚回校，院刊和院内六十多个大字报的“记者”便对他进行了“采访”。

马哲民不能不接待这些“记者”，又不能不回答他们的尖锐的问题。

“马院长，你是如何跟章、罗勾结在一起的，你的检讨可没提啊？”

红色游击队记者首先发难。

“马院长，你是如何叛党的？”

井冈山记者也毫不含糊。

“马院长，你和国民党反动头子张笃伦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猛狮记者言辞更为尖锐。

他回答了。

但他的回答令“记者”们十分失望，十分愤怒。

“记者”们纷纷发出消息：

马哲民继续顽抗，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示。

^① 见 1957 年 7 月 25 日人民日报。

8月2日，湖北省、市民盟召开干部会议，“欢迎”他们的盟主要从北京返回武汉。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马哲民不得不再次检讨。因为他的检讨没有具体的事例，于是人们便十分愤慨，他们纷纷揭发马的“罪行。”

陈中正揭发说：“解放初期，马哲民说过，北京现在把毛主席抬出来了，还喊什么毛主席万岁，共产党还用封建帝王那一套。表示很不满意。”

王绍欣揭发说：“在中共统战部召集最后一次鸣放座谈会的那天下午，马哲民对我说，党危险得很，水平太差，简直要命。”

这时便有人插话：“马哲民，你承不承认？”

马哲民心里很气愤，但他又不敢发火，只好说：“我考虑考虑，思想一下还没通。”

武汉市民盟副主席吴耕阳就说：“马哲民应当彻底向人民投降，才能重新做人！”^①

8月14日，湖北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又召集省、市盟机关干部部分大专学校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在这次会议上，马哲民“作了长达五小时的交待，初步承认了他在事实上作了章罗联盟反动工具”。^②

他说：“我干了很多为章罗联盟服务的工作。1955年章伯钧束汉，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召开联合欢迎会，我致欢迎词，章伯钧在会上讲话，把我大大夸奖和鼓吹一番。

“从此以后，章伯钧就下功夫拉笼我。每次开会，他都要拉我到他家看字画古董。省、市盟主委兼联问题，他支持我，让我搞好些。

① 见1957年8月3日湖北日报。

② 见1957年8月16日湖北日报。

“去年开全国人大代会，章伯钧请我到他家吃饭，同时被邀请的有潘大逵、沈志远、辛志超、彭迪先、专门请了北京饭店最有名的厨师，特别讲究。

“解放初期我情绪很不好，罗隆基就特别拉笼我，到那里见到他，都请我吃饭。

“我和潘大逵一起教过书，关系比较深，潘大逵作我的工作特别多。……我再也没什么交待了，今后查出来就加倍处罚，杀我的头！”①①见1957年8月10日湖北日报。

他已经绞尽了脑筋，去想他的“罪行”。

没有人满意他交待的“罪行。”

人们所满意的，是罪大恶极的罪行，是无耻的勾当，而且最好还要加上桃色事件。

8月26日，湖北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这是一次口诛笔伐的反右会议。

马哲民参加了，他是接受批判而参加的。

在会上，人们给他订了种种罪名。

他纠集了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他是华中右派的主帅，

他污蔑共产党，

他挑拨农民和党的关系，

他……

马哲民已不再希图解释了。

他也无法解释了。解释的结局只能是罪加一等。

“身后有余忘宿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从会场中回家，原先他的很多朋友都远远地躲着他，把他当作瘟神。

他憔悴了。

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往日的他总是笑逐言开的，现在他却沉默了。和以前判若两人。

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伤感，他不明白他的朋友为什么会无端地捏造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也许他们没有过错。他心里想，我也不无端地指责“章、罗联盟”了么，章、罗有没有联盟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啊。

回到学校，他看到了学生们一双双怒视的眼睛，一双双“敬而远之”的明眸。他理解这些学生。学生毕竟是学生。

他回想起他半生的东奔西忙，在日本留学受到的歧视，在苏联留学的激情，在北伐战争中的振奋。可是他又后悔，后悔脱离了共产党。

或许自己不应该参与政治。老老实实做学问，才是“正道”。

○ 似乎是最后的定论

1958 年来临了。

反右高潮渐渐已经过去。

但对右派的处理却是必须要进行的。

他的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职务是干不成了。

他的其他社会职务也同样被撤掉。

1 月 26 日，民盟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撤销了马哲民等一批人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5 月 15 日，民盟湖北省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马哲民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5 月 31 日，政协湖北省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右派分子马哲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但保留了政协湖北小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似乎有点儿滑稽。

流年似水。

1980年，马哲民溘然长逝。

他去世后不久，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极有价值的大部头书。

书中关于他的小传是这样写的：

马哲民，1889——1980。河北省文科大学毕业，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

谎言说了一百遍毕竟仍是谎言。

是非自有人品说。

只是，斯人已逝……

韩兆鹗·“贼船上的舵手”

韩兆鹗，1957 年为民盟中央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陕西省副省长。

○受到周恩来褒扬的人

1957 年 5 月，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古城西安，各级党组织连日来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会议，召集社会各界人士，希望他们向党进言，帮助整风。

5 月 17 日，中共陕西省委邀请省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

人士举行座谈。

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主持。他看到人已基本到齐，就站了起来，微微咳了一下，说：

“欢迎各位代表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为了节省时间，我就长话短说吧。”

“今天请诸位光临，就是希望能畅所欲言，指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并提出宝贵的建议！”

张德生讲完话，坐了下来，身边的秘书已做好了记录的准备。两三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开口，张德生感到气氛不太对劲，忙笑着补充了一句：

“我们是老朋友、老同事，有啥拘束的！”

“张书记，我来开这个头吧！”

一个稍胖而不失儒雅的人从对面站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这个人向人们点了点头说：

“我在工作中感到，咱们省的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省上重视，县上就差一些；省委要是重视，行政部门就差些。

“比方说省人民委员会，只能看到行政关系，看不到统战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呢？也有很多问题！”

“有人说，党员是‘鹤立鸡群！’是‘举动冷冰冰，说话哼哼哼。’个别党员甚至还挑拨是非，弄得互相有意见！”

“有一个厅长，他年纪较大，提出坐吉普车不便，要换卧车。

“我说年纪老的人很多，要解决应该通盘考虑。

“结果就有人把我说的话告诉了这个厅长，他还说：‘大家都同意了，就是韩不同意！’弄得我和这个厅长之间很不愉快。

“另外，机关党有宗派主义。

“有些党员干部年年升级，还有一年连升两级的，几年间，有的连升三级，甚或连升五级。至于是否称职就不管了。

“如果‘才不足以理事，德不足以服众’，那就会越升得越高越坏。有些党员在机关里不钻研业务，但是‘指挥欲’很强！……”①

“胖子”言毕落座，屋里即时活跃起来，人们纷纷打开了心扉……

这个发言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民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副省长韩兆鹗。

说起他的“来头”，还不小呢！

韩兆鹗生于1890年，是陕西户县人。

他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专业。求学期间，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积极从事进步活动。韩兆鹗组织过北京高师陕西学生同乡会，配合其它组织反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又参与创办《秦钟》月刊，热心向家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曾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交际干事，又以学生代表的资格出席过环球中国学生会。

1921年毕业回陕，韩兆鹗积极从事教育事业。他当过教员、校长、代理厅长等，他书教得好，对教育改革也很关心。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韩兆鹗先后从政八年，历任绥德、米脂、安康、南郑、长安等县县长。

在那个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时代，韩兆鹗可贵地做到了体恤民难、廉洁奉公。他以政教合一、倡导并赞助革命为旗帜。他曾公开参加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被群众称为“平民县长”。

从政期间，韩兆鹗以其公开身份，做了大量的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资助革命的工作。

陕西大革命低潮时，他的家乡户县农民协会遭查封，他气愤至极，发电给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司令，以示反对。他任陕西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

省教育厅视学科长时，厅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干清身份暴露，他多方周旋，使杨免遭图圉。李子洲惨死在宋哲元军法处，韩兆鹗不但自己掏钱买棺，且亲自为烈士殓尸。

1932年到1934年，国民党驻军在南郑县逮捕了一些进步师生，身为县长的韩兆鹗全力营救，最终使被捕师生获释。

1936年西安事变时，韩兆鹗是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时韩兆鹗刚接任长安县县长，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到达西安时，他热情地把周恩来等人请到县府办公室，为周恩来召开各界群众救国团体负责人座谈会提供便利。此后，长安县府成了中共广泛联系进步人士的接待站，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多次在这里讲演。周恩来很感激韩兆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努力，亲切地称他为“胖县长”。

韩兆鹗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战期间，曾两度从军。一次是1934年9月出任三十八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一次是1939年3月因屡受蒋鼎文等威逼，他辞去长安县长职位，到晋南任第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军需处处长。

1941年10月，韩兆鹗被陈蔚如委以驻重庆办事处处长。蒋介石想使第四集团军自生自灭，几乎停发一切经费装备，经韩兆鹗据理力争，这支部队才免遭分化瓦解。他义正辞严，令众武将折腰。

抗战后期，韩兆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41年12月，经章伯钧、严信民介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7月，当选民盟中央委员。他竭尽全力为独立、民主、自由、幸福而奔走呼号。^①

新中国成立了，韩兆鹗的政治生命再度焕发青春。他曾任政务院人民检查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陕西省人民政

^① 《陕西近现代名人录》，西北大学出版社。

府副主席等职，后来，政府派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他同时又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陕西的主要负责人。

韩兆鹗很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力。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在工作中能动脑子，对时势有较清醒的认识。当政策在执行中出现某些偏差时，他能及时看到，并注意纠正。他真心和共产党合作，所以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常直言不讳。这次共产党发出整风号召，他积极响应，又鼓励其他人放下包袱，帮助党整风。

韩兆鹗没有想到，6月份以后，整风运动竟渐渐地变成反右运动，而且章伯钧等人首当其冲，遭到反击。

韩兆鹗不理解，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

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将要召开了，韩兆鹗对他以前的学生、民盟陕西省副主任委员李子健说：

“不要看现在批评章伯钧，人家部长还是部长。”

李子健有些担心，便反复叮咛：

“情势非常紧张，到北京后，你说话务须谨慎呀！”

“我到北京去，还要见章伯钧。”

他慢慢地答道。

.....

韩兆鹗怀着复杂的心情上路了。

一到北京，他立即找到了章伯钧。在他眼中，章伯钧好象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韩兆鹗没有多问什么。章伯钧希望他能找找董老、林老，为其解脱。

韩兆鹗去找了习仲勋秘书长和汪锋副主任，想试探一下对章伯钧的处理办法，他没有弄清楚。

人大预备会议一连开了五天，章伯钧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韩兆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韩兆鹗在6月19日给李子健写信时还说：

“盟总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章伯钧受到批评，他态度安详，这也是他的修养。”

在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吾弟所告我者，我深切注意勿念。……西安如有要事，望以函告为盼。”

6月26日，人大正式开幕了。

韩兆鹗听到人们纷纷揭发、批判章伯钧，材料铺天盖地。有些事情他是知道的，对有些问题他与别人理解不同，就想解释，这自然受到代表们的“帮助”。

“我是章伯钧介绍入盟的。他是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我是什么？我该怎么办？”

韩兆鹗想不通。

他在卧室里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焦躁不安。

“子健怎么不写信来？”

他想到了陕西。

是呀，子健为什么不回信来？

韩兆鹗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他忙找来陕西日报，看到上面有别人揭发他的消息！

他心里七上八下，脑袋里乱成一团麻。

代表们开始表态了。

韩兆鹗感到自己必须表态，可说什么呢？

他想了一夜，想到了与章伯钧十几年的共事，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路……

7月12日，韩兆鹗在人代会上检讨：

“我愿意把自己受了章伯钧等人反动言行的影响，向大会交代，

“我坚决的要与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坚决的跟着共产党

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章伯钧的许多问题，大家都谈了，我现在只说几件事情。

“1946年他一再说：如何为第三党辅摊子，企图与国、共平分秋色，分庭抗礼。

“1948年民盟在香港开三中全会时，他不同意民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议。

“他在湘、赣、粤三省为第三党搞武装。我劝他不要胡闹，他说：‘中国将来是个南北朝，我们还许三分天下有其一呢！’他还说：‘毛泽东会领导，我们就不会领导吗？’

“这都证明章伯钧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时，我已经认识到他的野心很大……

“去年，出国访问，他在克里姆林宫座谈会上讲，‘他到苏联心情很沉痛，对苏共是有意见的，这心情直到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才改变。我当时以为他随便讲话，还没有认识到他反苏反共的思想实质。

“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公开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表了。今后我们民盟要当家作主，独立思考，大有文章可做。他所谓‘大有文章可做’，首先是民盟组织的大发展。

“我当时竟然没有察觉出他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又发作了。

“此后陕西民盟在半年中，发展盟员二百多人。今天看来，发展固然不能说全错，但这岂不是和章伯钧自己所交代的他和罗隆基结成了政治联盟，暗自窃取民盟领导权，企图发展盟员一百多万的阴谋完全符合了吗？

“我现在愧恨交集！

“去年10月，章伯钧对我说，西安是八大城市之一，有条件建立农工民主党组织，并叫我负责。我以工作忙，不接受，他要我勇敢些。今年2月，执行局来西安发展组织，责我‘裹足不前’。6月16日陕西农工民主党筹委会成立，短期里就发展党员一

百四十余人。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独裁专横的丑恶面貌。也看出他企图搞政治资本。

“我真愧恨我自己为什么被章伯钧这样颐指气使的利用呢？

……

“我现在才认识到我那时上了贼船，上了章伯钧妄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

“我今天才明确认识到，章伯钧在民盟搞章罗‘政治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又搞‘章黄（黄琪翔）攻守同盟’，在两方面各捞一把，作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

“我这次到京后，还犯了试探对章伯钧问题处理办法的错误，……我现在幡然大悟，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模糊，立场不稳。

“我愿意首先交代我的思想本质。我是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没有经过彻底思想改造，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位观点。

“所以就容易被章伯钧长期利用。直到北京时，我还对他有温情主义……

“我在人民政权下工作八年之久，因为旧思想旧意识未经彻底改造，有时它还在作怪，这就会使我和人民之间发生一定的距离。这都是阶级意识的反映。

“我要坚决地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

“我还要正告章罗等人，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应该诚恳地把你们一切反动言行彻底交代出来，认罪悔过，才是你们的出路。如再半吞半吐，文过饰非，必当自绝于人民。”^①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韩兆鹗“愧恨交集”地读完检讨，满头是汗。
人代会闭幕，他昏沉沉地回到陕西。

○“两条大腿造反”·澡堂里的诬蔑

韩兆鹗在北京做了检讨，可西安还在等他呢！

韩兆鹗在北京时，陕西的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已多次召开了反右会议。

7月16日，在民盟省、市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李子健在人们的质问下，被迫交待了一些“具体情况”，承认韩是章罗联盟在陕西的“代理人”。

“我和韩兆鹗是师生关系，因此对韩有温情主义，失去了警惕性，我受了他的利用……”

“我现在恨极了韩兆鹗，我要和他划清界线！”^①

从7月6日到7月19日，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筹委会先后举行八次会议，揭发和批判韩兆鹗。

农工民主党秘书长袁吉安在会上被迫承认了他和韩兆鹗之间的一些“问题”，并检讨说：

“我由于立场不坚定、思想模糊，所以被右派分子韩兆鹗利用了，中了毒！”

“我没有上贼船，只是受了贼船上的引诱……”^②

有人说韩兆鹗有“两条大腿”，一条是民盟的李子健，一条是

① 《陕西日报》1957年7月17日。

② 《陕西日报》1957年7月21日。

农工民主党的袁吉安。“两条腿”倒了，韩兆鹗能站得住吗？

韩兆鹗刚回到西安，还没来得及稍事休息，就被请到了民盟省、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他成了“宝贝”。

韩兆鹗对自己的处境已经完全清楚了。

8月8日，韩兆鹗被要求作检讨，交待与章罗联盟的关系。

他说：“我仅仅是上了章伯钧的当，这就是我和章罗联盟的关系……”

“他说的不是事实！”

韩兆鹗的学生李子健站了起来，

“别人说我是韩兆鹗的一条大腿，但是今天我这条大腿起义了！”

“去年8月，民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韩兆鹗作了报告，这就是根据章伯钧关于大发展组织的指示来的。这次建立农工民主党组织，就是为了扩大势力，企图和党分庭抗礼！”

“他不愿意民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承认和韩兆鹗结成了反党小集团。开始时，我们只是对一些合作共事的党员干部不满，后来经常一起私议和诋毁一些党员干部，排斥盟内任职的共产党员，互相散布对党的组织的不满。韩兆鹗处处和省长及另一副省长（都是党员）作对。这样，就渐渐发展到反对党的领导。”

“韩兆鹗上北京前我们谈话，商量互相通信，我们这是订下了攻守同盟。”

这次民盟会议，农工民主党的代表也参加了。袁吉安也在场。李子健刚讲完，他马上就站起来，说：

“在讨论农工党的组织工作路线时，韩兆鹗把以医药卫生界为重点擅自改为以医药卫生和工程技术界为重点，企图大量发展党员。”

“韩兆鹗不满意党的领导，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党员哩，怎

么都行，我就不行！’

“他有时还谩骂靠拢共产党的人……”

“调配农工党的专职干部时，他说人事局调的人是靠不住的，总是自己找来才放心。

“韩兆鹗经常说章伯钧多好多好，对别人揭发章罗却表现很不耐烦，怕把自己暴露出来。

“既然对章伯钧什么都清楚，你为啥不揭发？”

韩兆鹗没有回答，只是直直地盯着手下摊开的笔记本。

韩望尘揭发说：

“在北京时，韩兆鹗对别人揭发章罗愤愤不平，骂这些人是‘卑鄙家伙，不够朋友’……‘把章罗搞掉了，谁来领导民盟呢！’”

王菊人揭发韩兆鹗挑拨他与党员干部的关系，说韩兆鹗告诉他赵寿山省长反对他当省府副秘书长。

又有一些基层民盟代表说，韩兆鹗鼓励人们鸣放，还说肃反运动后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些都是点火行为。^①

韩兆鹗面对猛烈的攻势，很气愤，有些事情本来不是同一性质的，但人们就是放在一起“揭发”他。韩兆鹗明白，他千万不能承认所谓的“动机”，否则更说不清。

在8月9日到10日的民盟会议上，有更多的人出来，揭发韩兆鹗的“反动言行”。

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委托民盟陕西省委员李敷仁揭发韩兆鹗的言行，说韩兆鹗与他见面时，没有一次不说党和政府的坏话，还说“我有职无权，共产党压迫我！”

高崇民还告诉李敷仁，韩兆鹗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有一次，韩兆鹗在他面前骂某位干部，当见到这位干部时，韩又立即恭维了一番。还有一次，章伯钧在克里姆林宫讲话，高崇民告诉韩兆

^① 《陕西日报》1957年8月10日。

鹗，章伯钧在讲反苏反共的话。没想到韩回头立即讲给章伯钧，所以高被章伯钧逼着追问。

当说到点火于基层时，先是西北农学院的叶子刚交代，说韩兆鹗支持他在西农鼓励人们大鸣大放。接着，农工党的一位代表又交待，说韩在全体党员面前煽动，讲“你们可以尽量大鸣大放，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可以带到北京！”

民盟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性初在会上揭发韩兆鹗诬蔑党，谩骂工作人员。他说：

“从我几年和韩兆鹗共事接近当中，没有听到韩提过一句关于党的领导的字眼，

“他造谣说‘有职无权’，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作副职是给人家拾遗补缺的’，是‘点缀品’！”

“韩兆鹗不仅骂党员，连干部、通讯员、警卫员都骂遍了，他给秘书起了几十个外号，什么‘木头’、‘石头’、‘低能’等等，

“他简直是横行霸道，动不动就训斥人，旧官僚政客架子十足，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一点没有改变！”

韩兆鹗站起来反驳道：

“我是对个别党员有意见，我没有反对共产党！”

“你太狡猾了”，有人嚷道。

有人说韩兆鹗曾介绍一个反革命分子入盟，韩兆鹗盯着那人道：

“当时你不是也同意介绍么？何况他当时也不是反革命！”

“你这是反咬一口，造谣中伤！”揭发的人激动起来。

当有人问起韩李同盟时，韩兆鹗一口否认：

“哪有什么同盟！”

韩兆鹗的交代被讥讽为“挤牙膏”^①

① 《陕西日报》1957年8月12日。

不管有没有“牙膏”，还是要接着挤。

西安市珍珠泉一位服务员请张性初代替他在一次民盟整风会上揭发道：

“韩兆鹗 6 月 16 日到珍珠泉洗澡，我想听听副省长对整风和反右派的高见。韩说：‘整风，只是共产党的事，我们政府不管。’

“谈到吴晗批章伯钧，他说：‘这你不晓得，吴晗这人与章伯钧早就有疙瘩，有成见，是借机会报复，吴晗是个小人！’……”^①

与会代表认为不能老在这样的问题上转磨磨，得“发现”新情况，这方显得出韩兆鹗的“厉害”。

有人早已想好了对付韩兆鹗的办法。

民盟陕西省委员任谦因检查工作没有参加这次整风扩大会，他写了封信，请苏资深（盟省委委员）在大会上念。信是这样写的：

“今年 5 月，在零县涝峪发生了‘中国人义救命军’反革命武装暴乱案。

“5 月 19 日，省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有关负责人前往处理。

“20 日上午，我去韩兆鹗处面请机宜，他却说：‘我不同意这样做，这是小题大做！我不同意你们都去，也不同意你去！’

“我回答说：‘这是省长紧急会议的决定，我还要去。’

“他就用刻毒而带冷嘲的口气说：‘你们是党怎样决定，就怎样做哩，我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试问这是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具体表现？”^②

这封信宣读后，会上立即“群情激愤”，争相发言。有人说这是反对扑灭反革命，使反革命武装暴乱蔓延和扩大，具体暴露出

^① 《陕西日报》1957 年 8 月 20 日。

^② 《陕西日报》1957 年 8 月 14 日。

韩兆鹗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岳劫恒说：“我要质问韩兆鹗，你和这些反革命分子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原政庭发言说：

“大鸣大放期间，韩兆鹗到处点火煽动，向党进攻，而反革命武装暴乱也发生在这时，联系起来分析，他之所以反对扑灭反革命暴乱，完全是**有目的、有阴谋的！**”

在会上，韩兆鹗解释道：“我当时持不同意见，是看法有错误，而且我希望给县里施一点压力，要他们办。”

韩兆鹗还是不承认有什么动机。据说当时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声讨”他，说他是反革命的帮凶。

李瘦枝在一次会议上着重“探讨”韩兆鹗如何执行章罗联盟指示的阴谋。

他认为韩兆鹗所讲的“匈牙利事件不是什么事件，而是内部争吵”，是有来由的。楚图南揭露罗隆基的文章中，就有类似说法。他认为韩的看法和罗隆基的反动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韩在陕西为章罗联盟进行“上下串连、八方呼应”的配合行动！^①

李瘦枝又说，韩兆鹗是从4个方面进行他的反动活动的：

第一，大发展组织；

第二，积极在外县建立组织，实现章伯钧“遍地开花”计划；

第三，执行章罗阴谋，四出点火；

第四，两方各捞一把，即在民盟内搞韩李同盟，在农工搞韩袁同盟，企图和党分庭抗礼。

他总结说：

“韩兆鹗在人代会检讨时讲：‘我真惭愧，我自己为什么要被章伯钧这样颐指气使的利用呢？’”

① 《陕西日报》1957年8月15日。

“究竟为什么，要由韩兆鹗自己解答！”^①

开了一个多月的民盟整风会议将要结束了，韩兆鹗始终没有给这些代表们以“满意”的答复。韩李联盟问题、执行章罗联盟阴谋计划问题、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问题等等，他一一加以辩驳和否认。

韩兆鹗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在“竭力掩饰反动面目”。有人生气地问：

“你到底是上了贼船，还是贼上了船？”

韩兆鹗当然知道这位发问者想听到何种回答。

○“彻底脱裤子”

韩兆鹗过了一关又一关，陕西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在8月下旬开幕了。

昔日的“胖县长”已憔悴了许多。

韩兆鹗曾说自己“二十年跟着共产党走”，为了批倒他，有人偏要找他的历史问题。

8月27日，余海丰说：

“1936年‘双一二’事变时，在长安南山一带，当地群众王子信组织青年参加红军，韩兆鹗却指派伪保安队打散了这批才组织起来的红军，还骂他们是‘土匪’。”^②

王菊人曾在揭发韩兆鹗介绍反革命分子入民盟时，遭到韩的

① 《陕西日报》1957年8月22日。

② 《陕西日报》1957年8月28日。

当场驳斥。9月1日的《陕西日报》上，也有他揭发韩兆鹗历史问题的发言稿。他说：

“1931年左右，伪陕西省政府要挑一个‘能吏’当安康伪县长，韩兆鹗便被选上了。所谓能吏，就是能勾结当地的土豪劣绅和驻军，能鱼肉人民的反动人物。

“绥德、米脂、榆林、汉中、长安等地，都是‘肥肉’，只有能剥削人民的人才能当这些县的县长，而韩兆鹗都坐过，还博得伪政权的称赞。

“他去重庆当第四集团军办事处处长，我问他咋干，他说：看风头再说。这是他早作两面手法投机的打算了。

“西安事变结束以后，所有当时抗日联军总部所委出的县长，都站不住了，而韩兆鹗一面披着进步外衣，一面当长安伪县长，这说明他和反动派有勾结！”

张正范、张富在人代会上做书面发言时说：

“韩兆鹗在历史上一贯积极的反对共产党，镇压人民革命，杀害革命战士。

“1932年冬我红军从汉中入四川，和1933年夏一部分红军在南郑开辟根据时，他身为县长，不分日夜给敌伪筹办粮饷，以阻击和围剿我红军。

“1932年‘汉中中学生联合会’为义勇军和红军劝募寒衣，韩兆鹗用恶毒手段，将几位进步学生传至县府，亲自利诱软化，说：‘你们不要胡来，应好好上学，如若愿到西安读书，每人给你们一百元，还可在县上领奖学金’，结果企图未遂，他使用武力解散了学联会进步组织。

“韩任伪南郑县长期间，还曾直接或间接捉捕我地下党员、团员、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

“韩兆鹗是以‘反共有功’起家的……

“韩兆鹗一贯狡猾卑鄙和毫无廉耻。他说当县长必须做到三

条：办事要有驴马精神；对上级会耍窑姐手腕；对老百姓要有狼虎心肠。

“……”①

韩兆鹗在民盟会议上对与章罗联盟的答复不令人“满意”，在人代会上，这个问题自然重被提出。

王菊人发言时说：

“远在1945年，民盟准备开个代表会，章伯钧再三叮咛说：‘西北代表一定要把韩处长加入！’其关切心情，见于词色。

“章罗联盟健将曾昭抡揭露，1948年在香港，韩兆鹗经常参加讨论章伯钧‘三分天下’和‘军事行动委员会’。可见那时韩已是章伯钧反共集团中的心腹人物。”②

李瘦枝、岳劫恒、李敷仁和苏资琛四人联合在会上发言说：

“韩兆鹗和李子健结成韩李联盟，贯彻执行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比如他篡改了民盟‘以文教界为主、中上层为主、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路线，而且把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界为重点’的组织路线，改为‘以医药卫生界和工程技术界为重点’，大肆发展组织！

“韩自称与章伯钧系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常在人前称章为‘吾的主’，可见他的忠实。

“韩兆鹗和李子健是师生关系，他们不特在思想认识上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方向上也是一致的！”③

韩兆鹗的“根”被挖出来，接着，就是对他解放后的清算了。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你的家庭订为地主成分不满？”

① 《陕西日报》1957年9月6日。

② 《陕西日报》1957年9月1日。

③ 《陕西日报》1957年8月31日。

韩兆鹗回答：“我只是讲我家里勤俭起家，我先人一贯烧砖瓦，参加劳动……”

“那你们家的砖瓦窑不是靠雇工做活吗？”

“当然得靠……”

既然阶级成分是地主，那他一定是替地主阶级讲话的，有的代表就找来一些证据：

1956年，省水利局在韩兆鹗家乡修水利，工程队拟借他家的空房临时办公，他竟说：‘给地主分的房，地主自己还要住呢’。^①

地主李思白说自己眼不好，有痔疮，不能参加农业劳动，韩就一再向县上建议，让李思白到炭厂。^②

……

5月18日韩兆鹗曾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批评，人代会上，有人把韩兆鹗的话翻出来，逐一进行反驳，说韩想瓦解革命队伍，打垮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说韩所谓“德”就是坚持反动立场，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才”就是欺骗、镇压人民的诈术……^③

韩兆鹗当过教师、做过官，风风雨雨也经历过不少，他曾自信口才不错，但时至今日，他发现无论自己如何讲，都要被当作狡猾，无理辩驳，他真正感到了众口难敌！

韩兆鹗又要交代了，

他想到了在北京的检讨：

“我要正告章罗等人，……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诚恳地把你们的一切反动言行彻底交代出来，认罪悔过，才

① 《陕西日报》1957年9月5日。

② 《陕西日报》1957年9月3日。

③ 《陕西日报》1957年9月9日。

是你们的出路。如再半吞半吐，文过饰非，必当自绝于人民！”

在这次省人代会上，他听到人们讲：

“摆在一切右派分子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彻底脱裤子，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真诚地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人民的宽大，这就是活路；一条是坚持错误，自绝于人民，这是死路！”

“我要活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

“可我得先低头认罪！认罪……”

韩兆鹗好象想通了。

9月9日，韩兆鹗在陕西省人代会上作检讨：

“我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卑鄙的政治野心家，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和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在大家面前是低头认罪，并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

他首先交待了章伯钧的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言行，然后谈到了自己：

“我执行了章伯钧大发展组织的阴谋计划。

“我执行了章罗联盟‘遍地开花’扩大阵地的阴谋计划。

“我到处点火……”

“我把持了民盟和农工党在陕西的领导权。

“我上了章伯钧的贼船，做了贼船上的舵手。

“我一贯诬蔑、诽谤党员领导同志，谩骂、歧视进步的民主人士；在对党的政策方面也犯了一系到错误。

“在给机关学校介绍人上犯了同情不纯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由于我满脑子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死守着旧的军阀、官僚作风……”

“我诬蔑了苏联。

“……”^①

^① 《陕西日报》1957年9月9日。

韩兆鹗交代完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也戴到了头上。

.....

事情还没有结束。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韩兆鹗大胆地喊出“这难道是真正热爱毛主席吗？”

1970年，韩兆鹗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被隔离审查，终于冤死监狱。

1980年，韩兆鹗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纠正，他的骨灰被隆重地移放到西安烈士陵园。

死者长已矣！

愿韩兆鹗安息！

潘大逵·“谁言蜀中无大将”

潘大逵，1957 年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 “‘百家争鸣’ 就是百家争人”

虽然罗隆基先生至死仍断然否定自己和宿敌章伯钧之间有过联盟关系，今天与人谈 1957 年反右，我们还是必提“章罗联盟”。1957 年，章罗联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更确定无疑地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动统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它上有头目：章伯钧、罗隆基，下有遍及全国的众多喽罗，单说长江沿线便一字排开罗隆基手下的三员大将：上海，陈仁炳；武汉，马哲民；在四川，便是潘大逵。

潘大逵确是一块将才。他早年留学美国，曾被公推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学成归国后，曾与宋庆龄等人为营救救国会的“七君子”，而发起“自动入狱”。抗战期间，他在四川省参议会，不畏强暴，仗义直言，赢得一方群众的仰慕，但终因言辞激烈，触怒当局，被迫辞职避走云南。在昆明，他为民盟云南支部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又只身劝说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弃暗从明，为人民解放事业再立功勋。

就是这样一位勇猛多谋的能人，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1957年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几成历史遗物。

1957年5月，中共开始“开门整风”后，中共四川省统战部召集在川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著名人士座谈整风，鼓励他们大胆“鸣放”，助共产党一臂之力。

潘大逵仍是那么心直口快，在座谈会上，他毫无顾虑地倾吐了自己的忧虑和不满。他认为，民主党派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是“忽隐忽现，若有若无”；党外人士的地位是“有若无，实若虚”；^①“党与非党之间，仍有一道墙。是某些共产党员优越感造成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就和党外朋友生疏起来，他们认为再和以前一样，就缺乏共产党员气魄”。^②他一再提出民主党派应参加学校的“设计”、“排演”、“导演”工作，强调民主党派在国家中的作用为“三缺一”，民主党派是桌子的一只脚，缺了一只脚就站不稳……

潘大逵就这样痛痛快快地鸣放了一个月。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声怒吼，政治风向大变。潘大逵在座谈会上的那些谈话，一夜之间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自己也成了座谈会上被攻击，被指责的活靶子。在会上，在报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13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上，不断有人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6月21日，民盟成都市副主委，成都工学院主委康振黄对《四川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潘大逵的反党言行。说他曾在盟内的会议上散布：“今天知识分子问题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毛主席已建议取消学校党委制”，“四川省委领导没有决心把整风搞彻底”等错误言论。

民盟西充支部主任委员阳承一揭发，潘大逵曾在民盟干部会上说：“现在是百家争鸣，也是百家争人的时候。两年以后的中国形势要变，所以要大量训练盟的干部。”潘大逵还提出“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平起平坐”作为民盟的政治口号，提出共产党与民盟之间先有政党与政党的关系，然后才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①

民盟四川省副秘书长赵一明公开承认，在整风中，潘大逵曾给他四点指示：（1）脱离党的领导，强调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平起平坐；（2）改变政治协商的内容；（3）强调改善民主党派工作条件；（4）要鸣要放，但是不要方向……^②

潘大逵并没在意这些揭露和指责，他忙着准备去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

○友情、“真理”、内情

在反右运动中召开的这次人代会自然也把“反击右派”作为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章伯钧、罗隆基被毛泽东公开点名后，揭露、批判章罗联盟就成了各省小组讨论会的中心议题。

^① 《四川日报》1957年7月10日。

^② 《四川日报》1957年7月13日。

在四川小组内，与罗隆基交情深厚的潘大逵受到了代表的质问、批判。7月8日，潘大逵在小组会上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言行，也开始揭发罗隆基。

他说，罗隆基企图用他所希望的“亲美的中间路线”，来反对中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他指责罗隆基仍在搞宗派阴谋，揭露了罗隆基进行阴谋活动的方式，说罗隆基等人的阴谋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与党分庭抗礼的本钱，而方法就是歪曲传达，利用他们的地位散布似是而非的消息，让小集团中的人接到指示后，到地方按指示工作。

他承认：“我就是参加了他们这样性质的宗派和阴谋活动的一人，并且我在四川也就响应了他们的主张，执行了他们的意见。”^①

7月9日，彭迪先、曾庶几、刘承剑、刘兰畦在人代会上联名作了长达八千字的发言，揭露章罗联盟在四川的阴谋。

他们揭发，潘大逵对章伯钧的设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十分赞赏，曾说：“章伯钧搞了多年政治，感觉敏锐，他的主张很有政治见解。”根据章伯钧的思想，潘大逵在省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民主党派应当参加各大专学校的设计、导演、排演的工作。潘大逵宣扬的“政治自由”十六字口号是从章伯钧那里拾来的……潘大逵在四川公开支持罗隆基设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平反”还要包括“三反”“五反”在内。

他们还揭露，潘大逵在一次宴会上附和罗隆基的反动言论，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据我看来还是一个问题。”潘大逵坚决支持罗隆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意见，在座谈会上，借反映别人意见诬蔑“党把知识分子当狗屎都不如，还不如坐监狱，监狱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还有人道待遇。”^①

.....

在人代会上，潘大逵的处境日益艰难，他必须在小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交代自己的“罪行”。在大会发言中，毕鸣歧、费孝通、储安平等人公开承认自己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

7月15日，潘大逵也被迫在大会上认错。

他说：“我现在以沉痛的心情当着全体代表面前，老老实实地交代我的问题，诚诚恳恳地承认我的错误……”

他再一次公开地揭发罗隆基：“我与罗隆基从小同学，熟识多年，回忆起他过去的一切，才认识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得寸进尺，欲望无穷、专搞宗派的野心家。”

潘大逵列举了罗隆基搞宗派、拉小集团的七件具体事例。

他指责罗隆基是一个只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一贯反苏反共的阴谋者。

接着，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言行：

“我对盟的工作安排、人事调整，都往往由盟自己作决定，而在事后才告诉统战部一声。我对四川党的领导进行诬蔑，企图挑拨党与党、党与群的团结关系，妄想削弱党的威望，抬高盟的地位。这是十足的英美资产阶级政党的恶劣作风。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我完全接受了罗隆基和费孝通的意见。因而在成都作传达的时候，只是宣扬了他们二人的主张而忽略了胡愈之与楚图南的意见。我也夸大‘肃反’、‘思改’中的偏差，因此我不但影响了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甚至发展了他的范围和内容。在学校党委制问题上，我不加辨别地接受了章伯钧的错误传达，也跟着说党委制过去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损失，因而主张专家治校。在鸣放中，我主张毫无标准的鸣放；甚至说鸣放精神不应限于学术，也可以适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

用于政治，互相监督应限于组织等谬论……”^①

○“无形组织”与 “有形集团”

人代会结束后，潘大逵一回成都便被通知去参加民盟四川省委和民盟成都市委举行的联合扩大座谈会。

与潘大逵有二十多年交情的刘坤南在会上揭露，有一次潘大逵宴请他。席间，他发了一些牢骚，潘对他说：“只要好好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团结得紧，把过去的熟人联系起来，你就站得起来了，……长期共存方针提出后，民盟要独立自主了，盟内选举也可以不通过统战部。”

刘坤南指责潘大逵有意拉拢他，并挑动他对党的不满情绪。

张声明揭发潘大逵对右派分子高兴亚十分赞赏和同情，并时常为高鸣不平。

赵一明也在会上交代；潘大逵在四川搞了一个“无形组织”，组织的核心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冯克熙、李康。潘大逵采用各种方式，传达章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张，并及时向章罗汇报四川的情况，做到上传下达，连成一气。^②

7月27日，潘大逵被迫在联合扩大座谈会上交代自己与章罗联盟的关系。

他交代，他参加了罗隆组织的小集团，他们曾在1952年宴请统战部长李维汉，一方面向李“示威”，一方面谋划排挤周新民等盟内先进分子。今年民盟4月工作会议前夕，他参加了章、罗主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② 《四川日报》1957年7月22日。

持的八人座谈会，会上主张民盟今后要大发展，章伯钧认为国际和平运动由共产党搞不起来。章、罗二人都指示他要大鸣大放、大发展。

他承认，自己秉承罗隆基的指示在四川搞了一个阴谋小集团。

他揭发，罗隆基在成都视察的目的在于发现党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实现垄断知识分子的野心，罗隆基还多次指示他今后民主党派的工作不要去向党请求，章伯钧一再强调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

关于康振黄揭发他曾去成都工学院“点火”一事，潘大逵承认康所揭露的都是事实，他同时又指出康振黄在他去成都工学院时，也供给了他一些关于成都工学院肃反中的偏差的材料，因此，他也就接着说了康所揭发的那些反党言论。^①

此时，四川的反右运动已经深入到了中小城市。自贡、内江、南充、雅安、绵阳、宜宾、乐山、遂宁等地的反右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潘大逵被牵扯进了一桩又一桩右派大案中。

在南充，民盟南充市副主委吴某交代，他参加了潘大逵的‘无形组织’，“执行了上面交来的放火安排和步骤。”与潘大逵上下呼应，八方配合。

在乐山，民盟乐山县支部副主委盛泽荣揭发，潘大逵去年8月组织的“民盟在职干部轮训班”实际上是“特别干部训练班”，“潘大逵妄图有计划、有组织的具体培养一批基层骨干，接受自己的一套反共纲领，去基层点火。”潘大逵还一再向受训者强调，要明确“新的形势”，民盟不但要向党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就是骂娘骂老子都不要紧，还要敢于提出党的政策方针上的缺点……潘还污蔑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号召盟员向党进政。

7月31日，赵一明在座谈会上再次揭发潘大逵。

^① 《四川日报》1957年7月29日。

他揭发，在4月，潘大逵和他一道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七楼召开的讨论取消高校党委制问题的会。潘大逵不仅在会上积极支持取消党委制，而且还要张声明把会议的内容整理出来交《四川日报》发表。

赵一明承认：“在取消党委，我自己起了组织作用，潘大逵起了领导推动作用，蒋文钦起了鼓动作用。”

他公布了在鸣放期间潘大逵给他的具体指示：①不要限制，不要清规戒律，像孙大雨在鸣放中拍桌子、打板凳都可以。②不要悲天悯人，人要杞人忧天，不要社会主义方向。①

面对别人的揭发、斥责，潘大逵一再表示自己愿低头认罪，把一切问题都交待清楚。可在每次认罪之后，他所得到的并不是善意的宽恕，而是越来越多的责问、指控，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张开的口想闭也闭不住了！

他与章罗联盟的关系仍是别人追逼最紧的问题。8月1日、2日，他再次交代了自己与章罗“狼狈为奸”的事实：

他不厌其烦地交代自己在4月间与罗隆基三次密谈的情况。他揭发，罗隆基在谈话中歪曲的分析形势，鼓动他大力发展民盟组织。罗还攻击民盟内部的其他领导人，有意在盟内制造分裂。

潘大逵也承认自己在4月10日召集民盟地方组织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传达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的精神的真实目的在于：要求盟员大胆鸣放，把党的缺点摊出来，以削弱党的领导，争取群众，提高盟的威信而有利于大发展。他也承认，曾指示自己的哼哈二将——赵一明、张松涛去基层鼓动不加限制的大鸣大放。

与会者对潘大逵这种“消极怠工”式的认罪检讨十分不满，他们再次警告潘大逵，要他争取主动，不要犹豫徘徊、自寻绝路。

8月3日、4日、5日，座谈会继续举行，从《四川日报》对

① 《四川日报》1957年8月1日。

开会情况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潘大逵虽然不断地检讨、认罪，但与会者仍然认为他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

三天之中，他交代了三个问题：

（一）反对党委治校问题。潘大逵在补充交代中再次揭发，罗隆基曾提出：民盟应当垄断知识分子，应当包办知识分子工作。他也承认，自己布置赵一明等人去成都工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大学煽动师生提出取消党委的要求。

（二）联络盟内右派分子把持盟务。他承认：自己曾计划把右派分子罗忠信、曾庶凡拉进自己的右派小集团。

（三）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他承认，在北京开人代会期间，先后和陈新桂、马哲民、张志和、范朴斋有过私不活动，曾和范朴斋订立过攻守同盟。

在别人的一再追问下，他承认曾为经常给自己的妻子看病的医生傅世春的哥哥代交两封“申冤”的信。在北京，他没有找到投信的机会，回成都后要妻子悄悄把信退还给傅世春，还与傅订立了攻守同盟。^①

其实，潘大逵并没有在关键问题上避重就轻。他一点也没放松对罗隆基的揭露。

8月9日，他在会上揭露：罗隆基企图把持盟务以实现其夺取文教界领导权的政治野心蓄谋已久。从1949年起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到1956年罗隆基和章伯钧合流组成章罗联盟以后，企图取消党在文教界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达到了高潮。^②

○四面楚歌欲何求？

① 《四川日报》1957年8月6日。

② 《四川日报》1957年8月10日。

潘大逵在联合座谈会上的交待还没有完结，他又不得不参加另一个会议——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在省人代会正式开会前，各地的代表聚集成都，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们并非为了准备议案，而是坚决、彻底地反击右派分子。

潘大逵被分在重庆代表组里。他一再表示自己有罪，决定“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他第一个要求发言，说自己决心要坦白交代，他交代了将近一个小时，除了早已披露的那些言行外，没有一点新意。代表们问道：“有 没有新鲜货？”

潘大逵犹豫起来，他支支吾吾地说：“过去是在民盟内交代的，许多人不知道……”

有代表打断他的话，质问：“章伯钧、罗隆基在北戴河密谈有 你，你和舒军、李康、胡克林在重庆南温泉、西郊公园、重庆宾馆也先后策划过，搞些什么鬼把戏？谈些什么私房话？”

潘大逵慢吞吞地说道：“在南温泉，我向胡克林说过，想把他调到省里工作。没说其他什么。”

肖清华激动地说：“你们在虎啸口，看见解放前马哲民叛变革命后住的房子，你不胜感慨地说：马哲民解放前受过苦，有功劳，解放后不被重视，像我们一样……说过没有？这是胡克林交代的，有这么回事吗？”

潘大逵一怔，断断续续地说：“可能谈过。”又急忙改口：“记不清了。”

川剧艺人张德成嘲笑道：“不要紧的话你记得很清楚，要紧的话却记不清楚，你的记性怎么这么怪？”

潘大逵觉得如坐针毡，把头垂得更低了。^①

8月14日，潘大逵在小组会上作了第四次检讨，他还没有讲完，便被萧清华打断。萧清华质问：你究竟在整风中作了什么布置？雅安、重庆、成都等地的“火”是怎样放起来的？你拒绝交代阴谋活动，是不是想留下火种将来再进行罪恶活动？”

列席会议的程占彪揭露：潘大逵不仅早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右派分子，而且一个顽固的亲美崇美分子。他曾说：“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我们打胜仗，是美国没有拿出力量来。”

萧清华等人揭露，潘大逵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由来已久。他在清华读书、美国留学、在上海法学院教书、参加救国会期间，都一贯与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抗战时，他一面主张民主，一面和张群往来，参加伪参议会。1940年又参加了国民党。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后，他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去美国领事馆“避难”，1949年，他还与美国领事勾勾搭搭，美国领事曾给他小孩美金。

8月26日，是大会讨论。潘大逵受到了空前严厉的批判。

田一平在他那篇长达万字的发言中详细披露了潘大逵在四川执行章罗联盟反动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指出：“潘大逵右派集团同我们的分歧，其根源在于阶级立场的截然不同，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同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针锋相对的……”

周绶章以《揭露潘大逵的丑恶面目》题作了发言。他说：“潘大逵虽然出身于封建阶级，但从他的社会关系、所受教育和服务对象看来，是一个满脑子浸透着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寄托希望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

何允夫详细揭露了潘大逵、赵一明等人制造四川农学院迁院

^① 《四川日报》1957年8月20日。

事件的言行。他指控，“迁院事件”是潘大逵等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件，是他们企图在中国搞匈牙利事件的试点。^①

《四川日报》报道了会议进行的情况：

“在代表们愤怒的眼光逼视下，章罗联盟四川代理人潘大逵，披着革命外衣实际上却踏着革命者的尸体往上爬的张志和以及用心险恶阴谋诡计多端的范朴斋昨天在会场里显得狼狈不堪，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在全省人民的代表面前终于暴露无遗！”^②

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纪希晨的文章《四川的右派群丑》，纪希晨以辛辣的笔调揭露、批判了以潘大逵右派集团的言行。潘大逵的名字和“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名称一起传遍了全国。

8月31日，已是四面楚歌的潘大逵在省人大会上公开认罪。

他揭露：罗隆基的所谓“无形组织”实际是一个反党小集团。章罗联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策略。它的反党、反人民、以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亲美反苏、反共；妄想改变党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而变为中间路线的亲美政策；并阴谋首先夺取党的文教领导权，以图最终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策略是扩大队伍、造成混乱、由民盟来收拾残局。

他承认，自己自愿走上了章罗联盟的道路，响应并执行了章罗联盟的阴谋。

他交代了自己向党进攻的六项阴谋：

- (1) 支持章罗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
- (2) 拥护招兵买马、扩大盟的组织，企图实现与党分庭

① 《四川日报》1957年8月27日。

② 《四川日报》1957年8月17日

抗礼的幻想；

(3) 反对党委治校，妄想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4) 假借执行民盟工作会议决议来贯彻章罗联盟的乱鸣乱放和四处点火的计划；

(5) 有意曲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义，幻想提高盟的地位；

(6) 诬蔑抵毁党的领导，妄图挑拨党群关系，削弱党的威望。

他认为，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根源的。是：

(1) 由于封建地主家庭出身和资产阶级教育限制了革命性，使他成了一个可鄙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并走上了改良主义和中间路线。

(2) 由于长期的美帝教育影响，有严重的亲美崇美思想，染受了英美民主的超阶级、超政治的反动观点。

(3) 由于出身、教育和二十年教授生活，使他脱离实际、轻视劳动，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

(4) 由于参加救国会和民盟使自己的丑恶言行得到了掩护，助长了个人名誉地位的欲望，妨碍了学习和进步。^①

9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的位置用大号黑体字向全国人民通报：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以潘大逵为首的右派阵营，在人民群众上下夹击，内外会攻之下，已全线瓦解。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撤销了潘大逵民盟中央委员的职务。

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了潘大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潘大逵所任的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职务也相继被免去。他成了被打入另册的人，感到自己像一个麻疯病

^① 《四川日报》1957年9月1日。

人，像个印度贱民，无敢来接触。

1961年，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不白之冤却未澄清。在接踵而至的“文革”中，他又遭到严重冲击。

1980年，他被彻底平反，官复原职，并兼四川省文史馆馆长。此时，他虽已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回忆文章。

虽蒙厄二十载，他仍是那么坦诚直率，心直口快。1989年春，他为教育问题面责四川省长。此举曾一时传为美谈。

林希翎·“魔鬼戴上了天使的面具”

林希翎，女。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

○基本论点派、精神支持派 和沙里淘金派的垮台

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当然也是新中国大学生的命运的一次转折。

遗憾的是，当时的莘莘学子们，大都只是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人生命运的颠簸震荡后才明悟这界碑年代丰富而又痛苦的涵义的。

对于林希翎，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高材生而言，也许她在当时已深刻认识到1957年界碑性的沉重代价。

1957年5月下旬，正当学生们热望着参加“大鸣大放”的时候，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和副书记聂真、邹鲁风分别向全校学生作了几次动员报告，号召大家大胆地揭发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宗

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改进学校的领导工作。

这时候，工经系讲师葛佩琦和王德周却“乘机散布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在同学中，也出现了一股歪风。”^①

为此，《中国青年报》特约专稿，以醒目的篇幅报道了人大林希翎这位法律系学生的“反动言论的破产”经过。

报纸指出：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即林希翎，林希翎是其笔名），她对我国许多重大政治问题，曾表述过种种反动见解。许多同学怀着不同的心情，要求她讲演，以便展开辩论。校学生会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设立了“自由论坛”，于5月底和6月初，分别举行了两次大会，有数千学生和教职员参加，请林希翎讲演。林希翎在城内和西郊的两次讲演中，用大量道听途说、夸大捏造的事实、“左”的煽动性的词句，发表了如下论点：

第一，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三害”的根本原因，要从社会制度中来找。她主张必须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不赞成改良主义。她认为整风是改良主义。

第二，关于“以党代政”问题。她认为我国以党代政问题是存在的。她又把共产党员分成了几类，一类是“混蛋”。她说：“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的有多少？”因此她主张“清洗一大批混蛋”。她说另一批是一批中等的，虽然不坏，但思想僵化，因此应该动员他们退党。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入党呢？林希翎说应该有70%以上的群众同意才可以入党。她又说老干部正在腐化或已经腐化。

第三，关于肃反问题。她说我国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十五贯”的现象太多。她污蔑现在法院的领导是继承过去统治的做法、地主恶霸的作风。她煽动说：可惜中国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究竟有多少人被害呀？

第四，关于民主问题。林希翎竟然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她说她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6月24日。

自己就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选票上写打油诗。因此她大喊大叫地说：我们要求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的民主。她还煽动地问听众：你们感到做过主人吗？你们究竟取得了什么民主权利吗？

第五，关于对现实不满问题。她说，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当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如果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因此她反对把今天社会的进步与过去国民党统治作比。她说这样作是唱廉价的赞美诗。

林希翎的这些讲演内容在听众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热烈鼓掌的有，羡慕和激动的有，义愤填膺的也有。会后，三人一堆，五人一簇，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报纸评论说：少数同学在林希翎讲演的感染下，“伤风感冒”了，特征是“嗅觉不灵。”他们大致可分为三派：

基本论点派：他们不仅支持林希翎的基本论点，而且还按照自己的愿望发挥其论点，所以被称为基本论点支持派，简称基本论点派。新闻系学生虞耀麟是基本论点派人物。他向人们宣称他支持林希翎的基本论点。有一位同学宣布：“即使大家把林希翎的基本论点批评倒了，没有一个支持她，我还是支持她！”

精神支持派：这一派人物虽然认为林希翎的论点是错误的，但她那种敢说敢道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称林希翎年轻、勇敢、有为。他们说自己虽不在公共场合宣布站在林希翎一边，但精神上是支持她的。

沙里淘金派：这一派人认为，虽然林希翎的论点有许多错误，但其中还有闪光的东西，有可取的地方。根据恩格斯辩证法的思想，应该吸收其精华，舍弃其糟粕。所以这一派人便被称为沙里淘金派。

林希翎的两次讲演后，人大掀起了大辩论的高潮，辩论会次数增多，参加的人数成百上千。当然，这些辩论会中，林希翎是主角。然而，林希翎的主角在当时却是以丑角的形象出现在讲台上，这是形势使然。报纸的报道，林希翎也是以丑角面目出现。

《中国青年报》载：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会中，当有人对林希翎的论点提出强有力的驳斥言论时，那些支持林希翎的人就听不顺耳了。特别是当人们鼓掌欢迎这个发言时，他们就更加愤怒了，于是会场上喊叫声、鼓掌声乱成一片。一位同学强有力地驳斥了林希翎的论点之后，他刚一下台就被几个支持林希翎的人包围起来，声称要与这位发言者闹一闹。这种情况，经过主席的几次说服，才能平静下来。

正当人大学生双方大论战不休之时，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的言论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指责。中共中央的喉舌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预示着中共中央反右的决心，同时也预示了当时的政治动向。于是，在人大，“嗅觉不够灵敏”的同学，他们的嗅觉也开始“灵敏”起来。

这时候报纸上披露了一件事：人大新闻系王嗜学同学由于在报上发表子反对右派言论的意见，便收到一封匿名信，威胁他要“当心狗命。”这封信使许多同学十分愤慨，表示坚决支持王嗜学同学，都决心参加到反右斗争中去，原来支持林希翎的部分同学也参加了这个斗争。

二十多天的论战之后，有一次辩论会结束时，主席再三地问：“是否还有人支持林希翎的发言？”

这话问得极有意思。

当然会场上只能以沉默作为对主席的回答。

主席又大声问：

“哪位支持林希翎的观点，请上台发言！”

回答他的是沉寂的人群，谁都明白，冒众人之不韪的孤独的下场。

后来有人要求发言了，他们不是支持林希翎，而是上台检讨，批判自己错了，以前受了林希翎的蒙骗。

洪有仲非常气愤和沉痛地说：“我本来是完全支持林希翎的。

并且说过，即使你们把她完全批倒了，我也不会服气，也要支持到底。因为我被她说的我们社会上的一些缺点迷惑了，我很气愤，我想新社会还有这种不合理的事，于是我自己就不冷静了，别的同学批判林希翎我也听不下去了。但是，在我认识到林希翎的观点是错误的，也看到了她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在辩论会上，她走来走去，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在她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时，不承认错误，并且还说：‘那是我们和你开开玩笑罢了’！特别是同学们揭露了她所举的许多事例是捏造的，我把气愤都转到了她身上，我知道自己上当了！……”

支持林希翎的，基本论点派瓦解了，沙里淘金派沉默和转移了。精神支持派连精神支持也不敢了。

一个同学怀着深深的悔恨，沉痛地说：“我们忘了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的话：‘对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由于这些运动的教训，我们今后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金玉良言。”

○ 人啊人·鉴别毒草与香花

人大不会很快风平浪静，就象中国不会很快风平浪静一样。

对林希翎的揭发和批判继续进行着。按照报纸上的说法：同学们鉴别毒草和鲜花的能力也越来越高。

东方中医理论，大凡有毒之物，皆可入药。毒性愈强，药性愈佳。故蝮蛇之毒可克顽症，每克价值十多万金以上。以此推之，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皆可作良医了，因为他们鉴别“毒草”能力日积月累，渐为高强。

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刊出了新华社记者郑伯亚、丁宝芳的专稿《毒草识别记》一文，副标题：“中

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作者开宗明义，写道：受骗者觉醒了。并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洪有仲的话：

“一杯有颜色的毒水我决不会喝，然而一杯看来是清亮而无颜色的毒水我却喝下去了！”

郑伯亚、丁宝芳并用充满了阶级爱憎激情的笔调写道：

一个热心探求真理的青年，当他一旦发现过去误以为真理的东西原来只是一杯无色的毒水，而真于是真理真正在他的面前发出耀目的光芒时，他该是多么沉痛，又是多么欣喜呀！

随后，作者综述了5月底至6月下旬人大论战彻底打垮林希翎的经过。并引用了林希翎孤立的事例：支持过林希翎的历史系同学童金怀，在一天晚上的辩论会中，知道了林希翎的真面具后，第二天走到副校长聂真面前说：“我错了！”

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此文又引用了洪有仲的话：……洪有仲同学，把辩论会看成是生活里难得的一课。在6月17日的一次辩论会上，他沉痛地诉说了被林希翎俘虏的经过以及转变的过程。他说：“……总之，我糊涂了，开始失去了平衡，开始以冲动代替了理智……林希翎，你挑拨了我和党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削弱了我对党的热爱的程度，我不能不骂你是恶棍。”

郑伯亚、丁宝芳的报道最后写道：演讲中她一再说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帮助党整风的。可是，一直到现在，当她的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被彻底揭穿的时候，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动论点。27日，还在偷听共青团员们开会的情况。

她到底赞成什么，追求什么呢？现在请看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周所揭发的林希翎生活的一个场面吧！

有一次，“百花学社”（北京大学的一个反动小集团）的几个同学在林希翎的宿舍里谈心）当时百花学社的王国卿说：

“要斗争到底，没有自己的刊物不行。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

复杂的，而整风运动是短期的，因此……”

林希翎接着点点头说：

“对，对，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给我们提供了这条经验。”

王国卿说：“刊物要印好，要多印些，要发行到全国，把火点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去。”

林希翎毫不在乎地说：

“我去找‘文艺学习’联系一下，叫他们帮助印刷，发行由我负责。”

○ 玉门之行·野心未死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玉门石油工人报樊廉馨的来信。其信内容如下：

编辑同志：

我以愤慨的心情，揭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右派分子林希翎在玉门油矿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去年8月份，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玉门油矿采访。可是这位“记者”和别的记者大不相同，她一到玉门油矿就到处点火，闹得玉门油矿满城风雨。她每见一个工人就问：“有冤吗？不要怕，讲出来，我为你申诉。”她曾经公开侮辱玉门油矿的工作是“一团糟”，辱骂玉门油矿的领导都是些彻底彻底的官僚主义者，并说这些官僚主义者“都应该枪毙”。更恶劣的是，她随便在玉门油矿发号施令。例如地质调查处野外勘探队有一个青年申请入团，虽然支部大队已经通过，但因为历史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团委当时就没有立即批准。林希翎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质问调查处团委：“你们为什么不批准她入团？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限你们在最短期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要给你们写‘辣椒’（指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讽刺副刊）了。”

林希翎在玉门油矿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怀

疑，特别是对她专找“辣椒”材料这一点不可理解。最近，我们从人民日报上才知道她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实质，就是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

林希翎不但自己不写玉门油矿的好人好事，反而反对别人写。新华社驻矿记者姚秉鉴同志曾发过一条“玉门油矿多方改善玉门油矿野外工作人员生活”的消息（完全符合事实，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可是林希翎当面就侮辱姚秉鉴同志是“捏造事实”，她认为“野外人员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林希翎的真实面目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公民，我应该把它揭发出来！

人民日报既然刊登了玉门油矿揭发林希翎的来信，中国青年报若不行动就意味着什么来了，因为林希翎是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一同去玉门采访的，并且是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身份去的。所以，在人民日报刊登以上群众来信的第二天，即1957年7月6日，中国青年报也就登载了其记者陈棣、崔国华的揭发文章。题目：我们在一路上看到的——林希翎去玉门干了些什么。

文章中说：去年8月，我们曾到西安、兰州、玉门油矿一带了解有关青年生活中的问题，林希翎也跟我们一起去了。为什么带她去呢？本报去年6月曾刊登过批评林希翎的一篇文章——“在灵魂深处长着浓疮”。那篇文章所批评的事实，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批评过重，某些事实也有出入，不符合党的爱护青年，耐心帮助青年的精神。为了弥补这次批评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报纸除了当即在报上作公开的更正和检讨外，本报领导上还决定让她一起跟我们去玉门，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她精神上可能受到的刺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她更多的接触和体验实际生活，这样对她改正错误的思想意识是有好处的。

没有想到，原来林希翎在那个时候就对党深怀不满，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她趁下去的机会，就别有用心地施展她的卑

鄙手法，专找我们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发表荒谬言论，动不动给人乱扣官僚主义的帽子。在她的眼睛中，从西安到玉门，我们的工作是一团糟”。在火车上因买不到火车硬席卧铺票，大骂列车长是“混蛋”。

同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了林希翎原工作部队单位集会声讨她的消息：7月5日下午，原空军某团的部分军官（营长、营教导员、指导员及参谋等）集会声讨右派分子林希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她在人民大学所吹嘘的“在部队的光荣历史”。首先发言的是该团连指导员耿开盛同志，他说：

“程海果在部队时，就已表现出她的反党情绪，她往往抓住工作中个别错误对党和政府大肆攻击。”

石峰说：“她在部队时就表现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谁都瞧不起，骂政治处主任是“无能”、“愚蠢”、“官僚主义”。对战士则利用她是文化教员的职务进行无耻地拉拢，硬叫战士称她为‘亲爱的程海果导师’。她这种领袖欲到人民大学后发展更甚，以致于变成了狂妄的野心家。她曾对我吹嘘，校长几次叫她去苏联学习，人民日报请她去当评论员。”

7月23日，人民日报又根据中国青年报消息，发出了一条新闻：林希翎野心未死还在挣扎。

11日（邮戳时间），林希翎从北京给她的同党武汉大学右派首领吴开斌寄去了一封航空信。在信上，她颠倒黑白，诬蔑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和报纸对她的揭发和批判是捏造和歪曲，说“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她并在信上说：“关于借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注：即她从中央某机关偷出的一份国家机密报告）给你看的事以及我给你的信交了说了没有？若未说，若别人均不知道的话，那请千万别说。因为我的‘罪名’已够多了。若已说了，就写封长信给我，告诉我说说了些什么。”她为了销毁她的罪恶痕迹，还在信的末尾上注了一笔：“此信阅毕焚毁，切切！”

可是事不凑巧，当此信寄到武汉大学时，同学们在反右派中已提高警惕，虽然信封上写着“内详”二字，但同学们一眼就认出是林希翎的

来信。吴开斌看到已被群众发现，只好将信交出来。

○ 害群之马乎·报纸答曰： 是害群之马·但漫画上 分明是一只雌狐狸

对林希翎的揭发和批判，越来越尖刻。从表象看实质。从现在看过去。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

林希翎是害群之马，这是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7 月 12 日在第五版上给她定的性。

值得玩味的是，在中国青年报同日同版上，有一幅漫画，漫画中三只狐狸分别贴上谭惕吾、黄绍竑和林希翎的名字标签。以狡猾的狐狸喻人，这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吧。

对林希翎的揭发，深入到她的家庭出身和她的过去。

有人撰文说：

“林希翎在平时，特别是她疯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总是先表白一下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我家庭是贫农成份，从小吃苦、受罪。并以威胁的口气说：‘有人查过我的历史，结果屁也没有查出来；我做工，有工人阶级的觉悟；我十三岁参加革命，今年才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在部队养成了战士作风’。

“看，林希翎为自己涂抹了一层多么鲜艳的胭脂。其实，这是胡说，别有用心，迷惑人。

“林希翎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遗弃了前妻逃之夭夭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被丈夫遗弃以后，她把一切寄托在长女身上，教育女儿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的外祖母，也常常教育外孙女，要争名夺利。林希翎把从母亲、外祖母、父亲

那里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要不流芳千古，便遗臭万年。’

“1949年10月，林希翎，就带着这种资产阶级的觉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附带声明一下，林希翎的母亲最近千里迢迢给女儿来了一封信，其中一句是‘自从你十六岁参加革命’，母亲不知女儿在年龄上要的花招，这就真实地暴露了林希翎的“十三岁参加革命”的谎言。

“林希翎参加革命以后，的确没有辜负母亲和外祖母的教育，时刻幻想高人一等，飞黄腾达一番。

“可是，革命部队严格的军事纪律，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林希翎的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她在部队三年零十个月，除了养病两年以外，其余一年多的时间，辗转调动了十三次工作。

“1953年8月，林希翎离开了部队，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她每见到过去在部队上认识的同志时，就夸耀一番：‘大学毕业以后，就当法学专家了啊。’

“林希翎把学校图书馆小说上的插图随便剪下来，贴在自己寝室墙上，说这是为了锻炼性格；她可以在退出伙食团之后，又自由地到食堂里去吃饭；她可以随意谩骂同学是‘混蛋’；当自己需要时，她可以随意到同志们家里去借书，当别人需要用而向她索还时，她可以破口大骂别人吝啬鬼。

“她写了一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说来可笑，她写这篇文章时，不仅没有系统里研究过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就连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书，也没有研究过，仅靠《托尔斯泰日记》、《巴尔扎克品传》和几篇其他人发表的文章，东拼西凑地写了一万多字。……

“当编辑部通知林希翎决定发表她的论文以后，这位文坛上的‘新生力量’，就向同学借钱买烟卷、喝酒，并扬言马上就可以得到一大笔稿费。论文发表以后，‘新生力量’又忙又喜，忙的是四处通知亲友看她的论文，乐的是，这一下，‘我，林希翎便要由一个学生，一跃而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个人物了’。

“这时候，中国青年报文艺部、文艺学习、文艺报等编辑部都先后和这位‘新生力量’结识了，他们本想至诚帮助这位年轻人，可是她却一会一个电话要求编辑部给他准备星期六的舞会票，一会一个电话要求编辑部给她购一张苏联国立歌舞剧院的演出票，一会儿又打电话要编辑部准备她星期六进城住宿的地方。

“她处处以青年作家自封。有一次，她在部队时的一位要好同志来看她，看见她又抽烟，又喝酒，问她怎么变成这样了？她说：‘大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灵感搞创作。’还对这个同志说：‘我现在跟过去不同了。校长和老教授都那样尊重我，学校还想送我出国留学，这些我还没考虑好，我现在正写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电影剧本，我想把你也写进去。你要是想到我这里来，我马上建议把你调来’。

“看！资产阶级思想使得她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了！

“其实，她早已不讲道德了。例如，有一次她拼命追求一个男同志，这个同志说：‘你和我，都是有了爱的人的人，这样做不道德’。她立刻怒火冲天，说：‘什么叫道德！道德不过是一句空话！’”^①

在报纸上，林希翎已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了。

但，“揭露”和批判没有结束，斗争不是尾声。

○行凶者·罗曼蒂克史·谋士的命运

^① 1957年7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如何本事高强，林希翎毕竟只是一个女学生。

所以，对林希翎的揭发，自然而然地要联系到右派大头目身上。

林希翎和他们之间有联系么？是什么联系，又是如何联系的？《中国青年报》的回答足以使当时的国人相信之至。

“从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发言中，和民革中央小组会上所揭发的材料来看，原来黄、谭（笔者注：指黄绍=、谭惕吾）是林希翎背后的撑腰者。林希翎在人民大学学生的辩论会上交待了她和谭惕吾的关系。

“林希翎发表反动言论后，曾经一度离校到谭惕吾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并在那里同黄绍=长谈了几个小时。此后林希翎又返校继续猖狂地煽动学生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黄绍=、谭惕吾和林希翎的政治关系，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有人继续作了揭露。许宝騄在会上用书面提出了谭惕吾同林希翎在电话中订“攻守同盟”的诡计，谭要林希翎按照她的意图进行检讨，并将民革向林希翎调查她们之间的关系的几个问题，告诉林希翎写成一式两份，一份寄给李济深主席亲启，一份写给谭惕吾本人。

“屈武也揭露了黄绍=在人们面前盛赞林希翎这个年轻学生公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值得钦佩，并对她寄予无限的同情。”^①

这个时候人大校内又发生了一起“行凶者事件”。

《中国青年报》立即报道了这个事件：

7月21日——星期天早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几位同学，正坐在楼下谈论着头天晚上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刘奇弟，如何鬼鬼

① 参见《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

崇崇企图混入人大进行活动的情况时，忽见一个身穿白上衣、黄裤衩的短个子男人，偷偷溜进了林希翎的宿舍。少顷，吴连起等也到林的房间里去了。不料，这位不速之“客”见人进来，慌张地收起密语，怒恨地向来人递过仇恨的目光。后来，当吴连起问起他的来历，没想到他竟作贼心虚地暴跳起来，他摇晃着手里的会客证大叫：“看见了没有？……你们人大简直是地狱、乌鸦……”同学们暂时容忍了他的粗暴行为。但是，同学们看他的言行不象一个正常的同学，随即追问他的来意，于是，他便对人大和人大的同学，进行了恶毒的辱骂；并撒谎说：“我是经过你们的党委批准来的。”当同学们揭穿他经过党委批准的谎言时，他反跑到校党委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人大不讲理。当同学们要和他说话时，他竟然打伤了四位同学，企图逃走。

就在这时，同学们知道了：原来他就是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二年级的学生，名叫计守勤，是个党的叛徒（7月4日在反右斗争中被清除出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整风以来，他在北医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要取消共产党，成立一个所谓的“真金党”；他煽动同学们不上政治课，并极力称赞和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的一切言行。他这次到人民大学就是为了与林希翎密会，企图向党和人民进行新的进攻。

在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同学们，闻讯后从四处拥来，近二千同学包围了这个坏分子、野心家。随后，一场激烈的面对面的斗争开始了。

刘秉钧同学当即指出他来人大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权，同时又是一种反动的行为，要求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被计殴打的关连起、康丁同学，当场宣读了根据国家刑事法律所拟的控诉书，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支持。

最后，在留校的一千九百四十二名师生员工的签名要求下，把右派分子、刑事罪犯计守勤送交海淀区公安分局依法论处。^①

“行凶者事件”报道后的第三天，即7月27日，《中国青年

① 见《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4日。

报》又以《流氓和骗子手》为题登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王保勤、张玉书的报道，其中《罗曼蒂克史》一节十分引人注目。

此文中说，林希翎在道德上的堕落，已经达到了很惊人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在她过去短短的一段生命史上，就和十多个人谈过“恋爱”。在南京时，她曾同时和好几个人发生暧昧关系，创造了“多角恋爱方式。”她和别人“恋爱”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而已。例如，她根本不认识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同志，却给他写了一封“求爱”信，××同志非常生气，把这封“情书”交给了组织。可是她还恬不知耻地向别人说：“我和××同志经常通信。”再者，没和别人谈上几天“恋爱”，就伸手要钱。此外，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不妨叙述如下，请读看看林希翎是如何卑鄙吧。

她在人民大学同学中宣扬说，空军某军官向她求爱，还向她哭了……。巧得很，这位军官最近专门来学校揭露了这件事情（揭露时林希翎也在场）。原来，林希翎从1951年起就开始追求这位军官，但人家早看透了了她这个卑鄙的灵魂，一直没有答应。于是林希翎又哭又闹地非要人家爱她不可，并且施展了种种卑鄙的手段。……这位军官当然不会答应，而只会更看透了了她的卑鄙。于是林希翎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我有个对象在人大当助教。”林希翎看威胁不成，就破口大骂：“你们男同志没有个好东西，我恨你们，我要报仇。别看我和男同志眉来眼去的，他们要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骂得他们下不来台，把他们一脚踢开。我在人大就踢了好几个。”

对林希翎的罗曼史的描写，在《中国青年报》另外一篇吴一铿等写的文章中也有。吴一铿的文章中写道：

很早以前，林希翎就用自己的女色迷住了共青团某机关的一个做机要工作的干部，先从这里盗窃一份党内机密文件。后来又在其他地方盗窃了一些机密文件和内部情况。这就是她向党发起

全面进攻的准备工作。^①

北京的消息传到林希翎的家乡——浙江省温岭县箬横区后，“引起了当地群众极大的愤怒”，便揭发她忘了共产党的恩情，是有根源的。她的父亲受过黄绍一的训练，黄绍竑解放前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血债累累。由此看来，林希翎的反动也就合情合理了。^②

林希翎的日子不好过了，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詹寰的日子也难过起来。因为据别人揭发，“他用全部心血支援林希翎”，他“还多次把报社内部材料和内部刊物偷出去给林希翎看。当北京大学学生准备反击林希翎时，他又自动担任情报员混到北大刺探消息，与林希翎密谋对策。”^③

因此，他被称为林希翎的“谋士”。

但是，“谋士”的命运不会比林希翎好。他被从采访地苏州调回到报社，接受批判。

○ 右史演义·魔鬼戴上了 天使的面具·三仙姑的来历

一个人成了伟人（好人），那么他的缺点也成了极富个性的优点；一个人成了“坏蛋”，那么他的一世所作所为连同他本身都打上了丑恶的烙印。

这符合国人的思维。

因此，右史演义中的林希翎变成了一个狂女、一个戴上了天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12日。

② 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31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8月5日。

使面具的魔鬼、一个三仙姑式的无赖也就合情合理了。

《文艺学习》杂志在1957年第8期便推出了署名常宏的《林希翎右史演义》的长文。

此演义以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形式，写下了洋洋洒洒数万言。

此文内容不妨简述如次：

第一回 稗官开场陈主旨

狂女入学闹玄虚

主要讲林希翎在部队如何不好好工作，如何一心想飞黄腾达，在大学如何自私自利，又如何想丢掉恋爱对象——一个叫游其仁的军官。

第二回 求爱不成遭羞辱

入团未准挨批评

主要讲林希翎谋夺有妇之夫名叫牟生的。并说只要柏拉图式的爱！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回主讲讲林希翎的反动活动经过。

第八回讲林希翎学会了三仙姑（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的本领，所以自己就被称为三仙姑。

演义中说，有一天林希翎把亲信喽罗卫试沼叫到她房间，先是给他挤眉弄眼的出会洋相，接着又给卫试沼灌了迷魂汤，然而两人密谈，刚刚入巷，门“砰砰”响了两下，随后进来两个人，他俩抬头一看，一个是团支书记史珍礼，一个是小周。林卫二人不免有些慌张，林希翎就势床上一歪，随口哼了起来。卫试沼尴尬地站起身来，“啊啊”地叫了两声，没说出一个字来。史珍礼不知底细，向林希翎问道：“你病了吗？”

卫试沼煞有介事地说：“嗯……嗯，你不知道，一盒火柴少了半盒，可能她吞下去了，刚才还呕吐来着。”

这时站在身后的小周煞是机灵，环视室内并无呕吐痕迹，就

故作惊讶地问道：“那可不得了！干嘛不找医生灌肠啊？”

这句话正好触痛了林希翎的心病。她就突然像三仙姑上了神似的，将头发一把扯乱，双腿在床上不住地乱蹬，口中大声嚷叫起来：“哎呀！妈呀！我怕！啊……啊”嚷着嚷着又从床上坐了起来，两眼瞪着天花板，

“那是什么？鬼！鬼！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史珍礼见她装疯卖傻，立即严厉地说道：“你放明白点！这个当不了事！一会请你参加辩论会。”

.....

林希翎就写到这里了。这位浙江的女子，无论是天使、抑或是魔鬼，她的名字，都已刻在共和国 1957 年历史的巨柱之上。

天使的辞典里少不了她，

魔鬼的辞典中也会记下她。

谭天荣 · “哲学的狂徒”

谭天荣，1957 年为北京 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

○北大不是乐园 · 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的，北大不是乐园。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踏进北大校门的人，便从心中产生了一种神圣的感觉来。

这是十分神奇的。

没有人专门去阐释这种神奇。

《圣经·马太福音》上说，一切源于上帝的旨意。

中国人大多不相信这一套，但北大就是神奇。

不知谭天荣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或许，他比一般人体会的更深，或许他和一般人的感觉迥然不同。

但无论如何，这位 1954 年 8 月踏入北大校门的物理系学生，会比别人更深刻地认识到

——北大不是乐园。

○平妖传又一章

“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这是当年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尤利乌·伏契克的话。

光明日报记者钱统纲引用了这句名言，其引用的时间是1957年7月23日，引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警惕谭天荣这一类人。

他的这篇文章登在1957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题目为《“平妖传”又一章》。

钱统纲在文中说：

“毒草的种子是在五月中旬趁北大的整风机会出土的，一出土，就发出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信号。这就是5月19日张元勋和沈泽宜用大字报形式发表的诗“是时候了”。……

这是什么样的诗，泛滥着什么样的情绪，不妨请看：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
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这首诗一发出后，谭天荣首先向党开了火。5月20日，谭天荣以“一个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的名义贴出了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

仅凭这一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足以使他名列大学生右派

榜首，而他在此大字报张贴之后又连续贴出了“绝交书”、“又一株毒草”、“几句人情话”、“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救救心灵”等多篇大字报。

北大的毒草发芽了！

北大的毒草开花了！

除毒草者·萧捷父

谭天荣的大字报，吸引了充满了朝气的北大师生。他的身边，跟随起一些拥护者，龙英华、沈泽宜、叶于生、刘奇等便是其中的代表。龙英华后来同谭天荣一样，也成为中国的著名右派人物，在西方人为中国所列的一百名右派人物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反对谭天荣的人也有的是。

1957年6月22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集会，开始有组织、系统地批判谭天荣的观点。

哲学系教员萧捷父首先对谭天荣进行批驳。接着、历史系研究生张磊、梁从诫，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俞忠钰，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康式昭、天津大学学生王大琦，纷纷登台，对谭天荣连续开炮。

以下是萧捷父、康式昭、王大琦的发言内容。

萧捷父——

谭天荣和目前向工人阶级政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一样，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打着“反对三害”的旗号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打着“争取民主”的旗号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

谭天荣在他写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混淆是非，歪曲历史，散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苏联和反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言论。

谭天荣利用“争取民主”的幌子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更暴露了他的反动的政治面目。谭天荣在“又一枝毒草”中号召所谓“认识了历史必然性的战士们”和“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组成“百万大军”，进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并说，“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各有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地毁灭。这不是赤裸裸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么？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高阶级觉悟，划清思想界限，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

康式昭——

最近从天津来了一个同学，告诉我们谭天荣等人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发现谭天荣等打着介绍北大学生帮助党整风的经验的幌子，在各大大学大肆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并且秘密地为他们的反动小集团进行发展组织活动。他们带去“一株毒草”、“白毛女伸冤”等反动宣传品，在大学里散发。

在天津师范学院，他们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挑拨学生反对学生会。但是他们的阴谋诡计很快被揭穿了，受迷惑的同学很快清醒了。有些学校的同学们把他们赶出了校门。

王大琦——

我在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谭天荣，谭天荣看我不是党、团员，曾把我当作“发展对象”，他在我面前说了很多反对社会主义、污蔑共产党的话，还散布了很多谣言。谭天荣还说，他们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要发展组织。但是天津的大学生们看穿了他们的反动面目，没有人上他们的当。……我们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右派作坚决的斗争。^①

① 《中国青年报》1957年6月24日。

○ 东征天津·北大风雷更响

谭天荣天津之行前，据说卖了铺盖作路费，大有英雄之气概。

6月2日左右，他和北大其他五位同学先后到达天津。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鼓动天津学生。

对于谭的东征天津的收获，《中国青年报》在1957年6月29日以“害群之马碰壁记”为题作了报道：

2日晚上七时半，南大学生会为他们召集了大会。刘奇弟第一个登台讲话。讲了不久，许多人有意见，说他讲话不清楚，论点不明确，希望北大推出一个代表来讲话。于是谭天荣登台开讲，中途陆续有不少人离开会场。他讲完后，就有许多人要求发言。13个人要求发了言，可惜，竟没有人赏识这些北大学生的“天才演说”，发言的内容全是反驳和责问。还有不少人说北大学生的讲话“论点混乱”、“莫名其妙”。

这时已经深夜十一点五分，南大学生们宣布了三个人提上来的建议：

一，请北大学生先回去，自己把论点弄清楚再来。

二，建议学生会以后不要再召开这样的会，要珍惜大家的时间。

三，南开大学整风运动已经展开，今后不要再叫北大学生来校影响学习。

台下热烈鼓掌支持，还喊着：“请他们回去！”

3日，谭天荣等人到了天津师院。同学们还是把他们当作北大的宾客来接待。下午，谭天荣又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传播起他那“天才”的头脑幻想出的“真理”来。……

正当他说得洋洋得意之际，演讲台后已贴上了大字标语：

“北大学生扬言介绍整风经验，实质上是造谣，……”

.....

这几位“客人”在师院留下了一项“成绩”：一大片以“滚回去”为标题的大字报和“数四争鸣小组”的同学对他们的揭露。大字报中有一首为他们而作的打油诗：

北大站不住
清华往外驱
南开赶出去

.....

谭天荣等人从天津返回北大之后，北大的反右风潮已经高涨，批判会一场接着一场。学生们已不能以学为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必须表明态度，站稳立场，这是经学习重要了一千倍一万倍的大事。

当然，教授们也认识到反右的意义来，很多人也口诛笔伐。

为了给右派分子强有力的反击，北大特请了吴晗副市长、翦伯赞、侯仁之、冯定、黄昆、龚祥瑞等教授作了报告。

翦伯赞在报告中讲：校内少数同志的错误言行，客观上助长了校外某些右派分子的声势，引起了他们的错觉。他们把北大的某些同学当作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群众基础，当作他们谬论的市场。

对谭天荣等人的批判，自发性越来越强。

一次，谭天荣刚贴出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墨迹未干就被学生团团包围，拖至“辩论台”向他责问：“你为什么污辱党中央？”“究竟是党中央在散布仇恨还是你在散布仇恨？”

愤怒的声音此起彼伏，在众目所示、众手所指之下，谭天荣付之一笑。

“你不要嘻笑掩饰空虚，你说的那些荒唐话，根据是什么？”

一个炊事员气愤不过，也跳上台来，指着鼻子问谭天荣：

“你不要臭不要脸，人民拿大米白面养着你，你反共反社会主义就老实交待，甬跟我讲什么辩证法、物理学儿，你再耍赖，假

充乐观，就是自走绝路！”

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谭天荣回答不出大家的问题。

“真理的战士”被群众赶下台去。

在布告牌前反击的大字报上马上出现：

“警告你！谭天荣，我们准备着，你企图反扑一百次，我们就准备与你交锋一千次！你不认罪就没你藏身之地。”

7月上旬，北大已到了放暑假时间。一些应届毕业生已买好回家车票或自费出国旅游票，为了与右派斗争，纷纷退票。^①

○ 春天不再来·忏悔录

谭天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在当年不仅是全国人民所要了解的，而且也是报纸必须予以披露的。

他——当然不怎么好。

至少，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

他“对自己的吹嘘最狂妄最无耻，他经常搬用‘否定之否定’，康德或者近代物理学，创立所谓‘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梁从诫揭穿他说，‘谭天荣在文科学生面前炫耀他的物理学，在理科同学面前就大谈文史哲。他不答应四年级物理系同学请他去辩论，而中文系一年级同学请他，他就去了。一次露天辩论会上，他看周围没几个物理系同学，就厚着脸皮说，我的物理学论文一旦发表，那时制造氢弹就和制造玩具一样容易。’^②

“原来他的物理学得很糟，黄昆教授说，他不过有二、三年级

^① 《文艺报》1957年16号。

^② 《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日。”

的水平，

“至于他的哲学，郑晰教授谈起就摇头，说是一窍不通，

“雷海宗教授写信给北大同学说，他没有和谭天荣谈过任何哲学的看法，他只问过谭天荣，读过何种黑格尔的作品，因为他提黑格尔的地方特别多。谭天荣说：他只读过中文译的一部分，并承认不能读外文。雷先生又问他曾否向贺麟先生请教过，他说也没有。”^①

.....

够了，报纸的报道说明了谭天荣是一个无知的狂徒，一个自称哲学家的狂人。

但，似乎谭天荣没有屈服，他的信心很强。在一个大字报上，他抄录了雪莱《西风颂》诗中的一句：“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学生们立即反击，就在那句诗的旁边写道：

“如果你一直自绝于人民，你的春天是永远不会来的。”

围绕着这些大字报的旁边，正贴着“批判谭天荣”，“再剥谭天荣的外衣”等大字报。

又有一个不具名的人在旁边为右派分子刘奇弟写道：“不要怨恨，不要忧伤”。立刻，许多学生就在上面写道：“这是一首有毒的诗句。要求作者写出名字来争论。”^②

反右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曾经追随谭天荣的学生，在苦海中回头寻岸。忏悔自己的过错。

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开始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信，要他的父亲出来“喊冤”（他的父亲在三反中被斗争过），这时候主动把父亲给他的回信公开出来。他的这种行动，得到了同学的欢迎。他

① 《光明日报》1957年7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

后来被同学们推为“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的起草人之一。^①

○ 阶级分析法·垃圾一堆

中国形势继续发展，反右斗争也越来越深入。国内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角落，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并且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刨根挖底。

北大少有庸才，这种方法运用虽晚，但很快得心应手，运用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赵震江对右派分子的家庭历史和个人经历作了详细的统计。

他道德解剖了北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据点“广场”骨干分子陈奉孝、龙英华、张元勋、崔德甫等 15 人的情况：

一，从这些人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之中有十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占 15 人的 75%；

二，从他们的亲属关系的情况来看，有 6 人（占 40%）的直系亲属中有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的；

三，从他们的政治品质来看，因混入党团组织被清洗的占 27%；

四，从这些人的道德品质来看，其中流氓盗窃分子占 14%，另外他们之中还有象刘奇弟那样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旧社会的渣滓，是新社会的垃圾。

赵震江继续举出事例：

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政客的右派分子严仲强，他

① 《中国青年报》1957 年 7 月 2 日。

认为自己是活在“死人堆”里，他咬牙切齿地咒骂党员、团员和一切正直的人们。他说：“我如果要死，也要抱着你们一块死。我要触电，一手摸电，一手也要抱住你们。”

另外，也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是由于个人主义极度发展，成为野心家，成为右派的。共青团叛徒，右派分子谭天荣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不接受党团组织的教育，不进行自我改造，听任自己的错误思想日益滋长，一直发展为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狂妄自大。

在另一篇关于北大右派分子的文章中，文章作者也对右派人物作了一些分析和归类：

刘奇弟——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

李燕生——因偷盗被判八个月徒刑，刚刚刑满，曾两次潜入女浴室，

龙英华——共产党的叛徒，

李亚白——一贯偷盗书籍，

叶于——抗美援朝前线的怕死鬼——逃兵，

张元勋——破坏参加军干校，散布反动言论，被开除了团籍，有杀兄之仇，

陈奉孝——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①

这里面没有提到谭天荣，大概他本人的家庭成份比较好，亲属也没有被关被杀的，他自己也没有潜入女浴室或偷盗财物。

但是比以上提到的更危险的人物。因为事实已证明，报纸对北大右派学生的批判，他是中心人物。

○ 密信·公开信

^①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

和北大一样，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也抓出了学生右派代表人物——一年级学生孙希光。

报纸披露说，孙希光交出了两封密信，一封是他6月30日写给谭天荣的，另一封是7月1日他写给人大林希翎的。

在给谭天荣的信中，报纸没有登载全文，仅摘录了其中的一些词。这些摘录的词句有以下这些：

“荣兄”，

为了我们的事业，弟虽不同生，但愿同死誓与兄共生共死。

那个满不在乎的样子，实在太傻，

我几乎恨一切人，真想杀他妈几千万！

在饭厅东边楼下看见了你，看你了两次，但在众目之下我不敢和你谈话。

你应该沉默，不必和他们去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立即解散“百花学社”等组织，保存实力，等反右派斗争过去后，再图恢复，禁止一切活动。

你要懂得策略，退却别再攻，以退为进，请向刘（奇弟）、龙（英华）、郑（瑞超）诸兄致意，并转告他们。

用自杀来吓唬他们，再不答应，就装疯作傻（如骂同学，说我爱你啦，在别人床上大小便）。

反右派运动很快就会过去，到那时情况就会反过来，……到那时再组织反扑，东山再起。

谭天荣侄儿收（信封上字）。①

在另一家报纸上，也公布了一封信。是刘奇弟给谭天荣的公开信。

很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不是摘录，而是照登原文：

你常批评我太主观，不客观分析问题，的确，我曾经是这样。但是我今天可不再主观蛮干了，而你却不是这样，例如：

1，你说群众现在还是同情支持你，这恐怕与事实不符，而且事实叫

① 《光明日报》1957年8月26日。

我无法相信,不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群众对你的最坚定的同道和最亲近的朋友——我都这样的憎恨和反对。

2,你说一年之后就会胜利,和波兰一样地变革,但波兰是怎样变革的,变革之前又是怎样,工人委员会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不甚了解,我深信你也不会了解,而如今我国的情况呢!工人农民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现行的政策,为什么变革?谁要我们变革?

3,你说天下要让我们才子佳人来管,我们首先看看天下和我们吧!老实说,天下确实很太平,而我们确实只会折烂污,即使退一步,“天下不太平”,若让我们来管,那只会更加糟糕,不信的话,回顾我们组织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百花社”、“广场”,那一个不是乌七八糟。算了,我看还是虚心点好!①

中国青年报也不甘落后,于9月2日登出北大学生徐列车员的信。同时登出北京——天津线列车员的揭发文章。

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赵健说,谭天荣认为只有大学生才能有前途;我看他那样的才子佳人没有前途的。

列车员王贵忠、杜鸿沃也在文章中愤慨地写道:“右派分子谭天荣由北京到天津去的时候,乘坐我们火车上,向我们青年列车员点火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为什么在毫不怜惜地消磨自己的青春……?”

风云变幻,三十年弹指而过。

当年的“哲学狂徒”,仍然留下依稀的影子,在北大的校园上空,若隐若现……

①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日。